

天下第一策

历代状元殿试对策观止

主编 李维新
副主编 贾滨 赵学武





中州古籍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这是唐人描写进士及第后的情状，可想而知中了状元的进士又是何等志得意满、神采飞扬了。

天子点元、大魁天下是科举时代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而那些十年寒窗、一朝成名、进士中式的贡士们赖以完成最后冲刺、角逐状元之位的，便是一篇命题时事论文——殿试对策，状元的殿试对策自然堪称“天下第一策”了。

状元策的主题，不外是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然因皇帝的策问往往是感时感事而发，对策也自然要有的放矢，陈述政见；罄其所学，展才施智，故多注重“时务”，富有现实性，而少了八股气，且不乏典雅严整而又文情并茂的佳制，具有很高的史学、文学和审美价值。

往事如烟，科举制度已消亡近一个世纪，状元策也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难以寻觅了。今天，我们广搜博采，得百余篇，约请有关学者进行整理，前加状元生平档案，后则加以赏评，使读者得以体验那种皇帝般的幸运，去品味历代状元的得意之笔。

状元

天下第一策

历代状元殿试对策观止



主编 李维新
副主编 贾滨 赵学武

中州古籍出版社

序

陈天心

甲

现在,人们一般爱把成绩最好的称作"状元",泛用于各行各业,其实这与"状元"的本义是相去甚远的。按照中国最末一科(光绪甲辰科)殿试探花商衍鎏的说法:"按状元之称始于唐,因唐制举人赴礼部试者,皆须投状,殿试第一谓为状元,意义如此。"①看来认识"状元",必须注意两点:第一,"状元"是与科举制度密切联系着的,或者说,严格意义的"状元"只能存在于科举考试之中;第二,"状元"是与殿试密切相关的,或者说,严格意义的"状元"只能通过殿试才可产生出来。这两点都涉及到我国古代官人制度上许多复杂问题,这里只能稍加说明。

关于第一点。我国古代的官吏选拔任用制度,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可以大抵区别为六种主要形式:一是自然为官;二是选贤任能;三是乡举里选;四是养士用客;五是察举征辟;六是设科考取。

"自然为官"依杜佑《通典》所说,乃系"曦后"时代的"以物命官",可能是根据对象的自然特性和需要随即性的任"官",这实际上反映的是生产力极其低下阶段"初民"的任"官"情况,本无所谓

"官";"选贤任能",大抵生成于尧、舜、禹的阶段,它主要是根据对象的"贤能"——才智和能力,或者说是根据对象为人类谋福利免灾患的实际能力和功绩,通过群推公选(实际是由一些重要人物提议)和一定的"试用"、考核来确定"官"的人选的。从一些文献材料可以看出,到了夏禹时代,"选贤任能"就已经具备了颇为明显的制度特色了;"乡举里选",主要实行于殷、周时代,它是通过官方的逐级逐层教育——选拔——再教育——再选拔,然后任命官职,给予爵禄的制度,有所谓"秀士"、"选士"、"俊士"、"造士"和"进士"等名目,为后世所追慕和仿用;"养士用客",是春秋战国时代常见的选才用人形式,大抵是由"人主"招贤纳士,将其作为"客"或"客卿"予以礼遇并任用之,据说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办法,"察举"和"征辟"是汉代的两种主要选才方式,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据一定的标准"礼聘"(实际仍是选拔)对象来任官。当然,汉代的命官形式并不止于此,比如它的"博士"和"博士弟子"制度,就曾起到重要的官人作用。其后还有魏晋以还颇具势力的"九品官人法"等等,但在性质上仍与察、征为近。总的说来,以上五种除第一种以外,其余四种,就性质上讲,都可以归之为"选举"制度;就时间而言,大抵主宰了自夏至隋即"中古"以前漫长时期里的官人领域。

与之相对的是"科举"。一般认为科举始于杨隋,但从较为系统的材料看,作为完备的官人制度的科举,应是从唐代开始大行的。所谓"科举",就是统治者根据其统治需要,设立不同"科目"及相应标准,让士子选择攻取,官方根据考试成绩录取一定数量的"合格"者,授予官职。因此,从官方角度看是设科考取士人,而从士人方面看,则是应科考取官职。由于科举制度比较地更具优越性,因而自唐迄清,为历代统治者所沿用不废,成为"中古"以后漫长时期里主宰官人领域的制度。

唐代科举有"常科"和"制举"的区别:前者是每年定期举行的

科目大抵确定的考试;后者则是科目和时间相对不很稳定的考试,而且是以天子的名义举行的。[②]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时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③]但在具体施行中,由于朝廷政策倾向,士子兴趣志向,以及社会风尚影响等因素互相作用,使得“明经”和“进士”成为当日举子的最热门选择,而尤以“进士”科最具魅力,竟形成“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和“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④]的局面。

唐代科举的考生来源分两大类: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用现在的情形来比方的话,“生徒”约同“在校考生”,“乡贡”约同“社会考生”。不过,从一些记载看,“生徒”似乎主要来自京(都)各学、馆,所以《新唐书·选举志》又说:“而选举不由学馆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无论哪类考生,都是要经过逐级考试选拔后才能获得到京(都)参加中央考试的资格。“既到省,皆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⑤]考生到京后要办理一系列报到、证明、住宿等手续,在提交的各种书面材料中,有“家状”和“文解”。所谓“文解”,“当是各州府发给举子们的荐送证件,由举子向尚书省有关机构(先户部,后礼部)投送”。“家状则是举子所写的本人家庭状况表,内容包括籍贯及三代名讳”。[⑥]

以上情况表明,在唐代科举中,举子从“怀牒自列于州县”,到“至京(都)后疏名列到,结款通保”,以至提交家状、文解等等,一路都离不开“书面材料”,这些书面材料,大概就包括商衍鎏所谓的投状之“状”吧。不过,我仍以为“状元”之“状”并不仅仅和这些“书面材料”相关,还应有别的取义根据。清人赵翼就曾说,“自武后初试贡士于殿前,别其等第,门下例有奏状,其居首者曰状头,亦曰状

元”。[7]“状元”和“奏状”的关系，可能更密切。不过，武后试士是怎样“别其等第”的？门下省又是如何“例有奏状”的？赵氏均语焉未详。以笔者浅陋所知，武后所试，乃为“制举”贡士，是否要“别其等第”？又是否须门下省“例有奏状”？都或未必。按唐代知贡举在开元二十四年前多由吏部考功员外郎充任，其后则由礼部侍郎专掌。现所知唐代“状元”多为常科，而“常科”及第与等第通常情况下在知贡举那里即可确定。而知贡举在确定之后，既要向上级或有关部门呈（通）报结果，又要向社会公开等第，前者大约就是用“奏状”，后者则为“张榜”（或曰“放榜”），因此“状”和“榜”其实就是一个内容的两种不同形式（或称谓），因此“状元”其实也就是“榜头”。联系到第二名称“榜眼”，则更能证明“状”与“榜”虽名二而实一。《唐摭言》记尹枢曾自告奋勇替知贡举杜黄裳填“榜帖”，而把“状元”留给自己的史实不仅可证“状”“榜”实际为同一回事儿，而且还可以表明“帖”也属此类，这些都是在知贡举那里便确定了的，并不必要等到门下去“奏状”，而且唐门下省的职能里，似乎也没有这一项惯“例”。[8]

“状元”和“殿试”的关系，也可以追溯到唐代。据《唐会要》载：“载初元年二月十四日，试贡举人于洛成殿前，数日方毕。殿前试人，自兹始也。”《资治通鉴》则径谓“贡试殿试自此始”。“载初”是武则天当权时的年号，其年（690）九月九日，她便“革命”，以唐为周，即位皇帝，改元“天授”。但如果说“殿试”就以此为始，又似不确。因为唐代的“制举”既然是以“天子自诏”的名义进行的，考试时“或在殿廷，天子亲临之”，实际上和武后的亲试没什么实质区别，而这在太宗、高宗时就已举行过。但唐代的殿试和后来严格意义上的“殿试”则很不一样。

严格的殿试，应是在天子殿廷进行的，由天子（至少在名义上）命题、亲试、亲阅和亲定录取的进士考试，而且要将所录取的进士

分为“三甲”:一甲三人,为“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一般为七名)人,为“赐进士出身”;三甲为余下之人,为“赐同进士出身”。而一甲又分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分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而有资格参加殿试的,都是通过了全国“会试”的及第者(或称贡士)。据介绍:宋太祖乾德二年(964)亲试制举,开宝六年(973)于讲武殿试进士,从此“殿试”才成为相对稳定的制度。进士分甲,则始于宋太平兴国八年(983),但当时一甲不止三人,且有“五甲”之分。起初的殿试尚有所黜落,至宋仁宗时,出于怜悯,才令殿试不再有黜落,从此成为常规。严格意义的“殿试”制度,要到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才完成并大抵固定下来,并为后代所沿用,且更加周密。

从以上简略考察中可以知道:第一,早期(如唐代)的科举虽有“状元”,但不一定非经殿试不可;唐代虽然有“殿试”,但多系为“制举”而设,其及第者不一定非定出“状元”不可。第二,严格意义上的“状元”应产生在严格意义上的“殿试”制度稳定之后,即始自明初。显然这样的“状元”只能出现在“进士”里。

乙

殿试一般只考“时务策”一道,就是针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诸般现实问题写一篇分析和解决的“对策”,约同于今天所谓的“时事论文”。当然,问题是由皇帝(或以他的名义)提出来的,应试者只能就此作答。而问题部分便称作“策问”,所谓“状元策”显然就是最优秀的殿试“对策”了,因为从理论上讲,皇帝应该是只凭成绩确定状元的,当然实际执行中,情况远不会如此简单。

殿试的日期,多在三月、四月里。“殿试临轩发策,鸿胪寺官设

黄案，一在殿内东旁，一在殿外丹陛上正中，光禄寺安排试桌在殿内，是日銮仪卫设卤簿法驾于殿前。黎明，新贡士袍服冠靴于丹陛排立，按中式名次，单名东，双名西，王公百官朝服分立丹陛内外。皇帝升殿，作乐鸣鞭。大学士就殿内黄案捧策题，出授礼部官置丹墀黄案上，读卷执事各官及贡士行礼。礼部官散题纸，贡士跪受，乃就殿内试桌对策。"这是载入典章的殿试仪程，实际上并不能每次都如此排场周备，但显然要比乡试、会试的规格和礼遇要高得多。

殿试的试卷有着较为严格的格式："第一开前半页写履历三代，文为应殿试举人臣某、年若干岁、系某省某府县人，由附生(或增廪生)应某某年乡试中式，由举人应某某年会试中式，今应殿试，谨将三代脚色开列于后，下开曾祖某、祖某、父某，已仕、未仕，于名下注明。"试卷的质地、大小也有一定规格，如"乾隆四十八年，改小为长一尺四寸，宽三寸七分弱。"同时，"外给草本一本，尺寸略小，纵横与正卷同，有横格行二十四字，载策式于草本之前。"⑨

至于策文的写作，也有格式："起用'臣对臣闻'，收用'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臣'字旁写，初用'草茅新进'，自宗室预试后改为'末学新进'。低二字写，空上二字留为抬头之用。策文不限字数，最短以千字为率，不及千字以不入式论……欲得高策者，策文必须充实写满，兼重书法，写时恐防错漏，则用蓑衣比格起草，写毕撤去。书写时间占大半日，限于晷刻，为文不暇构思，因预拟兵、农、刑、礼、吏治、河防、盐铁、工赈等数十门条对空文。问题发下，按照每门参入题旨，加以点缀成篇。策冒文四行八行无定式，后则相沿用十四行，策尾文六行或八九行，亦皆予拟携入。中间答问四道，每道约三百余字，十六七行。第一道以'伏读制策有曰'作起，第二、三、四道则用'制策又以'作起。文内颂圣，'钦惟皇帝陛下'，'干冒宸严'句，其'钦惟'、

'干冒'须在行之末二字,'皇帝'、'宸严'另行双抬,策冒必有颂圣双抬两行,单抬一行,每条策末均有颂圣双抬一行,策尾亦有颂圣双抬一行,此皆嘉、道以后互相沿袭,限制束缚;顿成一时通例。"[10]此外,在文字形式和书法方面也有一定要求,大抵越往后来越严格。至于"内容"方面,虽然因题而异,但总之应以合旨为要。

殿试之后,试卷先由"读卷官"预阅,并排出先后次序,虽然名义上应由皇帝批阅,但实际上他是不可能一一亲览的,故改由大臣"读"给皇帝"听",后来连听也免了,仍由大臣来代理。康熙二十四年(1685),"始令先以前十本进呈候钦定"。原先在进呈前便预拆弥封了,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则命阅定甲、乙后再拆。"是日晨,帝御养心殿西暖阁(住西苑则在勤政殿),阅毕亲定名次,召读卷官入拆弥封,即于御前用朱笔填写一甲三名次序,二甲七名亦依钦定名次书之,交下即缮写绿头小笺,传前十名引见,谓之小传胪。"十名以外,则由读卷官到内阁拆弥封,照阅卷时所定名次填榜,谓之"金榜"。一般在次日,举行盛大的"传胪"仪式,按清代的制度,这天清晨,"銮仪卫设卤簿法驾于殿前,设中和韶乐于殿檐下,设丹陛大乐于太和门内。礼部、鸿胪寺设黄案,一于殿内东楹,一于丹陛上正中。设云盘于丹陛下,设彩亭御仗鼓吹于午门外。王公大臣侍班各官朝服序立陪位如常仪。新进士朝服冠三枝九叶顶冠,按名次奇偶序立东西丹墀之末。届时礼部堂官诣乾清门奏请皇帝礼服乘舆,引入太和殿升座。中和韶乐奏隆平之章。阶下鸣三鞭。鞭用皮制,长丈余,司礼者执鞭柄由下飞舞回旋而上,其声缭绕于空中,响彻云霄,音长而韵,如鸾吟凤啸,入耳清脆可听,迥异凡响,如是三次,鸣鞭毕,丹陛大乐奏庆平之章,读卷执事各官北向行三跪九叩之礼。大学士进殿奉东案黄榜,出授礼部尚书陈丹陛正中黄案。丹陛大乐作,鸿胪寺官引新进士就位。宣制曰'某年月日策天下贡士,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

甲赐同进士出身'。传胪官唱第一甲第一名某人,引出班就御道左跪,第二名某人,引出班就御道右稍后跪,第三名某人,就御道左又稍后跪。每名皆连唱三次,嗣唱第二甲某等若干名,第三甲某等若干名,仅唱一次,不引出班。唱时以次接传至丹墀下,所以是日为传胪……礼成,皇帝乘舆还宫。……诸进士左出昭德门,右出贞度门。一甲三人随榜亭由午门正中而出。亲王宰相无此体制,以丹陛中石惟御驾得践,午门中路非御跸不启,文武一甲三人传胪后由此门出,实特数也。传胪后,颁上谕第一甲第一名某授职翰林院修撰,第二名某、第三名某授职翰林院编修,俗称第一为状元、第二为榜眼、第三为探花。"[13]于是大魁天下的"状元"便出现在世人眼前了。

丙

唐人曾以"春风得意"来描写进士及第后的情状,可想而知那些中了状元的进士该是怎样的志得意满,神采飞扬了。不过,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不复存在,在今人看来,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东西不过如过眼云烟,不再有什么实在意义。值得玩味的,倒是记录着他们寒苦艰难的文献材料,所谓"状元策",便属此类。

面对这些"状元策",人们也许不禁要问:"它们有什么用?"这是很重要却又难以一下子回答明白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答案就在我们对它所赖以存在、所由生长的那个社会政治及其科举制度的认识之中,关于这个问题,看来不能不多说几句。

我们知道,科举制度几乎从它开始实行之日起,就一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议论、批评甚至否定,迄于清末乃至当今,仍不绝于耳。

其中较有代表性且广为人知的，如顾炎武谓："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12]"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为白徒。而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计。于是，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宁，斯民之淳厚，岂非却行而求及前人者哉！"[13]至于龚自珍的议论，则更为激烈："（科举使得国家）左无才相，右无才吏，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14]这种无才无学局面似乎表明，科举不仅是无用的，甚至是有负作用的。这些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但须要有一定的立场前提，否则便无法解释科举制度千百年沿用不废、统治者明知"无用"却不愿放弃的历史事实。问题的症结，还须从古代中国政治性质上寻找。

毫无疑问，最理想的官人制度是"选贤任能"，但这个制度只能存在于"天下为公"的时代，在"天下为家"的社会里是行不通的，或者说不能完全通行，这是由"天下为家"政治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古代"家天下"的君主专制政治制度，大抵确立于殷周之际。王国维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同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15]其实周公制礼作乐的"本意"除了如王先生所说的"成一道德之团体"和"出于万世治安之计"以外，恐怕还有更为实质性的一层，那就是从根本上保证一家一姓永世不移地占有并"享用"天下。适应这样的需要，规定天子、诸侯等统治地位的继嗣，必须依"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

以长不以贤"的原则，于是"贤能"便不再是唯一的和主要的条件，而"嫡长"——即血缘则成为绝对的条件。为了弥补统治者所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非贤非能的缺憾，周人又不得不"以贤贤之义治官"，即任命贤能之士为官吏，来"帮助"统治者治理天下；又为了防止官吏利用其贤能而威胁统治地位，便不得不用"道德"来约束和改造他们，这就是"乡举里选"为什么要从"教育"做起，教育为什么必须以道德内容为主的根本原因。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贤能之士既能尽心尽力为统治者服务，又能忠顺不二地服从统治，这或许才是周公制作的"良法美意"的要害之处吧。

准此，在"家天下"的政制下，统治者所需要的"人才"，必然是集"贤能"与"道德"于一身的人才，此即所谓"德才兼备"。但是，由于统治者在不同条件下所需要的"德才"的性质和程度的不同，以及受其政制固有矛盾所决定，在具体执行时便显得五花八门，变换不居。而"人才"们也会利用一切条件和手段，去"创造"所需"德才"，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上下交互作用，左右推波助澜，于是整个官吏队伍充斥着无贤无能不忠不孝之辈，就如歌谣中所唱的那样："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16]这和顾炎武、龚自珍所指斥的情形没什么两样。

上述现象告诉我们，"人才"在古代君主专制政体下，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什么是真正的人才？什么样的人才有用？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选拔人才？不仅是值得我们具体认识的问题，也是古代统治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事实上他们也无不在以自己的方式面对它们。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应该的或合理的东西，一般都和古代统治者所认为的不尽一致，甚至恰恰相反，在他们那里，平庸的人，有时更受欣赏；恶劣的人，有时更为得力；不公正、不合理的选才方式，可能更有利于巩固统治地位……

人们多承认唐太宗是位相对雄才大略英明宽容的君主，这从

他所倡行的科举制度中也能得到反映：允许几乎所有的人参加科举考试；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里开放科举；几乎所有的时间里都给予考试求仕的机会；只要你愿意而且努力，再加上一点勤奋，就有可能及第为官。在考试"内容"方面，主要是以卷面形式来考察并确定士子的"德"与"才"。"进士"科："先帖经，然后试杂文及策，文取华实兼举，策须义理惬当者为通。"[17]大抵说来，"帖经"主要是测试举子的经典记诵能力，属于"基本知识和原理"性的；"策"主要是测试举子对现实社会各方面的了解、认识和应对能力，属于"联系实际应用"性的；而"杂文(主要是诗、赋)，主要借以见举子的性格、情操、气质、精神、才调等"综合修养"，甚至可以从中预见其今后的发展趋势及前途。从理论上讲，这样的考试形式和内容结构，是比较全面合理的，它不仅把士子由被动的出仕机会等待者，变为主动的积极争取者，而且给这种争取以均等的可能，也就是说后天的努力变得重要起来。同时，这样的考试相对客观化和数量化，既便于评阅，也比较易于公平合理。[18]故有唐三百年号为"得人"。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是和李唐统治者所实行的"文德"政治相适应、相支持的，[19]且在具体施行中仍不免弊窦丛生，褒贬不一。所以后来的统治者一面仿效沿用，一面也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改进"，比如"八股文"，据说定制于明初，但它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渊源有自的。"八股文"有两大要点：一是内容上依傍"四书"，模拟圣贤；二是形式上严守八股(比较整饬的八对文字)成文，中间尚有许多起、承、转、合等等"文法"。历来的批评者，大都以为这是导致空疏不学，人才耗竭的要害所在，但是若从"考试学"的角度看，这样的文体，不仅"内容"上有一定的依据，而且"形式"上也有明确的要求，从而使评判时标准更加客观化、确定化和数量化，因而也就更加合理公正。至于其人是否"人才"，对于统治者来说，能把天下士子的注意力集中到科举考试上来，使他们成为"功名富贵"的追求

者并进而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或追随者，从而保证统治政治的顺利施行和永久安定，便是最大的满足了。[20]从唐太宗的“英雄入彀”，到清圣祖的“牢笼人才”，无不透露着统治者对“人才”和“有用”的真实用心。当然，在表象上，他们又无不是以“字育万民”，“含养苍生”为口号的，在“人才”问题上，又无不是以“选贤任能”，“唯才是举”为旗帜的，我们似乎也不能说这些口号和旗帜尽是虚伪的。

丁

根据上述理解，我们今天来看“状元策”，对它的有用与否，就应有一个“历史的”认识，把它在古代的当时中的有用与否，与它在当代的现时中的有用与否区别开来，既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苛求古人。而就“状元策”在古代的作用而言，它们首先是作为殿试的试卷，起到了反映应试者水平、为皇帝区分高下次第的作用，并为朝廷完成了一科考试，也为应试者完成了仕途步入，既成全了皇帝要做天下进士“总座主”的用心，也满足了进士们在现实上和精神上对朝廷的皈依。至于“状元策”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作用，要看考试者和应试者双方的真诚程度，以及统治者对状元策的落实程度。不过，由于“殿试”是一种特殊的考试形式，较之一般的考试说来，具有许多特点，它们本身或许就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状元策”的某些有用性。

首先，“状元策”不是出自普通人之手的一般文章，而是出自状元之手。我们虽然不能否认状元中不乏滥竽充数之辈，但也应当承认，他们之所以能够被钦点第一，总是有其过人之处的。无论怎

样，就那个时代“治举业”的人们而言，状元无疑是最出色的，因而他们的“对策”也应是出类拔萃的。也就是说，“状元策”乃是古代应试策文中最优秀的一批策文。如果我们承认古代应试策文不无可取之处的话，那么，“状元策”无疑是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第二，严格意义上的“状元”，都是由乡试而会试的及第者通过殿试产生的，而殿试惯例是不再有黜落的。也就是说，参加殿试人员，本身实际上已经是进士了，殿试成绩优劣只是供皇帝排定次第而已，并不对他们的及第(即入仕)与否构成致命影响。因此，由于不必为落第而紧张，他们在应殿试时的心理状态无疑会比参加其他考试(如乡试、会试)要来得轻松而自信。而这正是有利于对策时思维活跃和才情发挥的，特别是可以在一种相对说来被礼遇、被尊重、较为舒适的环境条件下从容对策，自由抒写，因而一般说来，殿试对策水平，理所当然能够更加真实而充分地反映应试者的水平，“状元策”则更加如此。

第三，殿试虽然带有浓厚的象征意味和形式色彩，但毕竟在名义上是由皇帝主持的考试。也就是说，不论皇帝有没有“临轩”，殿试参加者在答卷时，都必须把自己“当成”是在面对君主说话，把自己放在“臣”的位置上向“君”陈述政见。在这种君臣名分下，应试者自然不能不认真对待。另外，我们知道，能够面对君主坦陈己见，乃是古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这个机会如果抓住了，那对自己一生的意义，是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分的，因此应试者岂肯轻易错过！仅就殿试的排序意义而言，也是值得一争的，因为这不仅是荣耀天下的美名，而且直接关系到授官及今后的仕途发展。凡此，都决定了殿试时每个应试者都将竭忠尽智，罄其所学，最大可能地展示自己才华，而这显然会导致对策水平的提高。

第四，我们知道，古代君主专制由于采取的是“亲亲”、“贤贤”的原则，往往会造成君主大权旁落，大臣或近侍控制权力的局面，

这样皇帝有时会陷入闭目塞听或无可信任的境地。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往往也会因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官僚的堵塞言路,使皇帝很难听到真实情况和有效进言。而当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时,往往更需要向在职官员以外寻求人才和良策。而“殿试”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这些作用,君主常常真的希望通过殿试来发现人才,获得良策,不仅可以调节政治,而且可以借此笼络新进,以培养忠于自己的力量。凡此种种,都决定了皇帝对殿试确有一定程度的真诚与重视,他在“策问”中提出的问题,未必尽是虚应故事的表面文章。当然,应试者的真诚与重视就更不用怀疑了。然则殿试对策对现实的意义也就不难想见了。

事实上,从这些“状元策”中可以看到,君主们在制策中总是要求“悉心以对,毋有所隐”,“悉心以陈,毋泛毋隐”,“详切敷陈,毋徒泛泛”……其恳切与真诚溢于言表。就其所问及的问题看,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学术、灾异、地理、民族等等几乎所有国家大事。应试者在对答时,固然有将预拟之题点缀参入的现象,但这也从另一方面恰恰证明他们平时在这些问题上还是有所用心的,所以才能在考场上从容作对,显得深思熟虑,胸有成竹,条陈畅达,理据充实。尤其难得的是,有的皇帝能够在策问中不护己短,坦然承让自己的失误或不足,表现出一定的反省与自责,以及渴望得到指点的真诚。如明宪宗在成化五年、八年、十一年的连续三科策问里,这方面的表现都很强烈。而这几年的状元张升、吴宽、谢迁的对策,总的说来还是言之有物,可资参鉴的。就其人后来的发展表现看,许多状元并非徒有虚名,他们中不少人在不同领域里都有所建树,如王十朋、陈亮、文天祥、康海、焦竑、翁同龢、陈冕、张謇等等。所以,无论就补裨现实还是就选拔人才而言,状元大多是有名有实,有其价值的。

戊

这些“状元策”在今天看来，也不是毫无价值的。我们不妨把它们当作历史文献来对待。这些当年国家最高级别的考试卷，在当时已是很少有人能够看得到的，后来，又由于人们对科举制度的指责和否定，又长期受到冷漠，因之，当日殿试的真实情况，皇帝如何策问？贡士们如何对策？试卷的形式和内容怎样？已很少有人能对之有具体真切的认识，甚至有些时期的殿试情况已无从考知了。现在，这些“状元策”就摆在我们面前，一目了然，这种真切感恐怕是任何介绍性材料所难以提供的。在这些“状元策”里，皇帝的策问和状元的对策，因为是关乎“时务”的，因而可以说是当日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现实情况的直接反映，同时也是他们认识和处理“时务”问题水平的直接反映。正因为如此，即使现在读来，仍能感受到浓郁的现实气息。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更直观地把握历史。

我们也可以把它们当作学术材料来对待。因为皇上的策问和状元的对策都围绕着“问题”展开的，这些问题在当日属于“时务”，但在今天，它们是应被纳入“学术”范畴的。于是，每位状元的对策，便都可以视为是对那些学术问题最早的研究结论，同时“状元策”本身也是一个富于魅力且有待研究的课题。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些由状元们在考场上作出的并得到当日统治者称赏的结论，不仅是“最初的”，而且也是背景复杂、蕴涵丰富的，尤其耐人寻味。

我们还可以把它们当作文学作品来对待。“策”作为古代文学的一种样式，虽然早已“死去”，但这并不影响古代策文作品在今天

仍具魅力，而“状元策”既是一种特殊的策文，也是“最好的”策文，它们的文学性即使用今天的眼光审视，仍然是很强的。首先，作为文学性重要因素的“真实性”，在“状元策”里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同时，它们也大抵可以满足文字对于现实性和充实性的要求。故读起来往往言之有物，内蕴丰富。其次，由于状元策是在特殊背景和环境下完成的，作者们往往在追求对答圆满的同时，还力求表现上的出色，很注意在行文中体现自己的修养、气质、性情、怀抱、风采和精神等等，这些实际上正是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因素，这个“人物”当然就是“状元”。皇帝和考官们之所以能够从试卷中“想见其人”并能预见到其发展趋势，原因盖在于此。所以许多“状元策”读来不仅令人感奋，而且令人对其作者心怀向慕，不能忘怀，如清代的韩菼、纽福保、孙家鼐、张謇，明代的罗伦、黎淳、顾鼎臣、罗元化，宋代的汪应辰、张九成、王十朋、文天祥等人的对策，都可谓文情并茂，富于感染力的佳作。再次，状元们在对策时，还会不失时机地展示自己的文学才华和技艺。虽然对策时有一定的体制规定，但高手为文正是要在这种有限之中达到无限，从规矩之中获得自由，于单调之中极尽腾挪变化。因此，他们从谋篇布局，到字斟句酌，以及起承转合等等，都格外用心，从而使其对策达到高度典雅严整且不失风格多样的形式之美。而不同时期的形式之美，不仅是状元们个人文学风格的反映，同时也是那个社会风气、文学好尚的反映。其审美和借鉴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己

和其他古代文化遗产一样，“状元策”同样也是精华与糟粕并

存的，我们在看到它有价值方面的同时，也应看到其它方面。说到底，皇帝的策问和状元的对策，首先都是为那个在本质上不合理非人道的专制政治服务的，在他们一问一答背后，起决定作用的，仍是双方对于荣华富贵等“私欲”的追求，因而它们的积极意义毕竟有限。同时，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阶段，已至于“烂熟”程度，越来越脱离乃至违背它的旗帜精神，而充斥着矛盾与弊端。统治者为了笼络“人才”，往往不顾实际，只把陈腐教条作为取士标准；士子们为了猎取“功名”，也往往不求真才实学，一头埋在空疏无用的“举业”里。更有甚者，通关节，事干谒，徇私舞弊，无所不用其极，最终不仅导致无才无学，少廉寡耻，斯文扫地，人格沦落，甚至殃及天下，遗患后世。这些情况，在“状元策”里也有所反映。有些策问，一副例行公事模样，有些皇帝制策，一派自我陶醉嘴脸，有些对策不过老生常谈，有些状元在对策中大唱颂歌，极力献媚，有的状元在答题时费尽巧智，曲意逢迎。另外，殿试对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严格限制，无疑是造成许多对策程式化的重要原因，使它们雷同刻板，不见鲜活。“状元策”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如果把所有进士策文放在一起，那真要把人读得晕头晕脑，昏昏欲睡了。凡此都提示我们，对“状元策”的价值不宜估计过高。

总而言之，这些曾被认为是由最得意的人们写出来的最出色的作品，现在可以任由我们随意翻阅，不能不说是今天的读者的一种幸运。而让我们得以体验这种“皇帝般”幸运的，是中州古籍出版社以及它的编选者们，仅就此而言，已是值得欢迎和肯定的了。至于见仁见智，本来就是“人之常情”。然则真理亦自在其中矣。

1997 年立秋中于天心居

注释：

①详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118页，三联书店，1958年5月第一版。

②《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谓："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又说："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而列为定科者，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典坟、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帅、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由于经常开考，这些"其名最著"也就和"常科"差不多了。

③《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

④《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4月第一版。

⑤《新唐书·选举志》。按：开元二十四年改由礼部侍郎主试，参见《唐摭言·进士归礼部》。

⑥参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第78～7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一版。

⑦详见《陔余丛考》卷二十八，商务印书馆，1957年12月上海初版。

⑧参见《唐六典》"门下省"条，中华书局，1992年1月第一版。

⑨参见《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111页。

⑩同上，第111～112页。

⑪同上，第114～118页。

⑫《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八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第一版。

⑬同上《经义策论》。

⑭《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12月第一版。

⑮参见《观堂集林》卷十一《殷周制度论》，中华书局，1959年6月第一版。

⑯《抱朴子》外篇《审举》，上海古籍出版社《诸子集成》本，1986年7月第一版。

⑰据《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中华书局，1992年1月第一版。按：此

外开元二十五年敕定之制，在此前后的执行中，容有差异。

⑱关于唐代科举的特点意义，笔者在《唐诗与科举》（漓江出版社 1996 年 5 月版）和《历史的苦涩》（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2 月版）中曾有涉及，可参见。

⑲笔者在《唐代文学的文化规定》中，对“文德”政治有所论及，文载《郑州大学学报》 1996 年第 1 期。

⑳关于科举的“功能”，笔者在《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精神品质》中有所论及，文载《文学遗产》 1991 年第 3 期。

目录

唐

垂拱元年(685)乙酉科 …………………………………………… (1)
状元:吴师道 …………………………………………………… (1)

宋

元丰五年(1082)壬戌科 …………………………………………… (9)
状元:黄裳 ……………………………………………………… (9)
绍兴二年(1132)壬子科 …………………………………………… (19)
状元:张九成 …………………………………………………… (19)
绍兴五年(1135)乙卯科 …………………………………………… (39)
状元:汪应辰 …………………………………………………… (39)
绍兴二十七年(1157)丁丑科 ……………………………………… (51)
状元:王十朋 …………………………………………………… (51)
淳熙十一年(1184)甲辰科 ………………………………………… (69)
状元:卫泾 ……………………………………………………… (69)
绍熙四年(1193)癸丑科 …………………………………………… (82)
状元:陈亮 ……………………………………………………… (82)

绍定五年(1232)壬辰科 …………………………………… (93)
状元:徐元杰…………………………………………………… (93)
宝祐元年(1253)癸丑科 ……………………………………… (107)
状元:姚勉 ………………………………………………… (107)
宝祐四年(1256)丙辰科 ……………………………………… (128)
状元:文天祥 ……………………………………………… (128)
咸淳七年(1271)辛未科 ……………………………………… (149)
状元:张镇孙 ……………………………………………… (149)

元

元统二年(1334)甲戌科 ……………………………………… (164)
右榜状元:同同 …………………………………………… (164)
左榜状元:李齐 …………………………………………… (170)

明

洪武四年(1371)辛亥科 ……………………………………… (178)
状元:吴伯宗 ……………………………………………… (178)
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 ……………………………………… (185)
状元:胡靖 ………………………………………………… (185)
永乐十年(1412)壬辰科 ……………………………………… (190)
状元:马铎 ………………………………………………… (190)
正统十年(1445)乙丑科 ……………………………………… (196)
状元:商辂 ………………………………………………… (196)
正统十三年(1448)戊辰科 …………………………………… (202)
状元:彭时 ………………………………………………… (202)
天顺元年(1457)丁丑科 ……………………………………… (209)
状元:黎淳 ………………………………………………… (209)

天顺四年(1460)庚辰科 …………………………………………… (216)
状元:王一夔 …………………………………………… (216)
成化二年(1466)丙戌科 …………………………………………… (224)
状元:罗伦 …………………………………………… (224)
成化五年(1469)乙丑科 …………………………………………… (238)
状元:张升 …………………………………………… (238)
成化八年(1472)壬辰科 …………………………………………… (246)
状元:吴宽 …………………………………………… (246)
成化十一年(1475)乙未科 …………………………………………… (254)
状元:谢迁 …………………………………………… (254)
成化二十三年(1487)丁未科 …………………………………………… (261)
状元:费宏 …………………………………………… (261)
弘治九年(1496)丙辰科 …………………………………………… (271)
状元:朱希周 …………………………………………… (271)
弘治十二年(1499)乙未科 …………………………………………… (279)
状元:伦文叙 …………………………………………… (279)
弘治十五年(1502)壬戌科 …………………………………………… (287)
状元:康海 …………………………………………… (287)
弘治十八年(1505)乙丑科 …………………………………………… (295)
状元:顾鼎臣 …………………………………………… (295)
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 …………………………………………… (303)
状元:杨慎 …………………………………………… (303)
正德十二年(1517)丁丑科 …………………………………………… (311)
状元:舒芬 …………………………………………… (311)
正德十六年(1521)辛巳科 …………………………………………… (321)
状元:杨维聪 …………………………………………… (321)
嘉靖八年(1529)己丑科 …………………………………………… (330)

状元:罗洪先 …………………………………………………… (330)
嘉靖十一年(1532)壬辰科 ……………………………………… (340)
状元:林大钦 …………………………………………………… (340)
嘉靖十七年(1538)戊戌科 ……………………………………… (351)
状元:茅瓒 ……………………………………………………… (351)
嘉靖二十三年(1544)甲辰科 …………………………………… (358)
状元:秦鸣雷 …………………………………………………… (358)
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科 …………………………………… (366)
状元:李春芳 …………………………………………………… (366)
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科 …………………………………… (375)
状元:申时行 …………………………………………………… (375)
隆庆二年(1568)戊辰科 ………………………………………… (383)
状元:罗万化 …………………………………………………… (383)
万历二年(1574)甲戌科 ………………………………………… (392)
状元:孙继皋 …………………………………………………… (392)
万历八年(1580)庚辰科 ………………………………………… (399)
状元:张懋修 …………………………………………………… (399)
万历十七年(1589)乙丑科 ……………………………………… (407)
状元:焦竑 ……………………………………………………… (407)
万历二十六年(1598)戊戌科 …………………………………… (414)
状元:赵秉忠 …………………………………………………… (414)
崇祯七年(1634)甲戌科 ………………………………………… (421)
状元:刘理顺 …………………………………………………… (421)

清

顺治十八年(1661)辛丑科 ……………………………………… (426)
状元:马世俊 …………………………………………………… (426)

康熙六年(1667)丁未科 …………………………………………… (434)
　　状元:缪彤 ……………………………………………………… (434)
康熙十二年(1672)癸丑科 ………………………………………… (441)
　　状元:韩菼 ……………………………………………………… (441)
乾隆四十三年(1778)戊戌科 ……………………………………… (449)
　　状元:戴衢亨 …………………………………………………… (449)
乾隆四十五年(1780)庚子恩科 …………………………………… (457)
　　状元:汪如洋 …………………………………………………… (457)
乾隆四十六年(1781)辛丑科 ……………………………………… (465)
　　状元:钱棨 ……………………………………………………… (465)
乾隆四十九年(1784)甲辰科 ……………………………………… (473)
　　状元:茹棻 ……………………………………………………… (473)
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科 ……………………………………… (480)
　　状元:胡长龄 …………………………………………………… (480)
乾隆五十五年(1790)庚戌恩科 …………………………………… (489)
　　状元:石韫玉 …………………………………………………… (489)
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科 ……………………………………… (498)
　　状元:潘世恩 …………………………………………………… (498)
乾隆六十年(1795)乙卯恩科 ……………………………………… (507)
　　状元:王以衔 …………………………………………………… (507)
嘉庆元年(1796)丙辰科 …………………………………………… (515)
　　状元:赵文楷 …………………………………………………… (515)
嘉庆四年(1799)己未科 …………………………………………… (523)
　　状元:姚文田 …………………………………………………… (523)
嘉庆六年(1801)辛酉恩科 ………………………………………… (531)
　　状元:顾皋 ……………………………………………………… (531)
嘉庆七年(1802)壬戌科 …………………………………………… (539)

状元:吴廷琛 …………………………………… (539)
嘉庆十年(1805)乙丑科 …………………………… (548)
状元:彭浚 ……………………………………… (548)
嘉庆十三年(1808)戊辰科 ………………………… (556)
状元:吴信中 …………………………………… (556)
嘉庆十四年(1809)己巳恩科 ……………………… (564)
状元:洪莹 ……………………………………… (564)
嘉庆十六年(1811)辛未科 ………………………… (573)
状元:蒋立镛 …………………………………… (573)
嘉庆十九年(1814)甲戌科 ………………………… (581)
状元:龙汝言 …………………………………… (581)
嘉庆二十二年(1817)丁丑科 ……………………… (590)
状元:吴其濬 …………………………………… (590)
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恩科 …………………… (599)
状元:陈沆 ……………………………………… (599)
嘉庆二十五年(1820)庚辰科 ……………………… (607)
状元:陈继昌 …………………………………… (607)
道光三年(1823)癸未科 …………………………… (616)
状元:林召棠 …………………………………… (616)
道光六年(1826)丙戌科 …………………………… (624)
状元:朱昌颐 …………………………………… (624)
道光九年(1829)己丑科 …………………………… (633)
状元:李振钧 …………………………………… (633)
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恩科 ……………………… (641)
状元:吴钟骏 …………………………………… (641)
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科 ………………………… (650)
状元:刘绎 ……………………………………… (650)

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恩科 ……………………………… (659)
状元:林鸿年 ……………………………………………… (659)
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科 ………………………………… (666)
状元:纽福保 ……………………………………………… (666)
道光二十一年(1841)辛丑恩科 …………………………… (673)
状元:龙启瑞 ……………………………………………… (673)
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科 ……………………………… (680)
状元:孙毓溎 ……………………………………………… (680)
道光二十五年(1845)乙巳恩科 …………………………… (687)
状元:肖锦忠 ……………………………………………… (687)
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 ……………………………… (694)
状元:张之万 ……………………………………………… (694)
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科 ………………………………… (701)
状元:陆增祥 ……………………………………………… (701)
咸丰二年(1852)壬子恩科 ………………………………… (708)
状元:章鋆 ………………………………………………… (708)
咸丰三年(1853)癸丑科 …………………………………… (716)
状元:孙如仅 ……………………………………………… (716)
咸丰九年(1859)己未科 …………………………………… (723)
状元:孙家鼐 ……………………………………………… (723)
咸丰十年(1860)庚申恩科 ………………………………… (731)
状元:钟骏声 ……………………………………………… (731)
同治元年(1862)壬戌科 …………………………………… (738)
状元:徐郙 ………………………………………………… (738)
同治二年(1863)癸亥科 …………………………………… (746)
状元:翁曾源 ……………………………………………… (746)
同治七年(1868)戊辰科 …………………………………… (753)

状元:洪钧 …………………………………………………… (753)
同治十年(1871)辛未科 ………………………………………… (761)
状元:梁耀枢 …………………………………………………… (761)
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科 ……………………………………… (768)
状元:陆润庠 …………………………………………………… (768)
光绪二年(1876)丙子恩科 ……………………………………… (776)
状元:曹鸿勋 …………………………………………………… (776)
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 ………………………………………… (783)
状元:王仁堪 …………………………………………………… (783)
光绪六年(1880)庚辰科 ………………………………………… (790)
状元:黄思永 …………………………………………………… (790)
光绪九年(1883)癸未科 ………………………………………… (798)
状元:陈冕 ……………………………………………………… (798)
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 ……………………………………… (806)
状元:赵以炯 …………………………………………………… (806)
光绪十五年(1889)乙丑科 ……………………………………… (813)
状元:张建勋 …………………………………………………… (813)
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科 ……………………………………… (820)
状元:吴鲁 ……………………………………………………… (820)
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 ……………………………………… (827)
状元:刘福姚 …………………………………………………… (827)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恩科 …………………………………… (834)
状元:张謇 ……………………………………………………… (834)

唐

垂拱元年(685)乙酉科

状元:吴师道

吴师道,一作吴道古,一作吴道师。生平、籍贯均不详。

策问

欲使吏洁冰霜,俗忘贪鄙,家给人足,礼备乐和,庠序交兴,农桑兢劝。善师期于不阵,上将先于伐谋。未待干戈,遽清金庭之祲;无劳转运,长销玉塞之尘。利国安边,伫闻良算。明言政要,朕将亲览。**第一道**

朕闻运海抟扶,必籍垂天之羽;乘流击汰,必伫飞云之楫。是知席萝黄屋,握镜紫微,诚资献替之功,必待弼谐之助。所以轩辕

抚运，遂感大风之祥；伊帝乘时，遽致秋云之兆。朕虽惭古烈，而情切上皇，未校滋泉之占，犹虚傅野之梦。欲使岁星入仕，风伯来朝，河荐萧张之名，山降申甫之佐。垂衣伫化，端拱仰成。多士溢于周朝，得人过于汉日。行何政道，可以至斯。思闻进善之言，以副求贤之旨。**第二道**

朕闻明王阐化，化感人灵之心。圣后宣风，风移动植之性。遂使翔龙荐检，鸣凤司农，兽解触邪，草能指佞。仰惟前烈，何德而臻此乎？朕逖听遂初，载钦神化，每欲反斯茕薄，景彼上皇。欲使瑞蓂司庖，仙蓂候月，游四灵于翠苑，集五老于荣河。致此休征，良由政感。伫闻启沃，以副虚襟。**第三道**。

朕闻三微递代，哲后所以承天。五运因循，明王由之革命。或金水而鳞次，应火木以还周；或寅子变正，天人之统斯辨。骊骠改色，昏旦之用有殊。兹乃涣汗图书，昭彰历数。受位出震，以迄于今，莫不母子相承，终始交际。然而都君土德，翻乃尚青；天乙水行，宁宜用白。深明要旨，其义何从？若以秦氏霸基，便有符于紫色；则魏人鼎足，岂复应于黄星？缅镜前修，又以矛盾。张苍之议，既颇反于公孙；贾傅之谈，复远乖于刘向。子大夫学包群玉，文擅锵金。既听南史之篇，方伫东堂之问。详敷事实，靡得浮词，商榷前儒，谁为折衷。**第四道**

朕以紫极暇景，青史散怀。眇寻开辟之源，遐览帝王之道。或载纪遥邈，无其处而有其名；或坟籍丧亡，有其号而无其事。将求故实，以伫多闻。至如化被柱州，创基刑马。两代之事谁远，五德之运何承。石楼之都，见匪均霜之地；穷桑之壤，元非测景之区。时将城彼偏方，惟一隅而独王。轻兹中土，弃九洛而不营。大夏之时，化臻禁甲；隆周之日，道致韬戈。而七十一征，翻在风凰之运。五十二战，更属云官之期。斯则偃伯之人，无闻于太古。摧锋之弊，反息于中叶。浇淳之道，名实何乖？欲令历选前圣，远稽上德。

采文质之令猷，求损益之折衷。何君可以为师范，何代可以取规绳？迟尔昌言，以沃虚想。**第五道**

对策

臣闻栖培塿者，不睹嵩泰之干云；游泞涝者，讵识沧溟之沃日？臣蒿莱弱质，衡泌鲰生。未识广厦之居，安知太牢之味？不量蕞尔，轻从裒然；谬达天聪，兢惶圣问。粤惟皇家出震，累叶重辉。天人归七百之期，宗祊联亿兆之庆。太宗以明一察道，括珠囊而总万方。高宗以通三御宸，转金镜而清九服。用能肃清天步，夷坦帝途。垂莫大之鸿基，托非常之元圣。伏惟皇太后陛下，道超炼石，化轶扪天。被子育之深仁，弘母仪之博爱。星阶已正，尚虽休而勿休；宸极既安，犹损之而又损。方欲还淳返朴，振三古之颓风；缉正苍生，降四海之昌运。拔幽滞，举贤良，黜谗邪，进忠说。故得鸿嵇接轸，和宇宙之阴阳；龙武分曹，节风雨之春夏。礼乐备举，学校如林。俗知廉让之风，人悦农桑之劝。犹复旁求塽议，虚伫刍荛。既属对扬，敢陈庸瞽。诚愿察洗帻布衣之士，任以台衡；擢委金让玉之夫，居其令守。则俗忘贪鄙，吏洁冰霜矣。旌好学之流，赏力田之伍，则家罕贫惰，位列文儒矣。降通亲之使，喻彼枭心；发和戎之官，收其鸡肋。则四夷左衽，颠倒来王；三边元恶，讴谣仰化矣。自然笼羲驾昊，六五帝而四三皇。远肃迩安，飞英声而腾茂实。谨对。**第一道**

臣闻立极膺乾之君，当宁御坤之主，欲臻至道，将隆景化，莫不旁求俊彦，广命英奇。疑庶绩以安人，绥万邦而抚俗。是故轩邱膺箓，委四监以垂衣；丹陵握图，举八元而光宅。于是齐桓拟之于飞

翼，殷武兴之以奠梅。克赞人谋，实宜神化。陛下功包邃古，道逸上皇，受授惟明，谋谟克序。弼辅之任，总风力于前驱；燮理之司，列伊周于后乘。振鹭翔鸾之客，毕凑天阶；乘箕降昴之英，咸趋日路。且犹虚心卜兆，托想旁求，冀山谷之无遗，庶贤良之毕萃。俯访愚鲁，敢述明扬。诚愿发德音，下明诏，咨列岳，访群公。举尔所知，不遗于侧陋；知人不易，无轻于慎择。下僚必录，上赏频沾，则叶县游龙自九天而下降，燕郊骏马赴千金而遥集。汉未为得，周岂能多？尽善尽美，于斯焉盛。谨对。**第二道**

臣闻化洽乾枢，景纬呈其灵贶；泽周坤络，卉木效其祯祥。是以若雾非烟，必应文明之后；九茎三秀，允符光宅之君。陛下应期纳箓，抚运登皇，孝道格于玄穹，仁心光于紫极。自临万域，辑御群方，灵瑞屡臻、休征荐至。五蹄仁兽，乐君囿而来游；六象威禽，拂帝梧而萃止。岂直银黄玉紫，雉白马丹，翻鄗上之二稃，拔江间之三脊。固亦巡河受检，拜洛披图，降五老于星躔，归四神于云路。盛矣美矣！巍乎焕乎！躏三五以腾徽，吞八九而高视。尚且崇谦让之道，守冲挹之德，抑斯天瑞，访此人谋。陛下虽不宰其成功，微臣亦不知其所谓。谨对。**第三道**

臣闻方圆既阙，帝王斯建。四游将六气交驰，五德与三微递变。自摄提著纪，出震登皇，循木火而相承，用骊骠而继作。虽复武功文德，揖让干戈。御旒房以高居，握图箓而深视。莫不垂天人之统，顺寅子之正。始终之际，何莫由斯。暨乎运偶都君，时云土德，道锺天乙，数叶水行。子胜母而尚青，母生金而尚白。略言其美，斯穷奥旨。至若秦居闰位，紫实非正之符。魏得中区，黄标应星之纪。未有矛盾，允惬随时。汉祖承天，人多异议。张苍言水而黑畤方兴，公孙据土而黄龙复应。逮二刘之父子，推五运之相沿，较彼前谈，斯为折衷。臣学非博古，识昧知新，轻陈管穴之窥，猥奉天人之问。惭惶靡地，悚越兼深。谨对。**第四道**

臣闻一剖为三，始鸿蒙于太易。九变于七，渐茫昧于无为。既分清浊之仪，乃列君臣之位。则有天皇首出，瞰柱州而宅土；地皇革命，俯刑马以开都。年匪异于万八千，号稍殊于七十二。既云木德，亦曰火行。开于天地之初，录自帝皇之纪。至若石楼远界，穷桑延壤，非万邦之土中，为二代之天邑。斯乃时犹鹫饮，道尚鹑居，谁知风雨之均，能建皇王之宅。亦分长于九域，岂独王于偏方。乃观象垂衣，化穆羲轩之代。蒴商伐扈，人浇周夏之年。而皇德方隆，未弭战争之患。王道才著，复存韬偃之日。是则怀柔伐叛，取乱侮亡，虽钟大道之行，终伫胜残之战。是故劣于太古，非事优于中代。陛下选芳列辟，垂范千年，王化既平，能事斯毕。亦何必损益今辰之政，师谟往帝之规。抚和琴而促柱，御夷途而止辙，因循勿失，臣谓其宜。谨对。**第五道**

评析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自然无法准确评判武则天二十余年乾纲独运，君临天下的是非得失。但有一点是所有熟悉历史的人共同肯定的，那就是这位震烁古今的封建时代的奇女子对于人才的极度重视。她好贤、求贤、用贤的一些轶事趣闻当时即播在众口，传为美谈。也正是由于此，她才能在以男子为主体的中国封建社会开创女皇主政的特殊时期。

垂拱元年是武则天主政的第二年。前一年二月，她废中宗李显，立睿宗李旦，但实际上“政事决于太后”，而“居睿宗于别殿，不得有所预”。九月，李敬业在扬州起兵，公开树起反武大旗，“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则写出了那篇脍炙人口，为后人传诵不绝的

《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檄文很快就到了则天的手上，对于文中那些近乎谩骂的人身攻击，则天只是"微哂而已"，但当她后来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诸语时，不禁亦为宾王的才华所折服。她非常感慨地对近臣说："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资治通鉴》203卷)

也许是则天从这件事中得到了一些启示，垂拱元年，当武氏政权并未得到完全巩固之时，她仍毫不犹豫地开科策试天下士子，以选拔俊才，为自己的新政服务。据《资治通鉴》204卷所载，载初元年(690)"二月辛酉，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也就是说，垂拱元年乙酉科并未进行殿试，所以，这一科的状元与殿试成为定规以后的状元，意义上当有一些不同(少了一场考试)。但由于这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第一篇状元对策，故仍把它列于全书之首，以飨读者，以见科举制度前期之片鳞断爪。

这一年的策问共有五题，其中一、二两题与现实关系非常密切。这样的题目如果让宋以后的士子们来回答，他们肯定会广征史实，纵横论证，指斥时弊，直陈己见，写出一篇洋洋洒洒的宏文来，然而师道对此的论述却单薄得让人为其担心。我们且先看其答"政要"一道，从"臣闻"至"兢惶圣问"，这是自谦；而从"粤惟皇家出震"至"敢陈庸瞽"则是颂圣，特别是对"皇太后陛下"的阿谀逢迎；而正面阐发策问的文字，只剩下"诚愿察洗帻布衣之士，任以台衡，擢委金让玉之夫，居其令守，则俗忘贪鄙，吏洁冰霜矣。旌好学之流，赏力田之务，则家罕贫惰，位列文儒矣。降通亲之使，喻彼枭心，发和戎之官，收其鸡肋，则四夷左衽，颠倒来王，三边元恶，讴谣仰化矣"三句。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段文字少得几乎与策问相当。泛泛而论，众所周知，这又如何能符合策问求"利国安边""良算"的要求呢?

再看第二道"求贤"：从"臣闻"至"实宣神化"，是简单列举前代求贤得治之事例；从"陛下功包邃古"至"应贤良之之毕萃"，则又是颂圣，甚至说朝廷已经使"振鹭翔鸾之客，毕凑天阶；乘箕降昴之英，咸趋日路。"那么策问之"行何政道，可以至斯?"当然就变成了已经"至斯"！只是因为皇太后陛下为了好上加好，精益求精而"俯访愚鲁"，所以师道才以"诚愿发德音，下明诏，咨列岳，访群公。举尔所知，不遗于侧陋；知人不易，无轻于慎择。下僚必录，上赏频治，则叶县游龙自九天而下降，燕郊骏马赴千金而遥集"来"谨对"。也就是说，只要太后再发一个"求贤诏"，则完全可以跨周越汉，功德圆满！

策问其它三题都有些空泛，然而师道的回答似乎也好不到那里。对于致祥瑞，圣问"仰惟前烈，何德而臻乎此?"师道对以朝廷已"盛矣美矣，巍乎焕乎"，"微臣亦不知其所谓"；对于"三微五德递变"之论述，师道则仅就题敷衍，引史实而折衷；特别是在第五道问及"何君可以为师范，何代可以取规绳"时，师道直以"陛下选芳列辟，垂范千年，五化既平，能事斯毕。亦何必损益今辰之政，师谟往帝之规"相对。这种避实就虚的圆滑真让人有些哭笑不得！看来，师道是在牢牢把握一条原则，即对刚刚手握实权的"皇太后陛下"多说一些赞扬之语，所谓"礼多人不怪，好话人愿听"是也。

可能我们的评析有些过于苛刻。因为师道毕竟处于科举制度的前期，诸如考试的形式、内容等许多方面还有待于日后逐步完善，以形成一定之规，他不可能像宋、元、明、清的状元那样有许多前辈的成文可以借鉴，可以进行旷日持久的准备和酝酿。但不管怎么说，仅就对策本身来说，它与我们以后读到的状元殿试对策相比，水平则是远远不如的。唯一值得肯定的是，师道在文字技巧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力。全文采用骈文的形式两两相对，既对仗工稳，又不时辅以变化，想来颂读之时的抑扬顿挫应是很入耳的。

据《唐摭言》所载，则天对这一科的贡士颇为关照。她曾下诏说："略观其策，并未尽善。若依令式，及第者唯只一人。意欲广收其才，通三者并许及第。"看来，她对于师道还算满意。但是，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她对于此科贡士的水平，心中大概仍有不少遗憾——因为治理国家需要的是优秀的行政人才，而不是文士，虽然文士也是国家不可或缺的。

（李维新）

宋

元丰五年(1082)壬戌科

状元:黄裳

黄裳(1043～1129)字冕仲,南剑(今福建南平)人。元丰五年中状元。政和年间曾知福州。累官至礼部尚书,赠资政殿大学士,谥“忠文”。

策问

礼所以辨上下,法所以定民志,三王之时,制度大备,朝聘、乡射、燕享、祭祀、冠婚之义,隆杀、文质、高下、广狭、多少之数,至于尺寸铢黍,一有宜称。贵不以逼,贱不敢逾,所以别嫌明微,释回增美,制治于未乱,止邪于未形,上自朝廷,下逮闾里,恭敬樽节欢欣交通,人用不逾,国以无事。降及后世,陵夷衰微,秦汉以来无足称者。庶人处侯宅,诸侯乘牛车,贫以不足而废礼,富以有余而僭上,

宫室之度，器服之用，冠婚之义，祭享之节，率皆纷乱苟简，无复防范，先王之迹因以熄焉。《传》曰："礼虽未之有，可以义起也，"而后之学者，多以谓非圣人莫能制作。呜呼！道之不行也久矣，斯文之不作也亦已久矣。抑将恣其废而莫之救欤，将因今之才而起之也？

对策

臣闻致道则求诸人，以人者善之所在也。及其行道也，不可以求人，惟人求道。置法则从诸人，以人者情之所在也。及其行法也，不可以从人，惟人从法。圣人之为天下，合众善以为道，合群情以为法。其为教也，则宜民下无异习；其为政也，则宜臣下无异说。若夫蠡管之见，涓埃之善，奚足以致哉！圣人以为物态有新，故民情有好戮，俗有盛衰，时有彼此，事有变常，道有升降，法有损益。以道应时，以法制俗。当与万物之理相得于无穷，则夫善之所在，未可以废也；当与万物之变相适于无常，则夫情之所在，未可以废也。陛下所以三岁一诏，旁集天下之士，亲降圣问，而使一介草莱类得发其涓埃之情，以助太山之崇高，沧溟之深远。如臣之愚，何足以与此！

然而臣闻大道之世，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则俗之于物轻矣；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则俗之于我轻矣。不以我累道，不以物累我。天叙之中，夫妇之情，父子之性，君臣之义，兄弟之序，所谓有物者也。天秩之中，父厚于义而薄于仁，母厚于仁而薄于义，君无为而尊，臣有为而累，所谓有则者也。方是之时，上下之分乌用辨哉！不必持衡与之为轻重，而人自以为平；不必探筹与之为得失，而人自以为公。其正不必规矩而天与之为方圆，其信

不必符契而天与之为取与。方是之时，上下之志乌用定哉！以故天之象，地之器，鸟兽之文，土地之宜，未有仰观而俯察者，则象与器，其孰制而用哉？法无所始，亦无所成；礼无所益，亦无所损。道之下降，在乎众器之间而已。人能轻物与我，而相与为天游，未有过礼而逾，不及礼而逼者，圣人盖未有患也。然而污尊而饮，捭豚而食，遂以为礼；抟土为桴，筑土为鼓，遂以为乐。营窟橧巢，羽皮毛血，圣人恶其鄙野太甚，贵贱之分，长幼之序，饮食居处几与鸟兽草木无以异焉。以故圣人作为礼法以文其实。营窟橧巢未利于居也，为之台榭宫室；草木血毛未利乎食也，为之炮燔烹炙；羽皮未利于服也，为之丝麻布帛；污尊坏饮未利于饮也，为之范金合土。网罟之利佃渔，耒耜之利稼穑，刳剡之利于川，服乘之利于涂，弧矢之利御寇，击柝之利待暴，利用之法详于此矣。然后制礼之文，施于饱食逸居之时，使远于禽兽。朝聘之礼，所以和君臣；冠婚之礼，所以正男女；祭祀之礼，所以交鬼神。为之射礼以观其志体，为之乡礼以辨其齿位。合其欢也为之燕礼，致其钦也为之享礼。虽然昔时鄙野之风，稍趋于文，而文之弊，使人役有涯之生，随无穷之情，忘不可乱之分，徇不可必之物，其性失中，其心失性。以菲废礼也逼，以美没礼也僭，遂丧天礼之自尔者。性命之情，日入于衰薄，有如横流之冲，失其大防，汗漫而难制。是以朝聘之礼，不足以和君臣；冠婚之礼，不足以正男女；祭祀之礼，不足以交鬼神；射乡之礼，不足以仁州乡；食飨之礼，不足以乐宾客。然则礼之数岂可废哉？有数而无义，则其制礼也不足以因情，有义而无数，则其制礼也不足以定分。“朝聘、乡射、燕飨、祭祀、冠婚之义，高下、隆杀、文质、广狭、多少之数”，所以见于圣问。而臣以为，礼法之行，自圣与贵者始。贤者，先王以率愚；贵者，先王以率贱者也。数度存焉。其在宫室也，庙各有数，堂各有尺；其在衣服也，冕各有章，旒各有寸；其在车旗也，常各有斿，车各有乘；其在器皿也，所食之豆，所献之

爵。其数有多寡，其用有贵贱。虽然，礼数之于天下，岂特进其不及之才，敛其不平之气，以就绳约，然后以为得哉！有以多为贵者，以文为贵者，以大为贵者，以高为贵者，以其外心者也。有以少为贵者，以质为贵者，以小为贵者，以下为贵者，以其内心者也。内之为尊，外之为乐，少之为贵，多之为美。是故先王之礼不可多也，故常不丰；不可寡也，故常不杀。惟其称而已。天下之人顾其教则谨其分，明其义则进其德，此其所以致治于未乱，止邪于未形欤！不然，而礼之近者适人之情，礼之远者，明德而反本。刍豢稻粱，庶羞酸醎，以养其口；椒兰芳苾，以养其鼻；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养其目；钟鼓管磬，琴瑟笙竽，以养其耳；疏房安车，越席床第，以养其体。此适其情者也。圣人以此救上古之鄙野，不能使后世无文之弊。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口之于味，四肢之于安佚，未有能克己复礼以为仁焉，则礼之近者，适足使人流而为淫泰，乘而为诈伪耳。山藻之僭，浣濯之陋，岂可废哉！是故圣人之制礼也，酒醴之美，而元酒明水之尚；黼黻文章之美，而疏布之尚；莞簟之美，而蒲越槁鞂之尚；丹漆雕镂之美，而素车之尚。是故礼虽道德之下，及忠信之薄，而道德忠信所以不丧者，礼实明之也。礼之近者，适人之情，而人情之适未尝放者。礼之所尚，不在乎美者而已。二帝三代，以法趋时，以义起礼，不能有异于此，特其详略未可同耳。故臣尝言，道无常也，未始有弊焉，必有升降者，礼法为之也；时无止也，未始有弊焉，或有彼此者，习俗为之也。继道以致用者，善也，制善以致治者，法也。异法者，彼此之时；异时者，盛衰之俗；异俗者，新故之物。物之新故，俗之盛衰，未始有常也。则以法趋时，以义起礼，岂有一定之论哉！是故圣人之在下者，或清或和，以矫一时之俗，而救其弊焉，则有三子之行。圣人之在上者，或损或益，以应一时之俗，则救其弊焉，则有三王之礼。然而道失而后德，则二帝之趋时也，致隆于德，未能以为皇；德失而后仁，仁失而后

义，义失而后礼，则三代之趋时也，致隆于业，未能以为帝。道也，德也，业也，皆圣人所能有者也，其用之异者，以制俗异之也。皇也，帝也，王也，皆圣人所能为者也，其名之异者，以应时异之也。

臣谓有成与亏者，法也；无成与亏者，道也。无成与亏之中，注之不盈，酌之不竭，万法之造，费之弥多，资之愈有。唐而后成，周而后备，于形色名声，不可以为量数。若夫制于礼者为之，非特不可以致治也，必待数百岁，其智足以相备者而后全。若夫休道者，虑后而致隆，则尧之所成，周之所备，伏羲旦暮而陈之，奚必俟唐与周哉！臣谓时之所缓，圣人不以为急，俗之所恶，圣人不以为好。是故五帝而上，其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二帝而下，其书谓之《二典》，言常道也。然而常道之用，又其大道之降者欤？不然而忠质之过也，周以极盛之文而救之，盖自夏商之末，仁义失尽矣，则周之所以救其弊者，其有礼欤？尽仁之数以制礼，尽礼之数以制法，辨等之仪，教节之度，尤详于二代，则大道之降者，未足以为怪也。后世之难治，惟其物我大重。我重而逾，物重而逼，无穷之欲，不测之变，不可以略制也。行法之吏，至于三百六十而后已，岂其好详哉！礼以义起，法以时行而已。臣观三代之盛，忠质文之不同道，服器官之不同法，相沿以情，相革以迹。朝聘之勤，燕享之欢，祭礼之诚，婚姻之好，欢然有恩以相爱，粲然有文以相接，彰之以车服，扬之以声音，光之以诗书，明之以藻色，其犹一元之散，遂华万物而为春欤。和气之中，声色万类，飞者翔，走者伏，潜者跃，并行而不相悖，并育而不相害，莫知为之者。三皇之世，未著于德义，其犹一元之含万物欤，二帝之喻则向乎春矣。陛下体道在上，造化群材，因革庶政，教令刑禁，下行上施，其犹天道之运四时欤。作者使复，枯者使荣，则春之风雷；散者使敛，华者使实，则秋之霜露。将与有生之类，还淳反一，而为太古之游，固陛下之志也。若夫宫室之度，器服之用，冠婚之义，祭飨之节，率皆纷乱苟简，未复三代之遗法，

岂可望哉！念此宜圣策之所及也。

臣闻不能以礼趋时，则其为法也无功；不能以义起礼，则其为法也无道。礼乐之情同，明王以相沿知礼有所因，三王异世不相袭礼，则礼有损益。商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损其文而益之以质故也；周因于商，礼所损益可知也，损其质而益之以文故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文弊则质救之，质弊则文救之，文质相代而趋于中，盖虽百世不能易也。伪者文之过，野者质之过，继文之过必过于质而救之，此孔子所以欲从先进欤。时也，惟夏之从，车也，惟商之从，服也，惟周之从，乐也，惟舜之从，郑声之淫，非所可欲者也。文弊之俗，皆溺于此乐，则惟舜之从然后郑声可以放焉。自秦继周，礼之情不能有所因，乃滋法令以酷天下，礼之文不能有所损，乃极奢侈以穷其欲。不能以智出义，以义明德，不能以仁出礼，以礼明分。苟以徒法而制天下，礼之近者又从而充之，古远而难行者类，弃而不为，遂使天下之俗，流而为淫泰，乘而为诈伪，淫为郑声，殆为佞人，则其制天下也，适足以为乱焉！岂能辨上下定民志，使恭敬樽节、欢欣交通以戴其上哉！若夫诸侯乘牛车，庶人处侯宅，贫以不给而废礼，富以有余而僭上。宫室之度，器服之用，冠婚之义，祭享之节，率皆纷乱苟简，未足以为怪也。汉文帝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皆罢去之，专务朴素。然而文帝岂能鉴周之弊而致然哉！会其所好适近圣人继周之意。故其屋壁得为帝服，倡优得为后饰，卖僮婢妾，富人大贾皆得以上僭，莫之制焉，斯亦文帝不能以义起礼之过也。呜呼！文帝畏甚高论，而释之与言秦汉间事而已。唐太宗好三代之礼乐，房杜不能对者，故其为礼也，沿秦故以为汉，沿隋故以为唐，其治卒愧乎三代，而使三代本数末度，寂寥数千载间，未有能振之者，可胜惜哉！陛下慨然有志于此，将欲贫者不至于废礼，富者不至于犯义，文不至于野，趋乎文质之中，非特天下后世受其赐也，斯文不亦幸乎！

臣闻有其德而无其位，不敢作礼乐焉，为其无行礼乐之权也；有其位而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为其无立礼乐之道也。而今陛下尊为天子，有其权矣；德为圣人，有其道矣。何惮而不为！然而不能因俗则礼失人，不能制俗则人失礼。礼失人也，无情；人失礼也，无分。陛下以义起礼，而臣言其所以因俗，所以制俗而已。寒暖燥湿异气，刚柔轻重异齐，器械异制，衣服异宜，饮食异和，此天理之所异者，俗之所宜，先王之所因。析言破律乱名，左道淫声异服，奇技奸色，行伪而坚，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有疑于众，圭璧金璋，锦文珠玉，或不中度，或不中幅，或不中量，或不中仪，有行于市，此人伪之所异者，俗之所病，先王之禁。因其所宜，而弗禁其所异。天下之人，心与物化，志逐利往。譬如新生之犊，狷狂而趋，未知其所向，则虽以义明法，以数定分，敛其放肆，以就绳约，亦已劳矣。是故大司徒施十有二教，所以因俗者一，所以制俗者四。太宰以八则治都鄙。以礼驭其民，则其制俗者也，以俗驭其民，则其因俗者也。盖惟圣人以道出法，以德制行，然后能为因俗而与之同，能为制俗而与之异。其因俗而与之同也，则能使之欢欣交通；其制俗而与之异也，则能使之恭敬樽节。礼之远者，使之知所尚焉，则能明德反本而不溺于忠信之薄，道德之下衰，三代之礼可得而终始也。此臣之计也。

评析

开宝六年(973)，因有人告讦该科主考李昉用情徇私，宋太祖亲临讲武殿复试进士。八年，太祖再次殿试，并对臣下讲："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

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续资治通鉴长编》16 卷)。从此，殿试成为制度，一直延续了近千年，成为封建社会中后期科举取士的重要步骤之一。所以，可以这样说，元丰五年壬戌科的状元黄裳，较之前朝吴师道，要显得更加合格，“质量”更高一些。

这一科殿试，神宗以“礼法沿革”来策试士子。细读策问，可看出其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则谓三王之时，礼乐制度完备，朝野循规，人不逾礼，国家无事；二则谓秦汉以后，礼崩乐坏，无足称者；三则提出问题，“将恣其废而莫之救欤？将因今之才而起之也？”实际上，正确的答案已包含其中：面对封建社会视为根本的“礼法”，哪一个饱读圣贤经典的儒生能任其衰微而“莫之救”呢？毫无疑问应是鞠躬尽瘁，殚精竭虑，“因今之才而起之”！

问题自然不会这样简单，否则的话，状元的桂冠岂不人人皆可唾手而得，又何须 10 年寒窗，白首穷经去下苦功呢？要想完满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对几千年礼法沿革的史实有着较为详尽的了解；二是要有清晰的头脑，能够驾驭材料，熔铸观点，逻辑谨严地加以陈述。就殿试对策看，黄裳无疑正是这种合格的人选。

黄裳的对策是按照“正、反、合”三段论的方式展开的。不过，在对策的开始，他首先从道、法与人三者的关系入手，提出了“以道应时，以法制俗”的中心论点。认为道与法都应该“与万物之理相得于无穷”，“与万物之变相适于无常”。也就是说，在肯定策问规定的“变”之后，他的目的重在阐明和确立“如何变”，即“变”的原则这一根本性问题。

在“正论”部分(二、三自然段)，黄裳详尽地分析了从大道之世的“法无所始，亦无所成；礼无所益，亦无所损”到“圣人作为礼法以文其实”，而“文之弊……遂丧天礼之自尔者”这一历史发展过程。明确指出，礼法的确立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因此，礼

法的文质繁简必须随现实的变化而变化，必须有沿有革。所谓“先王之礼不可多也，故常不丰；不可寡也，故常不杀。唯其称而已”，而“称”的关键，则在于“以法趋时，以义起礼”。先贤圣君正是由于遵循了这一原则，才造成了后世心向往之，众口称道的“三代之盛”。所以，在第三自然段的最后，黄裳以“陛下体道在上，造化群材，因革庶政，教令刑禁，下行上施，其犹天道之运四时欤。……将与有生之类，还淳反一，而为太古之游，固陛下之志也”作结，在颂扬了神宗熙宁以来变法的同时，自然归纳出自己要阐明的主旨。

在“反论”部分（第四自然段），黄裳明确指出，“不能以礼趋时，则其为法也无功；不能以义起礼，则其为法也无道。”并据此而剖析秦“苟以徒法而制天下”，故“适足以为乱焉；汉文帝好道家之学，不能以义起礼”，故“富人大贾皆得之僭，莫之制焉”；唐太宗虽好三代之礼乐，但房、杜诸大臣不能以正确的原则予以辅佐，故“其治率愧乎三代，而使三代本数末度，寂寥数千载间，未能有振之者”。这里有一点我们应提醒读者注意，那就是自孔孟以来，封建时代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对于社会发展、文明进步之后出现的种种弊端，由于无法——实际上也不可能——给以完满而合理的解决，因此都不约而同地把上古理想化，幻想出一个所谓“三代盛世”，并以此而针砭、批判现世的黑暗。如果从现代的角度来透视这一精神现象，其中无疑有错误的成份。但由于这一问题牵涉面太广，其是非得失绝非三言两语可予阐明，故我们仅从其积极方面给以肯定，特此赘言，以免造成误解。

经过一正一反地严密论证，在“合论”部分，黄裳首先对神宗坚持变法的态度给以肯定与支持。“而今陛下尊为天子，有其权矣；德为圣人，有其道矣。何惮而不为！”接着，又不失时机地对中心论点加以引申，进一步阐明变法极需妥善处理“因俗”与“制俗”这一看似矛盾而又必须互补的关键问题，作到既不能使“礼失人”，也不

能使"人失礼"。只有这样,变法才能"其因俗而与之同也,则能使之欢欣交通;其制俗而与之异也,则能使之恭敬樽节"。达到朝野安定,秩序井然的理想境界,进而使"三代之礼可得而终始也"。

黄裳的对策讨论的是一个纯理论性的问题,今天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它有些抽象与空洞,似乎与现实关系不大。然而,正像我们在文章一开始所指出的那样,所谓"礼法",在封建社会是关系到"根本"的最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它的"理论"意义自不能小觑。再联系到神宗朝自熙宁二年变法以来,至此已长达十余年的时间。新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它在北宋朝野所引起的震动,所遭到的反对,可以说是一直没有平息。因此,从为新法提供舆论支持,使天下之才进献方略,取利舍弊而言,策问与对策的现实意义似亦不可低估。

(李维新)

绍兴二年(1132)壬子科

状元:张九成

张九成(1092~1159)字子韶,号横浦居士,又号无垢居士。其先开封(今属河南省)人,徙居钱塘(今浙江杭州)。年轻时游学京城,师从名儒杨时。绍兴二年进士第一,任镇东军签判。因与上司不合,辞官,归乡授徒,出其门者多为闻人。后赵鼎荐于朝,历官著作郎,礼部、刑部侍郎。为秦桧所恶,谪居南安军14年。桧死,起知温州。因移书痛陈户部督粮扰民之弊,丐祠归,数月后病卒。九成研思经学,多有训解,著有《横浦集》。宝庆初,特赠太师,封崇国公,谥"文忠"。

策问

朕承中否之运，获奉大统，六年于兹，顾九庙未还，两宫犹远，夙兴夕惕，靡敢荒宁。悯国步之久艰，悼已事之失策，虚心求治，不惮改图，故详延子大夫于廷，咨以当世之务，冀闻长计以兴大业，将核其言，以收其用。非直循故事，设科举塞人情而已！

盖古先辟王，继中微之世，承思治之民，芟夷大患，事半功倍。少康一旅而复有夏，宣王兴衰以隆成周，光武三年而兴汉祚，肃宗再岁而复两京，皆蒙前人之绪，拨乱反正，若此其易也！今赖四方黎献，翊戴眇躬，列圣之泽未远也。朕焦心劳思，不敢爱身以勤民。然屈已和戎，而强敌内侵；招诱以弭盗，而盗贼犹炽。以食为急，漕运不继而廪乏羡余；以兵为重，选练未精而军多冗籍。吏员猥并，而失职之士尚众；田莱多荒，而复业之农尚寡。严赃吏之诛，而不能革贪污之俗；优军功之赏，而无以消冒滥之风。方今欲外攘，则不足以靖民，取于民有制，则不足以给车徒之众。为人父而自榷其子，则又何以保民而王哉！

朕弗明治道，仍暗事几，凡此数者，常交战于胸中，徒寝而弗寐，当食而叹也。子大夫与国同患难久矣，宜考前世中兴之主，施为次序有切于今者；祖宗传绪累世，其法有可举而行者；平时种学待问，奇谋硕画，本于自得，可以持危扶颠者。其悉意以陈，朕将亲览焉。

对策

臣对 臣闻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商道不衰，何以见高宗，四夷不叛，何以见宣王。汉无昌邑之变，则无以启宣帝，唐无宫壶之变，则无以启明皇。是以知君天下者，遇祸逢乱，当以刚大为心，无遽以惊忧自沮。灼知此理，然后可以知天意之所在矣！

臣尝历考前古，兴衰拨乱之君，以谓莫善于宪宗，莫不善于文宗。何以言之？宪宗当唐室陵夷之际，藩镇跋扈，主权下移，乃能左顾右盼，慨然起恢复之心。不幸廷臣异议，刺客在朝，京师皇皇，朝不谋夕，惟宪宗当宁发愤，屏声却欲，讨贼之心愈厉。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淮、蔡。元和之功，卓然为天下冠，此以刚大为心者也。文宗当昭、懿之后，阉寺执柄，主威不宣，虽能高举远蹈，毅然有扫除之心。不幸委任失当，害及非辜，甘露之祸，言之使人酸楚。岂非文宗遽以泣下沾襟，魂飞气索，自比周赧，又自比汉献，又自谓无与尧舜，又自纵酒以伤其生，悲辛愁苦，不复以朝廷为意，此以惊忧自沮者也！故臣尝断之曰：若宪宗，可谓知天意之所在，若文宗者，又何足与论天意哉！盖祸乱之作，正圣人奋励之时也，何至以惊忧自沮乎?!

今陛下痛九庙未还，两宫犹远，又悯国步之久艰，悼已事之失策，然深察祸乱之故，是乃皇天所以启至圣也。伏惟陛下谨之重之，以刚大为心，无遽以惊忧自沮，庶几与商高宗、周宣王、汉宣帝等相揖于千载之上，合皇天所以畀付之意，不胜臣子至愿。然以刚大为心者，要当夙兴夜寐，恶衣菲食，屏远便佞，登崇俊良，好切直

之言，戒声色之惑，先定规模，以定大事。臣观古之圣人，将大有施为于天下者，必先默定规模，而后从事。其应也有候，其成也有形，非若顺风扬帆，一求快意，而无所归赴也。商君之法，非良法也，然而规模先定，故能兵雄天下，臣服诸候；苏秦之术，非善术也，然而规模先定，故能合六姓之异，却强秦之兵。淮阴对高帝，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而西会于荥阳，无一不如其言者，规模先定故也。耿弇对光武，以定渔阳，取涿郡，还收富平，而东下齐，无一不如其言者，规模先定故也。伏仰陛下欲迎九庙，归两宫，安国步而康庶事，式扩规模，固已定于圣心，而又元枢捷报，歼厥渠魁，自前世之君观之，固有满假而自大，以速天下之谤者矣。独陛下不然，乃㧑谦不居，躬御便殿，亲颁德音，以前世中兴之君为问。至于攘夷狄，弭盗贼，足食练兵，澄冗官，复农业，革贪污而消冒滥，宽民力而给车徒，前世中兴之施为，祖宗传绪之法度，下询于承学之士曰："本于自得，可以持危扶颠者。"此有以知陛下用心之勤也。臣虽智识浅陋，然而仰见规模宏阔深大，辄整冠肃容，再拜稽首曰：猗欤盛哉！有君如此，天下何忧乎！宗庙社稷何忧乎！二圣六宫，暂当淹恤，亦何忧乎！臣学术至空虚也，然忠愤所激，敢不敷陈管见，上裨日月之光，臣谨昧死上愚对。

臣伏读圣策曰："古先辟王，继中微之世，承思治之民，芟夷大患，事半而功倍。少康一旅而复有夏，宣王兴衰以隆成周，光武三年而兴汉祚，肃宗再岁而复两京，皆蒙前人之绪，拨乱反正，若此其易也！"臣有以见陛下规模远大，知所以为中兴之本也。臣闻禹有治水之德，民心怀之，故其有天下也十有七世，历年四百六十有二，少康一旅而复有夏者，祖宗之德在人也。稷有播种之德，民心怀之，故其有天下也三十七世，历年八百有余，宣王兴衰以隆成周者，祖宗之德在人也。汉高祖有宽仁之德在人，故其有天下也二十一世，而历年至于四百，然则光武三年而兴汉祚者，岂非蒙高祖之德

哉！唐太宗有仁义之德在人，故其有天下也二十四世，而历年仅及三百，然则肃宗再岁而复两京者，岂非蒙太宗之德哉！皇宋一祖六宗，英灵在天，功德在民，中兴之运，正归今日，倘能扩此规模，济以兢谨，果何往而不可乎！

伏读圣策曰："今赖四方黎献，翊戴眇躬，列圣之泽未远也。朕焦心劳思，不敢爱身以勤民，然屈己以和戎，而强敌内侵。"臣有以见陛下规模远大，知祖宗之德，士民之归，将乘此时，为两宫中国雪积年之耻也。臣观金人有易弱之势三：夫好战者劳，失其故俗者敝，人心不服者离，而金人皆与有焉，臣请为陛下历陈之。始皇并吞六国，可以止矣，恣心快意，复征南越，曾不知骊山之役未成，而二世子婴已被害而就擒矣，此以好战而伤也。隋文帝远平江东，可以止矣，炀帝嗣位，亲驾征辽，曾不知锦帆未过隋渠，而大盗已据其都矣，此亦好战而伤也。金人负其勇锐，自靖国兴兵，越于今三十余载矣，适国家当此否运，乃敢因势乘便，犯我民人，侵我疆土，夺我两河，又捣我都城，又要我二圣，又入我淮右，践我江浙，转战经年，恃其士马之盛，而不知民力固已殚矣。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此臣所以言好战必伤也。西晋之乱，兵燹侵陵，纷纭于中国，而其豪杰间起为之君长，如刘元海、苻坚、石勒、慕容隽之俦，皆以绝异之资，驱驾一时之贤俊，其强者至有天下大半，宜有以自立，然不过一传再传而已。何也？君臣相戾，上下不安，虽建都邑，立城社，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寓于其间，其可恃乎！金人既灭契丹，复陵中国，中国声名文物，洵非遐陬所及，然承平日久，士人或溺词章，小人共安畎亩，怯战斗而恋身家，使金人乐而效之，其亦易弱也，此臣所以言：失其故俗必衰也。始皇灭韩，张良奋椎击其车，朱泚僭号，段秀实提笏击其额。以今日我士庶，蒿目时艰，固亦有豪杰慷慨之士，欲图之久矣。而又凌辱及于公卿，鞭扑行于殿陛，贵为将相，而不免有臣仆之耻，将见有愤惋郁结，而思变者矣。此臣所以言：人心

不服必亡也。区区一刘豫，欲收中国之心，呜呼愚哉！中国之心，岂易收乎！彼刘豫者，何为者耶？素无勋德，殊乏声称，黠雏经营，有同儿戏，何足虑哉！然金人虽有易衰之势，而我有必兴之理，不可不讲也。

臣观古人所以谋人之国，必有一定之计。越王之取吴，是骄之而已；秦之取六国，是散其从而已；高祖之取项籍，是离间其君臣而已。今越之计、秦之计、高祖之计，宜次第而用之。当先用越王之法骄之，使其侈心肆意，无复忌惮，天其灭之，将见权臣争强，篡夺之祸起矣。臣请备论越王所以取吴之术，惟陛下听之。范蠡曰“卑辞厚礼以骄之”，越王则自称曰“草鄙之人”，自称其国曰“贡献之邑”；范蠡曰“玩好女乐以骄之”，越王则先之以皮币，随之以管龠，使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其称吴为天王者，范蠡使尊之以名也；其请亲为前驱者，范蠡使以身为市也。今日之金人，当损益其法可也。呜呼！越王含辛茹苦，志在报吴，非笃志之君，其孰能之？以民之不蕃，而兵之不给也，乃下令于国中曰：“壮者无娶老妇，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则罪其父母。”生男子也，赐束修一犬；生女子也，赐束修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支子。死当室者死，则哭泣之，葬埋之，如其子也。载脂与粱，以食孺子，身耕妻织，以裕国人，国人荷其恩，感其德，愤其土地之狭，而悯其会稽之耻也。于是父兄请战，不许，父兄则又请战，而致其辞曰：“越四封之内，其视君也，犹父母也。子而思报父母之仇，臣而思报君之仇，其敢不尽力乎。”及其将行，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曰：“孰谓是行也，而可无死乎？”陛下欲报金人，当先结吾民之心可也。越王之在国也，觞酒豆肉以分左右，饮酒不尽味，听乐不尽声，求以报吴，今陛下有是乎？病者问，死者葬，老其老，长其幼，慈其孤，求以报吴，今陛下有是乎？富者安之，贫者与之，救其不足，裁其有余，求以报吴，今陛下有是乎？

南事楚，西事晋，北事齐，春秋皮币玉帛子女以宾服焉，未尝敢绝，求以报吴，今陛下有是乎？如其有也，天下幸甚，若犹未也，伏愿陛下勉之。越王归国四年，愤祖宗之仇，思欲一战以快心，范蠡曰："未可也"。五年而吴王信谗喜优，憎辅远弼，又欲乘其间以伐吴，范蠡曰："姑待之"。七年吴王杀申胥，又欲乘其间以伐吴，范蠡曰："姑待之"。七年而吴国稻蚕不遗种，又欲乘其间以伐吴，范蠡曰："姑待之"。今之金人虽有易衰之势三，然而信谗乎？喜优乎？憎辅而远弼乎？曾杀贤如申胥乎？曾有天灾，如稻蚕不遗种者乎？必也俟其天时去，人事失，然后可以图之。越王归国二十年，乃得举兵以遂其志。其举兵也，必智以度天下之众寡，仁以共三军之饥劳，勇以断疑而决大事，又舌庸使之审赏，苦成使之审罚，大夫种使之审物，大夫蠡使之审备，大夫皋使之审声。其将行也，则背屏而立，委夫人以内政；背檐而立，委大夫以国政。其至军也，则斩通行赂者。又明日徙舍，则斩不从令者。又明日徙舍，则斩不用命者。又明日徇军，则归无兄弟尽在军者。又明日徇军，则归有昏眊之疾者。又明日徇军，则归筋力不足以胜甲兵，志行不足以听命令者。虽列国之君，不足以为今务，然其禁密如此，亦可喜也。故能一战而败吴于囿，再战而败吴于泓，又战而败吴于郊。夷其城，犁其庭，墟其庙，以雪积年之耻。陛下欲报金人，愿观其用心，而以越王之法用之，不亦可乎！

伏读圣策曰："招诱以弭盗，而盗贼犹炽。"臣有见陛下规模远大，欲先靖中国也。臣闻唐太宗之说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尔。当去奢从俭，轻徭省赋，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韩愈之说曰："刺史不得其官，观察不得其职，财已竭而敛不休，人已穷而赋愈急，其不去而为盗也，亦幸矣。"此皆论良民为赋敛所困，故不得已而为盗尔。今日之事，则又甚于此。其横行于州郡，啸聚于山林者，类皆军兵尔。此曹在

太平时，贴首妥尾，惟上之令，不幸中国多故，朝廷权轻，何尔动辄怨怒耶！而一夫倡乱，百夫从之，百夫倡乱，千万人从之。然使吾无间而可入，则朱滔不能起卢龙之卒，而李怀光不能强邠宁之兵。今其所以一呼响应者，其心不服也！其心所以不服者，无乃吾恭俭未至乎？用人未当乎？赏无功而罚无罪乎？昔唐德宗放象豹，出宫人，以恭俭服天下；罢常衮，用崔祐甫，以用人服天下；赏淄青将士，以折其奸谋，杖邵光超，以惩其贪冒，又以赏罚服天下。时李正已持兵十五万，雄视山东，其将士闻德宗所为如此，皆投兵相顾曰："明天子出矣，吾辈犹反乎！"不特此也，吐蕃恃其强大，以凌侮中国，非一日积也，德宗即位，使者归告其国主曰："新天子出宫人，放禽兽，威德英武，洽于中国。"吐蕃大悦，遣使入贡。夫德宗恭俭委任，信赏必罚，行于户庭之间，而强蕃悍卒，自格于千里之外，使其恪守此心，终始不变，则贞观之风，亦不难到，奈何其自败坏也。臣愿陛下笃恭俭，谨用人，明赏罚，以收天下之心。若曰：我有甲兵，可以诛其不服；我有招降，可以俟其改过。诚恐去一大盗，其事卒未已也。诚能用臣之说，非特悍卒格心，而蕃戎亦且悔过也。故臣以太宗、韩愈、德宗之事为献。

伏读圣策曰："以食为急，漕运不继，而廪乏羡余；以兵为重，选练未精，而军多冗籍。"此有以见陛下规模远大，知兵食之不可不虑也。臣以谓漕运不继，宜选财赋之官，选练未精，宜责将帅之职。唐代宗以国用虚乏，馈饷纷纷，独得一刘晏，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操天下赢赀，而军用以给，以财赋得其人也。臣愚欲于常赋之外，创置一司，名曰"军兴"，凡辟市榷酤，载在有司者，不与其数，独变通有无，权制轻重，使利归公上，敛不及民。出入钱谷，勾检簿书，则付之士类，书符檄，觇低昂，则付之皂吏。明敏精悍如刘晏辈，实司其职，夫何忧漕运之不继乎！马燧之在河东也，驭马厮役，教以骑射，制甲有长短之等，造车为行止之宜，比及二年，得精

兵二万，以将帅得其人也。臣愚欲于冗兵之数，创置一军，名曰“精锐”，凡攻卫战斗，功在有司者，不与此选，独招降之兵，擒获之兵，俾弓矢戈矛，随器而使，有能者则书之尺籍，其无能者则驱之屯田，择强力勇毅如马燧辈，实司其职，夫何忧选练之未精也！

伏读圣策曰：“吏员猥并，而失职之士尚众；田莱多荒，而复业之农尚寡。”此有以见陛下规模远大，知吏农之不可不虑也。臣以谓吏员猥并，宜行辟举之法，田莱多荒，宜行屯田之法。昔沈既济欲宰臣叙群司，州郡辟僚佐，其意欲无失职之士也。臣愚欲使宰臣精选太守、部使者之职，若群僚，则太守辟举，若监当、若巡尉，则使者辟举，举而不当，重者褫其职，轻者罚其金，吏部台谏得以纠正之。每辟一员，则具二人以待之，补者既上，则又辟一人以待之，前后相承，虽怠者亦励。夫国家所以设官分职，将惟贤才之求，非为尔衣食之资也。志在衣食，胡不为工乎，为商乎，为农而力田亩乎！胡为在缙绅之列也。夫责之以士人，则朝廷待之亦不可轻。凡太守、监司之赴官也，若内若外，皆陛辞而后行。监司为一辈，郡太守为一辈，当行之日，陛下亲御正殿，借辞色告监司，则曰：“一路官吏，实汝之托。”告郡守，则曰：“一郡官吏，实汝之托，汝当夙夜以思，宣我所以爱民之意。予有大赉，报汝功，亦有大罚，惩不恪。”庶几贤才并用，则失职非所患也。昔邓艾欲行陈颍以东，屯田两淮，得谷五万斛，其意欲得复业之农也。臣愚不敢远引，且以镇江一路论之。屯兵江口，无虑数万人，就以二万人论之，人必有家，家止五人，人日二升，日计二千斛，月计六万斛，则岁百万斛矣。顾此馈运，非由天降，非从地出，皆当取之于民，三吴之间，旱暵仍岁，长淮以北，草莽连云，去岁到今，米斗千余，今此下民，谁救其迫？而又追需急于星火，箠械酷于秋霜，开元屯田之法，振武屯田之法，不知其可用乎？勋官八品以上，前资七品以上，此建官之法也；土柔则五十亩而一牛，土刚则二十亩而一牛，此耕耨之法也。如是之法，

出于开元。募人为十五屯，屯置一百五十人，令各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转而极西，过云州界中，出入河山之险，八百余里，寇来不能为害，人得肆耕其中，如是之法，出于振武。臣愿自淮以北，开置屯田，参开元、振武之法，非特足以招复业之农，而军储所资，亦足以宽其忧矣。

伏读圣策曰："严赃吏之诛，而未能革贪污之俗；优军功之赏，而无以消冒滥之风。"此有以见陛下规模远大，欲清流欲而惩侥幸也。昔毛玠为尚书，而士大夫不敢鲜衣美食；杨绾为宰相，而豪贵功臣为之撤乐毁第，减驺御。赃吏贪污，流风远矣，臣愿陛下去声远色，躬俭节用，以励朝廷；朝廷宰相，却苞苴，断货贿，以励猾胥而惩狡吏。又何患贪污之弗革乎！昔元载、王缙秉政，四方以贿求官者，相踵于门，大者出于载、缙，小者出于卓英倩，皆如所欲而去。代宗欲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为己用，乃擢李栖筠为御史大夫，事出主意，宰相不知，缙等由是稍绌。臣今欲用此策，以消冒滥可乎！凡大将以功来上，陛下亲据其中一二人，晏见而劳问之，果有功者，优加拔擢，其或言语不伦，事涉诞罔者，痛加惩斥，又何患冒滥之弗消乎！

伏读圣策曰："方今欲外攘，则不足以靖民；取于民有制，则不足以给车徒之众。为人父而榷其子，则又何以保民而王哉?"此有以见陛下规模远大，恤民如是之深也。臣伏读圣问，至此不觉涕泗交颐，仰知陛下仁心如天地之大，而天下弗知也。臣观滨江郡县，为守为令者，类无远图。阳羡、惠山之民，何其被酷之深也！率敛之名，种类闳大，秋苗之外，又有苗头；苗头未已，又行折八；折八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曰湮实；湮实虚矣，又曰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数也。流离奔窜，益以无聊。前日桑麻沃润，鸡犬相闻，今为狐狸之居，虎豹之宅。苍烟白露，弥望满野。彼所谓守令，独抵几而言曰："与其委之于盗贼，孰若输之于国家。"呜呼！安得

此委巷之语乎？堂堂国家，而下比于盗贼，不忠之罪，莫大于此矣！夫节财即生财之道也。今藩方大使，各置使臣，收召亲戚，竭民膏血以市私恩，或曰"准备"或曰"干办"者，不知其几人也。色目纷纷，难以数举，凡医巫卜祝之流，皆在其选。又诸县添置武尉，尤为无用！见敌则走，小胜则杀贫民以要功，居山则卖私茗，滨海则鬻私鹾，未及交付，则已捕之为己功矣。不知平时剥肤椎髓，敛怨招谤，以廪此曹，果何谓哉！臣愿陛下明降诏书，戒饬藩方，罢去武尉，以苏凋瘵，此亦保民之道也。

伏读圣策曰："朕弗明治道，仍暗事几，凡此数者，交战于胸中，徒寝而弗寐，当食而叹也。子大夫与国同患难久矣，宜考前世中兴之主，其施为次序有切于今者；祖宗传绪累世，其法有可举而行者；平时种学待问，奇谋硕画，本于自得，可以持危扶颠者。其悉意以陈，朕将亲览。"臣有以见陛下规模远大，谦冲退托，将以追配前王，绍述祖宗，旁搜远取，以尽愚夫之虑也。臣窃谓中兴之主，大抵以刚德为上，是故震伐鬼方者，高宗之刚；有严有翼者，宣王之刚；信赏必罚者，宣帝之刚；赳赳雄断者，光武之刚也。陛下之欲中兴，当以刚德为主，去谗节欲，远佞防奸，此中兴之本也。祖宗传绪之意，大抵以俭德为主。恭闻仁祖服浣衣，寝绝被，力行恭俭，不忍费一毫以伤民力，至今父老言我仁祖，必泣下沾襟。盖俭必仁，仁必能感天下。陛下欲绍祖宗，当以俭德为主，珍奇弗御，玩好弗求，此祖宗之意也。夫攘夷狄，弭寇盗，足食练兵，澄冗官，复农业，革贪污而消冒滥，宽民力而给车徒者，臣以一言而该之，不过曰"刚"与"俭"而已。然刚俭之德，圣心自明，天下犹未信者，何也？臣窃有说焉。臣尝读《左氏传》，见吕甥论君子小人情状，于秦穆公何其切至也。其曰："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又曰："小人曰'秦岂归君'，君子曰'秦必归君'。"又曰："小人曰'必报仇'，君子曰'必报德'。"夫士人所见高远，故其言多恕，小人所见浅狭，故其语

易深。善夫孟子有曰："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夫百姓以齐王为爱牛，以小人之见，每如此也，然小人满天下，而所谓士人者几何？虽家置一喙，言提其耳，不能胜众多之口也。则人主于食息謦咳之间，其可以弗谨乎？夫文王一饭，武王亦一饭，文王再饭，武王亦再饭，是武王以身试文王之安否也。盖一饭则我力微矣，今吾亲一饭而已，力不其微乎！此其所以可忧也。再饭则我力强矣，今吾亲至于再饭，无乃寿考之期乎，此所以可喜也。夫武王之于文王如此。若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当春阳昼敷，行宫别殿，花柳纷纷，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尘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际，风窗水院，凉气凄清，窃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蛮毡拥蔽，不得共此疏畅也，亦何安乎？澄江泻练，夜桂飘香，陛下享此乐时，必曰："西风凄劲，两宫得无忧乎？"狐裘温暖，兽炭春红，陛下享此乐时，必曰："朔雪袤丈，两宫得无寒乎？"至于陈水陆，饱奇珍，必投筋而起曰："雁粉腥羊，两宫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广厦，处深宫，必抚几而叹曰："穹庐区脱，两宫必难处也"，居其能安席乎？今闾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乐，陛下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以金人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温，夏不得凊，昏无所于定，晨无所于省，问寝之私，何时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时可救乎？日往月来，何时可归乎？每岁时遇物，想惟圣心雷厉，天泪雨流，抚剑长吁，思欲扫清蛮帐，以还二圣之车。此臣心之所以知陛下者如此，若小民之心则不然。以谓搜揽珍禽，驱驰骏马。道路之言，有若上诬圣德者，此臣所以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不量微贱，思为陛下雪之也。深察其言，盖亦有自焉。唐阉人仇士良致仕，其党送归私第，教以固宠之术曰："天子不可令闲，尝当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及他事。"又曰："谨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其党拜谢而去。此术既行，卒使天子昏惑于上，大臣壅蔽于下，兵柄在手，官爵在手，废立在

手，至自称曰“定策国老”，而称昭宗曰“门生天子”，呜呼！不臣之态，臣岂忍陈于君父之前。彼私求禽马，动以陛下为名，此臣之所以耻也，又何怪乎小民。陛下欲尊临宸极，泽及寰区，何不反其术而用之，勿为其所陷也。且阍寺闻名，国之不祥也，是以尧舜阍寺，不闻于《典谟》，三王阍寺，不闻于《誓诰》。竖刁闻于齐，而齐乱，伊戾闻于宋，而宋危。今此曹名字，稍稍有闻，此臣所以忧也。窃惟万乘之尊，深居邃宇，万机之暇，何以为情？贤士大夫，晏见有时矣，宦官子女，安居前后矣，有时者易疏，前后者难间，圣情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扫除之役，复门户之私，凡交结往来者有禁，敢与政事者必诛。陛下日御便殿，亲近儒者，讲诗书之指归，论古今之成败，追求典故，历访民情，不在于分文析字，绨章绘句，为书生之学，以取天下之名也。呜呼！隋炀帝、陈后主岂曰不文，适足以亡国而已，果何补于人主之学欤？臣愿陛下之为学也，见前世道德之主，英明之王，则瞻之仰之，退而自省曰：“吾其以此为法乎！”见前世暴虐之主，则震焉沮焉，退而自省曰：“吾其以是为戒乎！”读贤臣传，默观百僚中有类是者，任之勿疑；读佞臣传，默观左右类是者，诛之无赦。久之不倦，将闻阍寺之言，见便佞之态，如狐狸夜号，而鸱枭昼舞也，则陛下之圣德进矣。昔唐宪宗卓卓为中兴之主，其必有以也。及观其与宰相论道于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请退，宪宗留之曰：“朕入禁中，所与游者，独宫人宦官尔，故乐与卿等共谈。”为理之要，此其所以兴乎！臣闻鸣鹤在阴，其子和之，陛下勿谓深宫密殿，万事无迹也。然善恶未究，四海已知。历观前史所载，宫闱之谋，床第之语，想见时君以谓宫中不得而知也，而况外庭乎？外庭不得而知也，而况天下乎？然而皎如日星，不可掩没，卒为天下后世之所嗤笑。呜呼，其亦可畏也哉！故古人有言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谨其独也。”谨独之学，其用甚大，陛下不可不知也。古之圣人所以端拱岩廊，而四方万里，日

趋于治，天地清明，日星循轨，百谷用成，蛮夷率服，用此道也。心一不善，足以伤天地之和；心欲悔过，固已同天地之德。古之圣人所以趋众善之门，而得改过之要者，不过听谏一路而已。此臣所学于师，盖以为持颠扶危之术也。舜圣人也，而益戒之以罔游于逸，罔淫于乐；武王亦圣人也，而召公戒之以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以至禹有善言之拜，汤有改过之称。汉高祖何人也，止能听谏，故能成四百载之大业；唐太宗亦何人也，止能听谏，故能成三百载之洪基。至于商纣杀谏臣，其祚终归于周室；成帝杀谏臣，其祚终移于王氏；明皇杀谏臣，其祚终微于禄山。杀一谏臣，真若无与于治乱也？然乱臣贼子，苛政虐刑，一切不得闻也，不亡何待乎！故臣愿陛下先以谨独为心，后以听谏为意，奖借言路，以旌直士之风，以至远阉寺，亲儒臣，以成就规模之大，此臣所望于陛下也。

草茅贱士，充赋在庭者，志在一第尔，独臣不揆愚贱，妄议国体，负罪于不可赦，可谓愚矣。然臣闻天下之事，宰相能行之，谏官能言之，职不在此，虽抱奇策，拥雄材，无路可进，卒于老死而已。伏惟国家策士之制，上自公卿之子弟，下至山林之匹夫，皆得自竭以罄其所怀。非天子黜陟赏罚之吏，而得议百官之长短；非天子钱谷大农之吏，而得推财赋之多少；非天子帷幄将帅之臣，而得论兵革之强弱。则夫宰相、谏官之事，一旦得以详说而悉数之，而臣何敢无说以处于此。又况晏子一言，而使齐侯省刑，；田千秋一言，而使武帝念太子；柳伉一言，而使代宗黜程元振。谁谓皇皇大宋，无其人乎？《皋陶谟》曰："天叙有典"，是父子之间，君臣之际，无非天理也。臣处闺门之内，勉明孝道久矣。今自山林中来，望见陛下，突兀孤忠，卓然发于悃愊，不可遏也。此盖天理自然，无足怪者。臣或志在爵禄，不为陛下一言，臣谁欺，欺天乎！故臣虽进一言，退受铁钺之诛，于司败，不忍欺天，以昧此心也！惟陛下幸赦其愚。臣谨对。

评析

读绍兴二年壬子科殿试策问，真有点“罪己诏”的味道。“朕承中否之运，获奉大统，六年于兹。顾九庙未还，两宫犹远，夙兴夕惕，靡敢荒宁。悯国步之久艰，悼已事之失策，虚心求治，不惮改图……”相信当年坐在讲殿上的进士们咀嚼着这些沉甸甸的语句时，心中那份参加殿试的兴奋和喜悦，应该已经化为对国事不堪的痛心和担忧。是啊，自高宗建炎元年(1127)南京(今河南商邱)即位以来，风雨飘摇的小朝廷几乎没过上一天安稳的日子，在剽悍的金人铁骑的尾追之下，高宗自南京逃到扬州，又由扬州过江逃到杭州。建炎三年，金人分东西两路大举南侵，所向披靡，势如破竹。高宗只好再度出逃，由杭州而越州(今浙江绍兴)而明州(今浙江宁波)最后仓惶乘船逃到海上，这才侥幸躲过金人的追击，免去了象父、兄(徽、钦二宗)那样成为阶下囚的奇耻大辱。虽说在各地军民的抗击之下，金人不得不于以后两年陆续北撤，但作为一国之君的高宗，一直到绍兴二年的正月十七日，才回到了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总算暂时结束了像难民一样到处飘流的痛苦生涯。

也许是六年以来惶惶不可终日的颠沛流离使高宗清醒了许多，更可能是动荡不安的现实，支离破碎的山河使他真正认识到人才的重要，就在回到临安仅仅两个月之后，高宗亲自“策试诸路类试奏名进士于讲殿”。考前他曾对臣下讲：“朕此举将以作成人才为异日之用，若其言鲠亮且直，它日必端方不回之士。自崇宁(宋徽宗年号)以来，恶人敢言，士气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因手诏谕考官，直言者置之高等，尤谄佞者居下列。”(《续资治通鉴》110

卷)张九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脱颖而出,蟾宫折桂的。

九成的这篇对策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臣谨昧死上愚对",第二部分至"此亦保民之道也",第三部分至"此臣所望于陛下也。"最后一段是结束语。

针对策问诸题,九成并未匆忙依常规一一作答,而是首先在第一部分树立起全文之总纲,融汇贯通,高屋建瓴,一出手便不同凡响,超出侪辈。

开篇首以"臣闻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振起,这虽然是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之意的引申,然而此时此刻,便有着振聋发聩,起懦立顽的极强的现实意义。我们且不说半壁江山已沦入金人之手,也不说六年来小朝廷的风声鹤唳、朝夕难安,即如策问中所言之"强敌内侵"、"盗贼犹炽"、"廪乏羡余"、"军多冗籍"、"吏员猥并"、"田莱多荒"、"赃吏贪污"、"军功冒滥"等等,国人面临的已是一个千疮百孔、病入膏肓,人人看了都为之心寒,为之气索的冷酷的现实。因此,南宋君臣、朝野上下,当务之急应是树立起克敌制胜的坚定信念。九成开篇如此下笔的良苦用心,正在于明确无误地揭示中华民族披荆斩棘,履险如夷,生生不息的极强自信心。接着,他历数商之高宗、周之宣王、汉宣帝、唐明皇等彰明昭著的史实,指出"君天下者,遇祸逢乱,当以刚大为心,无遽以惊扰自沮",然后再以前朝宪宗、文宗正反二例作对比,重申:"祸乱之作,正圣人奋励之时也,何至惊扰自沮乎!"鞭辟入里,重锤三击,令人奋起。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些初看起来好似阐述经义的书生议论,对于高宗来说,不啻是对症下药的一针强心剂。

当然,面对如此难以收拾的不堪局面,绝不是再三重复有信心就可以大功告成的,要想兴衰拨乱、卓然有成,还必须要有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具体举措。对此,九成恺切陈言:"以刚大为心者,

要当夙兴夜寐，恶衣菲食，屏远便佞，登崇俊良，好切直之言，戒声色之惑，先定规模，而后从事”。实际上，这段话就是对策之主脑，全文之总纲。也就是在这段话的贯串之下，策问诸题如珠之附线，目之随纲。分则玉润珠圆，条目清晰；合者灿然成串，纲举目张。随后，九成于进一步申述“先定规模”之重要性之后，如水到渠成，自然进入对策的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按惯例来说是对策的核心部分，九成分别就策问“中兴之本”，“攘夷狄，弭盗贼，足食练兵，澄冗员、复农业，革贪污而消冒滥，宽民力而给车徒”七题侃侃而论。以下我们首先就“攘夷狄”一题来略作分析，以见其运筹帷幄，纵横捭阖之雄辩一斑。

面对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恃士马之盛而侵我疆土，夺我两河，捣我都城，要我二圣，入我淮右，践我两浙，把整个中国搅得天翻地覆的金人，九成秉刚大浩然之气，胸有成竹地指出“金人有易弱之势三：夫好战者劳，失其故俗者敝，人心不服者离，而金人皆有与焉。”九成的自信源于他对敌我双方有着极为清醒、深刻的认识。他以史为鉴，审时度势，故能较常人透过一层而直指要害，论证确凿，入情入理。在分析了金人无法改变的致命缺陷之后，九成以“区区一刘豫，欲收中国之心，呜呼愚哉！中国之心，岂易收乎？彼刘豫者，何为者耶？素无勋德，殊乏声称，黠雏经营，何足虑哉”一段极富感情色彩的文字，鞭挞丑类，视如无物，大长了民族之正气，国家之威风！据说刘豫后来读到这篇策问，恼羞成怒，立即拔剑付与刺客，欲置九成于死地。这虽然仅见于九成《家传》所载，而且所记文字与策语也有所不同(《续资治通鉴·考异》)，但至少可以使我们看到，此策一出，立即就有了四方争传、震动敌我的巨大效果。

九成在总结了金人“有易衰之势”的同时，又不失时机地展开了“我有必兴之理”的充分论述，九成认为朝廷应以勾践灭吴，秦取六国、刘邦胜项羽之方略对付金人。他特别详尽地分析了勾践卧

薪尝胆,20年生聚而报吴的具体史实,处处贯彻总纲,处处和现实、和高宗进行对比。这一段文字多次使用反诘句式,一方面,它使对策充满激情,使文势更加跌宕起伏,沉郁顿挫;另一方面,无疑是在对高宗六年来不能"以刚大为心"、"先定规模"进行委婉而恳切的批评。其中接连四次以"今陛下有是乎"发问,然后以"如其有也,天下幸甚;若犹未也,伏愿陛下勉之"作结,相信高宗读后,是决不会心如止水、无动于衷的。

很明显,"攘夷狄"一题是所有问题中的重点所在,因此其文字份量也大大超出其他诸题。九成在这一部分高瞻远瞩,明察时局,纵论敌我,信心十足,显示了自己具有"隆中一对而定天下三分"的胸襟和气度。

在回答其他六问时,九成或直斥时局;或进献方略;或以古鉴今,坚定高宗中兴的信念;或陈述利弊,愿高宗笃恭俭,谨用人,以收天下之心。在在都可看出九成于当时政局、军事、经济、吏治等方面均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与成熟的思考。

第三部分应是全文的结束语,一般行文至此,说几句谦恭、颂圣的套语即可完成全策,然而九成却仍意犹未尽。他在这一部分开端再次突出总纲:"陛下之欲中兴,当以刚德为主,去谗节欲,远佞防奸,此中兴之本也!"紧接着又对第二部分洋洋洒洒的数千言"一言而该之,曰'刚'、'俭'而已。"看来高宗在"去谗节欲,远佞防奸"方面确实存在着危及政权、危及国家的严重问题,所以九成要在第三部分以如椽之笔再现奇峰,重掀波澜,展开自己冒"大不韪"而直犯龙颜的最后冲击。

九成在"逆龙鳞"之时,采取的是以退为进、绵里藏针的手法。他首先肯定"刚俭之德,圣心自明",然后用"天下犹未信者,何也"一句转折,以下引《左传》、《孟子》之事例点明众口难防,委婉道出"人主于食息謦咳之间,其可以弗谨乎?"接着,他又以神来之笔,写

出一段极富文学色彩而一般对策中又很少出现的文字来。九成把春夏秋冬之际高宗在皇宫内院骄奢华靡、志得意满的享乐与徽、钦二宗囚居北边、艰难度日、求死不得的苦难作鲜明对比，语语秾艳，奇丽华美，属对精妙。读至此处，谁能不临文击节，拍案叫绝呢！然而更妙的是，九成在此段有意以一连串反诘语频频出击：春问“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安乎？”夏问“不得共此疏畅也，亦何安乎？”秋问“两宫得无忧乎？”冬问“两宫得无寒乎？”于食则问陛下“其能下咽乎？”于居则问陛下：“其能安席乎？”最后至谓闾巷百姓都能有父兄妻子之乐，而高宗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时时处于“冬不得温，夏不得凊，昏无所于定，晨无所于省；问寝之私，何时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时可救乎？日往月来，何时可归乎”的焦虑之中！真不知当年高宗在读到这些连珠炮式的反诘时，心内会作如何感想。如果说第二部分的反诘还有历史的幌子可以所推诿的话，那么面对自己无法躲避，无法托词的身边事实，高宗即使是铁石心肠，大概也会为九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拳拳苦心所打动，而面红耳赤，如坐针毡吧！

行文到了这里，问题可以说越来越明朗，所以，九成的话也就说得越来越直截。他在引唐代大阉仇士良玩主弄权的史实为鉴之后，直面现实，告戒高宗“彼（高宗身边的宦官）私求禽马，动以陛下为名，此臣之所以耻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闻，此臣所以忧也”。这一“耻”一“忧”，自然是在毫不客气地批评高宗于此生死存亡之秋，仍纵欲信谗，搜览珍禽，驱驰骏马的丑行。他语重心长地提醒高宗：“勿谓深宫密殿，万事无迹也”。“谨独之学，其用甚大，陛下不可不知也”。最后重申主题，总结全文，以“臣愿陛下先以谨独为心，后以听谏为意，奖借言路，以旌直士之风，以至远阉寺，亲儒臣，以成就规模之大，此臣所望于陛下也”结束第三部分。

九成的这篇对策可以说是历代状元对策中的佼佼者。据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二所载，一代才女李清照曾对“桂子飘香”等语颇有不满，并嘲之为“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易安自然是女中豪杰，词坛健笔，然而，我们倒要冒昧地说，她的这一嘲实在是有些恃才傲人，大失公允。我们认为，还是九成的老师杨时的评语较为中肯：“廷对自中兴以来未之有，非刚大之气，不为得丧回屈，不能为也！”（《宋史》324卷）信哉斯言！

（李维新）

绍兴五年(1135)乙卯科

状元:汪应辰

汪应辰(1119~1176)字圣锡,信州玉山(今江西上饶)人。18岁中状元,授镇东军签判。从张九成游,所学益进。后召为秘书省正字,因上书论"和议"而迕秦桧,通判建州。遂请祠归乡,以修身讲学为事。继通判袁州、静江、广州,流落岭峤17年。因与张九成、赵鼎、张浚等主战派关系密切,屡受桧党迫害,桧死后始还朝。孝宗朝曾以敷文阁直学士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全蜀蒙惠,甚有政声。再入朝任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并侍读。在朝多革弊事,中贵为之侧目。终出知平江府,力疾请祠,病卒于家。有《文定集》。

对策

臣对臣闻治道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行霸道则霸，未有力行而不至者也，未有不能力行而能至者也。今陛下策臣于廷，询之以天下之大计，曰觊闻治道之要。顾臣浅陋，何足以奉承大问，臣谨以所闻于师者言之。

窃以为为治之要，特在于反求诸己而已。盖天下之事，未有不本于一人之躬行也。天下皆不仁，宜不可为也；然人君一为仁，则天下相率而趋于仁矣。天下皆不义，宜不可为也；然人君一为义，则天下相率而趋于义矣。故爱人而人不亲，则是仁有所未至也；能反吾之仁，则人自亲矣。治人而人不治，则是智有所未至也；能反吾之智，则人自治矣。凡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吾之一身既正，则天下心悦而诚服，若风草之必偃，自然之理也。故曰治道之要，莫先于此者也。以修己安百姓为病，此尧舜之所以反求诸己也。以百姓有过为在予一人，此汤武之所以反求诸己也。小人怨詈则皇自敬德，此高宗、中宗、祖甲、文王之所以反求诸己也。“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孔子之言治，未尝不反求诸己也。“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之言治，又未尝不反求诸己也。是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以是传之孟轲。数圣人者，达而在上，则力行此道以泽天下；穷而在下，则力行此道以诏万世。自孟轲之死，始不得其传，此微臣所以有望于陛下也。今陛下果能反求诸己而力行之，则凡所以问于臣者，臣虽不言而治道固已举

矣。不然，则臣虽欲言之，无益也。然而圣策下询，则臣之言有不得而默者，谨一二而对，陛下当见此理之昭然而不复疑矣。

伏读圣策，首慕古先圣王之治，若有所仰望而不可企及者。臣窃以为圣王之治，其则不远，陛下反求诸已，在先立其志尔。陛下聪明神武，首出庶物，其于天下之事若不足为者，但陛下未之为耳。夫以金人之入中国，莫有当其锋者，宜若不可与之较也，然去冬警奏既闻，陛下赫然震怒，亲总戎辂，号令六师，而敌人自遁。所以然者，以陛下之英断而不惮于勤劳也。湖湘之寇，弄兵潢池，为患久矣，陛下委之贤将，授以方略，不出数月，遂能歼厥渠魁。去历年深根固蒂之盗，而安千里刀刃之余民，所以然者，以陛下之明略而长任使也。夫以陛下已能之事如此，而可见之效又如此，此臣所以知陛下之必能复古先圣王之治，第恐圣志有未加焉耳。臣不知陛下之志，将兴衰拨乱，行帝王之道耶？抑将趋小利急近功，为霸者之事耶？今圣策乃以正心诚意为言，则夫帝王之道，陛下固已知之矣。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陛下诚能以其所闻所知，尊而行之，则高明光大，孰能御之哉！至于措诸事业之间，宽猛文质之宜，特其余事而已。臣愿陛下立志以为本，以帝王之道为可以必至，以圣人之言为可以必行，法天行健，不自懈怠，日进一日，新而又新，则二帝三王之事，岂有不可为者哉！惟陛下力行之尔。

伏读圣策，以"粤自即位九年于此，思欲雪父兄之耻，而复祖宗之烈，夙夜祗惧，罔敢荒宁，施为缪戾，治效阙然，深维其故，不惮改作。"臣以为此则在陛下反求诸已而先自治也。昔杜牧论收复山东之策，而以自治为上。牧之言，万世之砭石也。今陛下欲雪父兄之耻而复祖宗之烈，盍亦先于自治乎？草茅之士，不知朝廷所以为自治之计者何也。昔之人君，虽当干戈扰攘之际，亦必先择形胜之地以为根本之图。故高祖之兴，根本关中，光武之兴，根本河内。今

也不然，譬彼舟流不知所届，自维扬而之临安，自临安而之建康，自建康而之会稽，自会稽而再之临安，是都邑之迁徙未始有定论也。越王之欲伐吴，与种、蠡协谋凡二十年，然后得以逞其志。今也不然，今日以某人言某人之善而相之，而明日又以某人之毁而罢之。自艰难以来，所置辅相凡几人矣，是宰相之废置未始有定论也。中间尝用留守兵，欲率励群帅复收赵魏矣，几渡河而辄罢。又尝以宰相都督诸军，议遣大将欲涉淮以趋宿泗矣，俄而中辍，是进取之前却又未始有定论也。至于号令之间，如所谓前降指挥更不施行之类，则于措画政事，何其无定论也！如所谓以差下人别与差遣之类，其于进退人才，又何无定论也！夫都邑之迁徙，宰臣之废置，进取之前却，政事之措画，人才之进退，皆国家大事不可易为者，而乃纷纷不定如此，则陛下所以为自治之计，臣窃恐为敌国之所窥也。如此而欲雪父兄之耻，复祖宗之烈，正犹却行而求及。前九年之间，治效阙然，固其宜也。今陛下果能翻然奋悟，不惮改作，则中兴之业殆犹反手之易。愿先定大计然后从事，毋为此纷拿错乱而无归宿也。凡我之所以自治者无所不至，卓然有不可胜之备，则为之而成，动之而功，将无不可者矣，又何以治效之不进为忧乎？惟陛下力行之尔。

伏读圣策，以“真才之未显，实惠之未孚，冗食之未革”为虑，臣以为此诚当今之宿弊，而其所以治之，则在陛下之反求诸己也。夫吏道未肃，宰相之责也；民力未苏，郡守县令之责也；兵势未强，诸将之责也。臣窃谓天子之于天下，所欲必得，所求必至。上之所好者玩异，则下之人以玩异而献矣；上之所好者财利，则下之人以财利而献矣。盖未有上好之而下违之者也。今陛下下铨选之令，则诚有意于肃吏道矣；严科敛之禁，则诚有意于苏民力矣；谨拣练之法，则诚有意于强兵势矣。然而真才之未显，则是宰相进贤退不肖有未尽也；实惠之未孚，则是守令承流宣化有未良也；冗食之未革，

则是二三将臣训兵整旅有未善也。夫人君之诏也若声，而其下应之也若响。苟好恶一萌于方寸，虽不形于言词气色之间，而下之人逆探其意而迎合之矣。今陛下以是三者为宵旰之忧，发于诏令，而下之人犹不能奉承之，无乃陛下诚有所未至耶？苟诚未至而徒为空言，则虽日下诏书，果何补于事哉！臣窃见朝廷前日以郡县之吏多非其人，乃诏侍从台谏馆阁之臣，使各举所知以备其选。一时在位之士，盖尝以其所知而举之于朝矣，而未尝出其姓名而试其用也。又尝下诏，以今之守令有历任虽多，而才非所堪者，皆使退从散局。当时盖尝略行之矣，而今则又复废弃而不举也。则是择吏诚有所未至，此真才所以未显也。数年以来，民不堪命，虽诏书出于上，而虐令阻于下。诳以出力自保，则调发其丁夫；恐以犒设赡军，则厚裒其钱谷。弓材弩料，竹箭皮革，日日征求，物物取办，贪缘奸弊，下不聊生。乃复宽下赦文，放其租负，而律文又以分数为限，实不能免，苟以欺之，则是恤民诚有所未至，此实惠所以未孚也。今士卒骄惰，赏罚不明，无所别择，一切安养姑息之，惟恐一夫变色不悦，幸其无故则已矣。教习击刺，叫噪号呼，有如聚戏，金鼓旗号，白梃小队，皆效敌人，节制荡然，虽其将帅莫敢自保。至于冒请月俸，虚廪饩廪，盖有诡名而请者矣；盖有以使臣之名而请者矣；盖有借补官资而请者矣。朝廷知之，莫敢禁止。则是治兵诚有所未至，此冗食所以未革也。凡此三者，陛下苟能加之以诚心，则必有能为。陛下任其事者，苟诚心未至，则在下之人虽欲奉承而行之，有不可得矣，惟陛下力行之尔。

伏读圣策，且欲考课以核殿最，省官以节俸稍，屯戍营田以宽力役，平准均输以佐赋人，以爵赏之未艾，则欲定武功之算；以纪律之未明，则欲参府卫之制。臣以为此皆今之良法，而其所以行之，则又在陛下之反求诸己也。昔唐虞之法则九载而黜陟，周官之法则三岁而诛赏，而朝无幸位，官无旷职，是考课固所当先也。光武

下诏减内外四百余员，太宗创制定文武七百余员，而国用以足，民事亦理，则省官又在所当先也。二者之法，诚足以核殿最而节俸稍矣。然臣以为，法之必行，陛下不可不先正其心术也。司马光有言曰：“考课之法，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功状者迹也，功明者心也，己之心不能治，而欲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诚以人主有偏党之心，则以愚为智，以是为非，但徇一己之爱憎，不复问其人之贤否，而人才于是乎溷淆矣，此考课之本所以在于正心术也。荀况有言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莫如清心。”诚以人主嗜好既形，下皆辐辏而趋之，各求自售，则名器必自此滥矣，此省官之本所以又在于正心术也。陛下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哀乐乱其志，使邪佞不得以惑之，谄谀不得以入之，如此则考课省官之法始可得而行矣。屯戍营田，韩重华常用之矣，终足以赡边将之用而省度支之费；平准均输，桑弘羊常用之矣，终能使敛不及民而上用自足。则二者之法，诚足以宽力役而佐赋入矣。然臣以为欲法之必行，陛下不可不先明于任使也。汉宣帝与赵充国议论疆场之事，一时在廷之臣，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充国以为明主可为忠言，条列利害，反复凡数千言，宣帝信任而不疑，终获破羌之功而收屯田之利。以充国之事观之，则营戍屯田，在陛下安得不明于任使也！唐之刘晏，初得渠河之利病，乃畏为人牵制而移书于朝廷。朝廷以其言为可行也，遂以漕事委之，故晏得以尽其才。及臣考其行事，晏之掌邦计也，凡始于广德之二年而终于建中之元年，前后十有六年，乃始得以成其功。以晏之事观之，则平准均输，在陛下安得不明于任使也！陛下诚能搜揽人材，经略世故，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久任而责成之，则屯戍营田平准均输之法，始可得而行矣。武功之等，在秦则凡一十七级。然臣以为纪纲先振，然后始可得而定其等也。昔唐之肃宗，当干戈多难之际，朝廷之势日以委靡，爵赏滥冒莫此为甚，将军告身，才易一醉而已。夫所以至此者，皆本于纪纲之不振

而然也。惟上之纪纲日以不振,故其下皆有觊觎之心以邀其上,而上之人不得而不与,此武功所以滥冒也。然则今日之事,盍亦取监于肃宗而先振其纪纲乎?府卫之制,在隋则凡十二卫,在唐则凡十六卫。然臣以为亦必纪纲先振,然后始可得而参其制也。昔唐之明皇,承晏安太平之后,苟且偷安,昧于远图,政令日弛,法度日隳,诸卫之兵,浸以贫弱,百姓苦之,而张说始献犷骑之议。夫所以至此,亦以其纪纲之不振而然也。惟其上之人纪纲日以不振,废而不举,弊而不修,此府卫所以败坏也。然则今日之事,又盍亦取鉴于明皇而先振其纪纲乎?凡此数者,考之于古,验之于今,以臣观之,莫不可行。而其所以行之,则在陛下正其心术,明于任使,而振其纪纲焉耳。古人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治人无治法"者,凡以此也,惟陛下力行之尔。

伏读圣策曰:"上之欲三辰明,四时序,灾沴不生,动植遂性",臣愿陛下反求诸己,而应天以实可也。"下之欲风化行,习俗厚,奸宄不作,而中外协心",臣愿陛下反求诸己,而动民以行可也。臣闻之《诗》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书》曰:"面稽天若",言圣人之奉天,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以颠沛造次,不违于仁,出入起居,罔有弗钦,凡以畏天之威而奉之尔。大抵天道虽至高而下,虽至远而迩,虽至神而明,人君一念一虑之失,则足以伤天地之和;一言一动之善,则足以同天地之德,善恶之应,速于桴鼓。臣窃观于今岁之夏,甘雨愆候,陛下焦心劳思,上惧天戒,下忧民瘼,不忘于食息之间。既有膏泽继降,不出于旬日之内,盖以陛下诚有惨怛之心也。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陛下诚能因前日之所已为,而推今日之所未为者,扩而充之,则天意昭格,将保佑宋祚于千万年矣。昔孟子以齐宣王有爱牛之心,且曰"是心足以王矣"。况陛下如天地之大,推此以往,其何所不至乎!此应天以实之效也,惟陛下力行之尔。臣闻得十人之心者,可以将十人;

得百人之心者，可以将百人；得千万人之心者，可以将千万人。今陛下将大有为于天下，宜先有以深服天下之心。而天下之心亦未易服也，刑威不可得而制，权势不可得而胁，惟人主力于为善，勤于进德，始足以服其心尔。昔宣王承厉王之烈，小雅尽废，四夷交侵，而终能复文武之境土者，以其所以躬行于上者能服天下之心也。故序《诗》者称之曰："侧身修行，天下喜于王化复行。"盖方其侧身修行，而天下之人固已胥庆，知王化复行矣，此民心所以归也。光武初入关，冯异送之曰："当行人所不能为者"。光武于是乎招徕俊乂，屈己从谏。邓禹之徒，闻风慕义，裹粮而归，相与扶持协赞，以成再造之业。陛下诚能体二君之所为，使圣德日新，昭著天下，则民之不幸而陷于强敌，将日夕引领而望王师之来苏，惟恐其后。况吾东南之民，安有不协心以为陛下用哉？惟陛下力行之尔。

臣窃见陛下临政愿治，当宁太息。不以臣等愚浅，幸赐诱进，而以治道为问。仰慕先圣之成效，而追悔前日之失策，深思历年之宿弊，而欲行昔日之良法。而又上欲得皇天之意，下欲收黎庶之情。圣虑深远，规模广大，皆非愚臣所能及。恭捧问目，沉吟久之，不知所对。周思历算，窃以为今日之事，惟陛下可以为，他人皆莫能为也。故因大问之及，而辄求所以反求诸己之道，诚不敢务为多言以上惑圣听。臣不知陛下之意，将以今日之事责之于谁耶？将责之大臣？陛下即位以来，大臣不为不多矣。以为不贤耶？则告廷之命，以某为有道，以某为有德，陛下何自而得之以为贤耶？而中兴之功，又终无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为之意，果能无愧于前王乎？苟为不然，则所谓大臣者，虽负经纶之方，方且畏惧而避嫌，而其不贤者，又且持禄而保宠矣，是无惑乎治效之蔑闻也。将责之台谏？陛下即位以来，台谏不为不多矣，以为不贤耶？则训诰之词，以某为正直，以某为謇谔，陛下又何自而得之以为贤耶？而中兴之功，又终无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为之意，果能

无愧于前王乎？苟为不然，则所谓台谏者，有怀忠徇国之心，方且待信而后谏，而其不贤者，又且希旨以求进矣，是无惑乎治效之蔑闻也。抑将望之四方之贤才耶？陛下即位以来，所以招徕而用之者不为不多矣，以为不贤耶？则或得之众论，或得之荐举，或朝奏而暮召，或一岁而九迁，陛下又何所见而然也？以为贤耶？而中兴之功，又终无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为之意，果能无愧于前王乎？苟为不然，则天下之士，其贤者方且奉身而求退，而不贤者往往旅进而旅退，患得而患失，阿谀谄佞，无所不至矣，是无惑乎治效之蔑闻也。以此言之，今日之事，惟在陛下自为之而已矣。苟能反而求之，勤而行之，奋然先有以自立，则智者愿效其谋，勇者乐效其死。举天下之大，惟陛下所欲，将无不可者矣。不然，则群臣虽有伊、吕、稷、契，亦安能为陛下计哉！此臣所以愿陛下力行反求诸己之道也。臣不胜惓惓，惟陛下留神省察，实万世无疆之休。臣谨对。

评析

汪应辰原名汪洋，中状元时年仅18岁，可以说是乳毛未退，涉世不深。然而他在对策中表现出的博学多识和成熟练达，使当年主持殿试的高宗也误以为是“老成之士”。只是到了金殿唱名之时，高宗才发现，这位独占鳌头的状元原来是一个年未及冠的翩翩少年。为此，他喜出望外，特加恩宠。因北宋仁宗朝王拱辰亦18岁中状元，故高宗亲为汪洋更名应辰，并一反常态，御书《中庸》一篇赐与(故事“进士第一人赐以御诗”)。本来，高宗还要破例恩授应辰为朝官，后因宰相赵鼎建议让应辰在外任多加磨砺，使其尽快

成为国家栋梁之材，高宗这才作罢。(《宋史·本传》)

这一科殿试策问的原题现已不存，然而我们从应辰的对策中大致还可见其要点。针对圣问："治道之要"，应辰采用的手法与他的老师张九成同出一辙，也是首先标出全篇主脑，并以此一以贯之，反复强调。在首段，应辰谓"为治之要，特在反求诸己而已"，"陛下果能反求诸己而力行之，则凡所问于臣者，臣虽不言而治道固已举矣。不然，则臣虽欲言之，无益也。"在作为结束的最后一段，应辰谓"今日之事，惟在陛下自为之而已矣。苟能反而求之，勤而行之，奋然先有以自立，则智者愿效其谋，勇者乐效其死。举天下之大，惟陛下所欲，将无不可者矣。不然，则群臣虽有伊、吕、稷、契，亦安能为陛下计哉！此臣所以愿陛下力行反求诸己之道也。"在其他逐条回答策问的五段中，应辰亦不厌其烦地在每段的开始都明明白白地标出"反求诸己"。剀切陈词，谆谆告戒，真可谓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今天的读者都知道，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的弊端，思想的禁锢，使国家、民族的命运完全系于一人之身。皇帝为尧、舜，则天下安定，国富民强；皇帝为桀、纣，则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一代又一代的才智之士勉力补天，死而后已，但却总是勘不破皇权天授这一道"铁门槛"，上演出一幕又一幕的历史悲剧，徒使后人扼腕悲愤！历史的局限自然使生在南宋的应辰也概莫能例外，所以，他在立国九年之后，以"反求诸己"作为自己金殿对策的中心，殷殷寄中兴希望于高宗，应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应辰在具体回答策问五题时，虽然不避重复的首先强调"反求诸己"，但他同时又根据各部分内容的不同而不时加以引申变化，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行文张弛自如，神完气足。

在答圣策"慕古先圣王之治"时，应辰是以勉励为主。他先引绍兴四年高宗为抵御刘豫与金的南侵，在主战派的支持下"亲总六

师，临幸江滨，督励将士"，使北兵无功而返一事；再引本年六月高宗用名将岳飞，破强寇杨太于洞庭水寨，安定上游一事。高度肯定"陛下之必能复古先圣王之治"。然后再以"第恐圣志有未加焉耳"对高宗予以提醒，鼓励他"立志以为本，以帝王之道为可以必至，以圣人之言为可以必行，法天行健，不自懈怠，日进一日，新而又新，则二帝三王之事，岂有不可为者哉"！坚定高宗兴衰拨乱，奋然有为的信心。

在答圣策九年来"施为缪戾，治效阙然"时，应辰历检立国之后朝廷在重要关头的首鼠两端，举措失当，丝毫不留情面地予以批评："都邑之迁徙，宰臣之废置，进取之前却，政事之措画，人才之进退，皆国家大事不可易为者，而乃纷纷不定如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此而欲雪父兄之耻，复祖宗之烈，正犹却行而求及。前九年之间，治效阙然，固其宜也。"这一段直笔无隐，放胆痛斥，对于高宗来说，无疑有如当头棒喝，足以促其清醒。

在回答圣策如何消除"真才之未显，实惠之未孚，冗食之未革"等"宿弊"时，应辰先用此"宰相之责也"、"郡守县令之责也"、"诸将之责也"，暂时把先前崩紧的弦略作松缓，然后曲线迂迴，娓娓道出"天子之于天下，所欲必得，所求必至。上之所好者玩异，则下之人以玩异而献矣；上之所好者财利，则下之人以财利而献矣。盖未有上好之而下违之者"这一封建社会之"通则"，分析高宗虽也屡下诏令，欲肃吏道、苏民力、强兵势，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顺理成章地导入"人君之诏也若声，而其下应之也若响。苟好恶一萌于方寸，虽不形于言词气色之间，而下之人逆探其意而迎合之矣。"最后顺藤摸瓜，直探本原，指出所有"宿弊"的症结在于高宗"择吏诚有所未至，此真才所以未显也"；"恤民诚有所未至，此实惠所以未孚也"；"治兵诚有所未至，此冗食所以未革也"。这一段以退为进，迂迴出击，如果作一个不甚确切的比喻，应辰在此打出的"重拳"，由

于包着厚厚的“拳套”，高宗虽痛在身上，大概也有苦难言，无可如何吧！

在对第四、五两题的论述中，应辰或详引前朝史实，条目清晰地深入分析；或阐释经典，谆谆告戒，语语情长。均给人以侃侃而论，鞭辟入里之深刻印象。

总之，读了仅只有今天高中毕业生年龄的汪应辰的这篇策论，我们不得不倾心折服。然而这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少年状元力劝高宗“反求诸己”的结果，却是高宗于绍兴八年三月复相秦桧。二人“君臣相得”，置国恨家仇，锦绣中原于不顾，排赵鼎，害岳飞，与虎谋皮，和金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而应辰本人，日后则饱经宦海浮沉，一生蹭蹬坎坷，曲折多难。他的那些几可称为字字珠玑的肺腑之言，最终却尘封虫蛀，了无影响。时代的不幸致使英才不遇，明珠暗投，岂不令人悲哉！岂不令人悲哉！

（李维新）

绍兴二十七年(1157)丁丑科

状元:王十朋

王十朋(1112～1171)字龟龄,号梅溪,温州乐清(今属浙江)人。少年颖悟,长有学行,聚徒梅溪,受业者以百数。绍兴二十五年进士第一,授绍兴府签判。入朝任秘书郎,建王府教授,著作郎。直言论事,不避利害,被太学生尊为"五贤"之一。孝宗朝历官国子司业,起居舍人,侍御史。坚决支持北伐,力陈恢复大计。后出知饶、夔、湖、泉四州,兴利除弊,政声蜚然。所至百姓为其筑祠绘像,去则老幼攀留,越境送之。以龙图阁学士致仕,令下而卒,终年60岁。谥"忠文"。十朋每以诸葛亮、颜真卿、寇准、范仲淹自比,风节凛然,素为大儒朱熹、张栻所敬。有《梅溪集》传世。

策问

盖闻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仰惟祖宗以来，立纲陈纪，百度著明，细大毕举。皆列圣相授之模，为万世不刊之典。朕缵绍丕图，恪守洪业，凡一号令一施为靡不稽诸故实，惟祖宗成法，是宪是若。然画一之禁，赏刑之具犹昔也，而奸弊未尽革；赋敛之制，经常之度犹昔也，而财用未甚裕；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犹昔也，而人才尚未盛；黜陟之典，训迪之方犹昔也，而官师或未励。其咎安在？岂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耶？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参稽典册之训，讲明推行之要，俾祖宗之治复见于今。其必有道，子大夫学古入官，明于治道，蕴蓄以待问久矣，详著于篇，朕将亲览。

对策

臣对 臣闻有家法，有天下法。人臣以家法为一家之法，人君以家法为天下之法。人君之与人臣，虽名分不同，而法有大小之异。至于能世守其法者，则皆曰“权”而已。人臣能执一家之权，守一家之法，以示其子孙，则必世为名家；人君能执天下之权，守其家法以为天下法，贻厥子孙而施诸罔极，则必世为有道之国。盖法者，治家治天下之大具；而权者，又持法之要术也。今陛下亲屈至尊，延集多士，访治道于清问之中。首以监于先王成宪，恪守

祖宗之法为言，是则陛下欲守家法以为天下法者，固已得之矣。臣获以一介草茅与子大夫之列，仰承圣诏，其敢不展尽底蕴，茂明大对，以为陛下遵祖宗守成法之献耶？臣之所欲言者无他焉，亦曰揽权而已。尝谓君者天也。天之所以为天者，以其聪明刚健，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昧也。君之所以为君者，以其能宪天聪明，体天刚健，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下移也。天执天之权而为天，君执君之权而为君，故天与君同称大于域中。而君之名号，必以天配。以天道而王天下也，则谓之“天王”；以天德而子兆民也，则谓之“天子”；居九五正中之位，则谓之“天位”；享万寿无疆之禄，则谓之“天禄”；五服五章者谓之“天命”；五刑五用者，谓之“天讨”；就之如日者，谓之“天表”；畏之如神者，谓之“天威”。居曰“天阙”，器曰“天仗”，法曰“天宪”，诏曰“天语”。天之大不可以有加，君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以其咸能司域中之权而已矣。恭惟陛下，蕴聪明之德，体刚健之资，躬亲听断，动法祖宗。一诏令之下，而万民莫不鼓舞者，如天之雷风；一德泽之布，而万民莫不涵泳者，如天之雨露；开众正之路，杜群枉之门，而万民莫不悦服者，如天之清明；为政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万民莫不拭目以观者，如天之运行而不息。巍巍乎！荡荡乎！固不可以有加矣！而臣犹以法天揽权为言者，盖陛下之德，虽不可以有加，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无已而望陛下，此臣所以昧死尽言而不知讳也。

臣伏读圣策，首以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为言；次及于祖宗立纲陈纪，列圣相授之道；又次以今日奉行，而不能无四者之弊为问。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守成宪、遵祖宗，欲革今日之弊也。臣窃谓陛下能揽威福之权，率自己出，则成宪有不难守，祖宗有不难法，时弊有不难革，天下有不难治。凡所以策臣者，皆不足为陛下忧矣。不然，陛下虽勤勤问之，臣虽谚谚诵之，无益也。臣观自古善言治之人，未尝不以揽权为

先。自古善致治之君,亦未尝不以揽权为先。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者,箕子告武王之言也。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至于无道,则自诸侯大夫出者,孔子垂戒后世之言也。谓庆赏刑威曰君,君能制命为义者,左氏记时人之言也;谓堂陛不可以相陵,首足不可以相反者,贾谊告文帝之言也。此臣所谓善言治之人,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三皇官天下者,揽福威之权以官之也;五帝家天下者,揽福威之权以家之也;三王计安天下,而历年长且久者,揽福威之权以安之也。汉宣帝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中兴之业者,无他焉。以其能革霍光专政之弊,躬揽福威之权而已。观其综核名实,信赏必罚,斋居决事,听断惟精,而神爵、五凤之治,号为吏称民安,功光祖宗,业垂后裔者,盖本乎此也。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建中兴之功者,无他焉。以其能鉴西京不兢之祸,躬揽福威之权而已。观其总揽权纲,明慎政体,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建武之政,号为止戈之武,系隆我汉,同符高祖者,盖本乎此也。唐明皇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开元之治者,以其能革前朝权戚干政之弊,躬揽福威之权而已。初,明皇锐于求治,姚崇设十事以要说之,其大概则劝其揽权也。帝自谓能行,由是励精为治,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矣。宪宗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元和之治者,以其能惩前日沾沾小人窃柄之弊,躬揽福威之权而已。初宪宗锐于致治,杜黄裳惧不得其要,劝其操执纲领,要得其大者,帝嘉纳之。由是励精为治,纪律设张,赫然号中兴矣。此臣所谓自古善致治之君,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陛下惩前日权臣专政之久,收还福威之柄,运独化于陶钧,裁万几于独断,天下翕然称陛下为英主,凛凛乎汉宣帝、光武、唐明皇、宪宗之上矣!而臣尤劝陛下揽权者,非欲陛下衡石程书如秦皇帝,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陛下传食德政如隋文帝,而谓之揽

权也；又非欲其强明自任、亲治细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其精于吏事、以察为明、无复仁恩如唐宣宗，而谓之揽权也。盖欲陛下惩其所既往，戒其所未然，操持把握，不可一日而少纵之，使福威之柄一出于上，不至于下移而已！臣窃谓陛下欲守祖宗之法，莫若躬揽福威之权。欲揽福威之权，又莫若行陛下平日之所学。五经泛言治道，而《春秋》者，人主揽权之书也。陛下圣学高明，缉熙不倦，万几之暇，笃好此书。固尝亲洒宸翰，以书经传，刊之琬琰，以诏学者矣。迩者又命儒学近臣，于经筵讲读之，是则夫子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迹，固已默得于圣心之妙。至于其间可为揽权之法者，臣请为陛下诵之。《春秋》书王曰天王者，所以为人君法天揽权之法；有书王不书天者，所以为人君不能法天揽权之戒。书朝书会者，欲朝会之权必出于天子也；书侵书伐者，欲征伐之权必出于天子也；书僭礼乱乐者，欲其收礼乐之权也；书僭赏滥罚者，欲其收赏罚之权也。权在诸侯则讥之，如践土之盟之类是也；权在大夫则刺之，如鸡泽之盟之类是也。先王人而后诸侯者，欲权在王人也；内中国而外夷狄者，欲权在中国也。书盗一字者，所以戒小人之窃权也；书阍一字者，所以防刑人之弄权也。凡一字之褒重于华衮者，皆所以劝人君揽权以作福；凡一字之贬重于斧钺者，皆所以劝人君揽权以作威。臣愿陛下尊圣人之经，行圣人之言，以是正天下之名分，以是定天下之邪正，以是成天下之事业。则何患乎不能监先王之宪，遵祖宗之法，革今日之弊耶？

臣伏读圣策曰："仰惟祖宗以来，立纲陈纪，百度著明，细大毕举，皆列圣相授之模，为万世不刊之典。朕缵绍丕图，恪守洪业。凡一号令一施为，靡不稽诸故实，惟祖宗成法是宪是若"。臣有以见陛下谦恭抑畏，不以聪明自居。必欲行祖宗之法，以致中兴之治也。臣窃谓陛下欲法祖宗以致治，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揽权。臣谨按《春秋》有变古则讥之之书，有存古则幸之之书，有复古则善之

之书。经书“初献六羽”者，讥隐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辄变先王之乐也；书“初税亩”者，讥宣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轻变成周之彻也。此所谓变古则讥之者也。书“犹三望”者，讥僖公不郊，而幸其犹三望；书“犹朝于庙”者，讥文公不告朔，而幸其犹朝于庙。此所谓存古则幸之者也。襄公十一年书“作三军”者，讥其变古也；昭公五年书“舍中军”者，善其复古也。此所谓复古则善之者也。《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汉惠帝用曹参，守萧何之法，而海内晏然；武帝用张汤，取高皇帝之法纷更之，而盗贼半天下。守祖宗之法者，其治如此；变祖宗之法者，其乱如彼。为人主者其可自坏其家法耶！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质、赵普之徒，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时，有若李沆、王旦、冠准；在仁宗时，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侧闻庆历中，仁宗出御书十三轴，凡三十五事。其一曰："遵祖宗训"；二曰："奉真考业"；三曰："祖宗艰难，不敢有坠"；四曰："真宗爱民，孝思感噎。故当时君圣臣良，持循法度。四十二年之间，治效卓然者，盖本乎此。又闻熙宁中，先正司马光于经筵进讲，至萧何、曹参事，谓参不变何法，得守成之道。且言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异日吕惠卿进讲，立说以破之。谓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随而折之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非变也。诸侯有变礼易乐者，王巡守则诛之，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是谓世轻世重，非变法也。观二臣之言，亦足以见其人之邪正矣。陛下自即位以来，固未尝不遵守祖宗法。比年有出于一时申请权宜而行者，致与成法或相抵牾。迩者陛下面谕群臣，谓国家政事，并宜遵守祖宗。今又发于清问，以求致治之效。臣有以见陛下得持盈守成之

道，真仁宗之用心矣。然臣复以揽权为言者，盖春秋讥时王失揽权之道，故诸侯遂有变法之弊。今陛下欲守祖宗之法，宜用春秋赏罚之权以御之可也。大臣有清净如曹参者，宜命之持循；忠正如司马光者，宜俾之讨论。变乱如张汤者则诛之，异议如吕惠卿者则斥之。如是则祖宗良法美意，可以垂万世而无弊矣，尚何患乎天下之不治哉！

臣伏读圣策曰："画一之法，赏刑之具犹昔也，而奸弊未尽革"。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明赏刑以革弊也。臣窃谓欲奸弊之尽革，不可不法《春秋》以揽权。盖《春秋》之法，非孔子之法也，成周之法也。故杜预曰："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经有书赏者，如锡命威公，锡命文公，锡命成公之类。皆所以讥时王之滥赏，非周公之赏也。有书刑者，如杀其大夫，放其大夫，杀其公子之类。皆所以讥时君之滥刑，非周公之刑也。时王失周公赏刑之法，不能革当时之奸弊，故仲尼以笔削之，权代之善劝而淫惧焉。我祖宗制赏刑之法，载在有司。画一之章，昭然可睹。创之者如萧，守之者如曹。未尝有滥赏也，而赏必当乎功。未尝有淫刑也，而刑必当乎罪。历世行之，弊无不革者，盖以圣祖神宗，能揽权于上，而群臣能奉行于下故也。故司马光自为谏官及为侍从，尝以人君致治之道三献之仁宗，又献之英宗，又献之神宗。而其二说则在乎信赏必罚也。三宗既用其言以致极治矣。光以清德雅望，执政于元祐之初，躬行其言，以革时弊。进退群臣邪正之甚者十数人，天下皆服其赏刑之当。一时之弊亦无不革者，我三宗真盛德之君，而光亦可谓救时贤相也。迩者陛下躬亲万几，一新时政，斥逐奸邪，登用耆旧。禁锢者释，告讦者诛。兹赏刑之至公，而革弊之甚大者也。圣策犹以奸弊未革为忧者，岂今日朝廷，犹有僭赏滥罚如春秋时乎？臣不敢不陈其大概。夫人主赏刑之大者，莫如进退天下之人才。今陛下每进一人，必出于陛下素知其贤，亲自识擢可也。不

然，则出于大臣侍从，公心荐举可也。不然，则采于舆论，而天下国人皆曰贤可也。苟不出于三者，而一旦遽进之，则议者必曰：某人之进也，出于某人阴为之地也。如是则一人之滥进，有以损陛下作福之权矣。陛下每退一人，必出于陛下灼知其罪，震怒而赐谴可也。不然，则出于谏官御史，公言论列可也。不然，则得于佥言，而天下国人皆曰有罪可也。苟不出于三者，而一旦遽退之，则议者必曰：某人之退也，出于某人阴有以中之也。如是一人之误退，有以损陛下作威之权矣。昔舜举十六相，而天下悦其赏之当；去四凶人，而天下服其罚之公。陛下苟能以祖宗制赏刑为法，以虞舜用赏刑为心，执《春秋》赏刑之权以御之，则何患乎奸弊之不革耶？若夫有某劳进某秩以为赏，犯某事得某罪以为罚，此特有司之职耳，非人主福威之大者。臣不复为陛下言之也。

臣伏读圣策曰："赋敛之制，经常之度犹昔也，而财用未甚裕"。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裕财用以经邦也。臣窃谓欲财用之有裕，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揽权。谨按《春秋》书"臧孙辰告籴于齐"者，讥庄公不节国用，一岁不熟而告急于外也；书"初税亩"者，讥宣公不节国用，变成周什一之法，至于履亩而税也；书"作丘甲"者，讥成公不节国用，至于以丘而出甲也。书"用田赋"者，讥哀公不节国用，至于用亩而出军赋也。《春秋》书告者不宜告，书初者不宜初，书作者不宜作，书用者不宜用。臣由是知《春秋》赋税之书，为人君节用裕财之训明矣。昔孔子对齐景公之问政，不曰：政在生财。而曰：政在节财。有若对鲁哀公之问年饥，不告之以生财之术，而告之以盍彻。臣又知裕国之术，实在乎节用也。侧闻太祖皇帝有言曰："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金银为饰，力亦可办。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呜呼！大哉言乎！真可为万世子孙保国之训也。又闻仁宗圣性，尤务俭约。器用止于漆素，衾褥止用黄絁。嘉祐间临轩策

士，出“富民之要在节俭”以为御题。时吕溱赋曰：“国用既节，民财乃丰。”仁宗悦之，擢为第一。观仁宗取士命题之意，又真可为万世子孙保国之训也。又闻熙宁初，司马光、王安石同对，论及救灾节用事。安石曰：“国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上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万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武帝不明耳。”司马光之名言，真可为节用理财之法，聚敛毒民者之深戒也。陛下自和戎以来，兵革不用二十年矣。是宜仓廪富实，贯朽粟陈，如成、康、文、景时可也。而圣策乃以财用未裕为忧，虽臣亦窃疑之。岂国家用度之际，有所未节乎？奢侈之风，有所未革乎？不急之务，无名之费尚繁乎？今赋入不及祖宗全盛之日，而用度不减祖宗全盛之时。三年郊祀之礼所不可免者，而臣下赏赐之费有可得而省也；不得已之岁币所不可免者，而使命往来之费可得而省也；百官之俸所不可免者，而冗官可得而省也；六军之食养所不可免者，而冗兵可得而省也。臣所谓用度之际有所未节者，如此之类，不止乎此也。朝廷往尝屡有禁销金之令矣，而妇人以销金为衣服者，今犹自若也；又尝有禁铺翠之令矣，而妇人以翠羽为首饰者，今犹自若也。是岂法令之不可禁乎？岂宫中服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风，未形于外乎？臣所谓奢侈之风有所未革者，盖在乎此也。臣又闻之道路，谓远夷外国，有以无益之奇玩，易我有用之资财者；池台、苑囿、车骑、服御，有未能无所增益者；中贵、外戚、便嬖、使令、倡优、伶官之徒，有未能无非时赏赐者。臣所谓不急之务无名之费尚繁者，盖在乎此也。昔汉文帝躬行节俭以化民，而海内至于富庶。臣愿陛下揽权于上，而革众弊。以文帝及我太祖仁宗恭俭为法，以《春秋》所书为戒，则何患乎

财用之不裕乎？若夫自同于聚敛之臣，献生财之术，则臣不敢也。

臣伏读圣策曰："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犹昔也，而人才犹未盛"。臣有以见陛下致治之道，在乎得士，而欲人才之盛，如祖宗时也。臣窃谓陛下欲人才之盛，宜揽育才取士之权。臣谨按《春秋》书作丘甲，谷梁因论古者有四民，而以士民为首。范宁释之曰："士者，治道艺者也"。又按经书单伯送王姬。谷梁曰："单伯者，我之命大夫也"。范宁释之曰："古者诸侯贡士于天子，大国三人，次国二人，小国一人。"又按《公羊春秋》曰："什一行而颂声作"。何休因论及成周之时，井田校室之制，大学小学之法，养士取士之说为甚详。又按经赦许止之罪。谷梁曰："子生三月，不免水火，母之罪也。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就师傅，学问无方，心志不通，己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誉不彰，朋友之罪也；名誉既彰，而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有司举之，而王者不用，王者之过也。"《春秋》伤时王失育才取士之权，而默寓其意于笔削之际。公羊、谷梁、范宁、何休之徒，从而发明之，亦可谓有功于风教矣。我祖宗以来，取士于科举，是古者诸侯贡士之法也；养士于太学，是古者校庠序之法也；又有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是有取于汉唐盛世之法也。进士科或用诗赋，或用经义，虽更变不同，而未尝不得人也；太学之士，或出于舍选，或出于科举，虽作成不同，而亦未尝不得人也。二百年间，名臣巨儒，建勋立业，背项相望，莫不由此涂出，可谓盛矣。陛下往者虽在干戈日不暇给之中，而亦未尝废俎豆之事。自偃兵以来，复兴太学以养诸生。其取士之科，作成之法，一遵祖宗之旧，恩甚渥也。而圣策犹以人才未甚盛为忧者，臣辄献揽权之说焉。今取士之科、作成之法虽曰犹昔，而人才非昔者，由福威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岁权臣子孙门客，省闱殿试，类皆窃巍科，而有司以国家名器为媚权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朝廷比因外台之言，例行驳放，士论莫不称快。臣愿

陛下常揽福威之权以御之，严诏有司，谨取士之公法，而无蹈往年之覆辙可也。至所谓作成者，盖欲作成其器，如鸢飞鱼跃，涵养其平日之刚方，而成就其异时之远大者耳，非取其能绵章绘句以媒青紫也。自权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而庠序之士，养谀成风。科举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时务，欲士气之振可乎？臣闻嘉祐间，仁宗以制科取士，时应诏者数人，眉山苏辙之言最为切直。考官以上无失德而辙妄言，欲黜之，独司马光慨然主其事。仁宗曰："朕以直言求士，其可以直言弃之耶？"擢置异等。此陛下取士之家法也。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命庠序去谤讪之规，科举革忌讳之禁，有司取忠谠之论。将见贤良方正、茂才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济济而出，如仁宗时矣，尚何患人才之不盛乎？

臣伏读圣策曰："黜陟之典，训迪之方犹昔也，而官师或未励。"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人，而欲官师之励如祖宗时也。臣窃谓欲官师之励，宜揽黜陟贤否之权。谨按《春秋》隐十一年书"滕侯至"，威二年别书"滕子"。范宁曰："前称侯今称子者，盖时王所黜"。隐二年书"纪子至"，威二年则书"纪侯"。范宁曰："前称子今称侯者，盖时王所进"。臣窃谓春秋时王不能黜陟诸侯，是必夫子以赏罚之权，因其贤否而黜陟之也。又按经书"楚"曰"荆"。公羊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休释之曰："圣人因周有夺爵之法，故备七等之科，以进退之。"臣是以知《春秋》实夫子黜陟之公法也。故为臣而知《春秋》者，则必为忠臣。盖《春秋》以责忠臣之至，训迪天下之为人臣者也。为子而知《春秋》者，则必为孝子。盖《春秋》以责孝子之至，训迪天下之为人子者也。我国家任官之法，上自公卿百执事，下至一郡一县之吏，无非以公道黜陟之，固无异虞舜三载考绩之法也；有学以教之于未任之前，有法以禁之于筮仕之后，无非以公道训迪之，固无异乎成周训迪厥官之方也。故当时为官

师者，罔不勉励厥职。坐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是宰相之励其职也；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是谏官之励其职也；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者，是御史之励其职也。百官励其职于朝，守令励其职于郡县。是以祖宗之世，内外多任职之臣，故其致治之效，远出汉唐之上。今陛下任贤使能以建中兴之治，黜陟之法，训迪之方，无非遵祖宗之时。而圣策乃以官师未励为忧者，臣辄献揽权之说焉。今黜陟之法，训迪之方，虽曰犹昔，而治效非昔者，由福威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大乎黜陟；而治乱之所系者，莫重乎官师。曩者内外用事之臣，多出乎权门之亲戚、故旧、朋党，文臣或非清流而滥居清要之职，武臣或无军功而滥居将帅之任。贿赂公行，其门如市，郡县之吏，其浊如泥。是皆官曹澄清时可堪一笑者。至于一言忤意，虽无罪而亦斥；睚眦之怨，虽忠贤而必诛。其一时黜陟，皆出于喜怒爱憎之私，无复有唐虞考绩，李唐四善二十七最之法，求欲其尽瘁励职可乎？若夫所谓训迪者，盖将以忠义训迪之，使其忘身徇国而已。非欲训迪其巧进取、善造请、以事权势也。当权门炙手可热之时，缙绅相率为佞之不暇，孰有以忠义相训迪者乎？至于今日而官师犹未励者，以其承积习之后，而余弊未革故也。陛下必欲官师咸励厥职，莫若大明黜陟于上，而以黜陟之次者付之宰相，又其次者付之吏部，又其次者付之监司可也。昔庆历中，仁宗黜夏竦等，用杜、韩、范、富以为执政，以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皆天下之望，鲁人石介作《圣德颂》以揄扬之。此陛下黜陟之家法也。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执福威之大柄以为黜陟之法，明忠孝之大节以为训迪之方。如是则尚何患乎官师之不励职如祖宗时乎？

臣伏读圣策谓："奸弊未尽革，财用未甚裕，人才尚未盛，官师或未励，其咎安在？岂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

不可已耶？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参稽典策之训，讲明推行之要，俾祖宗致治之效，复见于今，其必有道。”臣仰见陛下愿治之切，思慕祖宗之深，欲聿追其盛德大业者，可谓勤且至矣。然臣已陈揽权之说于前，且以《春秋》为献。抑尝闻先儒曾参有言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春秋之学，陛下既已深得之，复能尊其所闻，行其所知，揽福威之权，以守祖宗之家法，则赏刑当而天下悦矣，奸弊不患乎不革！节俭行而天下化矣，财用不患乎不裕！取士公而贤能出矣，人才不患乎不盛！黜陟明而邪正分矣，官师不患乎不励！祖宗致治之效，又何患乎不复见于今耶？若夫所谓“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按先儒释《春秋》，有变周之文从周之质之说，又有商变夏、周变商、春秋变周之说。臣以为春秋未尝变周也，特因时救弊耳。又尝闻董仲舒之言曰：“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救其偏者所以补其敝而已矣”。我祖宗之法，譬犹大厦，敝则修之，不可更造。苟不知遵守而轻务改更，臣恐风雨之不芘也。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愿以仲舒补敝之说为献，可乎？若夫所谓推而行之有非其人者，臣按《春秋》书“乃”一字，如“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之类。谷梁释之曰：“乃者，亡乎人之辞也。盖言任用不得其人耳。”又尝闻荀卿之言曰：“有治人，无治法。”夏、商、周之法非不善也，苟得其人，监于成宪，常如傅说之言；遵先王之法，常如孟子之言；率由旧章，常如诗人之言。则夏、商、周虽至今存可也。汉唐之法，亦非不善也。苟得其人，常如曹参之守法，宋璟之守文，魏相李绛之奉行故事，则汉唐虽至今存可也。祖宗之法，非不甚善也。苟得其人，常如司马光之徒持守成之论，则垂之万世，与天地并久可也。陛下既知前日推而行之非其人矣，则今日不可不慎择焉，臣愿以荀卿“有治人”之言为献，可乎？若夫参稽典策之训，则有历朝之国典在焉，祖宗之宝训政要在焉，有司之成法在焉，朝廷之故事

在焉。陛下宜诏执政与百执事之人,参稽而奉行之可也。若夫讲明推行之要,则无若乎揽权。陛下提纲振领,而以万目之繁付之臣下可也。

陛下终策臣曰:“子大夫学古入官,明于治道,蕴蓄以待问久矣,详著于篇,朕将亲览”。此陛下导臣使言,臣不敢不尽言也。臣闻人主开求言之路,必将有听言之实;人臣遇得言之秋,不可无献言之诚。盖求言之路不常开,而得言之秋不易遇。今陛下开求言之路,而臣遇得言之秋;陛下有听言之实,臣其可无献言之诚乎?臣复有一言以为陛下献者,欲陛下正身以为揽权之本也。按《春秋》书正者,杜预谓欲其体元而居正,公羊又有君子大居正之说。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者,董仲舒之论正也;谓人君所行必正道,所发必正言,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者,刘蕡之论正也。臣观自古人君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周文王;不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汉武帝。文王宅心于正道之中,其勤劳则日昃不遑暇食,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万民惟正之供,故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见于《思齐》之诗;在位之臣,皆节俭正直,见于《羔羊》之诗;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其化,又见于《驺虞》之诗。文王能自正其身,而其下化之如此。若夫武帝则不然,其所以自治其身,与其下应之者,皆不正也。帝好谀也,故公孙弘曲学以应之;帝好刑也,故张汤曲法以应之;帝好利也,故孔仅、桑弘羊以剥下益上应之;帝好兵也,故卫青、霍去病以拓土开疆应之;帝好夸大也,故司马相如作封禅书以应之;帝好神仙也,故文成五利之徒以左道应之。武帝不能自正其身,而其下应之如彼。臣愿陛下以文王为法,以武帝为戒。端厥心居,以为化本。非正勿视,非正勿听,非正勿言,非正勿动。其用人也,不必问其才不才,而先察其正不正。果正人也,其进则为治之表。其可以其才不足而不与之进乎?是果不正人也,其进则为乱之机。其可以其才有

余而使之进乎？其听言也，必观其言之是与非，斯可以见其人之邪与正。有逊志之言，必将察之曰："彼何为而投吾之所好哉？是必不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害于我者也！其可以其逊吾志而受之耶？"有逆耳之言，必将察之曰："彼何为而犯吾之所恶哉？是必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益于我者也！其可以其逆吾耳而不受耶？"左右誉言日闻，必察之曰："是必不正人也？是必阿大夫之类也？是必善结吾左右以求誉者也"，退之可矣；左右毁言日闻，必察之曰："是未必非正人也，是必即墨大夫之类也，是必不善结吾左右以致毁者也"，进之可矣。如是则一念虑无非正心，一云为无非正道。左右前后侍御仆从罔非正人，殆见四方万里，风行草偃，莫不一于正矣。臣愿陛下以是为揽权之本，而又任贤以为揽权之助，广览兼听以尽揽权之美。权在陛下之手，则所求无不得，所欲皆如意，虽社稷之大计，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动声色而为之。况区区四者之弊，尚何足以轸渊衷之念哉？臣闻主圣臣直，惟陛下赦其狂愚，不胜幸甚。臣昧死谨对。

评析

绍兴二十七年丁丑科殿试，王十朋以近万言之长篇巨制，反复纵论"揽权"，是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的。

一年多以前（二十五年十二月），巨奸秦桧在先后窃居相位、把持朝政19年之后，重病不治，一命呜呼，结束了令千夫所指、国人唾骂的可耻一生。虽然国贼"身死之日，天下相庆"，正史也有所谓高宗"渐知桧跋扈，惮之不敢发，至是首勒熺（桧子）致仕，欲以次斥逐其党"（《续资治通鉴》130卷。本篇所引史料，除特别标明外均

出此卷。)的记载。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秦桧余党汤思退、万俟卨等人依旧盘踞高位,弄权作威。而那位深感近二十年"君臣相得"的高宗,在朝野主战呼声日高,要求严惩国贼之时,竟先后明诏天下,说什么"讲信修睦,古今之大利,是以断自朕志,决讲和之策。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朕以秦桧辅佐日久,又临奠之日,面谕桧妻,许保全其家,今若遽夺诸孙与婿职名,不惟使朕食言,而于功臣伤恩甚矣。"(《续资治通鉴》131卷)所以,作为素以气节自许,以诸葛亮、颜真卿、范仲淹、韩琦等名臣自比的王十朋来说,要想在金殿对策之时,针对策问"守成宪、尊祖制、革时弊"而非议时局,批评朝政,是需要动一番脑筋,冒极大风险的。

细读全策,我们不难发现,十朋用了几乎一半以上的文字去为"揽权说"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充足的史实根据。作为一个学者型的"考生",他时时、处处不忘申论《春秋》尊王"大义"。这样作,一则符合封建时代皇权至上的最高原则;二则希望高宗重振乾纲,一新朝政;三则更为自己抨击秦桧当权时的腐败黑暗营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最后一点,正是数百年后的我们读此策时颇为赞赏的。

由于十朋为自己建起了堂堂正正的理论之旗,所以他在谈到"革时弊"时,就可以毫无顾忌,放胆直言。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采用"省事"但又非常能说明问题的办法,把十朋对策中的一些话与正史有关记载如实对录,以成比照。

在对策中,十朋谓:"往岁权臣子孙门客,省闱、殿试,类皆窃巍科,而有司以国家名器为媚权臣之具";史载:"绍兴十二年科举(桧)谕考官,以子熺为状元;二十四年科举,又令考官以其孙埙为状元。""去岁(二十四年)省闱,(董)德元为参评官,于誊录处取号,得秦埙卷子,对众曰:'吾曹可以富贵矣!'今房中以得埙之试卷,更自相庆,而德元对众又曰:'此卷子高妙,魁等有余。'"

十朋谓:"自权臣以身障天下言路,而庠序之士,养谀成风,科

举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时务”；史载：“桧擅权以来，屏塞人言，蔽上耳目，凡一时献言者，非颂桧功德，则讦人语言，中伤善类，欲有言者，恐触忌讳，畏言国事”。（《宋史·秦桧传》）

十朋谓：“曩者内外用事之臣，多出乎权门之亲戚、故旧、朋党，文臣或非清流而滥居清要之职，武臣或无军功而滥居将帅之任”；史载：“中外大权，尽归于桧，非桧亲党及昏庸谀佞者，则不得仕宦。……两居相位凡十九年，荐执政必选无名誉柔佞易制者，不使预事，备员书姓名而已；其任将帅，必选驽材”。

十朋谓：“贿赂公行，其门如市，郡县之吏，其浊如泥”；史载：“桧贪墨无厌，监司帅守到阙，例要珍宝，必数万贯乃得差遣。及其赃恶不法，为民所讼，桧复力保之，故赃吏恣横，百姓愈困。腊月生日，州县献香送物为寿，岁数十万”。

十朋谓：“当权门炙手可热之际，缙绅相率为佞之不暇，孰有以忠义训迪之”；史载：“士大夫投书启者，皋、夔、稷、契以为不足比拟，必曰‘元圣’，或曰‘圣相’，至有请加九锡及置益国（桧爵益国公）官属者”。

够了！够了！为了节省文字，我们姑引至此（如果真要作一番细密考证的话，十朋在论“革时弊”的四、五、六、七自然段中，几乎每一句涉及现时的话，都可以从现存史籍中找到佐证）。用不着我们再作分析，相信每一个读了这些材料的人，都会为其丝丝入扣，如合符契而惊叹。十朋似乎不是在写考卷，而是在用自己的心血写信史，在凭自己的浩然正气写声讨国贼、痛斥群奸的檄文！当我们明白了这些，再去读对策结语中的“臣愿陛下以文王为法，以武帝为戒，端厥心居，以化为本，非正勿视，非正勿听，非正勿言，非正勿动，……以是为揽权之本，而又任贤以为揽权之助，广览兼听以尽揽权之美”一段话，应该对十朋甘冒风险，欲一新朝政，重铸正气的赤胆忠心，有更加深刻的感受。

虽然高宗最终以“经学淹通，议论醇正，可作第一人”的御批取十朋为本科龙头，但令人感慨的是，他在事后仅对臣下讲：“昨览进士试卷，其间极有切直者。如论理财则欲省修造，朕虽无崇台榭之事，然喜其言直；至论销金铺翠（十朋在第五自然段论“财用”时提及此事），朕累年禁止，尚未尽革，自此当立法必禁之”。史载秦桧当权时，上言者“恐触忌讳，畏言国事，仅论销金铺翠，乞禁鹿胎冠子，以塞责而已”（《宋史·秦桧传》）。看来，高宗亦从那些小人身上学到了“心法”，故他避十朋有关社稷安危、国家前途之忠言谠论而不顾，仅取其小者，“以塞责而已”，正俗语所谓“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怎能不使后人啼笑皆非，悲愤扼腕呢！

（李维新）

淳熙十一年(1184)甲辰科

状元:卫泾

卫泾,生卒年不详,字清叔,平江昆山(今属江苏)人。取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句意,号后乐居士。淳熙十一年甲辰科状元第一,历官中书舍人,礼部尚书,御史中丞。开禧三年参与谋杀韩侂胄,除端明殿学生、签书枢密院事,后兼参知政事。因与丞相史弥远有隙,罢知潭州。有《后乐集》。

策问

盖闻道者适治之路,传万世而无弊者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纪纲法度,所以维持治具者也。尧、舜之所以帝,禹、汤、文、武之所以王者,盖用此道也。朕膺光尧之命,承祖宗之绪,思所以阐

文谟而扬武烈者，二十有三年矣。志勤道远，治不加进，夙夜祗惧，莫敢遑宁，故博延豪英，访以当世之务。子大夫造延待问，必有蕴而欲陈者。且唐虞之盛，固未易议。至若夏之尚忠，商之尚质，周之尚文，皆绵世历年，不能无弊。岂道有升降，政有损益而然欤？抑为治之具有未至欤？今朕正心诚意，体道之用，将以格物，而士风犹未一也。敦本抑末，崇尚礼教，将以范民，而俗化犹未醇也。义不胜利，何以厚民之生？刑不胜奸，何以防民之伪？意者仁义礼乐之用，与夫纪纲法度所以维持治具者非耶？何视古之有愧也？伊欲道与世兴，风移俗易。士相与谈仁义蹈名节，而不矜靡曼之虚文。民相与兴礼逊趋本业，而不溺奢侈之末习。八政修而食货足，七教明而狱讼息。措国如唐虞，巍乎跨三代之隆，而无忠、质、文偏胜之弊，其策安在？熟之复之，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对策

臣对 臣恭惟陛下聪明天纵，并隆五三，不自神圣，谦冲退托，亲屈帝尊，廷策多士，访以古今之治道，当世之急务。陛下岂以草茅之言为可用欤？然自陛下即位以来，六策多士，所以与之讲论治道，亦不一矣。亦尝采其所言，见之施行而有补于治者乎？抑草茅之士，华文少实，不当于理，而不足以措之事业乎？抑亦临轩赐问，姑循祖宗之故实，而不要之于用也？夫科目之兴，始自西汉，而贤良之策，亦有时而措之用者，载诸史册，烂然可观。况陛下舍己从人，如大舜不矜不伐，如大禹广览兼听。以极群下之幽隐，开心见诚；以来天下之谠言，将与海内共臻至治。夫岂崇尚虚文，不究实用，徒应故事而已哉？虽然，君听存乎广大，臣言贵于切近。

以陛下好问之勤，愿治之切，而徒泛为之辞，以娱观听，非士之所学也。臣闻成天下之治者，固惮于改作；革极弊之政者，尤患于因循。改作之患至于扰扰多事，而因循之弊将有委靡不振之忧，二者皆非所以为治。而因时制宜，则治道之所不废也。昔汉武帝以雄材大略之资，即位之初，侈然不满汉家之意，嘉唐虞、乐商周之言，屡形诏策。董仲舒待问广延，乃劝帝以更化善治。卒之武帝纷更制度，日不暇给，而一时之治，骎骎愈不如古。岂仲舒之言有以误之耶？终日变易法令，而不出于簿书期会之间，正非仲舒所以拳拳于帝之意也。知仲舒之更化，不在簿书期会之末，则知仲舒有救弊之名，无变道之实，诚古今不易之常理。从是而加之意焉，则以之振起治功，扫除积弊，跻一世于唐虞三代之隆，如圣策之所问，诚无难者，又岂在于变法易令而以多事自累哉！《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陛下亦悟于斯而已矣，谨昧死上对。

臣伏读圣策曰："盖闻道者适治之路，传万世而无弊者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纪纲法度所以维持治具者也。尧舜之所以帝，禹汤文武之所以王者，用此道也。"臣有以见陛下探治道之本源，而知帝王之为同条共贯也。臣闻道无精粗，治有详略，本末不可以偏废，而阖辟变化之用，则固有所主宰也。是故大原之所自，则不外于一心之微；而治具之在天下，亦不可一日废。此尧舜之所以帝，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固不外乎此道。然精一执中之妙，密相授受于心传之际，而皇极之编，九畴之旨，君臣上下所以孜孜讲切者，岂惟繁文末节是务？而庶绩之熙，九功之序，水土之平，礼乐庶事之备，固其形见之末效；而斯道之本原，固当求之于精微之运。诚不外乎"中"之一辞而已。不然，尧、舜、禹、汤、文、武之君，不能舍仁义礼乐纪纲法度以治天下。而繁文末节，后世因欲持此以治天下，不可胜穷之变，则亦无具甚矣。然则帝王之治固不难致，亦惟探其本而不废其末，举其全而不溺于偏，求其所以致治之实用，而不惟繁文

末节之是徇，则古今一天下也，而岂有异道哉！

臣伏读圣策曰："朕膺光尧之命，承祖宗之绪，思所以阐文谟而扬武烈者，二十有三年矣。志勤道远，治不加进，夙夜祗惧，莫敢遑宁，故博延豪英，访以当世之务。子大夫造延待问，必有蕴而欲陈者。"臣有以见陛下念付托之至重，思宵旰之愈勤，疑治道之愈邈，虚己以问承学之臣，将以讲明济时之术也。顾臣微陋，何以塞明诏？臣闻天下非治效不进之可忧，而人情安于苟且因循之可畏。以陛下勤政愿治之诚，迈越前古，唐虞三代之治疑若引手可致；而二十三年于兹，计算见效曾未之闻者，是安可不求其故耶？毋亦愿治之心虽切，济时之术实疏，士大夫安于苟且以为成习，而天下万事有不得其序耶？臣窃观陛下即位之始，锐于为治，念版图之未复，愤仇雠之未殄，慨然奋发，将一扫而清之。一旦起故老于废弃之中，擢将相于俦常之列，畀之大任，责以成功，而徒肆大言，习为诞谩，玩岁愒日，无补事功，比比负责而去，而陛下大有为之志亦自是少弛矣。故夫前日之治伤于太急，而今日之治又失之太缓。惟其责效之速，故诞谩之徒得以肆其欺罔，窃取陛下爵禄而去；惟其习于纵缓，故庸常琐琐之流得以偷安固位，自为保持之计。上下苟且，莫肯任责，而治效之不进。风俗日以坏，士气日以弱，民生日以困，刑罚日以峻，徒为九重之隐忧，而不思所以救弊之术者，循是而不之反，则天下之患殆将有出于意虑之外，而何治功之成！臣愿陛下思所以济治之术，革人情于极弊之余，正纪纲，明赏罚，毋徒徇于虚名，而必责之实用，则今日苟且之俗，将易而为趋事赴功之臣，则天下之治，有所不为，为无不成，惟陛下所志耳。

臣伏读圣策曰："唐虞之盛，固未易议。至若夏之尚忠，商之尚质，周之尚文，皆绵世历年，不能无弊。岂道有升降，政有损益而然欤？抑为治之具有未至欤？"臣有以见陛下想唐虞至治之极，考三代治尚之偏，图惟厥中，以为救弊之术也。臣闻三代之治，本于一

道。道之所在，初无毫厘之差，而救偏补弊，特其济治之术，由于时变之推移，而生于人情不可已者也。唐虞之盛，忠、质、文之名未立也，而忠、质、文未始不为用。忠之变而入于质，质之变而入于文，此其世变之使然，有不容御。则周人之处此，若其极弊不可为之世矣。自常情观之，必将厌委曲而务阔疏，弃文采而尚朴素，以求还上古之无事也。然周之君方且务为繁缛之典，凡可以管摄人心堤防风俗者，纤悉备具，是岂好为多事而繁文末节如后世之纷纷也哉？彼其损益之相因，无非因人情之所系，而扶持设施之术，固有出于法度纪纲之外，此太和之效所以并称于唐虞，而弥文缛典皆足以起当世之治。使周之子孙世守而勿变，则千万世而长在可也，而何弊之可言！陛下盖亦即其所以救弊之术，原其所以为人情之虑者，略其异而反其同，则唐虞三代之治，亦在陛下运用而已矣，奚必拘于形迹之末哉！

臣伏读圣策曰："今朕正心诚意，体道之用，将以格物，而士风犹未一也。敦本抑末，崇尚礼教，将以范民，而俗化犹未醇也。"夫士风之不美，以其无所范也。今陛下以正心诚意之学，将以致格物平天下之效，而士风之未一，得毋以承末流之弊而源或未之正乎？夫俗化之不善，以其不知也。今陛下敦本业而抑末作，崇礼教而设防范，而俗化之未醇，得毋以流俗之渐渍者深而制度之不严乎？臣闻古之仕也，上下相待以成其美；后之仕也，上下相胜以败其事。夫仁义道德之本，孝弟忠信之实，古人之所以修于乡党，处于庠序，以为吾之所当为，初无所觊于上。而官爵禄位之设，车马衣服之奉，古人所以用于朝廷之上者，亦以为待天下士，而非有德于下。故士知修于家以待上之求，上取夫士以为天下之用，上之所以待其士者愈厚，故士之所以自待者愈不敢轻，上下交相待而人才日以盛，固其宜也。后世则不然，上设其爵禄以待士之求，而士亦苟且修饰以有所要于上。士惧其无以自达，则巧取幸进，不顾礼义，而

上亦惧其进之滥，则多为之防，以绳其来，此后世之通患，而按之今日则尤甚矣。冒进之习滋，廉耻之道丧，苟侥幸于一得，则抵法禁而不知畏。天下固未始无卓然特立之士也，而以一眚之过而绝其终身之善，以一人之失而疑及天下之士，则亦自流于薄恶而已矣，而何怪于士风之不美欤！臣故曰承末流之弊而源未之正也。臣闻古之治天下者，将以定民志；后之治天下者，将以便民情。古者上自天子而达之于民，尊卑贵贱之不相侔，则服食器用之间，截然等级之有辨。古人非故为是无益之文也，防闲之不至，则情伪之相滋，乐好之不厌，而弊将有不可胜言。深为之节，严为之限，故民志一定而分守自明，彼其趋向之一而风俗之厚，亦其理也。后世则不然，举圣人所以检押人心者，一切惟人情之便。而偷风薄俗，亦复荡然于法制之外。富商大贾得以交通王侯，而乡曲豪右无别于贵近，自后世有所由来，而较之今日则殆将不止于是者。车服上僭宫闱，家室略拟都邑，辇毂之下，四方之所观瞻，而此风益炽，上下恬然相视不以为怪，则亦日流于无节文已矣，而何怪于俗化之未醇欤？臣故曰："俗之渐渍者深而制度之不严也。"

臣伏读圣策曰："义不胜利，何以厚民之生；刑不胜奸，何以防民之伪。"夫率民以义，则义之所在，而利固存于其中，则民心之礼义，若可以厚其生也。而义或不胜其利，得毋以义利之不能两立，而趋于利则或违其义乎？夫防民以刑，则刑章之立，可以不试而民畏也。而刑或不胜乎奸，得毋以刑所以防民而求以胜民，则奸宄益不胜其多乎？臣闻古者先养民，又教民，然后治民。后世不知养民，不知教民，一于治之而已耳。夫日用饮食之须，冠婚丧祭之具，圣人初非举手以予民也。为之立其官师，制其田里，义教之以君臣上下之大分。民既知教，而民生益厚，故民乐出其力以供上之用，亦不以为劳我而且厉我也。后世教养斯民之事曾弗之讲，民生之用皆民之所自为，而上之人又从而征敛困苦之。今日之民，其无聊

赖甚矣，而何义之能知？山泽之饶，舟车之美，香盐茶酒之榷，凡桑弘羊辈所以笼天下之利者，无不悉为常赋。常赋有限，复令先期，常数既殚，复令别配，凡陆贽所以进疏于唐德宗者，无不尽用。陛下加惠元元，勤恤民隐，形于诏旨，无非以宽民力厚民生为言，而守令之不奉行，徒亦文具而已。水旱有减放之令，而督促如初；岁久有蠲除之科，而追催犹故。所谓禾稼如云，问之父老，皆有忧色曰："丰年不如凶年，而况水旱相仍，曾无虚岁。"上下迫蹙如此，欲民生之厚，其可得耶！臣闻古之制刑也，所以厚民俗；后之制刑者，所以罔民利而已矣。夫古之圣人不得已而制刑，盖为夫不孝不友不姻不睦者是禁。而山泽之利无不弛以予民，而或为之限节。盖亦禁其末作之为害，而非夺民利以自殖也。后世不明圣人制刑之意，而禁网之密，条章之具，无非与民争利。而茶盐之商贩，酒榷之私酤，毫发之不贷，纤悉之必计。刑禁之既加，而科罚又从而重困之。今日之刑，其冤滥亦甚矣，而奚伪之能防！故刑不足以胜奸，则奸宄之习滋炽。聚于山泽者为盗贼之区，而刑余之众不得与齐民齿者，亦将流而为盗。陛下广覆宇内，远近如一，通商贩之禁，宽酒榷之征，虽见于比年之诏，而有司诿曰："国用之所须，无得以辞其责。"故上有仁心而下不被其泽，有宽恤之美名而无宽恤之实惠。所谓罔民以为利，诱民以为奸，不反其本而徒治其末，欲奸宄之消，其可得耶？

臣伏读圣策曰："意者仁义礼乐之用，与夫纪纲法度所以维持治具者非耶？何视古之有愧也。"诚如陛下所言，则信知后世之治所以不如古矣。陛下以古问臣，臣不敢徒以古对。陛下果有意于古也，盖亦稽唐虞致治之原，参三代救弊之政。一政令之未纯乎古，一设施之不合乎古者，振起而更张之，以作天下苟且因循之习，以起天下趋事赴功之心。则以之美士风，善俗化，厚民生，去民伪，亦惟磨以岁月，无不可矣。不然，陛下徒有慕古之名，而无师古之

实。则今日之策臣者，徒为故事；而臣之所以告陛下者，亦虚文而已。是将奚益！

臣伏读圣策曰："伊欲道与世兴，风移俗易。士相与谈仁义蹈名节，而不矜靡曼之虚文。民相与兴礼逊趋本业，而不溺奢侈之末习。八政修而食货足，五教明而狱讼息。"臣愚以为世有先后，道无异同。由大原之所自出而观之，越千载犹一日。唐虞三代即斯道以为治，既有以措天下于无为之盛，况陛下心传之妙，得于授受之懿则，施之事业，移风易俗，诚无难者。若夫人士相与谈仁义蹈名节，而不矜靡曼之虚文，臣以为莫若有以正人心。民相与趋本业兴礼逊，而不溺奢侈之末习，臣以为莫若有以定经制。夫礼义者，人心之所同，惟其利害得失之心日胜，是以忠纯笃实之意日亡，是固科举之法有以坏天下之心术也。今陛下徒曰："严法禁，谨堤防，足以革士风之弊。"臣以为无以善人之心，则未见徒法之可以自行也。夫科举之法，后世即以之取天下之人材；而天下之人材，亦辐辏于科举之内。既取之于未用之初，，盖亦择之于既用之后；广之以教化之本原，而恃之以趋向之所在。贪浊者黜之，廉介者用之；奔兢者抑之，靖退者进之；旌直言以来谏诤，伸士气以通下情。若是而曰士风之不美，臣未之信也。夫礼制固有一定之经，惟防范之既亏，故至荡然而莫知限节。是固民心之无常，亦上之人无以撙节之过也。今陛下徒曰："躬节俭，务朴素，足以先天下之俗"。臣以为躬行之至虽为正风俗之本，而礼制之未明，经制之不立，则人心之无厌者方且苟于目前之便，未见徒善之足以有为也。今为之明其礼，定其经，上而乘舆之服御固有其度，降而公卿，又降而士庶人，冠婚丧祭之节，宫室器用之制，严为限量，设有科条，逾者有禁断于必行。贪溺者无所歆艳，而豪右兼并，粟腐贯朽，无所用之，则民志定而争端息，无甚富之民则亦无甚贫之民，无甚侈之家则亦无甚弊之家。人心有常，风俗归厚，若是而曰俗之未醇，臣未之信也！厚

民之生，则莫若讲节用之策；省民之刑，则莫若谨按察之使。今日之利原竭矣，不可复兴矣。无已，则有节用之说乎？节用固多术也。曩者固尝限宫观之员，而宫观之除，滥予犹故也；固尝省添差之数，而添差之恩，妄授犹昔也。倖幸之赐，得毋有过度者乎？虚籍老弱之兵，得毋有坐縻廪食者乎？节之于彼，而又节之于此，则民生之厚，庶乎其有自矣。今日之刑滥矣，不可以复峻矣。盍亦谨按察之官而使之加意乎？命官非不谨也，州县之间责成案于胥吏，而长吏不以为意；付棰楚于狱卒，而狱官慢不知情。郡刺史足迹，尝一至于圜土之门乎？监司之按行，又能尽得于一见之顷乎？谨之于彼，而复谨之于此，则好生之德，庶乎其洽民矣。舍是而曰八政修而食货自足，五教明而狱讼自息，臣恐未免于揖逊救焚之举也。

臣不佞，陛下召至阙廷，赐之清问。臣首以更化为陛下献，次愿陛下正人心以美士风，定经制以善民俗。次愿陛下节用以厚民生，谨按察以省刑罚。以为更化之说，请复为陛下终始言之。臣观艺祖皇帝，为天下除大残，致民更生，兵不血刃而天下归戴。征伐既下诸国，必先已逋敛蠲繁苛，一以仁厚为本。大抵兵以不杀为武，刑以不用为威，财以不费为饶，人以不作聪明为贤。此其立国之本意，而列圣守之以为家法者也。仁宗庆历间，承平既久，一时事类少弛，仁宗一旦振起之，不过于增谏员、减任子、展磨勘。虽一二节目之或殊，而大体卒不改易。故嘉祐之治，振古无及。社稷长远，终必赖之由此道也。臣以更化为献，亦岂劝陛下以变更祖宗之法度哉！士大夫之偷惰者，从而振作；王业之偏安者，思有以规恢而广大之；万事之积废者，思有以作新而奋励之。而不失祖宗立国之本意，则士风之日美，民俗之日醇，民生之厚而刑罚之清，固有不期而致。则圣策所谓“措国如唐虞，巍乎跨三五之隆，而无忠、质、文偏胜之弊”，其策舍此将安在耶？

陛下复策之于终曰："熟之复之，详著于篇，朕将亲览。"臣有以见陛下咨访之意益勤，而使臣等得以竭其愚衷也。臣不度愚贱，窃有拳拳忧国爱君之忠。一旦得奉清光，条当世之事，陛下所以问臣等，固已略陈于前。若天下大体之所系，而国家安危理乱之所从出者，虽圣策之所不及，臣安敢有怀不吐，上负陛下详延之意！敢为陛下毕言之。臣闻宰相者，朝廷之股肱也；台谏者，朝廷之耳目也。非有知人之明，不足以进贤退不肖；非有硕德重望，不足以镇抚中外；非有不穷之才，不足以赞万机之务。择相而任之者，不可以不谨也。非有公忠之操，不足以排击奸回；非有刚强之守，不足以肃清班列；非有高明之见，不足以裨益冕旒。擢台谏而付之者，不可以不审也。苟曰"以其久位而姑以迁之，幸其无过而因以任之"，则何以称具瞻之望，起非常之功？专求州县之下吏，搜索钱谷之细务，姑以应故事，而朝廷之阙失，国家之大议，有不敢言，则何以通幽隐之情，辅圣明之德？臣愿陛下委任擢用之际，详择而审处之。疑之当勿复用，用之当勿复疑，必期有以尽其才然后可也。陛下爱惜名器，必无滥予之爵。然技术艺能之贱，或充斥于朝路；而宫掖非泛之恩，或不厌于公言。可不有以节之乎？陛下亲近儒臣，必无偏信之失。然是非毁誉之说，或出于细微；而士大夫结托之私，或竞趋于权要。可不有以抑之乎？陛下诚于是而留听焉，任宰相而重其股肱之寄，用台谏以谨其耳目之司，惜名器以励天下，戒偏信以示至公，则兹所以策臣四者之弊，特不过于事为之末，非圣明之可虑也。臣是以终篇之末论次其大者，以为陛下献。若乃襞绩故实以为有学，雕绘言语以为新奇，臣不惟不敢，亦不暇，惟陛下赦其狂僭而录其区区。臣无任昧死谨对。

评析

朱熹谓："绍兴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时士人所做文字极粗，更无委曲柔弱之态，所以亦养得气宇。只看如今，称斤注两，作两句破头，是多少衰气。"(《语类》109卷)朱夫子的话自然不是专对策论而发，不过，把卫泾的这篇对策与前之张九成的对策相较，倒的确给人以如此印象。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卫泾的对策写得就差。试想，十年寒窗，屡战文场，最终突围而出，魁天下士，哪一个状元的文章得之容易，哪一篇苦心经营之作我们能小视呢？卫泾的对策，读后给人以不温不火，四平八稳，无不过亦无不及的感觉，用他自己的话来评价，即"诚不外'中'之辞而已。"总觉得缺少了张策贯串始终的那种气势和直达人心的情韵。

针对圣问，卫泾"首以更化为陛下献，次愿陛下正人心以美士风，定经制以善民俗，次愿陛下节用以厚民生，谨按察以省刑罚。"我们可以据此把全策分为三个部分。

从开头至"奚必拘于形迹之末哉"为第一部分，阐述卫泾的"更化"说。卫泾认为，改作的缺点在于多事，因循的弊端在于委靡不振，因此，他提出了"因时制宜"，但又不能"变法易令而以多事自沮"的主张。他的这一主张自然是源于先王之治，所谓"道无精粗，治有详略，本来不可以偏废，而阖辟变化之用"，"则不外于一心之微"，"不外乎'中'之一辞而已。"指出达到帝王之治的关键"操其本而不废其末，举其全而不溺于偏，求其所以致治之实用，而不惟繁文末节是徇。"基于此，他批评孝宗临朝二十三年以来，"前日之治伤于太急，而今日之治又失之太缓。"并对圣问三代"不能无弊"之

说予以纠正，认为三代之治并无偏颇，其“损益之相因，无非因人情之所系”，希望孝宗能够“即其所以救弊之术，原其所以为人情之虑者，略其异而反其同”，不必拘于形迹之末。这些议论处处不离儒教大义，中规中矩，温和稳妥，实际上也就规定了全策“中庸”的基调。

在第二部分（至“臣恐未免于揖逊救焚之举也”），卫泾针对士风未一，俗化不善，民生凋弊，刑罚冤滥等四弊倒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特别是论及民生凋弊时的一段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陛下加惠元元，勤恤民隐，形于诏旨，无非以宽民力厚民生为言，而守令之不奉行，徒亦文具而已。水旱有减放之令，而督促如初，岁久有蠲除之科，而追催犹故。”这自然会使我们想起同期爱国诗人范石湖（成大）那首著名的《后催租行》：“老父田荒秋雨里，旧时高岸今江水。佣耕犹自抱长饥，的知无力输租米。自从乡官新上来，黄纸放尽白纸催（皇帝的文告用黄纸，地方官文告用白纸）。卖衣得钱都纳却，病骨虽寒聊免缚。去年衣尽到家口，大女临岐两分首；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复驱将换升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诗文相证，可知卫泾决不是在危言耸听，哗众取宠。然而可惜的是，他为孝宗开出的根治四弊的药方，即“正人心”、“定经制”、“节用”、“谨按察”，却大都如老生常谈，隔靴搔痒。如此而欲使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国强民富，岂可得耶？

从“臣不佞”至结束是全策的结语，可划为第三部分。卫泾在这里再一次强调“更化”应以“仁”为根本，郑重申明“臣以更化为献，亦岂劝陛下以变更祖宗之法度哉！”可能是连他自己也觉得所献方略有些苍白无力，所以又于“圣策所不及”作一补充，力劝孝宗“任宰相而重其股肱之寄，用台谏以谨其耳目之司，惜名器以励天下，戒偏信以示至公。”并以此结束全策。

也许是我们的评析有失公允，卫泾的对策，从总体看来虽论证

严密，条理清晰，但其指导思想的因循保守却是显而易见的。联系到日后他反对韩侂胄北伐，并积极参与宫廷政变，以侂胄之头换取与金人的第三次和议，其政治主张与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与对策一脉相承，故亦不能不使后人予以非议。

（李维新）

绍熙四年(1193)癸丑科

状元:陈亮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学者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为人才气超迈,议论风生,喜谈兵。不屑如常儒研穷义理,原心较礼。自谓于"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差有一日之长。所交皆天下豪杰名士。淳熙五年三上孝宗书,反对和议,力主抗金,孝宗阅后赫然振动,将擢用之。大臣恶其直言无忌,交相沮毁,陈亮谓:"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博一官乎?"渡江而归。一生三遭大狱,几至丧命,精泽内耗,形体外离。绍熙四年状元第一,授签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时亮已51岁,《谢恩诗》有"复雠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之句,惜未至官而一夕病卒。陈亮文、词均气势纵横,豪放激越,当时即广为人传颂。有《龙川文集》、《龙川词》传世。

策问

朕以凉菲，承寿皇付托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遵慈谟蹈明宪者，甚切至也。临政五年于兹，而治不加进，泽不加广。岂教化之实未著，而号令之意未孚耶？士大夫风俗之倡也，朕所以劝励其志者不为不勤，而偷惰之习犹未尽革。狱，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选任其官者不为不谨，而冤滥之弊或未尽除。意者狃于常情则难变，玩于虚文则弗畏乎？且帝者之世，贤和于朝，物和于野，俗固美矣，然谗说殄行乃以为虑。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终贼刑必使加审。何也？得非薰陶训厉自有旨欤？今欲为士者精白承德而趋向一于正，为民者迁善远罪而讼诉归于平，名宾于实而是非不能文其伪？私灭于公而爱恶莫可容其情，节俭正直之谊兴行于庶位，哀矜审克之惠周浃于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子大夫待问久矣，咸造在庭，其为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风俗、清刑罚、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条陈之，朕将亲览。

对策

臣对 臣闻人主以厚处其身，而未尝以薄待天下之人，故人皆可以为尧舜。而昔人谓其以己而观之者，天地之性本同也。夫天佑下民而作之君、作之师。礼乐刑政所以董正天下而君之也，仁义孝悌所以率先天下而为之师也。二者交修而并用，则人心有

正而无邪，民命有直而无枉，治乱安危之所由以分也。尧舜三代之治，所以独出于前古者，君道师道无一之或阙也。后世之所谓明君贤主，于君道容有未尽，而师道则遂废矣。夫天下之事，孰有大于人心之与民命者乎？而其要则在夫一人之心也。人心无所一，民命无所措，而欲论古今治革之宜，究兵财出入之数，以求尽治乱安危之变，是无其地而求种艺之必生也。天下安有是理哉？

臣恭惟皇帝陛下谦恭求治，常若不及，深念夫人心之不易正，而民命之未易生全也。进臣等布衣于廷，而赐以圣问。曰："朕以凉菲，承寿皇付托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遵慈谟蹈明宪者，甚切至也。"臣窃叹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余，所以察词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众。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而圣问又曰："临政五年于兹，而政不加进，泽不加广。岂教化之实未著，而号令之意未孚耶？"臣于是知陛下求治若不及之心，如天之运而不已也。臣闻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推其本原，则曰"克俭克勤，不自满假而已"。今时和岁丰，边鄙不耸，亦几古之所谓小康者。陛下犹察其治之不加进，泽之不加广。而欲求其所谓教化之实，号令之意者，盖深知人心之未易正，民命之未易生全也。臣请为陛下诵君道、师道，以副陛下求治不已之心焉。夫所谓教化之实，则不可以颊舌而动之矣，仁、义、孝、悌以尽人君之所谓师道可也。所谓号令之意，则不可以权力而驱之矣，礼、乐、刑、政以尽人君之所谓君道可也。夫天下之学，不能以相一。而一道德以同风俗者，乃五皇极之事也。极曰皇，而皇居五者，非九五之位则不能以建极也。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察天下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者，悉此而同之，此岂一人之私意小智乎？无偏无党，无反无侧，以会天下于有极而已。吾夫子列四科，而厕德行于言语、政事、文学者，天下之长俱得而自进于极也。然而德行先

之者，天下之学固由是以出也。周官之儒以道得民，师以贤得民，亦以当得民之二条耳。而二十年来，道德性命之学一兴，而文章政事几于尽废。其说既偏，而有志之士盖尝患苦之矣。十年之间，群起而沮抑未能止其偏、去其伪，而天下之贤者先废而不用，旁观者亦为之发愤以昌言，则人心何由而正乎？臣愿陛下明师道以临天下，仁、义、孝、悌交发而示之，尽收天下之人材。长短小大，各见诸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无一之或废。而德行常居其先，荡荡乎于天下共由于斯道，则圣问所谓"士大夫风俗之倡也，朕所以劝励其志者不为不勤，而偷惰犹未尽革"，殆将不足忧矣。若使以皇极为名，而取其偷惰者而用之，以阴消天下之贤者，则风俗日以偷，而天下之事去矣。

夫天下之情，不能以自尽，而执八柄以驭臣民者，乃六三德之事也。强弱异势而随时弛张者，人主所以独运陶钧，而退藏于密者也。用玉食不可同之势，而察威福之有害于家凶于国者，悉取而执之，此岂臣下之所得而亵用乎？沈潜刚克，高明柔克，以明刑法之适平而已。吾夫子为鲁司寇，民有犯孝道者，不忍置诸刑。其说以为教之不至，则未庸以杀。而少正卯则七日而诛之，盖动摇吾民，不可一朝居也。周官之刑，平国用中典，盖不欲自为轻重耳。而二三十年来，罪至死者不问其情，而皆附法以谳，往往多至于幸生。其事既偏，而平心之人皆不以为然矣。数年以来，典刑之官遂以杀为能，虽可生者亦付以死，而庙堂或以为公而尽从之，使奏谳之典反以济一时之私意，而民命何从而全乎？臣愿陛下尽君道以宰天下，礼乐刑政并出而用之。凡天下奏谳之事，长案碎款，尽使上诸刑寺。其情之疑轻者，驳就宽典。至其无可出而后就极刑，皆据案以折之，不得自为轻重。则圣问所谓"狱，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选任其官者不为不谨，而冤滥之弊或未尽除"，殆将不足忧矣。若使以福威在己，而欲一日尽去其冤滥，人之私意固不可信，而吾能自保

其无私乎？不如付之有司之犹有准绳也。圣问又曰："意者狃于常情则难变，玩于虚文则弗畏乎？"臣以为人主以厚处其身，而未尝以薄待天下之人。安有吾身之既至，而天下之终不可化者乎？臣愿陛下明师道、君道以先之而已，此所谓教化之实，号令之意者也。

臣伏读圣策曰："且帝者之世贤和于朝，物和于野，俗固美矣，然谗说殄行乃以为虑。"臣有以见陛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也。昔者尧舜以师道临天下，苟可以救之者，无所不用其至矣。而说之横入于人心者，谓之谗说；行之高出于人心者，谓之殄行。人心之危，说有以横入之则受矣，行有以高出之则伏矣。此所谓震惊，而尧舜之所忧也。故必有纳言之官，使王命民言交出迭入，而得以同归于道，而天下之学一矣。及周之衰，天下之学争起，肆出不能相下，而向之所谓谗说殄行者，一变而为乡原。务以浸润于人心，自纳于流俗。天下之学既不能以相一，而其势不屈而自归，孔孟盖深畏之，以其非复尧舜之时所尝有也。愿陛下畏乡原甚于尧舜之畏谗说殄行，则人心之正有日矣。

臣伏读圣策曰："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终贼刑必使加审。何也？"臣有以见陛下深知民命之未易生全也。方尧舜以君道宰天下，禹平水土，稷降播种，民固已乐其有生矣。而皋陶明刑以示之，塞其不可由之涂，使得优游于契之教、伯夷之礼。天下之人皆知禹、夷、稷、契之功，而皋陶之所以入于人心者，隐然而不可诬也。后世之为天下者，刑一事而已矣。宽简之胜于徽密也，温厚之胜于严厉也，其功皆可言，而皋陶不言之功则既废矣。夫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官刑既如彼，教刑又如此，情之轻者释以财，情之误者释以令，凡可出者悉皆出之矣。其所谓怙终贼刑者盖其不可出者也，天下之当刑者能几人。后世之轻刑未有如尧舜之世者也，愿陛下考尧舜之所以轻刑之由，则民命之全可必矣。而圣策又曰："得非薰陶训厉自有旨

欤?”臣之所以反覆为陛下言之者,苟尽师道则薰陶在其中,苟尽君道则训厉不足言矣。尧舜之所以治天下者,岂能出吾道之外哉!仁义孝悌礼乐刑政,皆其物也。

臣伏读圣策曰:“今欲为士者精白承德而趋向一于正,为民者迁善远罪而讼诉归于平。”臣有以见陛下之未尝以薄待天下之人也。彼亦何忍以异类自为哉?而圣策又曰:“名宾于实而是非不能文其伪,私灭于公而爱恶莫可容其情。”则圣意不免于小疑矣。然而天下之学贵乎正,天下之情贵乎平,其终固未尝不归于厚也。夫今日之患,正在夫名实是非之未辩,公私爱恶之未明,其极至于君子小人之分犹未定也。伊尹论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其说近矣。而汉之谷永,其言未尝不逆;唐之李泌,其言未尝不顺。则人心庸有定乎?孟子论国人皆曰贤,必察见其贤而后用之;国人皆曰可杀,必察见其可杀而后杀之。其说密于伊尹矣。然为人上者,何从而得国人之论也。凡今之进言于陛下之前者,孰不自以为是,而自以为公哉?陛下亦尝察舆论之曰贤者而用之矣,然而人之分量有限,其心未能尽平也,未能举无私也。小人乘间而肆言以为公,力抵以为直,陛下亦不能不惑之矣。遂欲两存之以为平,薰莸决无同器之理也。名实是非当日以淆,而公私爱恶未知所定,何望夫风俗之正,而刑罚之清哉?陛下见其贤而用之,举动之小偏,则勿行而已耳。君臣固当相与如一体也。何至有肆谗之人,以恐惧其心志,而徊徨其进退哉?陛下苟能明辩名实是非之所在,公私爱恶之所归,则治乱安危于是乎分,而天下之大计略定矣。风俗固不期而正,刑罚固不期而清也。清白承德,迁善远罪,直其细耳。而圣策又曰:“节俭正直之谊兴行于庶位,哀矜审克之惠周浃于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其要在于辩名实是非之所在,公私爱恶之所归;其道则以厚处其身,而未尝以薄待天下之人而已。

陛下三载一策多士,宜若以踵故事也,宜若以为文具也。草茅

亦以故事视之，以文具应之。过此一节则异时，高爵重禄陛下不得而靳之矣。陛下图其名，而草茅取其实，此岂国家之所便哉？正人心以立国本，活民命以寿国脉，二帝三王之所急先务也。陛下用以策士，则既不鄙夷之矣。于其末又复策臣等曰："子大夫待问久矣，咸造在廷，其为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风俗、清刑罚、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条陈之，朕将亲览。"臣有以见陛下必欲正人心、全民命、以尽君师之道，而自达于二帝三王之治而后已。顾臣何人，岂足以奉大对，臣窃观陛下以厚处其身，而未尝薄待天下之人。既得正人心、全民命之本矣，而犹欲臣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夫以厚处身之道，岂有穷哉？使天下无一人之有疑焉可也。陛下之圣孝，虽曾闵不过，而定省之小夺于事，则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即日如故，而疑者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处为无已也。陛下之英断自天，不借左右以辞色，而废置予夺之不当，则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终无所假，而疑者亦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处为无已也。"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而九五之需于饮食者，待时以有为，当于此乎需也。岂以陛下之圣明而有乐于此哉？然而人心不能无疑也。"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四方。"而六五之出涕沱若，戚嗟若。两明相照，抚心自失，而不敢以敌体也。岂以陛下之英武而肯郁郁于此哉？然而人心不能无疑也，臣愿圣孝日加于一日，英断事逾于一事，奋精明于宴安之间，起心志于谦抑之际，使天下无一人之有疑。而陛下终为寿皇继志而述事。则古今之宜莫便于此，治化之本莫越于此。同风俗以正人心，清刑罚以全民命，而明效大验，可以为万世无穷之法，其本则止于厚处其身而已。《诗》不云乎："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而子思亦曰："纯亦不已。"夫以厚处其身，岂有穷哉，臣昧死谨上愚对。

评析

初读陈亮51岁中状元时的这篇金殿对策，很觉得有些兴味索然。这位自许"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豪杰之士，一入科场，好像猛虎入了槛笼，让无形的绳索缚住了手脚，再也没有当年写《上孝宗皇帝第一书》时的勃勃英气，再也没有以壮词与辛稼轩唱和时的旷世豪情。不过，如果我们稽考史实，细细品味，就会发现我们的初感还是有些问题。陈亮在高中后曾对朋友解释说："批逆龙鳞，期于合理，庶几一割之有用，安能百炼而愈刚？……白首騣騣，丹心隐隐，言在此而意在彼，问之显而答之微。"(《陈亮集》卷十八《谢张侍御启》)看来，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陈亮在对策时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他之所以要采取声东击西、以柔克刚的手法，的的确确有着他不得不如此的苦衷。

为了更好地使读者明白这一点，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当时的政局，介绍一下金殿主试的皇帝——光宗。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内禅，移居重华宫。第三子赵惇即位，是为光宗。元妃李氏也升格为皇后。史载这位李氏天性妒悍，曾屡遭孝宗训敕，甚至有李氏如不改弦更辙，"行当废汝"这样绝情的话。后来李氏又请立自己的儿子嘉王为太子，孝宗不许，因此李氏对孝宗大为不满，经常与一些宦官在光宗面前挑拨父子二人关系。到了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光宗不朝重华宫，这件事在朝野引起了巨大震动。虽然在大臣们的一再劝谏、调解之下，光宗也曾偶尔到重华宫作作样子，但父子之间终究是难以嫌隙全无，和好如初。为了两宫失和之事，上至"宰辅百官，下至韦布之士，以过宫为请者甚众，至有叩头引裾

号泣者。”另外，光宗在生活上亦不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他“宴游无度，声乐无绝，昼日不足，继之以夜。宫女进献不时，伶人出入无节，宦官侵夺政权，随加宠赐。”至于那位李皇后，更是骄恣横行，甚至在光宗因病不视朝政时，定夺大事，滥封李氏亲旧。仅一次归谒家庙就“推恩亲属26人，使臣172人。下至李氏门客，亦奏补官。”（以上史料均见《续资治通鉴》152卷）

我们知道，陈亮并不是一个奢谈心性伦理的规规小儒，深谙帝王“王霸”之学的他自然明白，在“批逆龙鳞”之时，首要的问题应是如何避实就虚，对症下药，以使放纵多疑、刚愎拒谏的光宗能够平心静气地面对自己的忠言。

这一科圣策以“礼乐刑政之要”为问，陈亮则以“正人心，全民命，尽君道师道”为对。在对策的一开始，陈亮首云：“人主以厚处其身，而未尝以薄待天下之人”。接着指出，人主应以礼乐刑政董正天下（君道），以仁义孝悌为天下表率（师道）。他特别强调：“夫天下之事，孰有大于人心与民命者乎？则其要则在夫一人之心也。人心无所一，民命无所措，而欲论古今沿革之宜，究兵财出入之数，以求治乱安危之变，是无其地而求种艺之必生也，天下安有是理哉！”这些话，可以说都是儒家理论最基本的概念，然而对于光宗来说，看来还是需要认真地补补这一课。

为了能够顺利地展开自己的议论，对于此时闹得沸沸扬扬，朝野上下视为国本的“定省”大事，陈亮先以“陛下之于寿皇（孝宗）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余，所以察词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众，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为京邑之美观也哉”等语给光宗吃下一颗“顺气丸”。这些话自然不仅仅是为了让光宗听起来舒服入耳，因为在对策的开始，陈亮就指出，人主应以“厚”处其身，强调师道的主要内容即是以“仁义孝悌”为天下表率，“孝”赫然就列在其中。

陈亮的真实意图，应是希望光宗在“顺气”之后能够予以自省，能够予以反思。因此，紧接着，他又一次“请为陛下诵君道师道”，并进一步把它们阐述得更为清晰明白，“所谓教化之实，则不可以颊舌动之矣，仁义孝悌以尽人君之所谓师道可也；所谓号令之意，则不可以权力而驱之矣，礼乐刑政以尽人君之所谓君道可也。”殷殷开导，言之再三，真可以说是“言在此而意在彼，问之显而答之微。”

在具体阐发圣问时，陈亮反反复复，前前后后，仍是以“师道君道”贯穿始终。“臣愿陛下明师道以临天下”，“尽君道以宰天下”；“苟尽师道，则薰陶在其中，苟尽君道，则训厉不足言矣”；“其要在于辨名实是非之所在，公私爱恶之所归，其道则以厚处其身，而未尝以薄待天下之人而已”；“陛下必欲正人心，全民命，以尽师道君道，而自达于二帝三王之治而后已”。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希望光宗能修养自身道德，成为天下表率。唯其如此，人心才能安定，国家才能无虞。

对策的最后一段，更可以看出陈亮的良苦用心。“陛下圣孝，虽曾、闵（曾参、闵子骞，均为孔门弟子，孝行楷模）不过，而定省之小夺于事，则人得以疑之矣”，这是又回到了矛盾的焦点，再一次提醒光宗；“陛下之即日如故”，是指绍熙三年十一月，光宗在赵汝愚等人的调解之下，入朝重华宫，但此后则依然故我；“而疑者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处为为无已也”，由于有了前面的反复论说，其希望光宗三省吾身，善处孝宗之意已经非常明显。接着，陈亮又两引《易卦》，以退为进，劝勉光宗。“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乐。”《易·需》疏云：“言云上于天，是天之欲雨，待时而落，所以明需。大惠将施，而盛德又亨，故君子于此时以饮食宴乐。”这是告诉光宗，饮宴逸乐，目的应是“待时而为”，不应一味沉溺其中，“岂以陛下圣明而有乐于此哉?”这样的进言，自然比强硬地指责更易为光宗接受。（绍熙二年，钱塘余古上书，极谏光宗不应纵欲，结果被诏送筠

州州学听读。)“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四方”。《易·离》疏云“明两作离者，离为日，日为明，今有上下二体，故云明两作离也。”按：离卦☲☲离上离下，为两明前后相续之象。这里应指光宗继孝宗为帝，两明相继，自应孝谨而不能敌体，故陈亮谓：“岂以陛下英武而肯郁郁于此哉?”所以有些人只看到对策开始的“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一句，就认定陈亮是在讨光宗的欢心，真是误解了陈亮“入当大对，曲尽寸心。问所不该，言岂容于越次；意虽独至，事亦谨于开端”(《陈亮集》卷十八《谢章司谏启》)的一番苦衷。

据陈亮讲，此篇对策最后还是让一些考官们感到不快，故奏名时仅在第三，不过由于他号准了光宗的“心脉”，御览时则被亲擢为第一(出处同上)。事后光宗曾在赐第告词中褒奖说：“尔早以艺文首贤能之书，旋以论奏动慈宸之听，亲阅大对，褒其渊源，擢置举首，殆天留以遗朕也。”(《宋史·陈亮传》)不过，陈亮耗费心机以求夺魁入仕，其目的仍是为了能实现他为之疾呼一生的抗金复国大业，所以他在《谢恩诗》中有“复雠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之句。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于陈亮对策时的闪烁其词，当会更多一些支持与同情。然而天妒英才，哲人不寿，一生的坎坷竟使陈亮未至官而卒。对此，我们除了发几声“时也！命也!”之类无谓的感叹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

(李维新)

绍定五年(1232)壬辰科

状元:徐元杰

徐元杰(? ~1245)字仁伯,信州上饶(今属江西)人。少颖悟,诵书日数千言,曾拜理学家真德秀为师。绍定五年状元,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嘉熙二年,召为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淳祐元年,差知南剑州,合郡德之,丁母忧去官,众人遮道跪留。既免丧,授侍佐郎官,迁将作监,上疏反对起复丞相史嵩之,忠论切直,朝野传颂。后迁国子祭酒,权中书舍人,五年六月以暴疾而卒。元杰之死,时人疑为权臣下毒,台谏交疏论奏,三学诸生至叩阍讼冤。理宗命有司勘治,终无所明,海内人士伤之。谥"忠愍"。有《楳埜集》。

对策

臣对 臣闻求道有本原，行道有功用，自本原而达之功用，则天下之治可以不劳而举矣。盖道无近功，惟志趣之高远者为足以极其功；道非小用，惟力量之凝定者为足以大其用。自有天地以来所以脉络世教，纲维人极于不泯不绝之地者，皆非偶然之故也。太极之理，流行散见于万类之殊，常人得之由之，而不知者也。故必有待于超出乎亿兆人之上者为之君师焉。以一人之心融天地之心，以天地之心觉天下之心，帝之所以为帝，王之所以为王，同此心也，亦同此道也，同此学也，亦同此功用也。然则有帝王之心者，斯能有志于帝王之道；有帝王之学者，亦岂不能进于帝王之用哉？恭惟皇帝陛下，英姿天挺，圣学日新，自临御以来，孜孜汲汲，既知求此道之用以用其心，则知推此心之用以用天下。其间大震怒、大拂乱，所以撄宵旰之怀，关玉食之抱者，殆非可以一二计也。陛下端居凝邃，加意讲求，所以压万变之纷纭，镇群疑之汹涌，阴以为天下国家之计者，盖陛下求道得力处也。夫求道既有所得，则夫坚始者之念，以就来者之图；勉今日之诚，以为后日之虑；不以仅定为无恐，不以苟安为自足；凡尧舜三代之所以根柢乎盛治者，是政陛下行道用力处也。因其力之有所得，充其力之有所用，天地之眷厚矣！所以答天地之眷者当何如？祖宗之托重矣！所以奉祖宗之托者当奚若？丕绪之承今九年矣！所以充拓事业者，当何修而至？陛下诚能因其力之有所得，充其力之有所用，自身而家，所以正人伦而系风化者，不可不谨其表倡之几；自家而国，所以别贤否而定名义者，不可不致其微渐之虑；自国而天下，所以谨修攘而全爱敬

者，不可不极其勉励之诚。其效证于尧舜三代之所已行，其监具于秦汉以下之所并见，其事信于经训史册之所可考。陛下诚于本原之地而极其神，不徒以曰诵曰讲者为常准，则学之为王者事宜，在陛下方寸间耳。臣又何敢容其喙！请以所闻于师者拜手稽首以复陛下之问，惟陛下少垂听焉，臣昧死上愚对。

臣伏读圣策曰："盖闻学之为王者事，由尧舜三代至于今日，未之有改也。而或以为古今有殊时，帝王有异治，世道有升降，各因其时以为治，而无一定之论。吁有是哉！"臣有以见陛下有志于帝王道统之传，而为昧者发道与时异之叹也。臣闻道与心一，帝王之心，与万世一。尧之授舜，舜之授禹，三圣授受相传一道，载之于《书》。人心道心之分，惟危惟微之辨，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惟其形气之并生，虽上智不能无人心；惟其性命之各正，虽下愚不能无道心。故人心每患于难制，而道心每患于难明。难制故危，而安之者常寡；难明故微，而知之者几希。惟精则决择详审而致知之功深，惟一则主宰坚定而力行之用久。是以一中之执，万世惟允。成汤传之，为昭德建中；文武传之，为顺则立极。帝王之治，所以蒸为雍熙，薰为泰和，而无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者，皆此道之功用也。夫以功用之散于天下者若是其明著，而根本之敛于一心者，犹不敢废夫讲贯之忱。故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号为汲汲于学者，果为何事也？岂非以危微数语，肇启其端？故心法之传，异世同轨。成汤之礼制，文武之克宅，莫不皆致力于本原之地。虽其时之相去，若有不同，而道之相传，未尝不一。自世之昧者观之，泥于迹而不求于心，索于治而不求于道。舜文一也，或疑其劳逸之殊，而不揆其符节之合；商周一也，或疑其文质之异，而不通夫损益之因。善乎董仲舒之言曰："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异。"盖其所以异者，世之治乱而已，所谓道则未尝不同焉。故韩愈亦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

文武”。即仲舒之所谓继，求韩愈之所谓传，则六七君子之心，越宇宙而同神，历千载而一日。又孰谓其世有升降而因时为治，果无一定之论乎？然则能知帝王之无异心，则知帝王之无异道；知帝王之无异道，则知帝王之无异效矣。

臣伏读圣策曰：“夫统理民物，为天下君。膺天地之眷顾，蒙祖宗之付托，若是其重。而本原之地无所据依，以善斯世，不可也。是以尧舜之帝，禹汤文武之王，莫不从事于学，如饥之必食，渴之必饮。未尝外道以出治，舍经以求治也。”臣有以见陛下以天地祖宗之寄为不可忽，以尧舜三王之道为必可行，而欲讲学以求道，即道以求治，而又知所用力之地也。臣闻帝王之心，与天地一，祖宗之心，与帝王一。帝王代天地以裁成其化者也，祖宗法帝王以会通其用者也。故求帝王之治者，当求帝王之道；求帝王之道者，当求帝王之心。心法明则道法著矣，道法立则治法举矣。世去古远，正学不传，生民不见帝王之泽。至治之主，盖不世出，而天地之生圣人，乃间见于千载之后，艺祖皇帝肇造区夏，拨乱立极，读《书》而叹后世刑纲之密，盖有以契夫天地生育之心矣。仁宗皇帝绍休圣绪，继体守成，讲《易》而得六情六气之说，盖有以契夫天地动静之心矣。夫以祖宗讲明学问，稽式帝王，既无一而不契于天地之心，则夫两间之所眷祐于国家，而遗陛下以无强之休者，要非人力之所幸致也。陛下讲学所以朝夕不倦，寒暑不辍，而必欲与帝王之心同一运量者，盖欲以慰祖宗之托而答天地之眷焉尔。故观乎天地，则见帝王矣；观乎帝王，则见祖宗矣。何则？天地付陛下以此位者也，帝王同陛下以此道者也，祖宗传陛下以此心者也。心得其正，则此道为有宗；道得其正，则此位为无忝。位正而道益可行，道正而心益可制。动息造次，常以天下为忧；安舒暇豫，略不以有位为乐。夫如是也，真知夫天地之所付者至大，而不敢以自小矣；真知夫帝王之所同者至公，而不敢以自私也；真知夫祖宗之所传者至重，而不

敢以自轻矣。自是而充之，以学力所到，日益月新，心术所存，天宽地大。举一世之人济济于雍熙泰和之域，浑浑乎如四时之春，而不见有炎风朔雪之惨者，皆此心之推也。惟陛下益反诸心而用力焉，则功用岂有难致者哉？

臣伏读圣策曰："朕以眇陋，嗣承丕绪，于今九年。昧旦而朝，咨诹辅弼，延纳英俊，日御经筵，曰诵曰讲，咸有常准。"臣有以见陛下统临于上，愈尊而愈谦；问学之勤，愈久而愈不替也。臣闻帝王之学，厥有本原，惟谨养乎心术之微，不徒为诵说之务；惟深探夫造端之自，不徒为外饰之求。宫庭深邃，燕佚易失；声色满前，志念易汩。四海九州之大，非空言所能维持；一日万几之繁，非小智所能经理。然所以维持而经理之者，其本会于圣心运量之中，其用形于圣学贯通之后，则是心不可以不尽，学力不可以不充也。久矣，故有一念之纵肆，则不足以充此学；有一息之间断，则不足以充此学。外庭固学矣，内庭其可息乎？经筵固学矣，退处其可懈乎？端人正士固与学矣，便嬖使令其可与亵乎？陛下有志于帝王之事，固出于圣心之实。然抑帝王所以兢兢业业，儆戒无虞，孳孳汲汲，悠久不息者，得非陛下之所当深勉，而不徒为言语诵说之末而已者乎！陛下即位固九年矣，然外而疆土之未清，内而奸宄之未靖，陛下而念及此，得不以周之克商九年，大勋未集而勉其忧勤乎？陛下每朝固咨辅弼，延英俊矣，然内而邪正之未明，外而贪廉之未判，陛下而念及此，得不以舜之三考黜陟，庶绩咸熙而为几康之戒乎？不然，以可致之资而不能致，以可为之时而不能为，以可豫备之岁月，而自惰于不备不虞之域，若是而曰讲诵有常，臣甚不知陛下讲诵之谓矣。陛下苟能以帝王之心为心，则必深求帝王用力之要。凡六经所载，得之于经筵之所诵讲者，诚非徒以讲诵为也。口以诵之，必反心而载；惟学以讲之，必闻义而力徙。故于至善之所止，则必如好好色使之眼明心悦可也；于不善之所当改，则必如恶恶臭使之影

灭迹绝可也。学有如是，则本原正矣。本原既正，则自身而家，自家而国，自国而天下，无一政之不立，无一事之不举。功用之著，其可以限量既耶！

臣伏读圣策曰："六经之道，所以该贯天人，维持世变者，至纤至悉，不可胜穷。而《通鉴》一书，又所以著历代之秽恶以劝戒于后者，莫先于修身而齐家，进君子而退小人，严名分而遏乱萌，修政事而靖边疆，恤民隐而惧天变。"臣有以见陛下会经训之精粗，明史册之劝戒，而欲用力于君德治道之大者也。夫经所以载道也，史所以纬经也。人主之学，所以讲经与史者，盖欲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用者也。臣尝以是观之，六经皆所以言天人，而至于该贯其道，则莫详于《易》与《春秋》之为书；六经皆所以维持世变，而所谓至纤至悉，则莫大于《易》与《春秋》之为用。《易》者，六艺之原也，卦有阴阳，固所以明天道也，而吉凶悔吝未始不以人言之。则《易》之所以维持世变者，宜乎极其所谓变通鼓舞之道，而不可以致诘也。《春秋》者，史记之约也，义有褒贬，固所以明人道也，而灾异所书，未尝不以天言之，则《春秋》之所以维持世变者，宜乎定天下之邪正，而乱臣贼子皆凛乎其知惧也。即《易》与《春秋》之旨，而概之六经之道，则维持世变，至纤至悉而不可胜穷。自修身齐家，至于恤民隐而惧天变者，可以类推矣。虽然，此经之所以载道然也，至于史之所以纬夫经者，则自周之衰以讫五代之季，其间安危理乱之分，成败兴亡之故，上下数千年间，皆若烛照龟卜而不可掩。然以善论世变者观之，汉大纲仅正而万目则未甚举，唐万目举而大纲又不能正。则其所以正人伦而系风俗，别贤否而定名义，谨修攘而全爱敬，大概不可以帝王之功用并言者，要亦有由矣。是乌可不为本原之论哉？空谷而足音，晦冥而日月，绝无仅有之中，而求其粗合于古帝王之道，惟文帝一人而已。昔孝宗皇帝与大臣论古今治乱，因曰："自汉唐以来，人君惟汉文帝粗能知道。自文帝之外，人君非

惟不知道，亦不知学。”大哉王言！深于考论。夫后世人主之为学者乎？试即文帝之粗知道者观之，虽其礼文之事犹或多缺，然剌取六经，盖亦仿佛于王者之意。故当时之治，蔼然犹有王者气象，非粗知道者其孰能之？自其躬玄嘿丽道准仁，而修身之道粗明；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而齐家之道粗立；张武受赂益愧其心，吴王不朝，赐以几杖，而治国之道又粗审；以至弃细过而绝戎隙，成军礼以张国势，务休息而专德化，警灾异而求直言。凡可以为平天下之道者，亦粗于此而加之意。然则文帝之所以为汉德之盛者，岂非粗知道之效欤？夫惟文帝粗知六经之道，既足以致后世之治，后世考论文帝之史，则当劝其所以为文帝者，而戒其所以不如文帝者；当劝夫文帝之可以到帝王者，而戒夫文帝之终于未到帝王者。则治道功用，又岂容外吾心而求之乎？臣愿陛下反求此心，加意力行，以可到帝王者自勉，以未到帝王者自励，此则在于用力不用力耳，乌患其有难行者哉？

臣伏读圣策曰：“朕深惟经训史策，日陈于前，文字繁多，途辙迂阔，求其所以置力者，乃即燕闲，窃有慕古人缉熙光明之义，日就月将，躬履神会，盖以基治道之本，一人心之归，使普天率土，若士与民，悉共由于理义，而无本末舛逆之患，上下异向之风。顾不韪欤。”臣有以见陛下加意于缉熙之诚，用力于本原之地，而欲推而达之于治道功用之大也。夫经之与史，虽文字之繁，而关于君德治道者，则未尝无纲领之要。夫“缉熙光明，日就月将”，此诗人之所述，而成王用力为学之实也。至于曰“躬履”曰“神会”，此则陛下心术纯明，义理融贯，能以诗人之所述者究心，而又以成王之所学者用力也。盖躬之所履，皆力行之事；神之所会，皆致知之功。行无不力，则“缉熙”矣；知无不致，则“光明”矣。以陛下之“躬履神会”，求成王之“缉熙光明”，而又形诸心画，发诸圣制，布尧言于天下，断断然以为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知夫学之有益于人

国矣。举天下之大，家传人诵，皆灼灼然知陛下“缉熙光明”之懿，殆与成王不可以异观矣。抑成王之所以谨养其心，以为讲学之本也，陛下亦尝实用其力乎？臣考诸《诗》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群臣告成王以用力之大者也，而谆勤恳切之意，又必继之以“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盖欲其知天之监，无往而不在，无时而不然，而敬之为敬，无一动之或违，无一息之可驰也。成王于此，灼知用力之要，谦虚挹损，形之于言曰：“惟予小子，不聪敬止”，必加之以“日就月将”之诚，懋之以“缉熙光明”之益，积而至于亿万年天休之敬。以是而论，则知“缉熙光明”，乃为学之要；而“敬之敬之”，又缉熙光明之要也。今陛下既即燕闲，慨慕于古事，非不伟也。至于古所以谨处燕闲，无微而不敬者，兹又陛下切身之事。而治道之所由，以基人心之所由，以一义理之所由，以克广者也。盖敬者“主一无适”之谓，彻上彻下之道，陛下与成王所谓缉熙光明之实，而二帝三王所以传授心法之准的也。故必紬绎心思，绫绫不已，充广心地，恢恢有余，而后可以言缉熙。清明一有纷汩，志虑一有间断，气象一有褊狭，则不足谓之缉熙矣，而可以为敬乎？必明善诚身，动与理觉，尽心知性，静与理融，而后可以言光明。物欲少有障蔽，血气少有昏蒙，智识少有凝滞，则不足谓之光明矣，又可以为敬乎？陛下之所谓躬履，盖履此敬也；陛下之所谓神会，盖会此敬也。以是而基治道，使天下国家之治，如尧舜三代之盛可也。否则规摹弗立，玩愒小康，本末之不能无舛逆者，皆治世之累也。以是而一人心，必使远近风俗之化，如尧舜三代之美可也。否则仪刑弗谨，观听莫新，上下不能不异其向者，皆风俗之弊也。陛下能反求此心，常守此敬，内主乎一而不病乎杂，外无所适而不徇乎私。本正而末自随，上倡而下必应，阴消其舛逆之患，潜格其异向之风，则其感动意思，殆与七十子之服孔子者，同一机括也。臣愿陛下以真存心，则躬履神会，自不能掩其功用之著。由是

而充之，则以成帝王之学，造帝王之道，惟陛下加之意而已。

圣策又曰："若夫商政治之得失，求民俗之利病，论士习之厚薄，则有所未暇。盖以本原既立，则他可以序举也。"臣窃谓陛下之言及此，岂非天下之幸而天地祖宗之望陛下者乎？盖政治之得失，每系于君道转移之间；民俗之利病，实关于君政修废之顷；士习之厚薄，亦视夫君心之好尚者如何。陛下不屑屑于三者之计，必谆谆于本原之正者，岂非以用力于本原者既善，则三者之效特举而措之耳。故《中庸》论为天下国家有九经，而曰所以行之者一。《大学》言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亦以修身在正心者为之本。陛下讲明于此，盖亦熟矣。继今而后，极致知之善，尽力行之诚，因全体之明，求大用之著；必刚以制欲，必勇以力行，必恭俭以约己，必渊静以养心，如是则本原既正，三者之序断断乎其可举。不然，外有讲学之文，内无讲学之实；诿本原之论，以盖其事体之失，假修饬之具，以掩其修省之愆；戒酒有箴而无益于制心，缉熙有记而无益于进德。若是而曰政治之未暇问，民俗之未暇问，士习之未暇问，是自置天下国家于圣度之外，又安足以为本原之论哉？昔孝宗皇帝圣训有曰："朕心未尝放下，一日间天下定行一遭。"孝宗之所以经营于念虑者，若是其详且悉，曾谓其以本原之是正而一切付天下之事于未暇问乎？圣谟洋洋，载在国史，皆陛下之所当体而行之者也。臣愿陛下益反之心，曲加其真实无伪之功，广推于外，旁达其运量不穷之妙；则本原在于圣心矣。凡陛下策臣以经史之所当讲者，皆可以序而举，况于是三者之务哉！

圣策之所以幸教臣者亦已至矣，而陛下谦冲温粹，犹终之曰："子大夫奉对于庭，其以有得于经史者，䌷绎而毕陈之，朕将亲览。"臣仰见陛下咨访不倦，嘉与草茅之贱，求本原之纤悉，非徒为是诹采之文具也。臣窃闻六经之书，致治之成法也。史之为史，亚乎六经者也。夫致治成法，既皆具于经，而史又亚乎经之道，则凡天下

国家之治，非徒本原之是正而已。至于纤悉节目，所以救习俗之失，防人心之微者，经之与史，盖相贯通而互发明也。陛下既俾臣等细绎而毕陈之，臣不能罄竭肤浅之万一，以为陛下告，不惟下负所学，抑亦上负陛下之谆诲矣。然臣之所尤拳拳于陛下而不能自已于纳忠者，其说盖有三焉，一曰固民心，二曰肃军心，三曰正士大夫之心。盖民者，国之命脉也；兵者，国之精神也；士大夫者，又国之医师砭剂也。为人上者，当使命脉坚强，精神运动，常致谨夫医师砭剂之用，以为元气调养之方，则立国之势，自隐然有安靖和平之功用矣。臣请竭其愚而终言之。《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此言民不可以不固，怨不可以不弭也。今之所以固民者何如耶？田间困于科率，市井困于征求，商贾困于抽敛，富家大室困于奄没之刑。迭是数困，犹未已焉。远近怨咨不可闻也，乖戾之气上熏于天，激而为江闽之盗，滋而为辅近之奸，涨而为都会之灾，溢而为边陲之警，延而为数千里之旱，岌岌殆哉！国家命脉，一缕千钧，深可虑也。昔光武中兴，邓禹劝之以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先朝范镇亦曰："欲备契丹，莫若宽天下民。"此皆所以为命脉计也。陛下及图之，则其证犹可起也，否则非臣之所敢知矣。《书》曰："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此言卫国以兵，诘之者有其道，则服之者有其机也。今之为兵者何如耶？自核实之不加，而兵益以冗；自训练之不精，而兵益以惰；自豢养之不戒，而兵益以脆；自等级之不严，而兵益以骄；自刻剥纵驰之相蒙，而兵又流于叛且溃矣。夫国家竭民之力以养兵，盖资之以卫吾国也。今乃不冗则惰，不惰则脆，不脆则骄，不骄则叛，不叛则溃；习于纵敌而不习于死敌，利于为寇而不利于御寇，敢于犯上而不敢于卫上。于是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主帅。闽南之纷乱方迹，而继之以江右之陆梁；西蜀之惊荡方传，而因之以淮东之奔迸。姑息养祸，浸以成风，蔓草难图，忧未歇也。昔晋文

公城濮之战，见其师少长有礼而知其可用；艺祖皇帝始明军法，使以阶级相承，小有违犯，咸伏斧锧。是以上下有序，无征不服，此皆所以为精神计也。陛下其及图之，则其患犹可弭也。否则非臣之所敢言矣。夫固国以民，卫国以兵，二者命脉之所关，精神之所系，一日不可忽焉者也。然所以护养其民，调伏其兵者，惟有士大夫以为医砭尔。夫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而命将遣帅以卫中国者，亦以重戍役车徒之责。今之为士大夫者，臣又不知其果何如邪？陛下以培固邦本为心，而监司守令则行之以朘削膏血之政；陛下以运动国势为心，而曰将曰帅乘之以消沮士卒之私；陛下以兴利除害、信赏必罚为心，而内外大小之臣，则应之以虚诞苟且、偷安旦暮之计。是无怪乎上之真德实意，不能宣达于其下；下之吞声隐气，不能通达于其上。上下隔绝，于势分之交违，则夫民怨而思乱，兵怨而思叛，亦其理之所必至也。昔汉宣帝欲安渤海之警，得一龚遂，单车至府，宣布教令，慰安牧养，盗为之悉平。而民不患其不安者，以得人而安之也。唐马燧之在河东，驭马厮役教以骑射，比及二年，得精兵二万。而兵不患其不强者，以得人而制之也。是以国朝开基之初，藩侯不抚百姓，则有断不容之之戒。至于南征北伐，战胜攻取，兵不过二十万者，亦惟以曹彬、潘美为将耳。此其于国家砭剂之用，明效大验，彰彰然足以为后人嘉赖维持之地。盖汉唐之美，独盛于一代者也。今陛下所慕者，帝王之道；所鉴者，汉唐之言；所取者，祖宗贻谋之善。则其所谓一军民之心者，要莫先于正士大夫之心；而其所以正士大夫之心者，又不过先正陛下之心而已。董仲舒有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极而至于四方远近之一于正。"此又自本原而达之功用，古今不易之至论也。惟陛下于此而实用力焉，则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无任昧死谨对。

评析

封建社会，皇权至尊，皇帝的贤德与否，实则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命运。因此，历代的封建儒生都把“致君尧舜”当作自己的最高理想，而帝王之学也就成为封建时代最为重要的政治理论之一。绍定五年壬辰科，圣策以“帝王之学”为问，徐元杰凭着对这一问题的深刻理解，引经据典，阐发圣问，从历朝史实到当代弊端，一一评析，写出了这篇帝王如何修、齐、治、平的宏文来。

在对策中，元杰也是采用在开头一段点明主旨，然后再以此为准绳，分就圣策诸问一一论述的方法。他首先强调“求道有本原，行道有功用，自本原而达之功用，则天下之治可以不劳而举矣。”在他看来，帝之所以为帝，王之所以为王，就在于能够“以一人之心融天地之心，以天地之心觉天下之心。”所以他力劝理宗应自身而家，正人伦而系风化；自家而国，别贤否而定名义；自国而天下，谨修攘而全爱敬。不能只以口头上的颂讲经义为满足。元杰的见解，我们读后并不感到陌生，因为它们屡见于儒家圣贤的高文大册，也屡见于历届举子金殿应试时的考卷。不过，从元杰对圣策诸问的精心答对之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个饱读书史，精研性理的儒者；另一方面，使我们更感兴趣并应予以重点评析的是，他并不以循规蹈矩，亦步亦趋地阐释圣问为能事，在可能的条件下，他都尽量把帝王之学与眼前的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显示出他对于时务亦高度重视并具有极强的判断力。

针对策问“朕以眇陋嗣承丕绪，于今九年，昧旦而朝，咨诹辅弼，延纳英俊，日御经筵，曰诵曰讲，咸有常准。”元杰在略表赞许之

后，笔锋一转，尖锐地指出：帝王之学，厥有本原，“不徒为诵说之务”，“不徒为外饰之求”。并进一步告戒理宗，“外庭固学矣，内庭岂可息乎？经筵固学矣，退处其可懈乎？端人正士固与学矣，便嬖使令其可与亵乎？”这些话可以说已经完全溢出了策问的范围。封建时代的君主们（个别无“道”的残虐之君除外），大多能在表面上如策问所述作作样子，然而在极权集于一身，人欲无所限制的天子宝座上，口颂道德仁义，实际上往往会成为他们纵欲荒唐、骄奢逸豫的保护伞，理宗当然也不可能例外。为了把这一点讲得更明白，元杰毫不客气的批评理宗即位九年来，“外而疆土之未清，内而奸宄之未靖”；“内而邪正之未明，外而贪廉之未判”。忠告他不能以口头讲颂自许，而必须“口以颂之，必反心而载；惟学以讲之，必闻义而力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理宗落实在行动上，“于至善之所止，则必如好好色使之眼明心悦可也；于不善之所当改，则必如恶恶臭使之影灭迹绝可也。”

针对策问“若夫商政治之得失，求民俗之利病，论士习之厚薄，则有所未暇。盖以本原既立，则他可以序举也。”元杰则明确表示：“政治之得失，每系于君道转移之间，民俗之利病，实关于君政修废之顷；士习之厚薄，亦视夫君心之好尚者如何。”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看起来似如策问所言是本与末的关系，然而实际上却是由此及彼，由彼又可以证此，两者均不可偏废的大问题。策论所言显而易见的弊端则在于“外有讲学之文，内无讲学之实，诿本原之论，以盖其事体之失，假修饬之具，以掩其修省之衍”，最终导致“自置天下国家于圣度之外”，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本原之论呢？这无疑是在批评策问的似是而非，貌合神离。为了使自己的观点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元杰又引孝宗圣训“朕心未尝放下，一日间天下定行一遭”为证，再三劝勉，希望理宗能体而行之，立足于实务而谨戒空谈性理。

在对策的最后一段，元杰又于策问之外，拳拳纳忠，提出固民

心，肃军心，正士大夫之心三项措施。由于这一部分已经完全摆脱了策问的限制和束缚，所以在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方面，也就更为大胆和直接。在元杰直笔无隐地描述之下，理宗之世国弱民贫，危若累卵的现实也就能触目惊心地展示在我们面前。在国家本应视为命脉的“民”的情况是：“田间困于科率，市井困于征求，商贾困于抽敛，富家大室困于奄没之刑”。矛盾激化的结果，造成江闽有盗，辅近有奸，都会有灾，边陲有警，这一切再加上千里大旱，已经使“国家命脉，一缕千钧，深可虑也。”而国家本应视为精神的“军”的情况是：由于治军措施的形同虚设，上下玩忽，军队冗、惰、脆、骄、叛、溃，诸弊丛生，军不成军。“习于纵敌而不习于死敌，利于为寇而不利于御寇，敢于犯上而不敢于卫上”，士卒凌偏裨，偏裨凌主帅，以至于闽南纷乱，江右陆梁，西蜀惊荡，淮南奔迸，真可谓一乱未平，一乱又起。“姑息养祸，浸以成风，蔓草难图，忧未歇也。”而作为国之医砭的“士大夫”的情况那就更糟：监司守令行朘削膏血之政，曰将曰帅者以私而消沮士卒，内外大小之臣则虚诞苟且，偷安旦暮。上下隔绝，各怀鬼胎，势分交违，民乱兵叛。读了这些毫无掩饰的放胆直陈，明白了国势朝政已经到了如此难以收拾的地步，我们再来看策问之奢谈道德性理，帝王之学，岂非揖逊救焚，痴人说梦吗？

由于时代的局限，元杰虽较时人有着远为犀利的政治目光，但他还是不可能找到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灵丹妙药，作为道学大兴时代的一介儒生，他也只能——或是必须——回到策问规定的思路上去，所谓“一军民之心者，要莫先正于士大夫之心，而其所以正士大夫之心者，又不过先正陛下之心而已”，而它的反命题，亦即董仲舒所云：“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极而至于四方远近之一于正。”唯此而已，岂有他哉？今天的读者对此也大概只能感慨备至，莫可如何吧！　　（李维新）

宝祐元年(1253)癸丑科

状元:姚勉

姚勉(1216～1262)字述之,一字成一,浙江新昌人。宝祐元年状元,后官校书郎兼太子舍人。因上疏反对奸相丁大全,辞官归里。吴潜为相,以原职起复。终以得罪奸相贾似道免官。有《雪坡集》。

对策

臣对 臣恭惟皇帝陛下十诏宾兴,九临轩御,求贤靡倦,博采刍荛。兹者进臣等于廷,策之以选举之八事,而欲得夫学术、才智之二者,以扶世道,真尧舜之用心也。臣来自远方,怀忠欲吐,意陛下必策之以当世之务,理乱安危之机,而圣问所及,乃止于

此，其虑臣等触时讳，而不使之言乎？抑亦虑臣等有待对之帖括，而问其所不备乎？甚非策士本意也。虽然，人才亦国家之重事！陛下求学术者，则欲其达性命而学圣贤，挺气节而发言议；求才智者，则欲其理国家而究民事，裕邦计而捍边陲，亦皆时政之大者。臣敢因陛下之问，而条其所以对，然后以臣所欲言者，为陛下言之，惟陛下试垂听焉。

臣闻求天下之士以文，不若淑天下之士以道。以道而淑天下之士，正其心也；以文而求天下之士，蛊其心也。上帝降衷，烝民有则，孰非良心善性之赋？惟民生厚，因物有迁，则教之者非其道耳。《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言古先圣王，所以教天下者，惟修其性中之道也。《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言古先圣王，明其心之明德，以新天下之民，而皆止于义理之极也。古之所以淑天下者如此。自乡举里选首废于周，而策士有科始见于汉，既非古意矣，犹未至以词章也。隋唐以来，始有进士，科目之诱既设，利禄之习益牢，然后天下之士，愈不知所谓道。心术日坏，以至于今，士习之趍犹唐旧也。虽然，变今之士习，臣犹以为易致力焉。何也？自孔孟绝响以来，士不知道。隋之世惟一王通，唐之世惟一韩愈，然皆得圣门之仿佛，莫造斯道之精微。如通以圣人之心迹有殊，愈以人之性有三品，其于圣道皆昧指归。学道之士且然，而况科目之士！故士习难骤变焉。天开我朝，道统复续，艺祖皇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对曰："道理最大。"此言一立，气感类从，五星聚奎，异人间出。有濂溪周惇颐倡其始，有河南程颢、程颐衍其流，有关西张载翼其派。南渡以来，有朱熹以推广之，有张栻以讲明之。于是天下之士，亦略谓道矣。闻古圣人之所，虽为科目之学蛊其心术，而道学之功每从而救之，识之明者亦多觉焉。臣故曰："变今之士习为易。"使上之人不专以文求天下之士，而专以道淑天下之士，则学术才智之

士，宜出为国家用矣。陛下聪明天锡，问学日新，接尧舜精一执中之传，得孔孟《中庸》、《大学》之旨，陛下可谓知道之君矣。抑臣犹愿陛下，推是道以淑天下之士也。而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则未免于以文耳，是非所以淑天下之士也。教之无素，求而得之者亦陋矣，间有能为天下用者，亦天资暗合耳，岂以道用天下者哉？古之盛时，自八岁入于小学，其所学，则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也，礼、乐、射、御、书、数之艺也。十有五而入大学，其所学，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序也，此古之士所以多全才也。后世以来，所习者词章，所志者利禄。进士可以求仕，则挟书假手者有之矣；学校可以求进，则诡名冒贯者有之矣。世禄之家能学有几，已仕之人可试尚多。贤良惟僻书奥传之观，而道则不知；词科惟奇文丽藻之习，而道则愈暗。武科则岂真有山西将帅之学？遗逸则不过为终南捷径之求。道之不闻，弊乃至此，无他，上之人求之者以文，则下之士应之者亦惟以文也。陛下而欲一新乎士习，盍亦先正乎人心。人心正，则士习新，虽以科目求士，亦皆得人矣。尚何学术才智之乏哉？臣请为陛下疏言之，谨昧死上愚对。

臣伏读圣策曰："朕临政愿治，夙夜不遑康宁，每惟自昔帝王，莫不急亲贤之为务。今选举之法未戾于古，而得人之效有不如人意，所以每当馈而叹。子大夫咸造在庭，其相与茂明之。"臣有以见陛下求治之切，欲得人以为用，而叹选举之难得士也。臣闻求于末者，不若求于本。心术者，本也；选举者，末也。今之人则选焉而得，举焉而获。本之不正，而惟欲于末以求之，虽日变其法而使详，日讲其术而使精，天下之所以应之者，亦止于如是之人耳。何则？本之不求而求之末，固如是也！求之本则道矣，求之末则文矣，文岂足以观人才乎！故成周之时，以德行道艺兴天下之贤能。德则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也；行则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也；艺则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也。而独不言所谓道，岂非道贯乎三

者之中，而有德行艺者，毕不可以不知道乎？是以文武不殊科，有武者亦皆有文；将相不殊途，可相者亦皆可将。古之人何以能是也？无所不通之谓道，知道则无所不能也。成周曷尝求之选举之末哉？乡以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先教后兴，盖有素矣；兴而曰宾，盖有礼矣。岂若后世，圜棘以试之，糊名以考之，待之者亦甚贱乎？况夫古之所以用乎士者，所献之书，虽登于天府，所仕之地，则不出其乡闾。故天下之士，皆知所以自重，而无所谓奔竞之习。今之所以教天下则异是矣。六艺云者，古人之所谓末节也，今之士亦皆不复知矣，而况所谓六德六行哉！未仕者志高科，已仕者志高位，不得不止，愈进愈贪。弃父母，左亲戚，背坟墓，远乡邦，逐逐然惟利禄之计，则科举之法有以坏之也。科举已久其行，何敢轻议变革，臣但愿陛下以道而淑天下，使天下之士知天爵之可贵，而人爵不足贵；知义荣之可尊，而势荣不足尊。利禄之心轻，则科举之念轻，科举之念轻，不得已而后应科举，则恬退静重之士出，而顽钝无耻之风亦可以少息矣。安有得人之效不如人意哉？

臣伏读圣策曰："夫学术者，君子所以维持斯道者也。达于性命之原，穷乎圣贤之指，形于气节，见于言议，平昔之所讲贯，其要可得闻欤？才智者，则所以经纶斯世者也，或识国家之大体，或知民事之本末，材术足以裕邦计，谋略足以捍边陲，平昔之所蕴蓄，其亦有所本否欤？今朕所以搜罗天下士者，无所不用其至。"臣有以见陛下思得夫学术才智之士，以为天下用，而慨今世未有其人也。臣闻学术、才智，一事也。学术其体，而才智其用也。有学术而有才智，其人则君子；有才智而无学术，其人则小人。陛下求人才，必皆求其两全之人，最不可各求其一也。至于圣问所及学术之四事，才智之四事，则脉络相贯，事理相关，亦不可以异观者。是故达性命之原，则能穷圣贤之旨矣；秉正直之气节，则发忠鲠之言议矣；识国家之大体，则知民事之本末矣；有裕邦计之材术，则全捍边陲之

谋略矣。臣请为陛下条陈之。夫圣贤教人，惟性命之学而已。在天为命，在人为性。命则天令之自然，性则仁、义、礼、智四端之固有也。是故为士者，当全天所畀付之命，而尽人所固有之性。天命之性，则一善而无恶，不可执气质之性以为性也；四端之性，则一真而非伪，不可泥释老之所谓性以为性也。圣贤教人不过如此，今之学者则异是焉。资禀之下者，局于功利之申、韩；资禀之高者，溺于虚寂之释、老。高谈性命，藐视辈流。好虚议论者，无实事功；尚虚声名者，无实践履。为程颢之体认“天理”二字者，谁欤？为程颐之求“孔颜所乐何事”者，谁欤？为朱熹之欲为朝廷措置大事者，谁欤？明善、诚身之言，资士夫谈柄而已，固不知善若何而明，身若何而诚也？格物致知之说，窃先儒绪论而已，固不知物若何而格，知若何而致也？道之在天下，体可以达用，精可以贯粗。而今之言道者，则以为无用之空谈，不能见于有用之实学，圣贤岂如是乎？臣故曰：达性命之原，则穷圣贤之指者，此也。夫议论者，自气节而发也。天下安有无所谓气节，而有议论者哉？王素为谏官，以“独击鹘”见称，则王素之气节为之也。刘安世在言路，以“殿上虎”见惮，则刘安世之气节为之也。有欧阳修之气节，则能排夏竦之奸邪；如王拱辰则初虽弹竦，而终则攻杜衍矣。有吕诲之气节，则能劾王安石之巧诈，如常秩则始虽立节，终则附安石矣。无气节而有议论，天下有是理哉？今之士大夫，气节言议，视先正似若少逊矣。以讦直为矫亢，以缄默为安静，以随声附和为不立异，以无所指斥为不近名。陛下非不容受直言也，又非不舍己从人也，而曾未有言焉者。今天下之窃议时政，惟曰内批也，营缮也，近习之弄权，而外戚之除授也。然而缴还内降如杜衍者，谁欤？论张尧佐四使如唐介者，谁欤？请不再建玉清昭应宫者，谁欤？夺任守忠节度，指曾觌、龙大渊奸利者，又谁欤？苟有一言，臣知陛下必从之也。无一人为陛下言者，而徒诿曰：“恐陛下之不受得”，无类于欺君乎？是皆气

节不立之过也，而何言议之有？臣故曰：秉正直之气节，则必发忠鲠之言议者，此也。国家大体，其本在仁。艺祖皇帝陈桥驿之言，紫云楼之誓。子孙万世，根本在斯；爱养元元，是为大务。胡今膏泽不下于民？陛下仁厚，论中所谓以术辅贪，以材济虐者，往往皆是。有如去岁，叠见重灾。九郡生灵，为鱼鳖之墟；众大民居，为灰烬之地。不加赈恤，民命谓何？撤阛阓而广通衢，略无救正之谏；侈土木而穷事力，第先应办之谋。以至监司守令之官，所谓承流宣化之任，而诸路台节，旷职甚多，弄印不除，褰帷何有？贪吏朘民之脂髓，虐吏戕民之肌肤，陛下深拱九重，亦安知此？是盖不知有国，故不知有民也。臣故曰：识国家之大体，则知民事之本末者，此也。今之备边，重在兵食，食苟不足，兵何由强？而今之兵赋，体统乖异。制阃则曰"食少"，总饷则曰"兵多"；制阃则曰"乏粮"，总饷则曰"虚籍"。岁行和籴，内斫本根，边有屯田竟无效验，徒耗事力不立规模。敌至则逃，敌去则舞，乘军之退，则以为功，愚弄朝廷，希觊酬赏。侧闻壬子之蜀祸，甚于丁酉之北兵，而掩败不言，惟以捷告，观其夺回虏掠三十万计，则知残害鱼肉凡几何？人生聚良难，岂堪频蹂？边之不能御，政坐不能练兵足食以为备，而徒以欺朝廷为心也。臣故曰：有裕邦计之材术，则全捍边陲之谋略者，此也。是皆不知道而然也。无道中之实用，而尚虚文以欺世，其失固宜矣。故臣愿陛下求才智于学术之中，而毋求才智于学术之外。苟不求其学术，而第求其才智，虽求士无所不用其至，非所谓至矣。陛下而先审乎此，则选举八事，臣得以次第而熟数于前。

臣伏读圣策曰："进士一科，自唐而重。祖宗盛时，或一榜才百二十人，而得四贤相；或胪传之际，日有五色，而多得名臣。果何道而臻此欤？近岁州乡贡举，率多混淆，考核之法，有不容略，故既选于礼部，又复试于中书，朕拳拳于作新者至矣。棫朴之茂，丰芑之仁，子大夫其亦有以称朕意者欤？"臣有以见陛下加意于进士之科，

而欲如祖宗得人之盛也。臣闻求天下之士者，科目也；坏天下之士者，亦科目也。士不务道，惟知工于声病之文；用不适时，惟知习于套括之学。其未仕也，用力惟在于此；其既仕也，从政曷知其方？失在于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也，非科目坏之乎？大抵科举之取士，惟在于文，不在于道，故天下之士，不习乎道，惟习乎文。每至三年谓之大比，群众以考其艺，誊录以观其文，不求之乡评，不本之宿望，惟其文足以惑有司足矣，初不必素行之可以服乎乡里也。惟能窃用先儒之言，而谓之明理学足矣，初不必用力真在乎义理也。词赋不本于理，致日以雕镌；经义不求其指归，日以穿凿。至于论策之作，欲观其通达之才，而乃俪叶骈花，抽黄对白，竞为纤巧之制，无复浑厚之文。世变如斯，可为太息。然此犹自能之者也，固有平时不稔于文声，一旦忽腾于榜帖，由私径以鬻举，挟厚赀以倩人，公道益亡，科举遂陋。臣观有唐取士，乡贡以荐而充，虽或间有私情，不敢大废公论。有如武陵之托杜牧一赋，韩愈之荐侯喜数人，允为得才，今岂能及？故唐之世虽曰私，而犹有公议；今之世虽曰公，而实用私情。臣为科举之谋，其说有二：一曰严考校于其始，一曰公复试于其终。科举所选考官，必有出身科第之人，然后可在考校之列，不知出身之士，半是假手之人，以若持衡，安能得士？臣愚以为方今诸州贡士之际，以至省闱廷对之时，精选考官以惠多士，其或谬得科第，决不使与校文，则不至于滋缪种矣。昔仁祖朝，用欧阳修典贡举事，一脱西昆之体，丕变嘉祐之文；用能革险怪之刘几，得名世之苏轼，皆考官得人之验也。臣故曰：严考校于其始。今日省闱取士之后，必行复试，可谓良规，独于州县取解之时，虽有帘引，未免文具，使乡举果皆得实，则省闱安有不通。而州郡之间，奉行不恪，以覆护为长厚，以驳放为过苛，不知取此庸流，他日又将安用！臣谓州郡奉行之意不恪，亦由朝廷连坐之罚不严。倘自今以往，省闱复试不通者，所属州郡真行连坐之罚，则必可以得实材

矣。前日都堂复试，已极提防，然虽能察张奭曳白之庸，未能觉温岐潜救之巧，似闻掩覆，大是吏奸。今已噬脐，后当加意，毋使人谓清明之世而犹有是也。昔艺祖时，徐士廉诣院，诉榜不公，始命复试。当时考核，可谓至公，虽以陶谷之子，登科亦必在所审察，此复试尽公之法也。臣故曰：公复试于其终。虽然，此犹未为淑其心也。朱熹在同安，尝因县补，明布训谕，俾父兄毋为子弟假手，以教之欺。陛下倘能以道淑人心，使人知此义，则能而肆假手，庸而求假手者，皆愧矣。榜才一百二十人，而得四贤相，廷唱之际，五色云见，而得世名臣，何患不如祖宗盛时乎！

臣伏读圣策曰："学校之设，所以教养作成。庆历中，湖学最盛。置治道斋以讲明世务，遂取其法以教太学，而胡瑗职教京师，几二十年，是岂徒校一日之长者欤？今负芨担簦，云集行都，来者甚众，而与选者甚寡，朕心为之恻然。其当何道，使无道路之劳，而坐收教养之实欤？"臣有以见陛下轸念学校之士，而欲加教养之功也。臣闻学校者，最近民而易以化民者也。今之天下莫不有学，而学校以养士，科目以取人，两不相关，学遂虚设。于其艺而不于其行，考其暂而不考其常。能为发策决科之文，则曰能事已毕；问其根本当然之事，则茫然不知。气习一浮，风俗遂薄。内则有燕安废学之失，外则有挑达在阙之愆。逐利惟竞于锥刀，养指遂失其肩背。失在于所养非所教，所教非所养也。太学，四方所聚，实系观瞻，而乃诡冒成风，遂成奸弊之薮，祈恩趋利，尤开侥幸之门。太学尚然，况乎天下。有如省闱之试，辄求泛免之恩。使朝廷确然不行，则幸门何由而启？而乃务为姑息，复与放行，弊例一滋，公法何在？朝廷曩欲士子之安乡井，乃偏州郡而行类申，曾不几时，又复中变，于是补闱之士，云集京师。无鼓箧孙业之风，如鳌弧先登之状，蹂死不可胜计，仁人岂所忍闻？是皆启侥幸之心，所以激纷纭之祸。迩者廷臣欲分路而试，其法亦可谓良，而臣为学校之谋，其

说有二：一曰定教育之良法，一曰示奖励之微机。夫养士，欲养之以为异日用也，而可徒教以无益之时文哉？是必教之以三纲五常之道，教之以修齐治平之序，而后可也。今天下监司郡守，有能知理道之人，乃于学校之外，创立精舍，讲明义理，意固善矣。而精舍讲道，学校习文，然则学校之士不必知道乎？又不当如此异其趋也。昔先儒程颢有言曰："治天下，以正风俗、养人才为本。宜访经术充备，足为师表，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朝夕相与讲明正学。其道必本乎人伦，明乎物理，自洒扫应对，以修其孝弟、忠信、明善、诚身，以至于化成天下。其学皆中于是者，为成德。取材识明达，可进于善者，使之受其业。"若颢此言，则臣所谓教养之良法也。科目、学校，自是两涂，欲立学校之规，当于科目之外。方今太学舍选，亦与科举并行，固亦此意。然舍选所取，亦惟其文，其所谓行，则坐斋满季，无私过议罚之谓耳。行止如是而已乎？此特蔡京之法也。况太学为然，而天下之学不皆然乎！程颢又曰："择学明德尊者为太学之师，次以分教天下之学。择士入学，县升之州，州宾兴于太学，聚而教之。岁论其贤者、能者于朝。凡选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洁，居家孝弟，有廉耻礼节，通明学业，晓畅治道者。"若颢此言，则臣所谓奖励之微机也。虽然，师儒则每难于择焉。昔仁祖朝，命胡瑗以为太学师，取湖学以为太学法，爰教人以有用之学者也。当时伊川程颐，实在表倡之列，天下士安有不知道者乎？陛下而以道淑天下，取程颢之言以为法，命胡瑗之类以为师，则士无道路之劳，而有教养之惠矣。

臣伏读圣策曰："资荫入仕，与寒畯同升，患其不学，故严程试，近岁浸成文具。若祥符之诏，令于国学习书二年，乃送审官考试；淳熙之议，欲令铨试，本经、法律，各取其半令举，行之可欤？书判之选，唐铨部常用之，至有龙筋凤髓之誉。建隆、天圣，立拔萃科，或于内殿，或于秘阁。朕比以吏道之衰，复书判于吏部，以考狱官

县令之能否，亦唐世与祖宗之旧也，其法可详否欤?”臣有以见陛下欲察任子于未仕之初，而且欲察县令狱官于已仕之后也。臣闻：夫已仕未仕之人，皆当使之知道。苟不知道，则未仕者固无所取材，已仕者又何所取材哉？臣请先以任子言之？方今冗官之弊，全在任子之多。三岁取士仅数百人，而任子每岁一铨，以百余计；积至三岁，亦数百人矣。纵观州县之仕，为进士者不十之三，为任子者常十之七，岂进士能冗陛下之官哉？亦曰任子之众耳。阀阅鼎盛，亲故复多，挟厚赀而得美除，结奥援而图见次，考第未满，举削已盈，寒畯之流，亦安能及？使任子其人皆能才识如吕端，问学如张栻，岂不足以为天下之用？独斯人之不多得耳。身燠锦绮，岂知陛下之民之寒？口饫膏粱，岂知陛下之民之馁？庸者受成胥吏，虐者擅作福威。寒畯生长诗书，明习义理，决不至有是也。臣谨按：《春秋》讥尹氏之世卿，讥仍叔武氏之子弱，则任子之不当有明矣。臣观古人赏曰“世延”，仕曰“世禄”，使之有田禄而已，初非使之世其官也。任子之法起自汉朝，必父兄真知其子弟之有材，然后保任而授之位，非如今之官及则任也。儒者未仕之前，皆知任子之可抑；才玷郎秩，荫可及门，则不复为是言矣。是私也，非公也！为己子之计，故不复以任子为非也！是必为父兄者，如先正之不为子弟祈恩；为子弟者，如先正之自取儒科。不受门荫，则善矣，然而难能也。臣谓任子之恩，朝廷当稍加裁抑，不至冗纷。三岁一郊，少减奏荐之数，每岁一铨，必严考核之法。如祥符之诏，令于国学习书二年，使稍知道，然后如淳熙之议以试之，斯可矣，否则亦文耳。文岂足知任子之贤否哉？至若令录之官，尤当深识道理。使为县令者，常有学道爱人，弦歌为邑之意；为狱官者，常有失道民散，哀矜勿喜之心，则书判虽不试而何害？苟为不尔，虽有龙筋凤髓之誉，徒美观也；虽中书判拔萃之科，亦虚文也。士而能为文章，安有不能书判？此但可以观其曲直是非之识耳！其贪如狼，其苛如虎者，

亦何自而知之哉？虽然，臣犹幸铨闱之试，尚可以惧愚騃之任子；书判之试，尚可以惧庸缪之令录也。抑臣闻之，试则当公，不公则不必试。闻之道路，铨闱固可捐厚赀而得传义，书判亦可先嘱省吏而得案牍也。倘或无之，言之者固无罪；万一有此，闻之者不足以为戒乎？试已非古矣，试而私焉，曷若不试乎？惟陛下察之。

臣伏读圣策曰："贤良之举，祖宗以收魁垒杰特之士，如富弼、张方平辈出焉。自熙宁以试进士策，与大科无异，由是罢之。绍兴、淳熙，追思前宪，下诏复置，而应书绝少，今可复之，茂异之才其出否欤？自绍圣以宏词十二体，取该博华藻之士，比年以来，应选亦稀。朕方患词采之衰，欲令四方人士共兴其习，议者乃谓立法未尽善，何欤？"臣有以见陛下欲复贤良之科，以收魁垒杰特之士，而又欲新宏词之科，以收该博华藻之士也。臣闻：异等大科，皆当知道。苟不知道，名贤良者，固无足观；名宏博者，亦无足观也。臣请先以贤良言之：今世贤良久废不举，盖自淳熙以后无之矣。夫贤良者，所以待非常间出之士也。三岁大比之时所得，恐或常士，于是又设贤良之科以取之。能谋王断国，斯可谓之贤良；能直言极谏，斯可谓之贤良。此名未易当也。熙宁之朝，以贤良与策士无异，由是罢之，盖有深意。自苏轼兄弟以直言对策，简知仁宗，其后立朝，风节坚劲，争论新法，积忤大臣，故当时怒影移木，并贤良之科而罢。然而本朝贤良，知道盖亦可数。如富弼，如张方平，如苏轼、辙，是真贤也，是真良也。奸邪之夏竦，倾险之李清臣，谓之贤良可乎？读人所不知之书，何如知人所共由之道？为世所不能之文，曷若为世所可用之才？千门万户之书，何补于晋之衰？济水帝丘之对，何益于唐之乱？公孙弘之贤良，固不若董仲舒之贤良；牛僧孺之贤良，固不若裴垍之贤良也。贤良今不复试矣，贤良之才，臣不敢诬天下以无人也，但所以取之者，当以其道耳。臣谨按《春秋左氏传》："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而《祈

招》之诗，则不能知，以救楚国之汰。”是知记问之浩博，适足以为玩物丧志也。贤良之策亦始于汉朝，观其策晁、董、公孙之徒，无非问之以谋国之大方，为政之大略，初未尝以隐僻难知之事而策之也。臣记杨万里上书孝宗皇帝，有曰：“孟子之时，去周未远也，而诸侯去周之籍，孟子已不闻其详。孟献子去孟子尤近也，而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则记诵非孟子之所能也。乃若孟子，则有所能矣。孟子曰：‘天之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此孟子之所能也。今贤良之科，不求孟子之所能，而乃求孟子之所不能。”万里此言，则上所以策贤良之道也。程颐亦有言曰：“汉策贤良，犹是人举之，如公孙弘犹强起乃就对；至如后世贤良，则自求举耳。若曰廷对欲直言天下事，则尚可；若志富贵，而得志则骄纵，失志则放旷与悲愁而已。”若颐此言，则下所以为贤良之道也。至若词学之科，其文犹当贯道。文不载道，虽华奚观？文章所以黼黻皇猷，号令所以鼓舞天下，词气萎苶，世道系之，不可不加意也。陛下近者明诏四方，自今三年，省闱别立小词科一试，激昂表厉，陛下可谓得其术矣。但愿陛下力而行之，必有蔚赡之才，出应搜罗之意。谨毋以舍大就小，即易去难，为浮议所摇，方行而复辍也。又既设此科，当寿其脉，倘使真无可取，亦当短中求长，市骨而骏马自来，悦画而真龙必至。苟进取之无阶，则习尚之无益。然臣闻之，异科之才，多负劲气，出而为世用，每不见容。熙宁之罢贤良，盖以苏轼兄弟之故，近时词科之不取士，陛下亦知之乎？亦由前日词臣忤于当国，既已逆其心而拂其意，所以止其身而罢其科，不然，何名存而实废也，惟陛下察之。

臣伏读圣策曰：“右科之设，本以示右武而求韬略，非特校虚文而课骑射也。兵兴累年，未闻慷慨以英略著者，其故何欤？”臣有以见陛下慨念时艰，思欲得武略之士以为用也。臣闻以武设科，虽曰右武，以文求武，反不得人。今之武科，臣得而议之矣。贡荐额狭，

选举路艰，于是以武为捷径，而求为右科之试。能诵兵法者，罕能兼骑射之习；能使弓马者，罕能兼刀笔之长。于是能文者代课七书，能武者代执鞭弭，是无非欺朝廷也。间有能兼二者之长，亦不过苟一时之试，求其英略，宜尔无闻。今之文科，必有五削，而后改京者；今之武举，不出十年，而可至郡守。既登武级，复试文闱，换侵其官，已在通籍之上矣。此天下之士所以指右科为速化，而竞以趋之也。陛下于此方且求其英略焉，可谓按图而索骏矣！寇准器兼将相，非右科也；韩琦、范仲淹才兼文武，非武举也。此犹文士也。岳飞、韩世忠诸将，亦尝自武举中来乎？臣愿陛下以道淑天下之士，毋使人指武举为速化之地，则英略者出矣。

臣伏读圣策曰："遗逸之召，当取人于岩穴，如艺祖之招王昭素，太宗之召陈抟，真宗之起种放，有光简册矣。今日亦未有可副明扬之旨者，抑又何欤?"臣有以见陛下广罗人才，而取遗逸于科目之外也。臣闻：逸民之举，天下归周；幽人之求，民心附汉。遗逸，固有国之所先也。然而不求闻达而后可谓之遗逸，借此以钓名者，非也；不慕荣贵而后可谓之遗逸，阶此以媒进者，非也。汉有樊英，终于败节；唐有藏用，亦至损名。本朝邵雍、常秩，其初亦无大异，审观其后，然后秩伪而雍真矣。其羹藜饭糗，非不欲膏粱也；衣荷制芰，非不愿文绣也。将有所待也！是作伪也，非真隐也！夫治天下者，进恬退之人，固可以风奔竞之士，然而恬退之伪者进，则奔竞者愈竞矣。恬退之伪，奔竞之真也。种放之出，人犹议之，况又不及放者乎？如王昭素，如陈抟，斯可矣。臣愿陛下以道淑天下之心，毋使人以遗逸为捷仕之径，然后诏内之侍从、台谏，外之监司、郡守，举有道之士不事科目者而旌用之，则竞科目、逐利禄者，亦可以少弭矣。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与臣所以奉天对者，已略尽其概，而陛下于其终复策之曰："夫是八者，上之所以求于下，法意之未尽，可商榷

者，固朕所欲闻。若学术才智二者，则下所以应上之求，有关于世道之大。子大夫贲然来思，必不耻于自言，其合而具陈之，毋略。”臣有以见陛下求言之意有加无已，以八者责之己，而以二者责之臣等也。愚臣浅陋，何足以仰承圣问。抑臣之意，则终愿陛下以道淑天下，而不必求之法也。今之法意亦可谓尽矣，而陛下犹以为未尽者，是无乃详于法而略于道乎？今日之患，乃正在于下之求上者，切于上之求下。上之所以求于下者，虽广其路以招延之，亦密其防而检束之，已非求士之意；而下之所以求上者，投牒觅举，肆欺售伪，无所不至，又岂如汉人之自豐哉？是尤非古意也。若是者既皆不以为耻，又岂特耻于自言而已乎？风俗益薄矣，陛下不以道挽而回之，臣不知其后之所趋，又当何如也！然此选举事也。臣观陛下发策大廷，前乎此时，莫非问以当世之大务，独惟己丑、壬辰，不敢深及时政。此则陛下养明于晦之时，而当路忌言之日也，而今亦若是焉。何哉？甚非臣之所望也。臣欲深而言之，则僭；欲隐而不言，则欺。敢因陛下之所及，而略言之，可乎？

圣问之中有“气节”、“言议”之说，臣于今日正不满于是二者，敢以二说为陛下献焉：一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二曰：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何谓“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汤之执中也，曰“立贤无方”；武王之建极也。曰“无偏无党。”是故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后可谓之君子。君子者，未尝有所谓党，而上之人亦不当以党视之。禹、皋叶忠于事舜，而言焉不合，则有吁咈，不苟同也；旦、奭同心于辅周，而事有不可，则或不悦，不诡随也。唐有白居易，不附僧孺，亦不附德裕；本朝有苏轼，不徇熙丰，亦不阿元祐。君子之所自立者如此，若之何而以党视之？小人之欲空人之国者，必惑其君，而指君子以为党。空党锢以危汉，空清流以祸唐，而指元祐臣寮为奸党者，宣靖之时空国而无君子，其祸尤不忍言也。独惟有道之朝，虽倡为朋党之论而不胜。方庆历诸贤之用事也，夏竦等辈，结

内侍蓝元震，上疏谓仲淹、修、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四贤得时，遂引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以报谢当时歌咏之德。仁宗虽不之信，未几诸贤相继皆去，是仁宗之明如此，而小人亦得以行其动摇之术也。独惟仁皇天意终定，浮云暂蔽，白日即昭，循至嘉祐之时，皆用庆历之彦，而成功致治，竟是当时指为朋党中之人。然则君子之党，何负于人之国哉？何代无贤，固有居今之时，义胆忠肝如庆历诸贤者，而或者以“哗竞”、“朋比”目之。陛下本无是心也，臣意必有倡为是论者矣。夫使真“哗竞”，真“朋比”，固可嫉也；第恐以好论国事为“哗竞”，以志同道合为“朋比”耳。夫以好论国事为“哗竞”，则喑默唯阿，辕驹伏马者为是乎？以志同道合为“朋比”，则怀奸相结，根蟠株据者为是乎？此臣之所不能晓也。大概今日之弊，在于用一宰相，则用一般人。一相既去，则凡在其时者，皆指为某相之党而尽去之。非如范仲淹既出，而吴育犹奏行其事者也；非如张浚既罢，而赵鼎犹不变其所用之人者也。去年以庶官而论台谏者有二，前日大臣进拟，其一乃已得衡山之麾，其一则犹絷白驹之谷。得非前日之论台谏者，其台臣已去，故可以擢用；后之论台谏者，其谏臣犹在，故有所妨嫌耶？今之谏臣，心乎体国，则必如彦博之不憾唐介，夷简之不憾仲淹，夫亦何嫌于此！况西蜀之贤，乃其所劾，亦已得郡乎？而乃同罪异罚，一用一舍，臣恐非中道也。中者，非执一之谓也，亦非参用之谓也。元祐调停为祸不细，建中靖国何以为中！陛下至德深仁，矜念远谪。谓除误国殄民之外，并有放令自便之恩，而初议旨执，他皆未及，独惟前日之柄相密党，数人首拜此惠。是得无类于调停以平旧怨者乎？夫其据言路，为宰属之时，陷忠良不知其几，误国殄民，孰有大于此！而首蒙湔濯，臣甚为执事者羞之。臣愿陛下与大臣，自今进退人才，秉执公道；不肖者终身可弃，忠良者一眚不遗；且毋使大夫有西人、东人之讥，毋使天下有蜀党、洛党之说，则人才之气者出

矣。臣故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者，此也。

何谓“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舜闻一善，若决江河；禹闻昌言，下车以拜。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闻，而人有法家、拂士，则出无敌国、外患也。汉有汲黯，淮南为之寝谋；唐有温造，悍将为之堕胆。二鲍可以敛贵戚，一勉可以尊朝廷，直言之有功于人国者如此，上之人安可以轻视之！古之危邦，未尝不箝谏者之口，以自涂其耳目。贺琛之言，未为切直，梁武帝罪之，他日侯景之祸竟无与言；张九龄之谏，可谓忠鲠，唐明皇黜之，他日禄山之变，曾不知觉。泛观史传，如此甚多，不可枚数也。独惟盛时则不若是。仁祖朝士气最盛，直言最多，攻夏竦之枢密，十八疏上，而竟行其言；攻陈执中之宰相，十九疏上，而竟可其奏，叩铜环之呼，事关宫禁也，仁祖虽以是黜仲淹，竟以是擢仲淹；灯笼锦之诋，事关廊庙也，仁祖虽以是谪唐介，亦以是召唐介。仁祖之容养直言者如是。陛下端平初政，天日昭苏，积郁顿舒，久蛰咸奋。谏官论事，御史斥奸；侍从有论思之忠，百官有轮对之直；以至草茅投匦，学校上书，华国直言，何减庆历当时！天下延颈太平，徒以一鉴早亡，诸贤失助，相踵而去，渐已销声。淳祐初年，柄相当国，纯用私党，布满朝端。示缙绅以意，而使之不敢言；扼学校之吭，而使之不敢议。于是直气日销矣。今虽更化，神观未收，噤无能言，萎痹滋甚。泛观士大夫之奏疏，无复我先正之绪余。凡而封事之文，类如举子之策，平平论事，小小立言，惟恐伤时，姑以塞责。臣谓直言之不振，原于直气之久销。陛下责诸臣以先正能言之风，当责圣躬以祖宗受言之事。陛下圣度天广，靡直不容，然而直臣去朝，竟未有如范仲淹、唐介再蒙显用者，得非陛下虽能容其批鳞之直，而终不能无逆耳之厌乎？台谏许以风闻，祖宗自有典故。陛下迩者宸翰乃责其廉访之不真，如必待其真而后言，臣恐自此无言者矣。况其一台臣已去职，其一则犹未至国也，而并罢之，可乎？其逊避再三，久而后就，而臣意其人

必有可言，而恐不见听者。陛下曾不待其一言而去，其为结言者之舌，不亦甚乎？前日台臣之罢，或如圣训之言，然而外议纷纷，则不谓是。咸曰：台臣之仆隶，怒于近幸之貂珰，浸润密行，由此遂去。臣知此事万万无之，第惟台臣未去之先，偶有仆隶交斗之事，是以外议不能无疑。心固不然，迹则相似。万一因循不革，遂长此风，则汉之常侍必横于司隶，唐之中尉必横于南衙矣。陛下固不纵其至此，然亦不可不防其微，杜其渐也。苏轼有言曰："奸邪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又曰："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以奋扬；风采委靡之余，虽豪杰不能以振起。"今日之患，深似此言。臣尝终日废飡，中夜不寐，以为方今事势，盖有莫大之隐忧。火未及然，安于薪寝。所赖朝廷有见远识微之士，必能为陛下陈长虑却顾之谋，而迩日以来，言者畏忌。天下有患，陛下谁与销之！臣愿陛下上法仁祖之盛时，次用端平之初政，广辟言路，旁通下情。言不可从，置之无害；倘或可用，岂小补哉？则人才之言议者出矣！臣故曰：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者，此也。

臣草茅愚生，不识忌讳，忠爱一念，与生俱生。陛下可为忠言，故敢于圣问之外，竭其狂瞽，亦可谓出位犯分矣。大则殛而投之鼎镬，小则退而屏之山林，其甘如饴，九死无悔。虽然，陛下必不然也。陛下自即位以来，未尝以直言罪士，岂以臣一蝼蚁，而累陛下天地之仁哉！第惟臣言，历议弊端，旁忤贵幸，将恐第刘蕡之策者，虽嘉其忠，而不敢进之陛下之前耳。然而臣自幼以来，所学者道，事君之始，安敢不忠？且谀悦以取高科，非臣本志！苟有一语可裨时政，虽黜不恨也。臣固万不及刘蕡，而堂堂天朝，岂唐比哉？臣可以无恐矣！惟陛下矜其愚忠而幸听之，臣不胜惓惓。臣谨对。

评析

宝祐元年癸丑科策问“选举”八事，姚勉首以“臣来自远方，怀忠欲吐，意陛下必策之以当世之务，理乱安危之机，而圣问所及，乃止于此，其虑臣等触时讳而不使之言乎？抑亦虑臣等有待对之帖括，而问其所不备乎？甚非策士本意也”一段话对策问表示了批评。这段话自然显示出姚勉旺盛的政治热情及强烈的现实责任感，然而这里最使我们感兴趣的倒是其中“虑臣等有待对之帖括”一句。“帖括”，唐代科举术语。当时明经一科以帖经试士，考官为了使考生无法事先预作，常选较为偏僻的章句为题，而考生亦针锋相对，把那些生僻幽隐的经文编为歌诀熟读记忆，以应付考试。所以《新唐书·选举志》杨绾上疏云：“故为进士者，皆诵当代之文，而不通经史，明经者但记帖括。”从姚勉的这句话来看，到了两宋，“帖括”大概亦指进士考生为了应付考官，参考往年考题而事先作好的一些文章。“应试教育”的弊端就在于此，“一法立而一弊生”，真可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姚勉的这篇对策，主要是针对策问，批判“选举”的弊病，而我们的评析自然也就以此为重点。至于他在对策最后，针对现实而力献二说：一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二曰奖直言以用天下直气，我们则放在距此仅三年之后的文天祥对策中一并评述。

封建时代的“选举”，是国家选任官吏最重要的途径之一。甚或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选举”制度的日臻完善和确立，才使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赖以延续和存在。然而正如姚勉对策中所云：“科目之诱既设，利禄之习益牢，然后天下之士愈不知所谓道，心术日

坏。""进士可以求仕,则挟书假手者有之矣;学校可以求进,则诡名冒贯者有之矣;世禄之家能学有几,已仕之人可试尚多;贤良惟僻书奥传之观,而道则不知;词科惟奇文丽藻之习,而道则愈暗;武科岂真有山西将帅之学?遗逸则不过为终南捷径之求。"八种"选举"的这些弊端,其实是和封建制度的不公正、不人道、不合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由于此,封建制度终至于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完成了自己寿终正寝的历史使命。不过,作为封建儒生,姚勉根本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从道学的立场出发,他认为防治这些弊端首要的问题应是以道正人心,"使上之人不专以文求天下之士,而专以道淑天下之士,则学术才智之士宜出为国家用矣","以道而淑天下,使天下之士知天爵(语出《孟子》,指道德品性)之可贵,而人爵不足贵;知义荣之可尊,而势荣不足尊。利禄之心轻,则科举之念轻;科举之念轻,不得已而后应科举,则恬退静重之士出,而顽钝无耻之风亦可以少息矣。"这些话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都是对的,似乎也可以施行,然而在阶级社会中,在名利的冲击和腐蚀之下,希望道德去砥柱中流,坚不可摧,显然是理论家坐在书斋中不切实际的空想。因此,我们更为看重的,是姚勉针对"选举"八事而作的那些尖锐的批判。这些几可看作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应为治封建科举史者之必读。下面,我们仅就其中数条略作点评,以"几斑"而见全豹。

进士一科,是唐宋科举制度最为重要的一门,策问也承认"近岁州乡贡举,率多混淆",试图用严格考核,"既送于礼部,又复试于中书"来纠正这一弊端。姚勉的对策则从更深层的意义全面进行了揭露与批判。他指出:由于士不务道,致使文士惟工声病之文,惟习套括之学,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他们雕镌词赋,穿凿经义,目的就是为了打动考官,博取一第。而策论之作,本来是为了求得通达时务的经纶之才,而实际上却是"俪叶骈花,抽黄对白,竞

为纤巧之制，无复深厚之文”。更有甚者，“有平时不稔于文声，一旦忽腾于榜帖，由私径而鬻举，挟厚赀以倩人，公道遂亡，科举遂陋。”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严格考核的姚勉这一科，“都堂复试，已极提防，然虽能察张奭曳白之庸，未能觉温歧潜救之巧。”张奭，唐天宝时御史中丞张倚之子，因舞弊入高等，落第者不服上告，后玄宗亲自复试，奭不措一字，交了白卷，时人谓之“曳白”；温歧，晚唐诗人温庭筠本名，才思敏捷，恃才傲物，考场多为邻铺假手，号日救数人。名利的驱使，甚至都堂复试都有人敢于公然作弊(也许有的就是倚势而为，有恃无恐)，那末其他级别考试的混水摸鱼，滥竽充数也就可想而知了。

门荫制度，是封建科举取士以外又一条任官的主要途径。特别是有宋一朝，为了笼络、收买封建官吏死心塌地为朝廷所用，一些高官重臣的子孙婿戚、门客仆隶，亦可由此途直接入仕。姚勉指出：当今冗官之弊，全在任子之多，“纵观州县之仕，为进士者不十之三，为任子者常十之七。”阀阅鼎盛，亲故复多，挟厚赀而得美除，结奥援而图见次。这些纨袴宵小，身衣锦绮，不知民寒；口甘膏粱，不知民馁。“庸者受成胥吏，虐者擅作威福。”其实，资荫入仕的弊端并非只有姚勉能看得出来，文中有一段话讲得非常真切，“儒者未仕之前，皆知任子之可抑；才玷郎秩，荫可及门，则不复为是言矣。”根本的原因即在于私欲作怪。不知道姚勉入仕之后，是否也真为他所讲的那样“不复为是言”了呢？大概也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吧！

武科之设，本来是为了求得国家干城，然而由于“贡荐额狭，选举路艰”，因此就有人舍难就易，曲线求官，以武科为达升显宦的捷径。姚勉指出：那些参加武科考试的人，能颂兵法者，极少可以能骑善射；能使弓刀者，极少可以兼善文词。于是能文的就请人代执鞭弭，能武的就请人代课七书。通同作弊，蒙混朝廷。一旦侥幸考

中，不出十年，这些人就可以升至郡守一级；然后再转换文秩(两宋有这样的成规)，级别就可以跃升通籍之上。

总上，姚勉在对策中大胆地指出"选举"的痼疾所在，并发忧爱于忠诚，殚精竭虑，勉力补天，一一为其开出医治的药方。今天的读者虽然会认为这些措施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但在当时，却显然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所以这篇对策博得了考官的一致好评，并先后给以"洋洋万言，得奏对体"(初考)；"一笔万言，水涌山出，尽扫拘拘谫谫之习"(复考)；"规模正大，词气恳切，所答圣问八条，皆有议论，援据的确，义理精到，非讲明理学，该博传记者，未易到此。奇才也，宜备伦魁之选"(详定)等评语，真可谓是青眼有加，好评如潮。

(李维新)

宝祐四年(1256)丙辰科

状元: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宝祐四年状元。开庆元年,蒙古军围鄂州,宦官董宋臣劝理宗迁都避之,人莫敢议其非。天祥时为宁海军节度判官,上书"乞斩宋臣,以一人心",不报,辞官归。后稍迁至刑部郎官,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迁尚书左司郎官,累为台臣论罢,除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以草制语讥大奸贾似道,被劾,以37岁致仕。咸淳九年,元军东下,天祥尽散家产,募集义兵,帅万人入卫临安。次年,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出使元军议和,与伯颜抗论皋亭山,被拘,后历尽艰险逃归。端宗即位,复任右相兼枢密使,率兵在福建、广东一带坚持抗元。元至元十五年十二月于广东五坡岭被俘,元军多方利诱,天祥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后被送至大都(今北京),囚禁三年有余,十九年十二月从容就义,年47岁。有《文山先生全集》。

策问

盖闻道之大原出于天，超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实不离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阳阳五行之赜，而实不外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天以澄著，地以靖谧，人极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圣圣相传，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本之精神心术，达之礼乐刑政。其体甚微，其用则广，历千万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浅深，证效有迟速者，何欤？朕以寡昧临政，愿治于兹。历年志愈勤，道愈远，窅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圣之术，咸造在廷，必有切至之论，朕将虚已以听。

《三坟》而上，大道难名；《五典》以来，常道始著。日月星辰顺乎上，鸟兽草木若于下。“九功惟叙，四夷来王，百工熙哉，庶事康哉”。非圣神功化之验欤？然人心道心，寂寥片语，其危微精一之妙不可以言概欤？誓何为而畔？会何为而疑？俗何以不若结绳？治何以不若画像？以政凝民，以礼凝士，以《天保》、《采薇》治内外，忧勤危惧，仅克有济。何帝王劳逸之殊欤？抑随时损益、道不同欤？及夫六典建官，盖为民极则，不过曰治、曰教、曰礼、曰政、曰刑、曰事而已。岂道之外又有法欤？自时厥后，以理欲之消长验世道污隆。阴浊之日常多？阳明之日常少，刑名杂霸，佛老异端，无一毫几乎道，驳乎无以议为。然务德化者，不能无上郡、雁门之警；施仁义者，不能无末年轮台之悔。甚而无积仁累德之素，纪纲治度，为足维持凭藉者，又何欤？

朕上嘉下乐，夙兴夜寐，靡遑康宁。道久而未洽，化久而未成。天变荐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习浮，国计殚而兵力弱，符泽未

清，边备孔棘。岂道不足以御世欤？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欤？夫不息则久，久则征。今胡为而未征欤？变则通，通则久。今其可以屡更欤？子大夫熟之复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详延之意。

对策

臣对 恭惟皇帝陛下，处常之久，当泰之交，以二帝三皇之道会诸心，将三纪于此矣。臣等鼓舞于鸢飞鱼跃之天，皆道体流行中之一物。不自意得旅进于陛下之庭，而陛下且嘉之论道。道之不行也久矣！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然臣所未解者，今日已当道久化成之时，道洽政治之候，而方歉焉有志勤道远之疑，岂望道而未之见耶？臣请溯太极动静之根，推神功化之验，就以圣问中不息一语为陛下勉，幸陛下试垂听焉。

臣闻天地与道同一不息，圣人之心与天地同一不息。上下四方之宇，往古来今之宙，其间百千万变之消息盈虚，百千万事之转移阖辟，何莫非道？所谓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隐于浑沦，藏于未雕未琢之天。当是时，无极太极之体也。自太极分而阴阳，则阴阳不息，道亦不息。阴阳散而五行，则五行不息，道不息。自五行又散而为人心之仁义礼智，刚柔善恶，则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穹壤间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与之相为不息。然则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为之。圣人出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不过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术，以至于礼乐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坟》、《五典》以来，以至于太平、六典之

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秦汉以降，而道始离。非道之离也，知道者之鲜也。虽然，其间英君谊辟，固有号为稍稍知道矣，而又沮于行道之不力。知务德化矣，而不能不尼之以黄老；知施仁义矣，而不能不遏之以多欲；知四年行仁矣，而不能不画之以近效。上下二三千年间，牵补过时，架漏度日，毋怪夫驳乎无以议为也。独惟我朝式克至于今日休，陛下传列圣之心，以会艺祖之心；会艺祖之心，以恭帝王之心，参天地之心。三十三年间，臣知陛下不贰以二，不叁以三。茫乎天运，窅尔神化。此心之天，混兮辟兮，其无穷也。然临御浸久，持循浸熟，而算计见效，犹未有以大快圣心者。上而天变不能以尽无，下而民生不能以尽遂，人才士习之未甚纯，国计兵力之未甚充，以至盗贼兵戈之警。所以贻宵旰之忧者，尤所不免。然则行道者始无验也邪？臣则以为道非无验之物也。道之功化甚深也，而不可以为迂。道之证效甚迟也，而不可以为远。"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也。"之德之纯"，"纯亦不已"。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也。为治顾力行何如耳，焉有行道于岁月之暂，而遽责其验之为迂且远邪？臣之所望于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姑以近事言，则责躬之言方发而阴雨旋霁，是天变未尝不以道而弭也；赈饥之典方举而都民欢呼，是民生未尝不以道而安也。论辩建明之诏一颁而人才士习稍稍浑厚，招填条具之旨一下而国计兵力稍稍充实，安吉、庆元之小获，维扬、泸水之隽功，无非忧勤于道之明验也。然以道之极功论之，则此浅效耳，速效耳。指浅效、速效而遽以为道之极功，则汉唐诸君之用心是也。陛下行帝而帝，行王而王，而肯袭汉唐事邪？此臣所以赞陛下之不息也。陛下傥自其不息者而充之，则与阴阳同其化，与五行同其运，与乾坤生生化化之理同其无穷。虽充而为三纪之风移俗易可也，虽充而为四十年囹空刑措可也，虽充而为百年德洽于天下可也，虽充而为卜世过历亿万年敬天之休可也。岂止

如圣问八者之事，可徐就理而已哉？臣谨昧死上愚对。

臣伏读圣策曰："盖闻道之大原出于天，超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实不离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实不外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天以澄著，地以靖谧，人极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圣圣相传，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本之于精神心术，达之于礼乐刑政。其体甚微，其用则广，历千万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浅深、证效有迟速，何欤？朕以寡昧临政，愿治于兹。历年志愈勤，道愈远，窅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王之术，咸造在庭，必有切至之论，朕将虚己以听"。臣有以见陛下溯道之本原，求道之功效，且疑而质之臣等也。臣闻圣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圣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则道自道，天地自天地，圣人自圣人；合而言之，则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圣人亦一不息也。臣请溯其本原言之。茫茫堪舆，坱圠无垠；浑浑元气，变化无端。人心仁义礼智之性未赋也，人心刚柔善恶之气未禀也。当是时，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阴阳；未有阴阳，先有无极太极；未有无极太极，则太虚无形，冲漠无朕，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体也；既有物之后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体则微，其用甚广。即人心，而道在人心；即五行，而道在五行；即阴阳，而道在阴阳；即无极、太极，而道在无极、太极。贯显微，兼费隐，包小大，通物我。道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下，犹水之在地中。地中无往而非水，天下无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澄著，则日月星辰循其经；地以靖谧，则山川草木顺其常；人极以昭明，则君臣父子安其伦。流行古今，纲纪造化，何莫由斯道也？一日而道息焉，虽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夫圣人体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此道而不息，圣人亦以此道而不息。圣人立不息之体，则敛于修身。推不息之用，则散于治人。立不息之体，则寓于致知以下之工

夫；推不息之用，则显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效验。立不息之体，则本之精神心术之微，推不息之用，则达之礼乐刑政之著。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犹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也。道之在天地间者，常久而不息；圣人之于道，其可以顷刻息邪？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至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圣人之论法天，乃归之自强不息。中庸之道，至于“溥博渊泉”，“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圣人之论配天地，乃归之不息则久。岂非乾之所以刚健、中正、纯粹、精一也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无疆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息。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圣人即不息之天地也。陛下临政愿治，于兹历年。前此不息之岁月，犹日之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岁月，犹日之至午而中。此正勉强行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谓数十年间我之所以担当宇宙，把握天地，未尝不以此道。至于今日而道之验如此，其迂且远矣。以臣观之，道犹百里之途也，今日则适六七十之候也。进于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废；游于途者，不可以中途而尽。孜孜矻矻，而不自已焉。则适六七十里者，固所以为至百里之阶也。不然自止于六七十里之间，则百里虽近焉，能以一武到哉？道无浅功化，行道者何可以深为迂？道无速证效，行道者何可以迟为远？惟不息则能极道之功化，惟不息则能极道之证效。气机动荡于三极之间，神采灌注于万有之表，要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远举，请以仁宗皇帝事为陛下陈之。仁祖一不息之天地也，康定之诏曰：祗勤抑畏；庆历之诏曰：不敢荒宁；皇祐之诏曰：缅念为君之难，深惟履位之重。庆历不息之心，即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心，即庆历不息之心也。当时仁祖以道德感天心，以福禄胜人力。国家绥靖，边鄙宁谧，若可以已矣而犹未也。至和元年，仁祖之三十三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变；碎通天犀，以救民生。处贾黯吏铨之职，擢公弼殿柱之名，以厚人

才，以昌士习；纳景初减用之言，听范镇新兵之谏，以裕国计，以强兵力；以至讲周礼薄征缓刑而拳拳，以盗贼为忧；选将帅明纪律而汲汲，以西戎北虏为虑。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息，则与天地同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祖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尧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仁祖。法仁祖则可至天德，颙加圣心焉。

臣伏读圣策曰《三坟》以上云云，岂道之外又有法欤，臣有以见陛下慕帝王之功化证效，而亦意其各有浅深迟速也。臣闻帝王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尧之兢兢，舜之业业，禹之孜孜，汤之栗栗，文王之不已，武王之无贰，成王之无逸，皆是物也。《三坟》远矣，《五典》犹有可论者。臣尝以《五典》所载之事推之，当是时，日月星辰之顺，以道而顺也；鸟兽草木之若，以道而若也；九功惟叙，以道而叙也；四夷来王，以道而来王也。百工以道而熙，庶事以道而康。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盖无一而不拜帝道之赐矣。垂衣拱手，以自逸于土阶岩廊之上。夫谁曰不可，而尧舜不然也。方且考绩之法重于三岁，无岁而敢息也。授历之命严于四时，无月而敢息也。凛凛乎一日二日之戒，无日而敢息也。此犹可也。授受之际，而尧之命舜乃曰：允执厥中。夫谓之执者，战兢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谓也。味斯语也，则尧之不息可见矣。河图出矣，洛书见矣，执中之说未闻也，而尧独言之，尧之言赘矣。而舜之命禹乃复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间，则其战兢保持之念，又有甚于尧者。舜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是以尧之道化，不惟验于七十年在位之日；舜之道化，不惟验于五十年视阜之时。读万世永赖之语，则唐虞而下数千百年间，天得以为天，地得以为地，人得以为人者，皆尧舜之赐也。然则功化抑何其深，证效抑何其迟欤？降是而王，非固劣于帝者也。太朴日散，风气日开，人心之机械日益巧，世变之乘除不息，而圣人之所以纲维世变者，亦与之相为不息焉。俗非结绳之淳也，治非画象之古

也，师不得不誓，侯不得不会，民不得不凝之以政，士不得不凝之以礼，内外异治，不得不以采薇天保之治治之。以至六典建官，其所以曰治、曰政、曰礼、曰教、曰刑、曰事者，亦无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穷耳。以势而论之，则夏之治不如唐虞，商之治又不如夏，周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以帝者，何其逸？王之所以王者，何其劳？栗栗危惧，不如非心黄屋者之为适也。始于忧勤，不如恭己南面之为安也。然以心而观，则舜之业业，即尧之兢兢；禹之孜孜，即尧之业业；汤之栗栗，即禹之孜孜。文王之不已，武王之无贰，成王之无逸，何莫非兢兢、业业、孜孜、栗栗之推也？道之散于于宇宙间者无一日息，帝王之所以行道者，亦无一日息。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尚可以帝者之为逸，而王者之为劳耶？臣愿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帝王之心。则今日之功化证效，或可与帝王一视矣。

臣伏读圣策曰：自时厥后云，亦足以维持凭籍者，何欤？臣有以见陛下陋汉唐之功化证效，而且为汉唐世道发一慨也。臣闻不息则天，息则人；不息则理，息则欲；不息则阳明，息则阴浊。汉唐诸君天资敏，地位高，使稍有进道之心，则六五帝，四三王，亦未有难能者。奈何天不足以制人，而天反为人所制；理之不足以御欲，而理反为欲所御；阳明不足以胜阴浊，而阳明反为阴浊所胜。是以勇于进道者少，沮于求道者多，汉唐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欤？虽然，是为不知道者儒尝论汉唐言也，其间亦有号为知道者矣。汉之文帝、武帝，唐之太宗，亦不可谓非知道者。然而亦有议焉。先诸君以公私义利、分数多少为治乱，三君之心往往不纯乎天，不纯乎人，而出入于天人之间；不纯乎理，不纯乎欲，而出入乎理欲之间；不纯乎阳明，不纯乎阴浊，而出入乎阳明阴浊之间。是以专务德化，虽足以陶后元泰和之风，然而尼之以黄老，则雁门上郡之警不能无；外施仁义，虽足以致建元富庶之盛，然而遏之以多欲，则轮台末年之悔不能免；四年行仁，虽足以开正观升平之治，然而画之以

近效，则纪纲制度曾不足为再世之凭藉。盖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人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变。世道污隆之分数，亦系于理欲消长之分数而已。然臣尝思之，汉唐以来为道之累者，其大有二：一曰杂伯，二曰异端。时君世主有志于求道者，不陷于此，则陷于彼。姑就三君而言，则文帝之心，异端累之也。武帝、太宗之心，杂伯累之也。武帝无得于道，宪章六经统一、圣真不足以胜其神仙、土木之私，干戈刑罚之惨，其心也荒。太宗全不知道，闺门之耻，将相之夸，末年辽东一行，终不能以克其血气之暴，其心也骄。杂伯一念，憧憧往来，是固不足以语常久不息之事者。若文帝稍有帝王之天资，稍有帝王之地步，一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而晁错辈刑名之说未尝一动其心，是不累于杂伯矣。使其以二三十年恭俭之心而移之以求道，则后元气象且将骎骎乎商周，进进乎唐虞。柰何帝之纯心，又间于黄老之清净，是以文帝仅得为汉唐之令主，而不得一侪于帝王。呜呼！武帝、太宗累于杂伯，君子固不敢以帝王事望之；文帝不为杂伯所累，而不能不累于异端，是则重可惜已。臣愿陛下监汉唐之迹，必监汉唐之心，则今日之功化证效将超汉唐数等矣。

臣伏读圣策曰：朕上嘉下乐云云，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欤？臣有以见陛下念今日八者之务，而甚有望乎为道之验也。臣闻天变之来，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习蛊之也；兵力之弱，国计屈之也。虏寇之警，盗贼因之也。夫陛下以上嘉下乐之勤，夙兴夜寐之劳，怅岁月之逾迈，亦欲以少见吾道之验耳。俯视一世，未能差强人意。八者之弊，臣知陛下为此不满也。陛下分而以八事问，臣合而以四事对，请得以熟数之于前。何谓天变之来、民怨招之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为喜怒者也。熙宁间大旱，是时河陕流民入京师。监门郑侠画流民图以献，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胜捷之图来上，料无一

人以父母妻子迁移困顿，皇皇不给之状为图以进者。览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罪。上为之罢新法十八事，京师大雨八日。天人之交，间不容发，载在经史，此类甚多。陛下以为今日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自献助叠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今尚可谓之不见乎？《书》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尚可谓之小乎？生斯世为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乐。而操斧斤，淬锋锷，日夜思所以斩伐其命脉者，滔滔皆是。然则腊雪靳瑞，蛰雷愆期，月犯于木星，殒为石，以至土雨、地震之变，无怪夫屡书不一尽也。臣愿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为安民之道。则民生既和，天变或于是而弭矣。何谓人才之乏、士习蛊之也？臣闻穷之所养，达之所施；幼之所学，壮之所行。今日之修于家，他日之行于天子之庭者也。国初诸老尝以厚士习为先务。宁收落韵之李迪，不取凿说之贾边；宁收直言之苏辙，不取险怪之刘几。建学校则必欲崇经术，复乡举则必欲参行艺。其后国子监取湖学法建经学、治道、边防、水利等斋，使学者因其名以求其实。当时如程颐、徐积、吕希哲，皆出其中。呜呼！此元祐人物之所从出也！士习厚薄最关人才，从古以来其语如此。陛下以为今之士习何如邪？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则授其句读，择其不戾于时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复焉。及其长也，细书为工，累牍为富，持试于乡校者，以是较艺于科举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车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诏师友之所讲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几何人哉？心术既坏于未仕之前，则气节可想于既仕之后。以之领郡邑，如之何责其为卓茂、黄霸？以之镇一路，如之何责其为苏章、何武？以之曳朝绅，如之何责其为汲黯、望之？奔兢于势要之

路者无怪也。趋附于权贵之门者无怪也。牛维马絷、狗苟蝇营、患得患失、无所不至者无怪也。悠悠风尘,靡靡偷俗,清芬消歇,浊滓横流。惟皇降表秉彝之懿,萌蘖于牛羊斧斤相寻之冲者,其有几哉?厚今之人才,臣以为变今之士习而后可也。臣愿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为淑士之道,则士风一淳,人才或于是而可得矣。何谓兵力之弱、国计屈之也?谨按国史:治平间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马光言:边臣之请兵无穷,朝廷之募兵无已,仓库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愿罢招禁军,训练旧有之兵,自可备御。臣闻古今天下能免于弱者,必不能免于贫;免于贫者,必不能免于弱。一利之兴,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财则交受其害矣。自东海城筑,而调淮兵以防海,则两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复归,而并荆兵以城襄,则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气染于汉水,冤血溅于宝峰,而正军忠义空于死徙者过半,则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实荆,则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应,分而镇抚,则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国之所恃以自卫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国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归之强,则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调度转急。问之大农,大农无财;问之版曹,版曹无财;问之饷司,饷司无财。自岁币银绢外,未闻有画一策为军食计者。是则弱矣,而又未免于贫也。陛下自肝鬲近又创一安边太平库,专以供军。此艺祖积缣帛以易贼首之心也,仁宗皇帝出钱帛以助兵革之心也。转易之间,风采立异,前日之弱者可强矣。然飞刍挽粟,给饷馈粮,费于兵者几何?而琳宫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费,则漏卮也。列灶云屯,樵苏后爨,费于兵者几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饰翠,宫庭之费则尾闾也。生熟口券,月给衣粮,费于兵者几何?而量珠辇玉,幸宠希恩,戚畹之费,则滥觞也。盖天下之财专以供军,则财未有不足者;第重之以浮费,重之以冗费,则财始瓶罄而叠耻矣。如此则虽欲足兵,其何以

给兵耶？臣愿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为节财之道。则财计一充，兵力或于是而可强矣。何谓虏寇之警，盗贼因之也？谨按国史：绍兴间杨么寇洞庭，连跨数郡，大将王瓔不能制。时伪齐挟虏使李成寇襄汉，么与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飞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擒杨么，而荆湖平。臣闻外之虏寇不能为中国患，而其来也，必待内之变；内之盗贼亦不能为中国患，而其起也，必将纳外之侮。盗贼而至于通寇，则腹心之大患也已！今之所谓虏者，固可畏矣。然而逼我蜀，则蜀帅策泸水之勋；窥我淮，则淮帅奏维扬之凯。狼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之，然使之无得弃去，则中国之技未为尽其出下，彼亦犹畏中国之有其人也。独惟旧海在天一隅，逆雏冗之者数年于兹。飓风瞬息，一苇可航，彼未必不朝夕为趋浙计，然而未能焉。短于舟，疏于水，惧吾唐岛之有李宝在耳。然洞庭之湖，烟水沉寂，而浙右之湖，涛澜沸惊，区区妖孽，且谓有杨么之渐矣。得之京师之耆老，皆以为此寇出没倏闪，往来翕霍，驾舟如飞，运楫如神，而我之舟师不及焉。夫东南之长技莫如舟师，我之胜兀术于金山者以此，我之毙逆亮于采石者以此。而今此曹反挟之以制我，不武甚矣。万一或出于杨么之计，则前日李成之不得志于荆者，未必今日之不得志于浙也。曩闻山东荐饥，有司贪市榷之利，空苏湖根本以资之，廷绅犹谓互易。安知无为其向导者？一夫登岸，万事瓦裂。又闻魏村、江湾、福山三寨水军，兴贩盐课，以资逆雏，廷绅犹谓是以捍卫之师为商贾之事。以防拓之卒，开向导之门，忧时识治之见往往如此。肘腋之蜂虿，怀袖之蛇蝎，是其可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发运兼宪，合兵财而一其权，是将为灭此朝食之图矣。然屯海道者非无军，控海道 者非无将？徒有王瓔数年之劳，未闻岳飞八日之捷。子太叔平符泽之盗，恐不如此。长此不已，臣惧为李成开道地也。臣愿陛下将不息之心，求所以弭寇之道。则寇难一清，边备或于是而可宽矣。

臣伏读圣策曰：夫不息则久，久则征，今胡为而未征欤？变则通，通则久，今其可以屡更欤？臣有以见陛下久于其道，而甚有感乎中庸大易之格言也。臣闻天久而不坠也以运，地久而不颓也以转，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中庸之不息即所以为大易之变通，大易之变通即所以验中庸之不息。变通者之久，固肇于不息者之久也。盖不息者其心，变通者其迹；其心不息，故其迹亦不息。游乎六合之内，而纵论乎六合之外；生乎百世之下，而追想乎百世之上。神化天造，天运无端，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天地之所以变通，固自其不息者为之。圣人之久于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天地以不息而久，圣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息而言久焉，皆非所以久也。臣尝读《无逸》一书，见其享国之久者有四君焉，而其间有三君为最久。臣求其所以久者，中宗之心，严恭寅畏也；高宗之心，不敢荒宁也；文王之心，无淫于逸，无游于畋也。是三君者，皆无逸而已矣。彼之无逸，臣之所谓不息也。一无逸而其效如此，然则不息者，非所以久欤？陛下之行道，盖非一朝夕之暂矣。宝绍以来则涵养此道，端平以来则发挥此道，嘉熙以来则把握此道。嘉熙而淳祐，淳祐而宝祐，十余年间无非持循此道之岁月。陛下处此也，庭燎未辉，臣知其宵衣以待；日中至昃，臣知其玉食弗遑；夜漏已下，臣知其丙枕无寐。圣人之运亦可谓不息矣。然既往之不息者易，方来之不息者难；久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难。昕临大庭，百辟星布，陛下之心此时固不息矣。暗室屋漏之隐，试一警省则亦能不息否乎？日御经筵，学士云集陛下之心此时固不息矣。宦官女子之近，试一循察则亦能不息否乎？不息于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内；不息于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彼。乍勤乍怠，乍作乍辍，则不息之纯心间矣。如此则陛下虽欲久则征，臣知中庸九经之治未可以朝夕见也。虽欲通则久，臣知系辞十三卦之功未可以岁月计也。渊蜎蠖濩之中，虚

明应物之地，此全在陛下自斟酌自执持，顷刻之力不继，则悠久之功俱废矣。可不戒哉？可不惧哉？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悉矣，臣之所以忠于陛下者，亦即略陈于前矣。而陛下策之篇终复曰：子大夫熟之复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详延之意。臣伏读圣策至此，陛下所谓详延之意盖可识矣。夫陛下自即位以来，未尝以直言罪士。不惟不罪之以直言，而且导之以直言。臣等尝恨无由一至天子之庭，以吐其素所蓄积。幸见录于有司，得以借玉阶方寸地，此正臣等披露肺肝之日也。方将明目张胆，蹇謇谔谔，言天下事。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发也。陛下胡并与激者之言而厌之邪？厌激者之言，则是将胥臣等而为容容唯唯之归邪？然则臣将为激者欤？将为泛者欤？抑将迁就陛下之说而姑为不激不泛者欤？虽然，奉对大庭而不激不泛者，固有之矣。臣于汉得一人焉，曰董仲舒。方武帝之策仲舒也，慨然以欲闻大道之要为问。帝之求道，其心盖甚锐矣。然道以大言，帝将求之虚无渺冥之乡也。使仲舒于此过言之则激，浅言之则泛。仲舒不激不泛，得一说曰：正心。武帝方将求之虚无渺冥之乡，仲舒乃告之以真实浅近之理，兹陛下所谓切至之论也。奈何武帝自恃其区区英明之资，超伟之识，谓其自足以凌跨六合，笼驾八表，而顾于此语忽焉。仲舒以江都去而武帝所与论道者，他有人矣。臣固尝为武帝惜也。堂堂天朝固非汉比，而臣之贤亦万不及仲舒，然亦不敢激，不敢泛。切于圣问之所谓道者，而得二说焉，以为陛下献。陛下试采览焉。

一曰：重宰相以开公道之门。臣闻公道在天地间，不可一日壅阏。所以昭苏而涤决之者，宰相责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责，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三省枢密谓之朝廷，天子所与谋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于中书，昔人谓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事。国初三省纪纲甚正，中书造命，门下

审覆，尚书奉行，宫府之事无一不统于宰相。是以李沆犹以得焚立妃之诏，王旦犹得以沮节度之除，韩琦犹得出空头敕以逐内侍，杜衍犹得封还内降以裁侥幸。盖宰相之权尊，则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为公道者，非不悉矣。以寅缘戒外戚，是以公道责外戚也；以亦裁制戒内司，是以公道者责内司也；以舍法用例戒群臣，是以公道责外庭也。雷霆发篰星日烛幽，天下于此咸服陛下之明。然或谓比年以来大庭除授，于义有所未安，于法有所未便者，悉以圣旨行之。不惟诸司升补上渎宸奎，而统帅蹿级，阁职超迁。亦以寅缘而得恩泽矣。不惟奸赃湔洗上劳涣汗，而选人通籍，奸胥逭刑，以钻刺而拜宠命矣。甚至闾阎琐屑之斗讼，皂隶猥贱之干求，悉达内庭，尽由中降。此何等虮虱事，而陛下以身亲之。大臣几于为奉承风旨之官，三省几于为奉行文书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景祐间罢内降，凡诏令皆由中书枢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张公道者如此。今进言者犹以事当间出宸断为说。呜呼！此亦韩绎告仁祖之辞也！“朕固不惮，自有处分，不如先尽大臣之虑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谕绎者何说也？柰何复以绎之说，启人主以夺中书之权，是何心哉？宣靖间创御笔之令，蔡京坐东廊专以奉行御笔为职。其后童贯梁师成用事，而天地为之分裂者数世，是可鉴矣。臣愿陛下重宰相之权，正中书之体。凡内批必经由中书枢密院，如先朝故事，则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二曰：收君子以寿直道之脉。臣闻直道在天地间，不可一日颓靡，所以光明而张。主之者，君子责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责；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于沮君子之气，则直道已矣。夫不直则道不见。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于君子，昔人谓之凤鸣朝阳以为清，朝贺国朝，君子气节大振。有鱼头参政，有鹘击台谏，有铁面御史，军国之事无一不得言于君子。是以司马光犹得以殛守忠之奸，刘挚犹得以折李宪之横，范祖禹犹得以罪宋用臣，张

震犹得以击龙大渊，曾觌。盖君子之气伸，则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为直道计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课，是以直道望谏官也；日有轮札，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转对，有请对，有非时召对，是以直道望公卿百执事也。江海纳污，山薮藏疾，天下于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谓比年以来，外廷议论于己有所未协，于情有所未忍者，悉以圣意断之。不惟言及乘舆、上勤节贴，而小小予夺、小小废置，亦且寝罢不报矣。不惟事关廊庙、上烦调亭，而小小抨弹、小小纠劾，亦且宣谕不已矣。甚者意涉区区之貂珰，论侵琐琐之姻娅，不恤公议，反出谏臣，此何等狐鼠辈，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于来和事之讥，台吏至于重讫了之报，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矣。康定间，欧阳修以言事出，未几即召以谏院；至和间，唐介以言事贬，未几即除以谏官。仁祖之所以主直道者如此。今进言者犹以台谏之势日横为疑。呜呼！兹非富弼忠于仁祖之意也！弼倾身下士，宁以宰相受台谏风旨，弼之自处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反启人君以厌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间置看详理诉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余家。其后邹浩、陈瓘去国，无一人敢为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鉴矣。臣愿陛下壮正人之气，养公论之锋。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于霜台乌府中，如先朝故事，则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自古帝王行道者，无先于此也。臣来自山林，有怀欲吐，陛下怅然疑吾道之迂远且概论乎。古今功化之浅深，证效之迟速，而若有大不满于今日者，臣则以为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书，直道不在台谏，是以陛下行道用力处，虽劳而未遽食道之报耳。果使中书得以公道总政要，台谏得以直道纠官邪，则陛下虽端冕凝旒于穆清之上，所谓功化证效可以立见。何至积三十余年之工力，而志勤道远渺焉未有际邪？臣始以不息二字为陛下勉，终以公道直道为陛下献。陛下万几之暇，倘于是而加三思，则跻帝王，轶汉唐，由此其阶也。臣

赋性疏愚，不识忌讳。握笔至此，不自知其言之过于激，亦不自知其言之过于泛。冒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留神。臣谨对。

评析

理宗赵昀实在不是一个好皇帝，他临朝41年，先后以大奸史弥远(理宗是被史拥立，以史为相是无奈)、丁大全、贾似道为相，朝政日非，国势益弱，给度宗留下了一个不堪收拾的烂摊子。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他终于撒手西去之后，南宋的亡国，只不过是计日而待罢了。所以到了元代，那些满脑子道学的史官们在撰修《宋史》时，虽对理宗“首黜王安石孔庙从祀，升濂、洛九儒，表彰朱熹《四书》，丕变士风”的行为不无赞美之意，但也不得不对其“中年嗜欲既多，怠于政事，权移奸臣，经筵性命之讲，徒资虚谈，固无益也”(《宋史·理宗本纪》)给予尖锐地批评。稍微了解一些这一时期的史实，我们就会对宝祐四年——时理宗52岁——丙辰科文天祥的金殿对策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提起文天祥，中国人大概很少有不知道的。他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大义凛然，彪炳日月，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常在人口。然而真正读过他中状元时的这篇对策的人，想来肯定不会太多。天祥中状元时，年仅21岁。据说当日他在集英殿面对策问，文思如飞，奋笔疾书，从早上一直写到未时。洋洋万言，气足理宏，博得了考官的一致赞赏。主试王应麟曾在上奏理宗时说：“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续资治通鉴》174卷，本篇所引史料，除另行注明外，皆出此卷)。读此对策，再联系到文丞相日后的所作所为，其文其词，当知他“成

仁取义”的高风亮节养之有素，实与对策一脉相承。（天祥就义时曾有《衣带赞》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

天祥的这篇对策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就策问侃侃而论，时见警策；后一部分则直陈时弊，略无隐讳。为了使读者对理宗朝的无“道”有更加直接的体认，我们的评析即以后一部分为主。

在开始进献二说之前，天祥首先就“子大夫熟之复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详延之意”作了一番意味深长，话外有话的论辩。他先以“陛下自即位以来，未尝以直言罪士”为一退；然后再以自己有幸面君，自当披露肺肝言天下事，而“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激者，忠之所发也，陛下胡并与激者之言而厌之耶”为一进；接着再引董仲舒“不激不泛”劝戒武帝，而武帝竟“顾如此语忽焉”之事为例；最终归结到自己虽不及仲舒，然所进忠言“亦不敢激，不敢泛”。这番话初看起来极以文人学士舞文弄墨时的故作狡黠，有意炫示文字技巧，然而联系前此理宗先后因直言罢赵汝腾、高斯得、徐霖、李伯玉、洪天锡等人官，造成朝廷“善人尽矣”的所作所为，我们自会对天祥冒险进言，预作防范的良苦用心体会一二。

天祥所进二说，一曰重宰相以开公道之门，二曰收君子以寿直道之脉。这与三年前姚勉所进“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可谓基本相同。然而时移事易，姚勉的忠言谠论于理宗早已如风过马耳，了无影响。三年过后，天祥面对的理宗更是“操炳独断，喜狎佞人”。宦官董宋臣，人称“董阎罗”。他逢迎帝意，引妓入宫，先后为理宗营造梅堂、芙蓉阁、香兰亭。深得理宗宠信。宝祐三年六月，理宗又任用丁大全为右司谏。史载“大全面蓝色，为戚里婢婿，夤缘阎妃及内侍卢允升、董宋臣，得宠于帝。”这些宵小内外勾结，横行朝野，招权纳贿，无所不为，而正臣直士却屡屡

因直斥奸佞而纷纷出朝。天祥谓“人君而至于沮君子之气,则直道已矣”,“比年以来,外廷议论,于己有所未协,于情有所未忍者,悉以圣意断之。不惟言及乘舆,上勤节贴,而小小予夺,小小废置,亦且寝罢不报矣;不惟事关廊庙,上烦调停,而小小抨弹,小小纠劾,亦且宣谕不已矣。甚者意涉区区之貂珰,论侵琐琐之姻娅,不恤公议,反出谏臣。此何等狐鼠辈,而陛下以身庇之!”这些话都有大量事实为根据,决非邀直买忠之空言。宝祐三年六月,有民告董宋臣倚势霸田,监察御史洪天锡下其事于有司,并申劾宋臣及卢允升数恶。理宗一力维护,天锡说:“修内司供缮修而已,比年动曰御前,奸赃之老吏,迹捕之凶渠,一窜名其间,则有司不得举手,狡者献谋,暴者助虐,其展转受害者,皆良民也。愿无使史臣书之曰:‘内司之横自今始’。”疏六七上,理宗均置之不理,天锡只好辞去言职。十一月,吴子聪因其姑女道士知古受理宗宠幸,夤缘得官,授知阁门事,实录院同修撰牟子才缴驳除书,并上奏说:“子聪依凭城社,势焰薰灼,以官爵为市,搢绅之无耻者,辐凑其门,公论素所切齿,不可用。”而理宗却蛮横地回答:“子聪之除,将一月乃始缴驳,何也?可即为书行。”子才据理力争,说:“文书不过百刻,此旧制矣,今子聪录黄,二十余日乃至后省,盖欲俟其供职,使臣不得缴之耳。给舍纪纲之地,岂容此辈行私于其间。”于是理宗不得不让吴子聪改知澧州待次,而子才也被迫离职,出知太平州。

明白了以上,再来读天祥所谓“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比年以来,大庭除授,于义有所未安,于法有所未便者,悉以圣旨行之。不惟诸司升补,上渎宸奎,而统帅躐级,阁职超迁,亦以夤缘而得恩泽矣;不惟奸赃湔洗,上劳涣汗,而选人通籍,奸胥逭刑,亦以钻刺而拜宠命矣;甚至闾阎琐屑之斗讼,皂隶猥贱之干求,悉达内庭,尽由中降。此何等虮虱事,而陛下以身亲之”等语,也决非空穴来风,危言耸听。为此,我们再引述一些史料:淳祐十二年

十一月，罢贤相吴潜，并罗织捏造其“奸诈十罪”，认为潜“如王安石而又过之也”(《续资治通鉴》173卷)。宝祐三年七月，罢左相谢方叔(谢本为庸才，只因得罪了内侍，即有此下场)。董宋臣，卢允升犹未快，又赂人上书，力诋洪天锡，谢方叔，且乞诛之，使天下知宰相、台谏之去，出自(圣上)独断，于内侍无预。”八月，以董槐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董拒绝丁大全的拉拢，并向理宗力陈朝廷三害，于是受到丁大全等奸佞的围攻，地位岌岌可危。为了使我们的评析避免冗长，有关史料暂引至此。

可以这么说，天祥的力献二说，实在已经不是要治本，而是希望能为奸佞弹冠、群魔乱舞的朝廷保留一丝正气，希望国家机器面对强敌能够勉强运作而已！他在对策最后总结道“果使中书得以公道总政要，台谏得以直道纠官邪，则陛下虽端冕凝旒于穆清之上，所谓功化证效，可以立见。何至积三十余年之工力，而志勤道远，渺焉未有际邪？臣始以‘不息’二字为陛下勉，终以‘公道’、‘直道’为陛下献”，“握笔至此，不自知其言之过于激，亦不自知其言之过于泛”。话讲得不能说不直接，不能说不激烈，但是面对已经听不尽宰相、台谏忠言的理宗，他这个小小的还未入仕的状元，又能有多少份量呢？

最后还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就在天祥中状元的第二个月，作了不到一年宰相的董槐又被罢斥。右司谏丁大全弹劾董槐，并敢于在朝廷文告未下之时，半夜调动百余名省兵，剑拔弩张地包围董槐府第。在丁的授意下，省兵迫槐出府，先拉其至大理寺恐吓，接着又把槐驱至北关之外，骄兵嚣呼而散，视国家重臣、朝廷法制如儿戏。这件事虽然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物论大哗，但在理宗的庇护下，董槐被罢 终成事实，而丁大全却依然故我，并最终爬上了宰相的高位。

“宋之不兴，天实弃之！”(方孝孺《读陈同甫上孝宗四书》)难道

不是这样吗?

（李维新）

咸淳七年(1271)辛未科

状元:张镇孙

张镇孙(1235～1279)字鼎卿,南海(今属广东)人。咸淳七年状元,官秘书监正字,校书郎。以与奸相贾似道不合,出为婺州通判。景炎元年,端宗召见镇孙,任龙图阁待制,广东制置使兼经略安抚使。元军陷广州,镇孙被俘。次年自缢,年44岁。

对策

臣对 臣闻帝王之治天下,自积一念之仁始;帝王之仁天下,自积一念之敬始。仁之为道大矣,非敬无以行之。惟无一念而非仁,则有以充其用之大;惟无一念而不敬,则有以极其体之全。故必融乎方寸之微,而后充周乎民物之众;持守于隐微之地,

而后显行于运用之天。究诸其端,亦在乎积之而已。尝观之天,以一元运行无间容息。元而亨,亨此元也;亨而利,利此元也;利而正,正此元也。正下起元而生理,又续之于无穷,万物之囿于其间,其生亦无穷也。使天之生理有一息之间断,则非所谓盛德;万物之生意,有一毛壅阏,则非所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惟积故能日新;富有之谓大业,惟积故能富有。显仁藏用,夫岂一日二日之故哉?其所积者渐也。故仁者造化生物之心,帝王得之以为心。上天生物之仁,犹以积而成;帝王爱民之仁,岂有不积而成乎?《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积此健,所以为天;帝王积此不息,所以为帝王。惟帝王之敬与天同运,斯帝王之敬所以与天同流也欤!臣恭惟皇帝陛下,自天生德,体元长人。临政愿治,八年于兹。固宜薄海内外,无一之不被吾仁矣。犹虑夫泽不下流,治未见效,策臣等于廷,询实惠以及民,盖欲充此仁与极其用之大也。臣愚以为充其大用非难,而极其全体为难。谨摭圣问中治生乎积一语,细绎以对,惟陛下幸垂听焉。

盖天体物而不遗,仁体事而无不在。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一之非仁也。是天日明,及尔出王;昊天日旦,反尔游衍。无一之不敬也。恻忍仁之端,积一念之恻隐,则仁不可胜用;博爱仁之事,积一念之博爱,则仁不可终穷。仁不止于公也,积之无不公,则仁在是矣;仁不止于恕也,积之无不恕,则仁莫近焉。由一念之仁积之,皆可极其用之大。夫仁之全体,非积其一念之敬未易全也。何者?仁者心德之浑全,莫非天理而亦不能无累于人欲。而敬也者,所以克去人欲,而全其天理也。尧、舜性之,固无待于积,而危微精一,犹致谨焉。此尧之钦,舜之恭,所以为圣帝也。汤、武身之,则有待于积矣。故不迩声色,不殖货利,敬以胜怠,义以胜欲,必致戒焉。此汤之敬跻,武之敬用,所以为令王也。故必有尧、舜性之之仁,而后有时雍不犯之仁;必有汤、武身之之仁,而后有子惠安民之

仁。孰谓积一念之仁，不自积一念之敬始乎？洪惟国朝以仁立国。盖自艺祖皇帝陈桥驿一誓，紫云楼一语，对越天地，远辈帝王，社稷灵长，终将赖之。此仁之积可谓厚矣。陛下缉熙有暇，尝谕臣邻曰：艺祖创业垂统，皆自不嗜杀人一念基之。大哉王言！真足以知立国之本矣，抑亦艺祖立心之本乎！乘快指麾，终日不乐，且有为天子易邪之语。战战兢兢，如对日星，如警雷霆，积此敬心以立其体，故能积此仁心以达诸用。凡其不嗜杀人一念，皆敬心积而大之也。至我仁宗抚熙洽之运，此仁之积愈深愈厚。范祖禹所谓："爱人恤物之心，上极于天，下达于地，内则诸夏，外则夷狄，山川鬼神草木，无不及者。"盖至论也。而仁宗所以积是仁者则有由矣。毓德诸宫，不妄言笑，此一敬也；临朝端庄，具有圣度，此一敬也；朝夕奉先，未尝敢怠，此一敬也；至忱所感，以致天应，亦此一敬也。四十二年之间，始终积此敬，故四十二年之间，始终积此仁。体全而用大，非有所积，曷由登兹？越我理考，俪美仁宗。臣观御制《仁厚论》，有以见先帝积仁之大用；又尝拜观《思无邪》、《毋不敬》二铭，有以见先帝积仁之全体。四十二年之积，功深力到，恩厚泽溥。博无穷，施罔极，本一无不敬之心充积之耳。陛下绍休圣绪，亲得心传。乃月正元旦，虑仁心仁闻隔而不通，则拳拳乎戒贪；虹流瑞旦，暴殄庖厨，实所不忍，则拳拳乎戒杀。即此一念已足以追配三圣之仁矣。夫贤才所以辅吾仁也，召而未至，求而未获，仁几于壅；吏治所以宣吾仁也，训而未孚，戒而未革，仁几于间。牧守非不选也，而厚生之仁未溥；贡献非不却也，而益下之仁未周。发义廪，蠲田租，而吏或得以梗吾仁；豁积负，捐赋额，而下未得以沾吾仁。岂仁之用未能积而大之耶？毋亦仁之体未能积而全之也。夫仁之用不难积也，积之一日则有一日之仁，积之一岁则有一岁之仁。日复日，岁复岁，积水以成渊，积土以成山。愈浚则愈深，愈培则愈高。何患其用之不大，特患不能积其体之全耳！有一毛慢易之心，则腐此

仁之体；有一毛非僻之心，则亏此仁之体；有一毛怠忽间断之心，则离此仁之体。陛下燕闲蠖濩之中，幽独得肆之地，亦尝戒谨不睹，恐惧不闻否乎？亦未尝勿贰以二，勿参以三否乎？亦尝在宫如在庙，使民如承祭否乎？孔子告子张以为“仁必先以恭”。告樊迟以为“仁必恭敬”。至于告颜渊以天下归仁之目，必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皆主敬之谓也。是虽圣贤讲学之要，而帝王行仁之体，实不外此。臣愿陛下以先帝毋不敬之心为心，常有以积其敬；复以先帝仁厚之心为心，益有以积其仁。而仁之全体大用，上足以续艺祖、仁宗一脉相传之仁。圣问所及，特仁之余用耳，臣谨昧死上愚对。

臣伏读圣策曰：“厥初颢穹，实生兆民，孰总其群，乃作之君。孰牖其述，乃作之师。君之治之，师之教之。礼乐刑政之由生，与有天下国家者，一是以元元为命脉。凡议论所讲明，政事所设施，罔非为邦本计。夷考载籍，率与天并言之，明威视听，皆自我民，其不可轻者固如此欤！”臣有以仰见陛下念天为民而立居，体天以子民，欲其仁之如天也。神闻乾坤天地之初，屯蒙人物之初，民之初生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不能资之养也，必需之饮食。自其资于养也，爪刚者搏，力强者夺，小者以讼，大者以师，纷然而莫之统一。一有聪明圣智者生乎其间，则天必命之为亿兆之君师。治之而争夺息，道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此天下所以此而归于一人，而礼乐刑政所由生也。礼以分其分，乐以宣其情，刑以防其奸，政以齐其俗，皆所以仁之也。故天下国家以民为命脉，圣人以仁而寿斯民之命脉，一都俞吁咈之间，讲明此仁也。一纪纲法度之立，设施仁也。天祐下民，作之君师，苟不能推广一念之仁，使斯民咸囿并生之中，宁不有负于君师之初意哉？古昔圣人所以惕然加敬畏之心，而不以下民为微贱而忽之，敬天命也。粤稽载籍，言明畏必曰自民。言视听必曰自民。言天畏棐忱，必曰民情可见。言来

绍上帝，必曰畏于民碞。良以民心之所归，即天命之所佑。民只之可畏，即天显之可惠。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惠民所以奉天也。惟天生民，惟聪明时乂，时乂所以奉天也。故尧不畏洪水，而畏昏垫之未安。舜不畏烈风雷雨，而畏烝民之未粒。旱非汤之胃，而栗栗之忧，惟恐涂炭之未拯。大风非成王之畏，而祇勤之心，惟恐蠢动之弗宁。惟其敬心，无日而不存，所以仁心无往而不周。而臣愿陛下积一念之敬而无或懈弛，则能积一念之仁，而无不浛浃矣。

臣伏读圣策曰："三圣传心之要，不越乎执中数语。斯盖万世君师之大纲领。究其指归，则曰非后何戴，非众罔守。然则一中之妙用，同所以为维持固结之道欤？道之出有原，道之传有统，前圣后圣，同一揆欤？"臣有以仰见陛下慕三圣之传心，本一道之无间，欲其仁之如古也。臣闻道之本原出天，圣人之心如天也。尧之命舜自执中，戴后非众罔与守邦，其忧之益深，其言之益切矣。盖中即仁之体，而惟精惟一所以全是仁。先儒胡宏曰：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惟仁者惟能尽性，岂有二道哉？尧得是道，故凡厘百工，熙庶绩，光四表，和万邦，无非此仁。舜得是道，故凡徽五典，穆四门，命九官，咨十二牧，无非此仁。禹得是道，故凡六府孔修，三事允治，万世永赖其功，无非此仁。圣人所以维持固结斯民之心，岂它有操制之术哉。仁之感民者无穷，而民之戴其仁者亦无穷，《书》之所谓守邦，即《易》之所谓守位也。道统之传本无绝续，世变所趋，自有淳漓，统一圣真。武帝非有志于道之君乎？外施之政，终莫掩其多欲，远辈尧舜。太宗非悦慕于道之主乎？劝行之功，卒税驾于末年。此无他，敬心不存。故人欲足以害天理而已。臣愿陛下，积一念之敬，使道心不汩于人心，则能积一念之仁，而与尧舜同符矣。

臣伏读圣策曰："我国家且受天命以奄有九有，列圣代光，绍明大保，人斯无疆。肆我先皇帝，迪畏天显，怀保小民四十一年，跻敬

履仁；用能延洪基绪，式克至于今日。盖其精神心术之妙，融会于六经之奥要语一书，口传面命，其示轨范者在是。朕只遹猷训，行其所知。”臣有以仰见陛下得先帝之心传，欲天下之仁遂行也。臣窃谓三代以来未有如我宋之仁。艺祖仁之原也，仁宗仁之亨也，我理宗仁之利而正也。青阳开动，品物发生，其元之时乎？迅扫五季衰陋之宇宙，抚摩五季疮痍之蒸黎，时则有以开运之元。朱明假大，万有长茂，其亨之时乎？培植丰苗之深根，滋衍蓼萧之厚泽，时则有以畅天运之亨。至于万宝告成，庶物就实，是利而正之时也。人知先帝所以博仁之用者，一利泽之心。孰知先帝所以充仁之体者，一正固之心乎？惟纯乎敬也。故尚贤则始终尚贤，不以不肖参之；布治则始终布治，不以贪黩累之。生欲其厚，则常存爱仁之心；下欲其益，则常持节用之心。荒政当行，田租当减，则此心无少怠；宿逋当贷，课额当省，则此心常如初。凡其所以持敬者，不特一《思无邪》、《毋不敬》之铭而已。四十八箴之首，揭以敬天命，又摭六经之言天，尝编而图之曰《敬天图》。《易》之跋曰："人君动静语默，政化云为，无一非乾。"先帝之心即乾也。《书》之跋曰："人君深知天命之靡常，如能疾敬厥德，则可以祈天永命。"先帝之心即天也。"上帝临汝，无贰尔心"，见于《诗》之跋，由此心无时不在帝左右。"忱之不可掩，忱之毋自欺"，见于《易》之跋，则此心无时不闲邪存忱。至于《周官》之法则，则不徒事文物典章之饰，《春秋》之灾异，则不徒诿列国证应之言，敬之所积如此。其至以其跻敬之心，而为履仁之心，以其迪畏天显之心，而为怀保小民之心，仁固自敬中来也。精神心术之妙，上绍三五之传，密探六经之奥。而要语一书，所以口传面命于陛下者，真尧舜禹之相授受也。陛下忱能端居而念，澡心以思，玩味以细绎，则知《书》之《尧典》曰钦，《易》乾曰忱，《诗》之蔽曰思无邪，《记》之首曰毋不敬，《周礼》之列名度数非繁文，《春秋》之笔削褒贬非纪事，其旨所在，盖与《敬天图跋》同一关

键。臣愿陛下于此而行其所知，则敬虚文而仁皆实惠矣。

臣伏读圣策曰："召故老，求实才，以尚贤也。然召能至，求未尽获，何以致信顺之助？"臣有以仰见陛下虑仁之不能偏爱，而急亲贤之务也。臣闻乌鸢之巢不毁，而后凤凰至，鸣犊之贤不见用，则仲尼临河而返，贤者之去就□□所觇也。陛下自践祚以来，弓旌四出，葑菲不遗，台衮皆在位之贤，薰获无共器之害，□□□□可谓翕合矣。王春之始，都俞庆会。当泰道之既长，思实才之是求，涣颁一札，趣召二老，真情实意，恳切至到。而考槃在涧，生刍空谷，犹未肯□然而起。何耶？进而在列者，弗获以容其用，故退而在野者，宁甘以藏其用耶！窃怪紫囊献替，或禁闼之莫留，白简绳愆，或车轮之难止。沽激者敢于好名，则虽不沽激者，岂敢不卷舌。才高者敢于任气，则虽不任气者，岂敢不韬光。夫人才之在天下，当涵养以翼其成，不当摧沮以速其败；当取其长而弃其短，不当责其备而求其全。先帝诏曰："朕以礼义遇士大夫，以仁厚培养人才，畦积器便，区区惟恐弗逮"。其急于亲贤若此。臣愿陛下积一念之敬，笃信君子勿有一毛厌薄之心，留意人才，每为先时培养之计，则养贤及民仁之所施者博矣。《易》之所谓信顺尚贤而获天人之祐助者，不在兹乎。

臣伏读圣策曰："训守牧，戒贪残以布治也。然训未必孚，戒未必革。何以新治象之观？"臣有以仰见陛下虑仁不能以自达，必饬吏以兴治也。臣闻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舍大恶而谪小过，张纲为之埋轮不行。吏习之秽恶，盖必有所仿也。陛下申饬守令，加惠元元，字民民牧，有训有铭，固宜令百里者皆抚字其人，守千里者皆养育其人。往者王春之始，涣颁奎章，犹虑贪残之相尚，而责监司郡守不先摭实求士，将以庇匿之罪罪之。夫监司者，一路之纲，郡守者，一郡之纲。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有蹇帷纠恶之风，则受财之吏自去，有悬鱼在庭之清，则献馈之丞自惭。今任按察之寄者，或

乏直清之誉，居方伯之任者，鲜闻廉介之称。源则浊矣，何以责流之清？甚而荐剡则立定直，辟剡则责厚报。嫉廉者之不附己，则劾而去之，喜贪者之能奉己，则举而进之，求其不庇匿不可得也。始于小大之相尚，成于上下之相蒙，小吏之贪以锱铢，大吏之贪以钧石，小吏之贪特穿窬之智，大吏之贪乃橐橐之藏。陛下虽有仁心仁闻，谁与达哉。先帝戒贪之诏曰："监司郡守，固望□奉法循理，正己帅下。今若此，复何赖焉？"其严于饬吏如此。臣愿陛下积一念之敬，劝奖大吏以为小吏之倡，禁戢大吏以为小吏之惩，则吏称民安，仁之所及者远矣。《周礼》之所谓布治于邦国都鄙，而亲万民之观听者，不在兹乎。

臣伏读圣策曰："求牧与刍当谨也。既不用□戚，每选用贤良，宜有厚生之政，而未见田里之无愁叹。"臣有以仰见陛下谨选循吏，欲以厚生之政仁斯民也。臣谓欲厚民生，当先戢吏。先王为民设官，有官则有吏，府吏胥徒，庶人之在官者，奉行文书，奔走力役而已。后世始有所谓轻黠吏，有所谓豪恶吏，有所谓深刻吏，尹赏、王温舒之徒，犹能擒制而用之，未有若今日官弱吏强也。盖居官者递迁，而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懵于法，而为吏者舞文法。谬者仰吏，懦者畏吏，贪者资吏，酷者任吏，吏曰可则可，吏曰否则否，据案占位，书纸惟谨，此官所以反听命于吏也。是以政则规成，狱为货宥，虽有循良之吏，果能以身任刍牧之寄乎？陛下用谏臣之言，汰去冗吏为蠹国虑也。盖亦为蠹民虑乎？先帝御笔戒饬守臣，毋纵吏奸为平民害，正虑此也。陛下体《书》之正德厚生，而以敬心行之，则循良用而奸黠屏，田里无愁叹之声，而仁声洋溢矣。

臣伏读圣策曰："竭泽而渔不忍也。既力却贡奉，且禁献羡余，宜有益下之说，而尚闻郡国之有征敛。"臣有以仰见陛下严正征敛，欲以益下之说仁斯民也。臣谓欲知益下，莫先损上。国家取民之法，纤悉不遗，昔以暴赋横敛为非，犹知赋敛之名，今直取之而已。

昔以收大半赋为非，尚有其半也，今直尽之而已。府库金帛皆生民膏血，郡邑官吏鞭捶丁壮，系累老稚，铢铢寸寸以诛求之，以输于帑庾，陛下不可得而见也。南亩之民，黧面涂足，终岁勤动而不厌糠核，陛下不可得而见也。徒吏坐门，叫嚣隳哭，吾民伐桑枣鬻妻子以饱之，愁叹之声载道，陛下不可得而闻之。思复损上以益下得乎？陛下自初即位，止贡奉，却羡余，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无土木营缮之侈，无匪颁赐与之害，天下咸知陛下之俭，日积月累，固宜邦计裕而民力宽。臣来自远方，侧闻奉宸之储瓶罄，大农之积子虚，是果何为而然耶？卮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内，韩琦论减费、浮费自宫掖始，宋祁论三冗、三费终之曰人。不率则不从，衣服醪膳无益旧规，请自乘舆始；珠玉锦绣不得浮费，请自后宫始。先帝因经筵讲易卦有曰："丰亨盛大之时，人主之侈心易生，不可不戒虑此也。"陛下体《易》之损上益下，而以敬心行之，则百姓足，君孰丰不足，郡国无征敛之政，而仁政行矣。

臣伏读圣策曰："义廪之发，将以赈饥，而侵牟或不免。田租之蠲，本以宽赋，而苟取或如故。至若豁诸州之积负，捐版曹之故额，俾纾急绝之扰，深寓省费之实，而民未有惬志，势若中隔，泽不下流，历思之迄未得其说。"臣有以仰见陛下轸忧民瘼，欲无一事之不本于仁，无一夫之不被其泽也。臣窃以为义廪之发，田租之蠲，欲公其利，则臣前所言欲厚民生，莫先戢吏，其说粗可行；积负之豁，故额之捐，欲去其害，则臣前所言欲知益下，莫先损上，其说粗可用。请终言之。自去岁旱涝相仍，民已告歉，今春常寒为咎，阴雨弥旬，谷再种而不入，麦虽秀而不坚，糠核既尽，惟草根木叶是食，民不聊生甚矣。朝廷蠲租发廪，正欲民拜一饱之赐。然常平之积，平时侵牟移易，以虚相付受，至是则乘时消豁者有之矣。幸而有积，则借补欠之说，而官吏瓜分其钱者有之矣。甚而坐视流殍，不肯发廪，并缘支拨，掩其实蠹，吏则肥矣。如民何？田赋之纳，郡邑

预借，或二三年，至是则文具应诏者有之矣。幸而富州大邑至预借，则以畸零当放而欺诳小民者有之矣。甚而包放重催，虚破补解，盗窃府库，欺弄簿书，吏则丰矣。如民何？此臣所谓莫先戢吏是也。诸州积负当豁则豁，仁也。上供之数或不足以供度之需，能保版曹之不划刷乎？冗费未节，而先积负之豁，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也。版曹故额当损则损，仁也。破分未除，或足以贻异时之害，能保州县之不横取乎？浮费未省而先赋额之损，是不节其源而窒其流也。此臣所谓莫先损上是也。先帝御笔令诸州建平籴仓，必命监司严督守臣，使小民无艰食之患。至蠲放水旱田租，必戒守令奉行，以实常赋，取赢于额外，敝租或见于重催，必一一申儆之。陛下倘能以敬行之，则纳己裕人，戢贪惠下，仁意充塞乎宇宙矣。

臣伏读圣策曰："意奉宪者导之未明欤，抑习锢于玩未易递革欤？朕寅念先帝贻谋，常恐羞之，重为之惕然也。"臣有以仰见陛下叹仁道之难尽，思所以光绍先烈也。臣于陛下治生乎积，非可速成一语，愿益加圣心焉。盖积之说有二，有积习之积，有积累之积。人心久玩，吏治久屈，令之不从，惩之而不改，此积习之积。仁之蠹也。力行不息，持敬不怠，有悠久无间断，有缉熙无作辍，此积累之积。仁之基也。陛下忧能体之以心，行之以身，不以未治而自止，不以小康而自务，不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不以小过为无伤而弗改，不以灾异为适然而有忽心，不以祥瑞为美观而有德色，一敬之积愈积而愈厚，则先帝贻谋数世之仁，又自陛下益迓续于万世矣。彼奉宪者，未明训导，为吏者未底廉平，特积习所致尔。一整饬间，气象改观，日变月化，人心之积习，岂不自圣心积累之功有以感之欤？臣窃观圣心，或者未能积其敬也。夫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思虑未萌，知觉不昧，则静而有以养此心。事物既接，品节不差，则动而有以养此敬。今也恐惧于旱涝常寒之警，固知敬矣，悦怿于瑞芝之观，何所积之未纯邪？齐庄于圭壁荐享之时，固知敬

矣，转移于霞光迎导之际，何所积之有间耶？先帝无不敬之心，恐不如是也。臣愿陛下加积累之勤，以充此仁之体而极其全，博此仁之用而极其大，则治虽未可以速成，亦未有积而不成者也。陛下谦虚逮下，所以策臣者亦以勤矣，区区愚忠，亦已历陈熟数于前矣。

至终复策之曰："子大夫博古通今，夙抱经济之蕴，其据经以对，毋有所隐，朕将亲览焉"。臣益见陛下好问之忱，有加无已，必期臣子之尽言也。臣束发读书，粗知有犯无隐之义。幸逢明盛之朝，陛下诏之以毋隐，臣而有隐，是负其所学矣。辄于圣问之终，所谓习錮于玩者，条其玩之说。盖去人心之玩，自去君心之玩始。一曰人言不能玩。苏轼对策曰："天下无事，公卿之言轻于鸿毛，天下多事，公卿之言重于泰山。"夫天下岂无可言之事，而亦有可言之阶，视之为重虽轻亦重，视之为轻虽重亦轻。重则敬心生，轻则玩心生矣。当安平无事之时，犹不可以玩心视之。今何如时哉，水旱盗贼之奏，日陈于前，《无逸》《酒诰》之书，日诵于左，露囊霜简，言言药石，月课风闻，事事箴规，非无敢言之人也。陛下虚心访问，和颜容纳，必精思谛听而审其可否，则言之善者用矣。二曰：天变不可玩。范祖禹奏疏曰："圣人无一日而不事天，天无一日而不祐圣人。"所谓无一日而不事天，以其敬心而事之也。天无一日而不祐圣人者，以其无玩心而祐之也。事天之敬有时而间断，则天必出灾异以警其玩也必矣。人君知其然，故夙夜自儆以畏天之威，右左如在，以在以敬。天之怒犹惧获咎，而况敢逸豫乎哉！今日食于春王三朝，水灾于江浙两淮，玉烛未调而乖气致异，天心之仁爱，端可识也。陛下侧身修行，战兢自持，以我之天会乎天之天，则灾异之来可弭矣。三曰：虏情不可玩。夫夷狄之不仁也犹豺狼，而其恶鸱枭不若也。张采有言曰：鸱鸮不鸣，谓之孔鸾。见其不噬，待以犬马，斯亦过矣。今之夷狄何如哉？和好之使虽来，而骄黠之情叵测；境土之界日蹙，而溪壑之欲难盈。此正鸣噬迫人之秋也。陛下思祖

宗之天下，寸尺不可以与人。鉴女真之世仇，覆辙不可以再蹈。兢兢业业，如大敌在前。兵甲相接，而罔或怠忘焉。臣见廊庙之筹策，为谋既臧，樽俎之折冲，其勇自倍。不然，日愒岁玩，遗患将深。虽有孙吴，无所用之。此犹国家之远虑，古今之通患也。陛下于此尤加之意，而去其积玩之心，则恢复之期有日矣。夫积习之积不可有，积累之积不可无。仁心之不能积而大之者，何也？以其积敬之功未至也。敬心之不能积而全之者，何也？以其积玩之心未除也。忱能去其积玩之心而为积敬之心，勉积敬之心而为积仁之心，天下尚安有不被吾仁者哉。

臣一介草茅，不识忌讳，罄竭忱悃，冒进狂瞽，惟陛下裁赦。臣谨对。

评析

景定五年(1264)十月，那位只会空谈性理的理宗溘然归去，他的侄子赵禥即位，是为度宗。度宗除了接收伯父留下的不堪收拾的烂摊子以外，还接收了一个不世出的大奸相贾似道。由于贾有“定策之功”，所以度宗临朝伊始，就特加贾为太师，封魏国公，每朝必答拜，不呼贾名而敬称“师臣”，百官则尊呼贾为“周公”。咸淳三年二月，又特授贾平章军国事，赐第西湖葛岭。允许贾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并可以治事都堂。实际上贾根本不去都堂办公，朝吏们只好抱着军国文书送到贾府呈署，大小朝政完全由贾的门客廖莹中、府吏翁应龙决断。贾虽然深居府第，骄奢纵欲，可是朝廷大小事务，诸如台谏弹劾、诸司荐辟及京尹畿漕等，不呈告他绝对无人敢于施行。咸淳六年八月，度宗又恩许贾十日一朝，入朝可以

不拜，每当朝退之时，度宗则起身避席行注目礼，一直到贾走出殿庭方才落座。在贾的机诈与淫威之下，正人端士，罢斥殆尽，贿赂公行，贪风大肆。度宗一朝，兵弱于外，匿不以闻，民怨于下，无人敢言，朝政的腐败黑暗较之理宗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咸淳七年辛未科，圣策以“治道时务”为问，实际上已经完全成为虚应故事的纸上文章。可怜那些考生们还要正襟危坐地冥思苦想，战战兢兢，笔笔不苟，希望能以一篇修齐治平的宏文取得一第，为国家而竭尽绵薄。不过，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毕竟只是一次“考试”。朝廷的目的是以文来取士，而作为考生，只要能在策问的规定之下，写出一篇论据充足、广征博引、文理慎密、超出侪辈的文章即可。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状元的对策几乎都可以说得上是优秀的文章。所以我们的分析，大多重视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着眼，很少涉及文章学。因为仅从文的角度分析，容易流于空泛，造成前后雷同，想来读者应会同意我们的这种认识。

自理宗朝大兴道学之后，我们能看到的几篇策问和对策，都是以道学作为指导思想，且在形式上，也已大致形成固定的格局：即开篇总述中心论点，中段阐发圣策诸问，篇末续貂，进献新说。辛未科状元张镇孙的这篇对策，同样也未能摆脱这种套路。

在策问的开始，镇孙首以“积仁积敬”为说。这与前之陈亮的“君道师道”，徐元杰的“帝王之心”，姚勉的“淑天下之士以道”，文天祥的“不息”，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其论点与论据，皆出于圣贤经典，先王史实，自不待言。在针对“时务”的论述中，镇孙分别就如何招贤、饬吏、厚民生、严征敛、赈灾宽赋一一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不无对现实的揭露与抨击，亦时见镇孙的才干与胆识。

在“饬吏”一段中，镇孙谓：“臣闻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舍大恶而谪小过，张纲为之埋轮不行。”“今任按察之寄者，或乏直清之誉；

居方伯之任者，鲜闻廉介之称。源则浊矣，何以责流之清？甚而荐刻则立定直，辟刻则责厚报。嫉廉者之不附己，则劾而去之；喜贪者之能奉己，则举而进之。求之不庇匿不可得也。"从字面上看，这些话自然是指那些按察、郡守之类的朝廷大员。然而弄清楚"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出典，了解一些度宗朝的史实，我们的认识当会更深一层。汉顺帝汉安元年，朝廷选遣八使巡行郡邑，七人受命即行，唯独年纪最轻，官职最小的侍御史张纲在雒阳都亭埋轮不进，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意指当时独擅国政的外戚——大将军梁冀。(《东观汉纪·张纲》)我们知道，贾似道之得势于理宗朝，就是因为他的姐姐入宫后被封为贵妃，深得理宗爱宠。到了度宗朝，贾似道更是独揽朝政，只手遮天。"吏争纳赂求美职，其求为帅阃、监司、郡守者，贡献不可胜计。赵溍辈争献宝玉，陈奕至以兄事似道之玉工陈振民以求进，一时贪风大肆。"(《宋史·贾似道传》)明白了这些，镇孙之所谓"豺狼"、"狐狸"的言外之意，难道还不清楚吗？我们真为镇孙捏一把汗！

在对策的最后，镇孙又力进三说：一曰人言不能玩，二曰天变不可玩，三曰虏情不可玩。按常规讲，"人言"、"天变"云云，对任何一个稍微有些理性的封建君主和执臣大臣来说，应该都不会掉以轻心，置之不理。但是镇孙进言的对象却是耽于酒色，懵懂混日的度宗，是把"与群妾据地斗蟋蟀"视为"军国重事"的贾似道(《续资治通鉴》179 卷)，这又能有什么效果呢？咸淳三年冬十月，大雷电。权中书舍人王应麟上书说："十月之雷，惟东汉数见。命令不专，奸衰并进，卑逾尊，外凌内之相。"结果惹恼了贾似道，很快就被迫致仕。其他如李芾、文天祥、陈文龙、陆达、杜渊等人，稍不如贾似道 之意就被贬官，重则屏弃除名，终身不录。至于"虏情"，这在当时应是关系到社稷存亡的头等大事，然而贾似道却严密封锁消息，向度宗只报喜不报忧。凡是敢于公开报军情，言边事者，大都

难逃贾的毒手。据说一次度宗如梦方醒，忽然问贾似道：有人讲襄阳已被包围三年，应该怎么办呢？贾则从容答对，说："北兵已退。"并追问度宗消息的来源，度宗告诉他是宫中一位女嫔所讲。贾当时不动声色，后来打听明白，竟诬以其他罪名把这位女嫔赐死。看来镇孙的力进三说，在度宗和贾似道眼中，只不过是虚应故事的书生议论罢了，他们又怎么会放在心上呢？

俗话说："大厦将倾，独木难支。"镇孙在当日自然称不上"独木"，在贾似道看来，他大概只能是一株纤弱的草芥，所以他最终总算未被黜落，并荣登榜首，从此步入仕途。而度宗和贾似道这一君一臣（两人可以说是"绝配"）则继续一玩人言，二玩天变，三玩虏情。然而历史却是公正无私、铁面无情的，是任何人都不能"玩"的。两年以后，元军攻破襄阳。次年，大军沿江东下，势如破竹。七月，被贾似道当作傀儡而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度宗一命呜呼，他的四岁儿子赵㬎即位，史称恭帝。而那位"蟋蟀宰相"贾似道，恶有恶报，同年被杀于漳州木棉庵。再过两年，元军攻下临安，恭帝与谢太后被胁北上。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封建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蒙族）政权入主中央，统一了全国。

（李维新）

元

元统二年(1334)甲戌科

右榜状元:同同

同同,元元统二年(1334)甲戌科状元,事迹湮灭无闻。

策问

制曰:古人有言:得天下为难,保天下为尤难。自古持盈守成之君,莫盛于三代。夏称启能敬承继禹之道;殷称贤圣之君六七作;周称成康能致刑措。夫以禹之力而惟启,以文武之德而惟成康。贤圣之君之众,莫若殷,亦不过六七而已。其后惟汉之文景,而言文景之治,犹不得比之三代善继承者,何若斯之难也!我祖宗

积德累世，至于太祖皇帝肇启土宇，建帝号。又七十余年，世祖皇帝始一天下，以致至元之治，厥惟艰哉！顾予冲人，赖天地祖宗之灵，绍膺嫡统，继承 之重，实在朕躬，夙夜兢兢，未获其道。子大夫通今学古，其永启之所以敬承，六七君之所以称贤圣，成康之所以致刑措，其道安在？文景之所以不及三代，其故何由？及今日之所以持盈守成，孰先孰后？孰本孰末？何以致刑措、称贤圣、继祖宗之盛？悉心以对，毋有所隐。

对策

臣对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持盈守成之道，远稽三代，近祖宗，皆非愚臣所能及也。然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臣敢不悉心以对。

臣伏读制策曰：古人有言：得天下为难，保天下为尤难。自古持盈守成之君莫盛于三代。夏称启能敬承继禹之道；殷称贤圣之君六七作；周称成康能致刑措。夫以禹之功而惟启，以文武之德而惟成康，贤圣之君之众莫若殷，亦不过六七而已。其后惟汉之文景，而言文景之治，犹不得比之三代善继承者，何若斯之难也！臣闻自古有天下者，创业至难，守成尤难，何也？天将有以大奉而王天下，必先使之勤劳忧苦，涉险蹈阻，功加百姓，德泽及四海，然后授之大宝，以为天下之谊主。是故人之情伪、事之得失、稼穑之艰难、前代之兴废，靡不历览而周知。盖操心常危而察理也精，虑患常深而立法也详，故能平一四海而无不致治者。守成之君兢兢业业，恪守先王之宪章，犹惧不治，况自深宫而登大位，习于宴安不复知敬畏，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便佞日亲，师保日疏，声色货利，游畋

土木与夫珍禽异兽，所以惑志而溺心者，不可胜数。管仲所谓宴安鸩毒是也。苟非刚明而大有为者，讵不为其所动。其间间有足以有为之资，则其颂功德、称太平、奏丰年、献详瑞者，投间抵隙，接踵于朝廷。于是志骄气盈，穷兵黩武，以祖宗之法为不足法，好大喜功，纷更变□，至失厥位而坠厥宗者，比比又如此。是故禹、汤、文武大圣也，自累世积德而有天下至难也，以天下相传，大事□□，能继禹之功者惟有启，承文武之德者惟成康，圣贤之君之于汤殷六七而已。以圣人有天下，能继其后者止如此。能□文景继高帝之治乎？由此言之，继世之君有能持盈守成而不废先王之道者，可谓难也已。《诗》曰：不衍不忘、率由旧章。《书》曰：监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此之谓也。

臣伏读制策曰：我祖宗积德累世，至于太祖皇帝肇启土宇，建帝号。又七十余年，世祖皇帝始一天下，以致至元之治，厥惟艰哉！顾予冲人，赖天地祖宗之灵，绍膺嫡统，继承之重，实在朕躬，夙夜兢兢，未获其道。臣惟我国家积德千万世，与天无疆。至太祖皇帝受明命，兴王基，建帝号于朔方。又七十有余岁，世祖皇帝圣德□□□□□天下，以成至元之盛治，王业之成□□难也。□□□□□□之重。托之□□□□□□□□，臣□□□□□□□□□□□□□□□□□□□□□皇帝陛□□□□□□□□□□□□□□□□□□□□□□艰□□之备尝，□数在□□□□□□□□□□□□□□心之所归。讴歌者咸曰：吾君之子也。□□者咸曰：吾君之子也。先帝之所顾命，慈极之所眷注，□王之所推崇，股肱大臣之所翼戴，陛下其时邈在□烟瘴雨之乡，夫岂有黄屋左纛之念哉。昊天成命，默定于苍苍也久矣。推之而不可推，辞之而不可辞，飞龙在天，□□□□□□□□□□□□□圣作物睹，天下皆以至元之治，复望于今日，陛下所以汲汲有为，以副天下之望者，当如何哉。制策有谓：夙夜兢兢，未获其道。臣读至此，顿首称贺，有以见陛下谨持盈守成

之心矣。充此心而力行之，行之不已，而求其至焉。虽禹汤文武无以过也，又岂有不获者哉。《诗》曰：夙夜匪懈，《书》曰：懋哉懋哉，此之谓也。

臣伏读制策曰：子大夫通今学古，其求启之所以敬承，六七君之所以称贤圣，成康之所以致刑措，其道安在？文景之所以不及三代，其故何由？及今日之所以持盈守成，孰先孰后？孰本孰末？何以致刑措、称贤圣、继祖宗之盛？悉心以对，毋有所隐。臣学不足以考古，识不足以通今，□□□□何足以及此而切有志焉。尝闻□□□□□□□□□治天□□□□□□□□继之，何敢加毫末□□□□过存□□□□□□□□昔启之继□□□□□□□□□敬承□□□皆禹之旧臣相与辅□□□□□□尊亲而礼任焉，故能继其道而不废，□□□□□□可顾。又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所以敬承者此也。陛下以是□□□之敬承之道，无以加矣。臣闻大甲嗣汤伊□□阿衡而告戒启沃者，无非成汤日新之功，大甲能守之，继是者能行之，所以继治。《书》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又曰：顾諟天之明命，贤圣之所以继作者，此也。陛下以是力行之，六七君之称贤圣不得专美于商矣。臣闻成王继文武之位，周公作礼乐行王政，成王克遵文武之德，康王又克守之，教化大行，刑措不用。《书》曰：庶狱庶慎。又曰：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春水。成康之所以致刑措者，此也。陛下以是而力行之，则刑措矣。臣闻治天下莫大于仁政，而仁政莫先于教养。故三代之相承也，莫不制田里教树畜，命训迪之官任敦典之责，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民知礼义而不犯法，然后刑罚辅之，以正其不正者耳，无非先德教而后刑罚也。汉高帝得天下，秦俗未尽革，专刑威而弃教化，不事诗书，不尚节义，何以为子孙法？文帝继其后，其恭俭慈爱虽足以化下，然贾谊劝其兴礼乐行仁义，则辞曰未遑。景帝忠厚之风又不及文帝。文景虽曰能守成，仅能守汉之成宪耳！何敢比隆于三代

乎？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由此观之，德礼本□□也，刑政末□□□□□□宜后也。陛下先其本后其末，德教化行礼乐兴，由之而致刑措，由之而□□□□□，而继祖宗之盛，□□□□□□，臣切观祖宗所积之□□□之德，祖宗所成之□□□禹之功，圣圣相承、以继□盛治，不特如殷之六七君之贤圣。陛下持盈守成，亦继志述事而已矣。承悦慈极、尊任师傅、博求贤能、修明庶政，进敦笃、退浮华、谨访问、纳规谏，以天下之耳目为之视听，以天下之心志为之思虑。万国至广也，吾为天地以容之；万民至众也，吾为日月以照之。人之所欲者安也，吾为行仁政以安之；人之所欲者富也，吾为崇节俭以富之；人之所欲者寿也，吾为隆教化兴礼让，使之趋善远罪以寿之。立经陈纪，不以小有故而沮挠；发号施令，不以小利钝而变更。次第而行之，强力以守之。念祖宗之勤劳，致王业之不易，慎终如始，必其成功。心即祖宗之心，治即祖宗之治。将见功高大禹，德并文武，日新又新，同得成汤。保天下之事备矣，持盈守成之道至矣。

臣愚戆，不足以奉大对，惟陛下财择。臣谨对。

评析

蒙古以游牧民族崛起北方，灭金亡宋，建立元朝，不重儒术，遂废除科举制度。至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始恢复科举，并指定以程朱学派的经典注疏为依据，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别命题，前者为右榜，后者为左榜，故每科皆有右、左两榜状元。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罢科举，到至正二年(1342)始恢复。故有元一代，仅有16次科举，计32位状元。

元文宗元统元年癸酉科取进士100人，号称得士。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元末殉难者多进士》中列举的15人，该科就有余阙、李齐等5人。次年三月廷试，右榜状元为同同，左榜状元李齐。

同同的这篇应对文章颇有特色。

一是朴实。作为一个蒙古人，同同没有一般汉人文士的毛病，为文实实在在，御试策问怎样发问，他就怎样回答；御试策问问几个问题，他就回答几个问题。在结构文章时，他一般是先引录皇帝制策，然后再根据制策进行回答，而且引录的制策也是一字不漏，全文照登。在回答问题时，他行文也很朴实，不过分运用虚比浮辞，不过于追求怪涩文风，以能使文意显豁、层次清晰为原则。所以，整个文章给人留下了质朴厚重的印象。

二是短小。和朴实的文风相一致的，是他的文章篇幅相对短小。这当然得益他为文的老实；也得益于他的行文原则。这样的对策文章如果让那些惯会舞文弄墨的汉族文士写来，洋洋洒洒数千字恐怕都会收束不住，同同却用了很短的篇幅就回答完了全部的问题，且总的看来，结构很完整，层次也较有条理，文体程式也很符合规则。所以，短小并不是同同文章的弱点，而是一大特色。

同同的文章精炼集中、朴实无华、行止有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的文章风格。

（苗菁）

左榜状元：李齐

李齐（1301～1353）字公平，广平（今河北永年）人。幼时家贫，但聪睿好学。元统二年高中汉人、南人榜进士榜首，成为元代第七位左傍状元。按元制，李齐被授为正七品官，初任河南淮西廉访司事，后调任高邮知府，颇有政绩。元末张士诚据泰州起事，攻陷高邮等地。李齐受朝廷派遣招降，被张士诚杀死。

策问

制曰：朕闻《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盖事必师古，帝王之所尚也。昔之有天下者曰皇、帝、王、霸，夫其位同，有庙社臣民同，爵禄废置生杀予夺之柄同，独其为号不同。然则曰皇、曰帝、曰王、曰霸，其名义可得而知乎？治天下者，为其事必有其

功，载之简册，垂之来世。尚矣，《三坟》之书。少昊、颛顼、高辛氏之典湮灭无传，其事功亦可考而有征于今乎？唐虞以下载籍虽存，亦可以尽信而无疑乎？临乎亿兆之上，必有为治之道，始终持循，以成一代之理。皇、帝、王、霸其为道同乎？不同乎？《传》曰：为政以德。盖必行道，有得于心，然后可措诸政。皇、帝、王、霸之德，其浅深纯杂亦可得而言乎？君心出治之原也，皇帝王霸其心之微，亦可得而见乎？是皆朕之所欲闻也。子大夫修业于家殆有年矣，兹故详延于廷，以询所蕴。《书》曰：今民将在祗述乃文考。又曰：别求闻由，古先哲王。朕仰荷天明，承累圣之丕业，兢兢图治，其法祖宗者，固不待谋之子大夫矣。等而推之，皇、帝、王之心、之德、之道，何者可师？何者可取？其悉陈之，以副朕之虚伫。近世儒者以皇、帝、王、霸分而比之春、夏、秋、冬，然而其所以为皇、帝、王、霸者，将犹气之周流于一岁，适然而然，初无系于向之云云也乎？天道循环，由贞而元，理之必至。苟以四时方之，则秦汉而降，固可以配皇、帝、王、霸而班之否乎？子大夫其为朕索言之，朕有所鉴焉。

对策

臣对 臣闻元亨利贞，天之道也。皇、帝、王、霸，世之运也。夫世运虽有皇、帝、王、霸之不同，然而一元之气流行于天地之间者，则无时而已也。钦惟皇帝陛下，龙飞之初，兢兢图治，又进臣等于廷，询以帝王之所尚，与夫皇、帝、王、霸事功之著，心术之微，且谆谆于皇、帝、王之心、之德、之道，俾臣等悉陈之。臣草茅微贱，凡圣问所及者，皆非愚臣之所能知也。臣尝读世祖皇帝中统建元之诏，有曰：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夫元者，天地生物之

心也。天运循环，世纪为元。洪惟圣朝以元纪号，默契大易先天之旨，施之经世，又合邵子皇极之言。由一元而推之，至于十二万九千六百之数，万亿年无疆之休。臣敢不精白一心，以对扬天子之休命。臣谨俯伏以对。

臣伏读制策曰："朕闻《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盖事必师古，帝王之所尚也。昔之有天下者，曰皇、帝、王、霸，夫其位同，有庙社臣民同，爵禄废置生杀予夺之柄同，独其为号不同。然则曰皇、曰帝、曰王、曰霸，其名义可得而知乎？治天下者，为其事必有其功，载之简册，垂之来世。尚矣，《三坟》之书。少昊、颛顼、高辛氏之典湮灭无传，其事功亦可考而有征于今乎？唐虞以下载籍虽存，亦可以尽信而无疑乎？"臣有以见陛下深知皇、帝、王、霸名号不同，然必求诸事功，考诸载籍，而后有以明之也。臣闻傅说之告高宗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故君子所以多识前言往行者，将以畜其德。而帝王之所尚者，亦必以师古为先也。昔之有天下者，曰皇、帝、王、霸。夫皇之所以为皇者，犹天道之春生也。帝之所以为帝者，天道之夏长也。王之所以为王者，天道之秋成也。至于霸，则以力假仁而已矣。虽其庙社臣民、爵禄废置、生杀予夺之柄同，而霸者之心则与皇、帝、王不可一例而论也。其名义之所以不同者，盖以道化民者谓之皇，以德教民者谓之帝，以功临民者谓之王，以力假仁者谓之霸。其事功之著，则《三坟》不可得而详矣。然而伏羲氏始画八卦造书契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以代结绳之政，而民始知所从。神农氏作为耒耜以教民稼穑，而民始知所本。黄帝氏定上衣下裳之制，兴宫室舟车之利，而民始有常度。此皇之所以为皇，盖以道化民者也。皇降而帝，于是少昊、颛顼、高辛氏兴焉。其官名之善，历数之精，后世继述焉。至若尧之□象日月星辰，而致庶绩咸熙之效。舜之命官资牧，而成恭己无为之治。此帝之所以

为帝，盖以德教民者也。至若禹之不矜不伐、汤之克宽克仁□□□文王之征柔懿恭，武王之垂□□□□□□□□□□此王之所以为王也。□□□□ □□□□□□□□□□楚庄修术，齐桓修才，邵陵之师□□矣。其实则以力而不以德，知功利而不知道义，此霸之所以为霸也。皇、帝、王之迹虽若不同，其心则一而已。由是而论，则唐虞以下，典籍所载亦可信而无疑矣。此即陛下所谓为其事必有其功，载之简册，垂之来世之意也。

臣伏读制策曰："临乎亿兆之上，必有为治之道，始终持循而成一代之理，其为道同乎？不同乎？《传》曰：为政以德，盖必行道，有得于心，然后可以措诸政。皇、帝、王、霸之德，其浅深纯杂亦可得而言乎？君心出治之原也，皇、帝、王、霸其心之微，亦可得而见乎？此皆朕之所欲闻也。"臣有以见陛下深知皇、帝、王、伯之心不同，将合皇、帝、王之治，而成一代之盛治也。臣闻有是心必有是道，有是道必有是治，治本于道，道本于心者也。盖皇、帝、王所传之道虽一，皇、帝、王为治之迹则殊。迹之殊者，时之异也。道之同者，心之一也。其始终持循以成一代之理者，初岂外于此心也哉！较之伯者，其浅深纯杂不待言而明矣。若夫心术之微，则臣请得而言之。尧之克明峻德，舜之兢兢业业，禹之不矜不伐，汤之克宽克仁，文王之纯亦不已。莫非以是心而行是政也。彼□□□盛者，莫桓文若也。然而邵陵之师、城□之战不过急功利而已耳。此所以卒不能如汤武之仁义也。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伯假之也。此即陛下所谓为政以德，盖必行道，有得于心，然后可以措诸政，□□□□

臣伏读制策曰："子大夫修业于家殆有年矣，兹故详延于廷，以询所蕴。《书》曰：今民将在祇述乃文考。又曰：别求闻由，古先哲王。朕仰荷天明，承累圣之丕业，兢兢图治，其法祖宗者，固不待谋之子大夫矣。等而推之，皇、帝、王之心、之德、之道，何者可师？何

者可取？其悉陈之，以副朕之虚伫。”顾臣愚贱，何足以知此哉！臣闻君天下之道，在法古以通今而已。欲法乎古，则皇帝王之心法所当讲也。欲通乎今，则世祖皇帝之成宪所当法也。夫法祖宗者，固不待谋之愚臣，臣亦不敢不为陛下言也。《书》曰：今民将在祗述乃文考。此即法祖宗之意也。又曰：别求闻由，古先哲王。此即取法于皇、帝、王之意也。况我世祖皇帝建国纪元之意，即天道一元生物之心乎？陛下仰荷天明，承累圣之丕业，兢兢图治，是亦帝王之用心也。臣愚以为法皇、帝、王以致治，亦惟法祖宗而已。何者？祖宗之治即皇、帝、王之治也。等而推之，皇、帝、王之心、之德、之道，臣又请得而僭言之：精一执中，建中建极，帝王之心也；钦明文思，恭敬宽仁，帝王之德也；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帝王之道也。有是心则有是德，有是德则有是道，其取而法之，在陛下力行□□□□君心出治之原者，盖陛下深□□□□□有此言也，心法之传，在陛下矣。彼伯者之事，何足以渎圣听哉！陛下之问及此，故臣敢肤列以明世运之不齐。然而皇、帝、王之道，则亘古今而不易也。臣前所谓迹虽异而心则一者，此也。

臣伏读制策曰：“近世儒者以皇、帝、王、伯分而比之春、夏、秋、冬，然则其所以为皇、帝、王、伯者，将犹气之周流于一岁，适然而然，初无系于向之云云也乎？天道循环由贞而元，理之必至。苟以四时方之，秦汉而下固可以配皇、帝、王伯而班之否乎？子大夫其为朕索言之，朕将有所鉴。”臣闻先儒邵子于阴阳消长之理，固已默会于心矣，故其为《皇极经世书》也。以日月星辰为元会运世之本，以皇、帝、王、伯为《易》《书》《诗》《春秋》之体，且谓《易》该皇、帝、王，《书》该帝、王、伯，《诗》该王、伯，《春秋》纯乎伯，譬如寒暑昼夜之不齐，乃所以为齐也，初岂适然而然，无系于向之云云也乎。？天道循环，由贞而元，理之必至。唐虞以下若秦者，固不足言矣。汉唐之事纵有可观，然而伯王之杂，心术之偏，君子无取焉，臣是以不

敢为陛下言也。臣之拳拳者，惟曰法皇、帝、王之为治，亦惟体世祖皇帝春秋正始之言，大易乾元之旨而已矣。况天运为元，圣德日新，其所以基鸿业无疆之休者，又自陛下始也。愚臣谨俯伏以奉明诏，陛下策臣之□□有献焉。夫敬者，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根柢，帝王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书》曰：钦明文思。此敬也。又曰：惟天无亲，克敬惟亲。亦此敬也。陛下以一心而制万化，惟天惟祖宗之寄，择不出乎一敬而已。如是而加乾健不息之功，缉熙圣学之力，则可以四三王，可以六五帝，比屋可封之俗，黎民于变之风，将复见于今日矣。猗欤！今此陛下之心，天下之福也！

圣策曰："昔之有天下至可以尽信而无疑乎？"臣伏见陛下之心，欲有以考乎皇、帝、王霸名义事功之实者也。臣闻皇、帝、王霸之有天下也，其君万邦而制六合者，固未尝不同。然皇以道，帝以德，王以功，霸以力，其所以然者不同，则其见于名义者，又安可得而同也哉！坟典之书虽有不传，然自今观之，伏羲之造书契以开人文，神农之作耒耜以教稼穑，黄帝之垂衣裳而治天下，其事功之见于《易》者可考也。皇降而帝，少昊、颛顼、高辛之世，虽损益不同，而制作未备，时□□□□比屋可封，而黎民于变，南面听治而恭已□□□□□王。禹平水土，祗承于帝，汤革夏命，克绥厥猷；文谟武烈，并受丕基。此帝王之事功见于《诗》、《书》者，又可考也。王降而伯，世道日微，齐桓、晋文辈出迭为盟主，虽能攘夷狄以尊中国，而功烈之卑不过以力服人而已，故见之于治□□□□□□者之名义事功，臣不敢屑屑为陛下道也。

圣策曰："临乎亿兆之上，止是皆朕之所欲闻也。"伏见陛下之心，欲有以考乎皇、帝、王、霸之道德心术之微也。臣闻圣人之治本乎道，圣人之道本于心，古之圣人所以临亿兆之上而成一代之治者，孰有加于此心哉？孔子曰：为政以德。孟子亦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无非明此心以为出治之原也。故三坟同一

大道，而三皇之心一。五典同一常道，而五帝之心一。禹之执中，汤之建中，文王之视民如伤，武王之不泄不忘。而三王之心一，故其道无不同。其见于治者虽有道德功力之殊，施于民者虽有教化劝□之异，盖亦时为之耳，非其心之有异同，而德之有深浅也。至于霸者之心，则异于是。孔子曰：齐桓正而不谲，晋文谲而不正。孟子亦曰：以力假仁者伯。皆指其心之微而言之也。由其心之不正，是以见于道德皆无焉。此伯者之道德心术，臣亦不敢屑屑为陛下道也。

圣策曰："子大夫修业于家，至以副朕之虚伫"。臣至是伏见陛下之心，祖宗之成宪，而□□之帝王之盛治。至于伯者之事，则非圣□□□□□□□□□□□□□□□□□□□大□□□□□□□□□□□□□□□□□□□世□□□□□□□□□□□□□□□□□□□累□□□□□□□□□□□□□□□□□□□陛□□□□□□□□□□□□□□□□□□□天明□□□□□□□□□□□□□□□□□□大位□□□□□□□□□□□□□□□□□龙飞一诏，诞颁四方，首遵世祖皇帝先皇帝成法，务在必行，毋为文具。此法祖之盛心也。臣以为祖宗之心即皇、帝、王之心，祖宗之道德即皇、帝、王之道德，陛下欲法帝王，惟法祖宗，法祖宗则可以至天德。行皇道而皇，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顾所行如何耳。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其是之谓欤？臣草茅愚钝，学不能以稽古，才不能以通今，何足以副陛下虚伫□□区区之心，惟欲陛下法祖宗而已。

圣策曰：近世儒者至朕将有所鉴，臣闻世道之有升降，犹天道之有推迁。故近世邵雍著《皇极经世》之书，以皇、帝、王、伯分配之春、夏、秋、冬，而有元会运世之说，此以天人合而论之也。然以臣愚观之，虽曰世变之不同，然亦莫非人事之所致，故有能行帝王之道于五伯之时者，是亦帝王而已矣。民彝天□□□□□□□上之

人不能作兴之耳。自秦而降，汉唐英辟虽能致一时之小康，终不能行帝王之大道。臣虽欲索而言之，恐不足上渎圣聪。臣愚惟愿陛下当春秋方富之时，人心望治之日，心祖宗之心，法祖宗之法，端一心以为出治之原，谨一心以为万化之本。而又辟奎章之阁，设经筵之官，俾万几之暇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寺臣妾之时少，涵泳圣德，保泰圣躬，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由是而推之，则道可以配三皇，德可以迈五帝，功可以过三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者矣。臣涓埃之诚，谨以心之一语始终为陛下献。伏惟陛下留意，则非惟天下之幸，抑亦祖宗之望也。臣谨昧死上愚对。

评析

元代元统二年(1334)甲戌科考试汉人南人的御试策就好像是一道知识题，它是关于“皇、帝、王、霸”尊号意义的一道试题。李齐在对策中以制策的提问顺序为结构层次的先后，从容应对，显出了他治学宏博、知识全面的特点。同时，在行文时，他又注意唯制策之言辞是从，采用“注六经”的方法依题义而一一阐释、发挥，决不敢有所逾越。如此，又使他的文章较为严谨紧凑，不至出现“跑题”的现象。最后，他文章中的言辞也较为平易，没有奇险的对句、华丽的辞藻，一切都朴实简要，这样，也使他的文章和整个元代的朴实文风趋于一致，能够为时人所激赏。

(苗菁)

明

洪武四年(1371)辛亥科

状元:吴伯宗

吴伯宗,名祐,字伯宗。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洪武四年辛亥科状元。他是明朝的第一位状元。初授礼部员外郎,参与编撰《大明日历》,因不肯依附权相胡惟庸,被贬谪凤阳。后明太祖召他进京,命他出使安南(今越南),不辱使命而回,授官国子监助教,进讲东宫,为皇太子朱标讲解经义。最后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后因其弟牵连降为翰林院检讨。卒于官。

策问

制曰:盖闻古先帝王之观人,莫不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汉之贤良,宋之制举,得人为盛。朕自临御以来,屡诏有司搜罗贤俊,然而杰特犹若罕见,故又特延子大夫于廷而亲策之,以庶几于古先帝

王之盛节焉！历代之亲策，往往以敬天勤民为务。古先帝王之敬天勤民者，其孰为可法欤？所谓敬天者，果惟于圜丘郊祀之际，致其精一者为敬天欤？抑他有其道欤？所谓勤民者，宜莫如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者矣。其所以不遑暇食者，果何为耶？岂勤于庶事之任耶？自昔而观，宜莫急于明伦厚俗，伦何由而可明？俗何由而可厚耶？三代而下，惟东汉之士俗，赵宋之伦理，差少疵议。果何道而致然欤？盖必有可言者矣。宜著于篇，毋泛毋略。

对策

臣谨对：臣闻古先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敬天勤民为务，以明伦厚俗为急，故汲汲于求贤者，凡以为此也。钦惟陛下进臣等于廷，策臣以古先帝王之务，臣愚昧何所通晓，然叨奉大对，敢不竭心尽知，上答圣问之万一乎？谨俯伏以对。

臣伏读制策曰："盖谓古先帝王之观人，莫不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汉之贤良、宋之制举，得人为盛。朕自临御以来，屡诏有司搜罗贤俊，然而杰特犹若罕见，故又详延士大夫于廷而亲策之，以庶几于古先帝王之盛节焉。"而臣有以见陛下求贤之切也。臣闻言者心之声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即其言之得失，而心之邪正可见。然言之匪难，而行之惟难，固有能言而行不逮者矣。是以古先帝王之观人，必敷奏以言而观其蕴，明试以功而考其成，然后有以得夫贤才之实焉。三代而后，若汉、若宋，其取人之法，有贤良制举，是有得于奏言试功之遗意。故在汉之时，若董仲舒人天三策，蔚为醇儒。而宋之诸儒仿佛三代，尤为得人之盛，良以此也。钦惟陛下以神武定区宇，以文德绥太平。屡降德音，广求贤俊，而又设科目为

取士之方，详延草茅之士，亲策于廷。陛下求贤之心，可谓切矣。将见必有杰特之士出而为邦家之用，而臣则不足以及此也。

伏读制策曰："历代之亲策，往往以敬天勤民为务。古先帝王之敬天勤民者，其孰可为法欤？所谓敬天者，果惟于圜丘祭祀之际，致其精一者为敬天欤？抑它有其道欤？所谓勤民者，宜必如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者矣。其所以不遑暇食者，宜必如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者矣。其所以不遑暇食者，果何为耶？岂勤于庶事之任耶？"臣有以见陛下深知为君之道，而后有此言也。臣闻：帝者莫盛于尧、舜，王者莫盛于禹、汤、文、武。稽之于经，若尧之钦明文思，舜之温恭允塞，兢兢业业，而戒饬于时，几同寅协恭而懋勉于政事，此唐尧、虞舜之敬天民者也。陛下能法尧、舜，而陛下即尧舜矣。敬德以先天下，祇肃以顾諟天之明命，克勤克俭而尽力乎沟洫，昧爽丕显而子惠乎困穷，此夏禹、商汤之敬天勤民者也。陛下能法禹、汤，则陛下即禹汤矣。小心翼翼而视民如伤，敬事上帝而作民父母，此文武之敬天勤民者也。陛下能法文武，则陛下即文武矣。夫古先帝王之可为法者，孰有过于尧舜禹汤文武者乎？臣闻：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而牧之，君所以代天理民者也。古之帝王审知乎此，故位曰天位，职曰天职，禄曰天禄，民曰天民，无一事不本于天，亦无一事不存乎敬。敦典庸礼，君之所以为教也，而必推之天序、天秩焉，是敬天之心见于施教者然也。命德讨罪，君之所以为政也，而必归之于天命、天讨焉，是敬天之心形于施政者然也。一动一静，常若有天在前；一语 一默，常若有天在中。以至天工之不敢废，天职之不敢旷，何往而非敬天之事哉。若夫圜丘郊祀之际，以致其精一，是特敬天之一事，固不专在于是也。制策谓抑它有其道，可谓深达敬天之道矣。非陛下敬天之至，何以及此。

臣闻民本有饥食渴饮之欲，不能以自治，必赖君有以养之。有秉彝好德之性，不能以自遂，必赖君有以教之。君人者，兼君师之

任者也。是以古之帝王审知乎此，既为之制其田里，教之树畜，使有以安其生。而设为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使民有以遂其性。如文王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者，凡以此而已。故曰：即康功田功。康功者安民之功，而田功者养民之功也。又曰：怀保小民。曰：惠鲜鳏寡。盖欲使天下之民，无一不得其安，无一不得其养而后已也。圣人之道一也，观文王不遑暇食，如此则尧、舜、禹、汤、文、武之心从可知矣。臣闻人主能以一心总天下之万机，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众职。古帝王之勤民者，非事事而亲之，要在责成臣下而已。故曰：劳于求才，逸于任贤，此之谓也。钦惟陛下奉天承运，抚临亿兆。严恭寅畏，无顷刻不在于天。宵衣旰食，无顷刻不在于民。孜孜勉勉、励精图治之心，即尧、舜、禹、汤、文、武之心也。而制策以古先帝王之孰为可法为问，臣有以知陛下不自满足之心也。臣愿陛下常存此心而不已焉，则唐虞三代之盛，岂能及哉！

臣伏读制策曰："自昔而观，宜莫急于明伦厚俗，俗何由而可明？俗何由而可厚耶？三代而下惟东汉之士俗，赵宋之伦理，差少疵议，果何道致然欤？盖必有可言者矣，宜著于篇，毋泛毋略。"臣闻自昔帝王之为治，莫急于明人伦、厚风俗。而人伦之所明，风俗之所厚者，皆由于崇学校，以兴教化而已。盖教化行而人心正，则伦理明而风俗厚，此必然之理也。唐虞三代无以议为矣。若东汉之士俗，赵宋之伦理，卓然于三代之后，岂无其道而致然哉。臣闻汉光武初定天下，首访求山林遗逸之士。明帝尊师重傅，临雍拜老，宗戚子弟，无不受学。是以养成一代人心风俗，皆知崇尚节义，耻于奔竞。此汉之士俗所以为美者，以有其教化也。臣闻宋太祖即位之后偃息兵革，崇尚文治，虽疆宇之广不及汉唐，而教化之美几及三代。当时人君无不学，而所用无非儒，是以天下翕然以道学为事。又有濂洛诸儒，出而接夫道统之传，以为学者之宗，斯宋之

伦理所以为美者，亦以其有教化也。方今上自皇都，下逮府州若县，亦既莫不有学，而陛下又躬行于上，日召儒臣讲求治道，固已论之精而行之当矣。制策以伦何由而可明、俗何由而可厚为问，臣以谓明伦、厚俗，惟在于崇学校以兴教化也。臣愿陛下益重教官之选，严守令之责，使居学校者果能如胡安定之教于苏湖，居府县者果能为文翁之化于蜀郡，则人伦不患其不明，士俗不患其不厚，而唐虞三代之治，无以异矣。又岂汉宋之可拟伦也哉？

臣愚不足以奉大对，谨竭其一得之愚，惟陛下裁择。臣谨对。

评析

明清科举制度大略相同，乡试之后的第二年即举行会试，会试取中者得以参加殿试，殿试是皇帝主持的考试。对于殿试，16世纪来华传教的意大利人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很生动的介绍，他说："新博士（即会试录取的"贡士"）全部转移到皇宫，在那里当着朝廷阁臣，有时也当着皇帝的面，就一个给定的题目写一篇论文。这次竞争的结果决定这些博士将授予三级官员之中的哪一级。这是一次著名的考试，全部内容只是做一篇相当简短的论文。在正规的博士考试中已取得第一名的人，在这次终试中最少也能保证第三名，而那些在这次考试中取为第一、第二名的则被赋予殊荣，他们一生都可确保高级公职。"文中所说的"论文"，就是"策问"，以皇帝的名义拟定，一般都是关涉治国安邦、国计民生的政治大事，所以又称"时务策"。从"策问"的形式上来看，它颇像一道道问答题的组合，要求考生在一日的时间内既能很好地把所问的问题全都给予答复，又须十分得体地把这些回答组成一篇结构严谨、

文理清晰的论文。同时还要讲究书法、格式。这确实是一件并不很容易的事。

明洪武四年(1371)的殿试中,江西举子吴伯宗就是因自己的一篇应对策卷而高据榜首,成为大明开国以来的第一位状元的。这篇对策究竟有什么特点呢?

一是体察"圣意",正面阐发,应对得当。一般的皇帝策问,是非、好恶的观点和态度已隐含其中,举子们在回答问题时,是不能去另起炉灶,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的,只能揣度圣意,以其好恶作为自己阐述意见的基点。这样才能既紧扣论点,又回答得较为令皇帝满意。譬如,洪武四年的策问中共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选拔人才,即"得人";二是"敬天勤民";三是"明伦厚俗"。当时,明朝开国仅第四个年头,百废待兴,朱元璋作为一代明主,认为得人、敬天勤民和明伦厚俗是当务之急,故特设这三个问题,以让举子们进行讨论。这三个问题实际上已把他自己的认识和观点都给暗示出来了,那就是:得人之途一是察举,二是科举,二者应以科举为常例,以察举为补充,并置不废。敬天勤民之道唯在勤民,而勤民之道非在"不遑暇食"。明伦厚俗当行教化。这些认识乃朱元璋心中所思,也是举人们立论的根本。吴伯宗善于揣度皇帝的心思,又通晓天下大势,在应对时处处正面阐发,对朱元璋的这些认识和观点进行了精当的总结,深入的发掘。既有理论高度的引发和升华,又有意义层面的阐释和生发。对于选才,他充分肯定了察举和科举的意义,即"敷奏以言而观其蕴,明试以功而考其成。"精到得体。对于敬天,他鲜明地指出了它的实质,即"敬天之心见于施教"、"敬天之心形于施政",唯有专心于勤政爱民,才能算是根本的敬天。深刻精辟。对于勤民,他深入地触及到了它的根本,即"劳于求才,逸于任贤",唯在访贤求才,才能是最大的勤民。一言中的。对于明伦厚俗,他精当地概括为"尚文治"、"尚学",乃实行教化的正途。

深明大义。他的这些概括和阐释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符合统治者的大政方针的，也就很能迎合朱元璋当时的真实心态，所以较为得体，被朱元璋"慧眼"选拔，成为 120 名进士中的第一名。

二是不枝不蔓，逐层展开，结构完整。吴伯宗的这篇对策在明代的对策中是较为短小的，形成这样特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注意了写作过程中的立意问题，即抓住立论的要害处，以皇帝的提问为立论的根本，不溢出，不外流，如水行河中，两岸高堤紧锁，多余的话不说，说便紧扣圣意，阐释得度，点到为止；论便深入挖掘，精髓一显，自然收束。这样写来，既能旨意尽见，又能不枝不蔓，给人以精炼、简要之感。同时，他又注意到文章的条理性，以"臣闻古先帝王之治天下"五句开篇，归纳皇帝策问中的要点，然后先论求贤选才，继论敬天勤民，最后再论明伦厚俗，章法清晰，富有层次，让人读来觉得语序自然、段序条理、结构完备，毫无艰涩和跳跃之感。

据史书记载，吴伯宗为人较为平易，他的这种得体而且平实的"对策"文风恐怕是得益于他的性格与气质。但得体与平易并不是说不讲文。据说，明太祖曾出过十个题目，让吴伯宗为赋，他援笔立就，极其优美，明太祖很是高兴，亲赐他织金锦衣。可见，他也是很注意文的，但过分的"文采"化，对于这种"时务策"有时恐怕不太适宜。所以，他的这篇对策就形成了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种风格。

(苗菁)

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

状元:胡靖

胡靖(1370~1418)原名广,字光大,号晃庵,吉水(今属江西)人。建文二年(1400)殿试为第一甲第一名。时燕王朱棣已起兵反叛,建文帝取“靖卫”之意,赐胡广改名为“靖”。例授翰林修撰。朱棣即位后,擢为翰林院侍讲,复原名。永乐五年(1407)进翰林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曾两次从成祖北征,召对帐殿,或至深夜,甚得信任。他善长书法,每勒石,咸受命为书。永乐十四年(1416)进文渊阁大学士。曾奉诏纂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死后谥曰“文穆”,有《胡文穆集》。

策问

制曰：诸生盖闻致治之主，论治道之盛必以唐虞三代为准。尧舜禹汤文武此数圣人者，其德厚矣，然所以本诸身，发于政事，施泽于民者，其先后、始终亦可得而言欤？夫由亲以及疏，笃近而举远，百王之所同也。尧舜之时，黎民于变时雍矣。以亲则有象之傲，臣则有共、鲧之凶，将圣人之化有所弗及欤？抑为恶之人有不得而化者欤？朕绍承大统，每思古先圣帝、明王之治，何修何为，而可使家给人足，比屋有可封之俗？行何善政，而可使囹圄空虚，刑措不用欤？图治莫切于用贤，而患贤才之难致。化民莫先于敩学，而患礼乐之难兴。果何由而可使野无遗贤，而民皆乐于为善欤？兹欲使海内皓皓熙熙，如唐虞三代时，致之必有其道，施为必有其序。诸生习于圣贤之说久矣，其具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对策

臣对 臣闻孔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大哉，仁义之道乎！尧舜用之而成化，禹汤文武用之而致治也。有志之君、愿治之主，莫不于是而取法焉。稽之于古，三代有天下率数百年之久，其所以致隆盛者，莫不以仁义之道也。及其后世之衰，亦莫不以不行仁义之故，而遂至于不有天下。至于论致治之隆、民俗

之美、致贤才之众、兴礼乐之盛，何莫不由于斯！今陛下以隆古之道、致治之由，下策微臣，此盖陛下之所已行，而不待臣之言也。虽然，天生一代之圣君，必生一代之贤才，所以能致非常之治，而开非常之太平者，由其能旁求博询，取诸人以为善者也。臣敢不献切时之正论，而徒角无用之虚文也哉！

夫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皋、夔、稷、契、周召之为臣，都俞吁咈者，无非仁义之言；赓歌戒饬者，无非仁义之语。所以扬言乎庙堂之上，而化行乎海隅之中，无一民之不被，无一夫之不化，而成黎民于变时雍之美。然而亲则有象之傲，臣则有共、鲧之凶，亦非圣人仁义之化有所不及，而为恶之人将圣人有不能化之者。故孔子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盖自暴自弃者，虽圣人与居不能化之也，岂可以此而病尧舜之治哉！夫天之生物，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未尝不同。而发荣滋长，凋瘁销落，有倍蓰而不齐者，亦岂天之不能成物也哉？圣人之治亦由是也。

陛下思古先帝王之治，而欲垂宪于万世，非仁义则不能有所为也。夫仁义者治天下之大经，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自陛下嗣位以来，宽租负之征，下养老之诏，省刑罚之繁，四海之民莫不欣戴。近以陆梁远近骚动，而天下之民心不摇者，此陛下躬行仁义之效。固结于人心者，又非一日也。此臣所谓陛下已行之验者。臣愿陛下终始而行之，持之以久，积之以岁月而不求其近功，则何修而不得，何为而不成？况夫陛下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柄，岂宜薄此而不为哉？

夫囹圄非仁义不空，刑罚非仁义不措，贤才非仁义不兴，礼乐非仁义不作。故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事得其序，物得其和，则礼乐见而仁义著矣。故仁义之道行之于一身，推之于一家，又推而达之国与天下，则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自有不期然

而然者矣。今陛下举仁义于上,则公卿大臣躬行仁义于下。远近百执事倡导仁义以相渐摩,而民亦以仁义相教习。将见礼乐可兴,而致凤凰来仪之美,贤才毕出,而致国家咸宁之休。囹圄何患其不虚,刑罚何患其不措哉!将见唐虞三代之盛,熙熙皓皓之俗,复见于今日矣。臣固以圣贤仁义之道,为陛下始终而敷之。伏愿陛下不以臣言为迂,而加意笃行,则其效将有不止于今日矣。

抑臣闻之:汉武帝策贤良,董仲舒以教化对,信乎武帝不能行也,惟好尚功名而喜于方士,以至末年乃有轮台之悔。今陛下策臣,臣以仁义为对者,欲陛下力行之以致太平。使天下后世知陛下之策臣者求实言,而臣之应陛下者以实对。臣虽不敢自侪于仲舒,又岂敢以武帝望陛下为三代之君。臣既不敢过谀,亦不敢激。愿陛下少垂睿览,非惟臣之幸甚,天下幸甚。臣谨对。

评析

胡靖(广)是一位善于见风使舵、随机应变的人。他背叛建文帝而降朱棣;与大臣解缙连姻,解缙获罪后又欲悔婚。这些事情使他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形象不佳。他在殿试中作的这篇时务策也能或隐或显地显示出他善迎合的特点。

建文帝的策问中共提出了四个问题,即一,三代之时有什么“施泽于民”的善政,使之达到天下大治的?二,尧舜之时也有“为恶之人”,这些“为恶之人”是天生如此呢?还是君主没有尽到教化之责呢?三、怎样才能达到“家给人足”、“刑措不用”的大治之境?四、怎样才能达到“野无遗贤”、“民皆乐于为善”的盛世之境?

对于这四个问题,胡靖(广)的回答都是十分巧妙的。

第二个问题是有所针对的。当时建文帝用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谋，定策削藩，先后废周、湘、代、齐诸王等为庶人，次第将及燕王朱棣。朱棣遂于建文元年(1399)七月起兵，号“靖难”之师。到胡靖(广)参加殿试的建文二年，朱棣已先后击败建文帝的两员平反大将耿炳文与李景隆。在这样的背景下，“象”、“共”、“鲧”之类的恶人都是影射朱棣的。这个问题是个相当敏感，也是个不能躲避的问题。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胡靖(广)不能空泛而论，也不能把责任推到皇帝身上，他只能旗帜鲜明地赞成“为恶之人”是“天生如此”的观点，于是他或引经据典，或设象引喻，既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他的态度和立场，又简炼扼要地论证了这一观点的正确。颇有些耿直忠正之风。

第一、三、四个问题都是些较为空泛的问题，归纳到一起，就是如何行善政。建文帝问的空泛，胡靖(广)也就回答得空泛。他只标出“仁义”二字为立论的根本，首先限定什么是“仁义”；继而又说历史上的“有志之君、善治之主”都是以行“仁义”而致天下“隆盛”的，要想“致治之隆、民俗之美、致贤才之众，兴礼乐之盛”，都必须实行“仁义”；最后说建文帝的施政方针也是在实行“仁义”的，只要“终始而行之，持之以久，积之以岁月而不求其近功”，那当然会“何修而不得，何为而不成”，达到”唐虞二代之盛，熙熙皓皓之俗，复见于今日”的功效。这样的回答，既显得胡靖(广)站得较高，看得较远，颇有“理论家”之风度，而同时又能使他避实就虚，不去更多地涉及一些现实问题的是是非非。这样的回答确实是煞费苦心的。

胡靖(广)投到明成祖的麾下后，行事谨慎，倍受宠爱，但却建树不多，世人把他比作汉代的“中庸公”胡广，有人还曾作诗一首加以嘲讽：“汉朝胡广号中庸，今日中庸又见公。堪笑古今两奸宄，天教姓名正相同”。可见人品和文品的确是有某些关连的。

(苗菁)

永乐十年(1412)壬辰科

状元:马铎

马　铎(? ～1423)字彦声,号梅岩,福建长乐人。自幼聪颖异常,作文不假思索,下笔立成。永乐十年壬辰科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官至南京国子监监事。为人刚直不阿,坚持以理服人,公事公办。闲暇时常以读书鼓琴自娱。永乐二十一年(1423),卒于官。有《玉岩集》行世。

策问

制曰:朕奉承宗社,统御海宇,夙夜祗畏,弗遑底宁,以图至治,于兹十年未臻其效。虑化未浃矣,谨之以庠、序之教;虑养未充矣,先之以足食之政;虑刑未清矣,详之以五覆之奏。求才备荐举之

科，考课严黜陟之令。然而厉俗而俗益偷，革弊而弊不寝。若是而欲跻世泰和，果何行而可？六经著帝王为治之迹，《易》以道阴阳，专名数者，或流而为灾异；尚理致者，或沦而为清谈。《书》以道政事，语知行则何以示其端，论经世则何以尽其要？《诗》以道志也，何以陈之于劝惩黜陟之典？《春秋》以道名分也，何以用之于闭阳纵阴之说？《礼》以道行，而《乐》以道和也，何以道同六经而用独为急？夫道本一原而治有全体，推明六艺，讲议异同，行则美矣，何以一归于杂？雅歌击磬，执经问难，志则勤矣，何以未复乎古？讨论文籍，考定五经，可谓劳矣，未足以致大治。更日侍读，质问疑义，可谓伟矣，仅足以成小康。夫五星集奎，文运斯振，儒道光阐，圣经复明，较之往迹何胜何负？盖为治之道，宽猛相济，各适其宜。太宗宽厚长者，务崇德化，政足尚矣，而言者谓不若中宗之严明。显宗法令分明，幽隐必达，严足尚矣，而言者谓不若肃宗之长者。论治若此，其将孰从？夫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子诸生蕴之有素，其于为治之要，时措之宜，悉心以陈，毋徒泛泛，朕将亲览焉。

对策

臣对 臣闻治本于道，道载诸经。圣人出而三代之治为可复；真儒出而六经之道为大明。经以载道，固必待人而后明；道以出治，尤必待人而后行也。洪惟皇帝陛下尊履大宝，绍承鸿基，明照八表，知周万务，心存乎帝王之心，治绍乎帝王之治，尚虑阙漏，下询刍尧，此好问而好察迩言之意，尧舜禹汤文武之心也。然化已浃矣，选任师儒严督课业，简绌以惩庸，励进以劝善，而庠序之教唯谨。养已充矣，省其征徭，薄其税敛，禁一民之不得妄差，禁一

毫之不得妄取。而足食之政尤先慎罚，而致三覆五覆之详，尚思夫罚罪之非当。用贤而惇荐举考之典，尚思夫任职之未宜。是盖陛下明经术之正，识帝王之大，不安小成，必跻斯世于唐虞三代之盛也。夫厉俗未底乎时雍，不害为俗之益偷。革弊未至乎于变，不害为弊之不寝。臣愚有以知陛下泰和之世可跻，唐虞三代之治可致。其厉俗革弊有不在政令之末耳。何则？陛下任奉承之重，统御宇之大，夙夜祗惧，而存心于不已，道本于一原，治具乎全体，若稽经籍而垂至治于无穷，六经之道固已蕴诸圣心矣。其视诸经传授之是非，历代为治之得失，昭昭而白黑分矣，奚以臣言。虽然，圣问所及，敢不罄竭，臣愚条悉以对。

夫自六经删述于孔氏，帝王之道由是而大明，自六经附会于汉儒，帝王之治由是而难复。《易》以道阴阳，伏羲神农黄帝之道无所不该。自田、何传至于焦、房，专尚名数，流而为灾异。自费直传至于辅嗣，专尚理致，沦而为清谈。于是理数分而易道微矣。《书》以道政事，而典谟、训诰、誓命之辞无不具焉。语知行则惟精惟一，所以示其端。论经世则洪范皇极，所以尽其要。自大、小夏侯之说殊，而书之义踳矣。《诗》所以道志也，先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美之而民知所劝。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刺之则民知所惩。以是巡行诸侯之境土，而黜陟行焉。自齐鲁毛韩之异尚，而诗之义隐矣。《春秋》所以道名分也，董仲舒大一统之论正谊明道、贵王贱伯之义，其得于《春秋》也大矣。而乃用于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有闭阳继阴之说，而《春秋》之义乖矣。《周礼》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此礼以道行也。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此乐以道和也。礼有三千三百之仪，而一主乎敬。乐有五声十二律，而一本于和。制度品节之详而有所持循，情文节奏之备而有所感发。致礼以治躬，则齐庄中正，非僻之心无自而入。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鄙诈之念无自而生。用之

于邦国而邦国治，达之于天下而天下平，此六经之道同归，礼乐之用为急。而《易》、《书》、《诗》、《春秋》之蕴，必于《礼》《乐》以著其用焉。然欧阳修所谓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则班《志》所谓礼乐之用为急，亦未见于实用也。然六经之道未极一原，尚何三代全体之治为可复乎？此汉之武帝推明六艺罢黜百家，孝宣章帝之石渠白虎讲议异同，行则美矣，而卒莫能循乎王道之正，而终归于霸道之杂。由乎六经之道，昧于一原，宜其治有所未纯焉。光武亲幸太学，诸生雅歌击磬。明帝临雍拜老，诸儒执经问难。其志虽曰勤矣，而未克以复乎古。不能四三王而六五帝，盖徒尚夫仪文之末，而未究夫圣道之本也。若唐太宗讨论文籍至于夜分，诏颜师古考定五经，求治之心可谓劳矣。然而仅能致斗米三钱，外户不闭之效，而未足以为大治。玄宗更日侍读，质问疑义，怀素、无量常侍更直，好治之心亦可谓伟矣，而开元之治庶几贞观之风。惜其后不克终，以致祸乱，是皆亦由乎六经之道昧于一原，宜其治有所未至焉。迨夫五星聚奎，宋德隆盛，文运斯振，周、张二程光阐儒道于前，杨、罗、李、朱复明圣经于后，较之往迹大有径庭矣。儒道既阐，圣经复明，则治道胜负较之于前，不待论说而明矣。

夫天下之大经，仁义中正而已。仁以育万民，义以正万民，二者并行而不相悖。宽而不流于姑息，有猛者存。猛而不偏于苛察，有宽者在。严而泰，和而节，此理之自然，治道之全体也。汉文帝恭俭玄默，赐不朝以几杖，遗受赂以金钱，造露室惜十家之产，可谓宽厚长者，务崇德化，政足尚矣。然与匈奴疏绝，毅然讲武，盖未尝不猛焉。宣帝综核名实，励精图治，流而至于苛刻，汉室忠厚之风几乎荡尽。明帝法度分明，幽枉必达，严足尚矣，而过于察察。章帝宽厚长者，而流于姑息，东京之政由是而衰矣。亦其学术不明，不能损过就中，而归于圣贤大学之道也。向若汉之文帝从贾谊而兴礼乐，武帝从董仲舒而明教化，则仲舒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正

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万民正而远近莫不一于正，则道之一原可知，治之全体可识，其治岂止于汉而已。迨夫宋之诸君能用诸儒，则经术之明见于治效，岂独载诸传、注而止哉！虽然，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承大一统文明之运，表章六经圣人之道，比隆于唐虞三代，正有待于今日圣天子居天位、行天道，而著治效于无穷也。

臣愚生浅学，叨奉大问于廷，获闻道本一原，治有全体，不胜踊跃，庆唐虞三代之治复见于今日，宁不顿首为天下贺。非但为天下贺，当为万世贺。抑臣闻之，为治之要，《大学》一书，治天下之格律也。时楷之宜，《中庸》一书，圣学传心之要法也。此皆陛下身体而力行之者也，故能致笃恭而天下平之效。臣愚，学不能以博古，才不足以应变，伏愿陛下始终此心，始终此治，可以四三王六五帝，岂但跨越汉唐宋而已哉！臣不揆浅陋，以此上尘圣览，干冒天威，岂胜战栗。臣谨对。

评析

明成祖的这篇策问看似篇幅较长，实际上只涉及到三个大问题。

一个问题是关于他即位十年的政绩评价问题。他在策问中自责"奉承宗社，统御海宇"以来，虽然"夙夜祗畏，弗遑底宁，以图其治"，但是却仍然是"厉俗而俗益偷，革弊而弊不寝"，没有达到泰和之盛世。据史书记载，他即位后的这十年，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所谓"知人善任，表里洞达，每遇水旱，朝报夕赈，无有壅蔽"，迁都城，征漠北，遣郑和，设都使等都可以归功于他的政绩。所以面

对着这个志得意满的皇帝，在回答这个看似沉重的自责时，决不能顺着他来说话，给他提意见，找弊端。这样很可能引起他不满。因此，在应对这个问题上，马铎处理得就很巧妙，他不去顺着皇帝的话茬，而是和他唱起了“反调”。你说你的施政方略没有奏效，我却说你是“化已浃矣”，“养已充矣”；你说你“厉俗而俗益偷，革弊而弊不寝”，我却说“厉俗未底乎时雍，不害为俗之益偷，革弊未至乎于变，不害为弊之不寝”，你说你没有达到泰和之世，我却说你“泰和之世可跻，唐虞三代之治可致”。这样的“反调”皇帝不仅不会不满，相反很可能还会相当高兴，因为这样的“反调”实质是些正面颂扬、歌功颂德的“奉承话”，皇帝听了是会感到“耳顺”的。

处理完这个棘手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就好应付多了。因为其他的问题都和现实关联不大。对于六经的问题，马铎是最为娴熟的，因为问学之初，他就师从郑孟宣学《礼》，渐旁通《易》、《诗》、《书》等，并且因此成为治《诗》的太学生。所以，他回答起来，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显得毫不费力。至于为政之优劣的问题，谈的都是昔日帝王，自然可以不加顾忌，纵横驰骋，自由畅谈。以上两个问题，马铎在应对时都能放的开，文章也就气势充沛，辨理清晰。自然也会获得帝王的赞赏。

马铎被擢为状元之后官位不显，唯好读书。看来非做事之人，乃学问之人。这一点从这篇时务策中似已能看出。

（苗菁）

正统十年(1445)乙丑科

状元:商　辂

商辂(1414～1486)字弘载,号素庵,淳安(今属浙江)人。他自幼发愤读书,参加科举考试连中乡试、会试、殿试三场第一,为士人艳称为"三元"。他是明代历届科举考试中唯一连中三元的人。例授修撰,进学东阁。"土木堡之变"后,郕王监国,以荐入内阁,参预机务。明英宗复辟,被诬下狱,斥为民。成化三年(1467),明宪宗命以故官入阁。明年,改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吏部尚书。十三年(1477),进谨身殿大学士,被太监汪直所谮去官,卒于家。有《商文毅疏稿略》、《商文毅公集》、《蔗山笔麈》等。

策问

制曰:自昔二帝、三王致理之道,必选任贤才以敷政化,安中国而抚四夷,其见诸载籍,靡不足为后世法也。下迨汉唐宋,贤明之

君亦皆锐意于斯。而其人才治效,有可以比隆于古欤?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奉天明命,统一华夷,德威所被,罔不臣服。太宗文皇,帝嗣登大宝,制治保邦,光前裕后。列圣相承,咸隆继述。是以群贤汇进,教化旁治,海内乂宁,夷狄宾服,功德之盛,吻合古昔而无间矣。朕缵承鸿业,倾惟祖宗之彝宪是训是行,屡诏中外简拔贤才,亦既得人为用矣。诚欲九德咸事,野无遗贤,举错之法尚有可行者乎?申敕诸司,修明治理,亦既建立事功矣。诚欲百工惟时,庶绩咸熙,督劝之典尚有可举者乎?内而中国生齿之繁,因其性而教养之矣。诚欲使皆阜厚化成,同归于至治,尚何所加乎?外而蛮貊近悦远来,因其俗而怀抚之矣。诚欲使皆讲信修睦,相安于永久,尚何所施乎?夫治道有本,而推行有序,不法诸古无以施于今,泥于古而不通于今,亦不以为治。诸生明于道义,必讲之有素。悉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对策

臣对 臣闻图治莫急于用贤,用贤莫先于修身。非修身固无以为取人之本,非用贤又无以为图治之要。故《中庸》之书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人君诚能修身以为用贤之本,用贤以为图治之要,则知至、意诚、心正、身修。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以之亮天工而熙庶绩,安中国而抚四夷,何往而不得其效哉!钦惟皇帝陛下聪明睿智,文武神圣,存二帝三王之心,绍祖宗列圣之统,日御经筵,讲求至道,早晚视朝,裁决万几。好贤之诚,无间于话言;图治之切,常存于宵旰。乃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拳拳欲闻古今用贤致理之方,所谓智周万务而不弃于一得之愚,明照四方而必察于刍

荛之贱是也。陛下是心，与古帝王兢兢业业不自满假，用人惟已望道未见之心，何以异哉！臣虽愚昧，敢不精白一心，以对明命之万一乎？

臣惟致治有要，用贤是也；用贤有本，修身是也。若昔唐虞三代之世，百姓昭明，万邦协和，而黎民有于变之风；百工惟时，庶绩咸熙，而万邦有咸宁之效。二帝致治之隆如此者，实本于其登庸元恺，不废困穷之功也。府事修和，文命四敷。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在四方用丕式见德。以至万民咸和丕单称德，三王致治之盛如此者，亦本于其吁俊尊帝，克知克用之力也。当是之时，若皋夔，若稷契，若伊周，各以圣贤之资，居辅弼之任，或陈九德而谐八音，或播百谷而敷五教。一德足以致天心之格，成绩足以笃烈考之光。多士济济，布列庶位，又岂无所自而然哉！盖由尧舜禹汤文武之君，或克明俊德而重华协帝，或祇台德先而圣敬日跻，或缉熙敬止而无竞惟烈，一皆本诸行者无不诚，见诸行者有其实。所谓为政取人之方著于载籍，足以垂法于后世者，何莫不自圣人修身中来耶？继此而称善治者，莫汉唐宋若也。其间贤明之君，未始不以用人为致治之本。观其孝廉之有选，贤良之有科，或以明经进，或以进士举。若汉贾谊之劝兴礼乐，董仲舒之明于王道。当时海内富庶，戎狄宾服，其治效固有可称者矣。唐韩愈之排斥佛老，陆贽之论谏仁义，当时中国久安，四夷宾贡，其治效亦有可观者焉。以至宋之韩、范、富、欧有以辅盛治于前，周、程、张、朱足以继绝学于后。中国致文明之盛，夷狄怀景仰之心，其人才治效虽不能比迹唐虞三代，亦非汉唐所可及也。虽然，汉唐宋之君其用贤图治之意固云美矣，而取人以身之道，则概乎未有闻焉。或诗书之安事，或礼乐之未遑，或闺门失德而治杂于夷，或任用不专而小人迭进。外有尊贤之名，内无用贤之实。此汉唐宋所以止于汉唐宋，而不能俪美于唐虞三代者。亦以修身之道，有未至也。

洪惟圣朝太祖、太宗，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致太平，德泽敷施，声教远被，薄海内外，莫不尊亲，际天极地，靡不臣服。列圣相承，光启文治，隆继述之道，尽任用之方。是以群贤向用，君子满朝。礼乐兴而风俗美，教化洽而治道隆。斯民阜厚而化成，夷狄倾心而内附。圣德神功，盖吻合乎二帝三王之盛，而汉唐宋之君，风斯下矣。肆惟皇上缵承鸿业，远稽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孜孜以图治为心，拳拳以求贤为念。其得人致治之盛，固已超轶乎古矣。而尤虑举错之法未尽行，督劝之典未尽举。内而教养未备，外而抚绥未至。欲探其本，而推行之以序。臣愚以为是数者，皆陛下之所已行，行之而既效者也。然犹欲求其本，岂有外于陛下之修身乎？陛下屡诏中外，简拔贤才，其举错之法至矣。而犹欲求可行之法，臣愿陛下谨修身以为举错之本。贤者必进，不肖者必退。如孔子所谓举直错诸枉，则九德咸事，野无遗贤之效，不难至矣。陛下申敕诸司，修明治理，其督劝之典备矣，而犹欲求可举之典。臣愿陛下谨修身以为督劝之原，劝者必赏，而怠惰者必罚，如《虞书》所谓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则百工惟时，庶绩咸熙之效，有可必矣。陛下既谨修身以为取人之本，将见人才之出，彬彬乎盛。所以阜厚化成乎天下者，此也；所以讲信修睦于夷狄者，亦此也。陛下尝轻徭薄赋以立民命，建学立师以复民性矣。使凡任教养之责者咸以利用，厚生教训，正俗为心，则人得以仰事俯育，而有尊君亲上之心。生齿虽繁，有不同归于至治乎？陛下尝柔远能迩，以怀弗庭，厚往薄来，以抚宾服矣。使凡典戎狄之职者，咸能论之以祸福，示之以恩信，去者不追，至者不拒，训兵练士，保境安民。则人畏威怀德，修贡称藩，四夷虽远，有不相安于永久乎？

夫为治之本，在于用人；用人之本，又在修身。必先其本，而后其末。故《论语》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大学》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中庸》曰：知所以修身则

知所以治人，治天下国家皆此意也。虽然，修自固为用人之本，而欲用人致治，尤不可以不法诸古。盖古者，前代之法，圣帝明王精神心术之所存，仁义道德之所寓也。傅说告高宗曰：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使泥于古而或不通于今，则为徒法不能以自行矣。又必益之损之，与时宜之。《中庸》所谓时措之宜是也。

陛下之策臣者，臣既略陈之矣，而于篇终窃有献焉。臣惟始勤终怠者，众人之常情，慎终如始者，圣人之要道。是故天地有常运而后岁功成，帝王有常德而后治功著。陛下德配天地，明同日月，诚又加夫不息之诚，有常之念，终始惟一，宵旰无间，则以之修身任贤，以之安民致治，远足以追配二帝三王之道，近足以光昭祖宗四圣之业。上而致天地位，下而致万物育，而绵历数于无疆者，夫岂有越于此哉。臣干冒天威，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

评析

商辂是明代唯一一位连中“三元”的人。他之所以能连中“三元”，擅于写文章应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皇帝的那篇策问连珠炮似的问了好几个问题，如果笨拙的人便会老老实实地逐条回答。但是商辂却不是这样，他从这些诸多问题中只轻轻拈出了两个论点：“用贤”、“修身”。然后把这两个论点作为文章的总纲，把皇帝的提问统统都包容在这两个总纲之中，毫不费力地展开了自己的论证。

所谓的三代盛世之所以能达到天下大治，当然是选贤任能之功效，而选贤任能之功效的成因全在于“圣人修身”。此后的“善治”王朝如“汉、唐、宋”的贤明之君，也都以“用人为致治之本”，但

是，他们却只知用人而不知修身，所以虽然有“中国致文明之盛，夷狄怀景仰之心”的功效，却终 不能“俪美于唐虞三代者”。两相对比，可见选贤与修身对于帝王应同时并奏，交相为施，“非修身固无以为取人之本，非用贤又无以为图治之要”，二者同等重要。这样就首先顺理成章地回答了皇帝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随后，作者又从“用贤”与“修身”的关系入手，对当代政治进行了评点。他认为从太祖到当今皇帝，都能“尽任用之方”使“群贤向用，君子满朝。”尤其英宗，“孜孜以图治为心，拳拳以求贤为念。其得人致治之盛，固已超轶乎古”。这些话当然都是溢美之词，当殿试之时，无论是真意还是违心，此情此景，是不能不夸赞几句的。但是作者先说诸皇帝尤其英宗都能选贤任能，实际上还有一个目的，即以进为退。他肯定了“用贤”的一面，接着又委婉地指出当今皇帝“修身”一面还有种种不足，如果皇帝能谨于“修身”，那当今政治中的不如意处当尽能改观。“选贤”是求诸他人，“修身”是求诸自身。“为治之本，在于用人；用人之本，又在于修身”。应该是“必先其本，而后其末”。这样娓娓道来，反复阐释，既给英宗留下了面子，又含蓄地对英宗年幼而好嬉戏，重用宦官的行为进行了规劝，同时将英宗提出的关于当代政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巧妙地回答，确实一笔多用，十分精练。

以“用贤”，“修身”为总纲，能提纲挈领，抓住根本；也能使文章结构严谨，前后照应。这是商辂的高明之处。

（苗菁）

正统十三年(1448)戊辰科

状元:彭时

彭时(1416～1475)字纯道,江西安福人。正统十三年戊辰科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土木堡之变”,英宗被蒙古瓦刺部所俘,其弟郕王监国,彭时入阁参预机务。后又任翰林院侍读。英宗复辟,他又第二次入阁参预大政,并兼翰林院学士。宪宗时,彭时官至兵部尚书,兼学士,同知经筵,参加《英宗实录》的编修,书成后,被擢为太子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居官期间勤于政事,忠心不二,多有建树。卒于官,赠太师,谥曰:“文宪”。

策问

制曰：自昔君天下之道莫要于内治之政修，外攘之功举 。斯二者，圣人所以跻斯世于雍熙泰和之域也。夫修内治之政，必先于爵赏刑罚；而举外攘之功，必本于选将练兵。且爵所以待有功，必待有功而后爵，则天下有遗善；刑所以待有罪，必待有罪而后刑，则天下有遗恶。古先圣王无遗善无遗恶，必有不待有功而爵，有罪而刑者矣，其事安在？兹欲人人皆迁于善，不待爵赏而自劝，皆远于罪，不待刑罚而自惩，其道何由？凡兵之所统者，将；将之所用者，卒；卒之所仰者，食；而战则资于马。曰将、曰卒、曰食、曰马四者，外攘所不可阙一也。昔之君子以谓将其卒，则选其卒之良；戍其地，则用其地之人；战其野，则食其野之粟；守其国，则乘其国之马，庶几可以百战无殆。不然则一郡用兵，而取给百郡，非善策也。夫众至千万必有一杰，然智愚混淆，同类忌蔽，何以能知其杰而拔置军旅之上欤？一方之人，有戍有农，然戍非土著，农不知武，何以能作其勇而驱列御卫之间欤？田有肥瘠，岁有丰歉，何以能致其粒，而积贮仓廪欤？土地气候，产牧各殊，何以能致其息，而充溢边鄙欤？朕祗承祖宗大统，拳拳以经国子民为心，而于安内攘外尤加意焉。子诸生学古通今，而来必深于其道矣。其具以对，无骋浮夸，务陈切实，朕将采而用之。

对策

臣闻：天下以一人为主，人君以一心为主。善心者，万化之原，万事之本也。大哉，人君之一心乎！本诸心以安内，则内治之政修；本诸心以攘外，则外攘之功举。尚何患乎赏善罚恶之不得其当，选将练兵之不协其宜，而斯世之不跻于雍熙泰和之域也哉！《大学》以是心为家国天下之本，董仲舒以是心为朝廷四方之则，其以此欤？

钦惟皇帝陛下禀聪明睿智之资，备圣神文武之德，诞膺骏命，嗣守鸿图，临御以来，拳拳以经国子民为心。先之以励精，加之以恭俭，其于安内攘外之道，已无不尽，而见诸治效者，亦已盛矣。而犹不自满足，乃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首举爵赏、刑罚，次及选将、练兵之事，而责臣以切实之言。臣愚有以知陛下真大有为之君也！可以为尧舜，可以为禹汤、文武，可以隆太平之业于万亿年而愈盛矣！顾臣浅陋，何足以奉大对，然罄一得之愚，亦臣区区之素愿也，敢不俯竭刍荛以少裨于万一。

臣窃惟天生圣人，而付以君道之重，圣人奉天，而主宰天下之大。内而中国仰之以治，外而四裔赖之以安，则夫修内治之政，举外攘之功，夫岂可以一日而或废哉？然求其要，不越乎爵赏、刑罚、选将、练兵之四者耳。夫爵固所以待有功，功者，善之著于事也。若必待有功而后爵，则天下之善未著于事者，必至于见弃，何以使之皆知所劝而建功乎？刑固所以待有罪，罪者，恶之形于行也。若必待有罪而后刑，则天下之恶未形于行者，必至于苟免，何以使之皆知所惩而远罪乎？斯二者诚如圣问之所谕也，臣复奚言。

臣尝窃观唐虞三代之时，其赏善也，有三德而日宣者为大夫，有六德而日严者为诸侯。或俊乂之旁招，或宅俊之克用，与夫贤能之宾兴，俊造之升进，凡此皆不待有功而後爵者也。其罚恶也，象刑以弼五教，制刑以教祇德。或畔官离次之必诛，或羞刑暴德之必罚，与夫左道乱政者，戮之而不赦，悖礼疑众者，杀之而不宥，凡此皆不待有罪而后刑者也。然亦岂徒事乎爵赏、刑罚而无其本哉，盖一本诸心而已矣。观夫尧之兢兢、舜之业业，而懋敬于命德讨罪之政者，其心为何如？禹之孳孳、汤之栗栗，文王之翼翼小心、武王之无作好恶，而克谨于彰善惮恶之事者，其心为何若？肆赏罚之有道，劝惩之有本，而下无遗善、遗恶者，以此也。兹欲人皆迁于善，不待爵赏而自劝，臣愿陛下心唐虞三代赏善之心，使赏不徒赏，赏一人而千万人知劝，则我朝赏善之典，与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赏善者，同一揆矣。何忧乎天下人之不皆迁于善哉！兹欲人皆远于罪，不待刑罚而自惩，臣愿陛下心唐虞三代罚恶之心，使罚不徒罚，罚一人而千万人知惩，则我朝罚恶之政，与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罚恶者同一辙矣。何忧乎天下人之不皆远于罪哉！如是则善者列爵而登庸，恶者率德而改行，礼义廉耻之行兴，诡诈偷薄之风息，百官有济济之容，黎民有皞皞之俗，而雍熙泰和之治而跻矣。

若夫兵之所统者将，将非其人，则国无所倚以为安，将之所驭者卒，卒有不练，则将无所恃以取胜。而况卒之强弱由于食，战之胜负系乎马。是则曰将，曰卒、曰食、曰马，四者皆外攘急务，而不可有一之或阙焉者。而陛下讦谟远猷，已断自宸衷矣！臣奚以多言为？昔之善用兵者以为将其卒则选其卒之良，盖卒不良，则有不闲弓马之患。戍其地则用其地之人，盖非其地，则有不习水土之虞。战其野则食其野之粟，庶可以省转输之劳。守其国则乘其国之产，庶可以免调发之扰。如是则虽百战而无殆矣。不然，则一郡用兵而取给百郡，不惟无以卫民之生，而且有以疲民之力，诚非策

之善者。唐虞三代之时，其选将也，舜惟谆谆于敷文德之伯禹，文王惟汲汲于著鹰扬之吕望，经营四方有若召虎，克壮其猷有若方叔者焉。其练卒也，成周之制，春夏有振旅茇舍之教，秋冬有治兵大阅之习。井田之中，卒伍以具耒耜之暇，干戈以举，其兵食则登三余一之有其备。其马政，则天闲延厩之有其制。要其本，何莫非帝王一心之运用哉！夫众至千万必有一杰，良将之才未尝无也，必欲知其杰而用之。臣愿陛下心唐虞三代选将之心，而又精神以感召之，气类以招徕之。投之胶轕繁剧之地，以观其智，置之艰难险阻之中，以观其才，则虽伯禹、吕望、方叔、召虎之流，世不易德，而凡才智出众之士，必皆拔置于军旅之上矣。何忧乎智愚之混淆、同类之忌蔽哉！一方之人有兵有农，是盖兵农岐而二也，必欲作其勇而用之，臣愿陛下心唐虞三代练卒之心，而又择将帅统之，宽杂征以恤之，使三时务农以备衣食，一时讲武以闲步伍，尤于春蒐、夏苗、秋狝、冬狩之时，益严夫简阅练习之事，则可驱列于御卫之间矣。何忧乎戍非土著而农不知武哉！至若田有肥瘠之不同，岁有丰歉之或异，而兵食始有不足之虞。臣愿陛下体唐虞三代之心，以足食为念，而又择人以督耕屯，使绳其兼并，课其勤惰，则可致其粒，而积贮于仓廪者，陈陈相因矣。虽古之万亿及秭与夫贮积于豳，粮峙于申者，何以加焉。土地气候之不齐，监牧畜养之不力，而马政始有不蕃之弊。臣愿陛下法唐虞三代之心，以息马为重，而又择人以掌监牧，使之时其刍秣，谨其孕字，则可致其息，而克溢于边鄙者，翩翩成群矣！虽古之天闲十二，与夫思马斯臧，騋牝三千者，何以过焉！诚如是，则将皆智勇而无不良，卒皆果敢而无不精，食皆克裕而无不给，马皆孳息而无不蕃。由是而举外攘之功，有不战战必胜矣，有不攻攻必克矣，有不守守必固矣。将拭目乎四裔畏慕，稽首称藩。边徼无烟尘之警，人民有耕凿之安，而雍熙泰和之治于铄哉，于今为烈矣！此修内治之政，而与外攘之功，所为不可一日而

或废者,此也。

洪惟我国家圣圣相承,丕图治理,太祖高皇帝奉天命而肇造邦家,太宗文皇帝顺人心而肃清海宇,其内治外攘之道,垂裕后圣而无穷。仁宗昭皇帝溥惠泽以福苍生,宣宗章皇帝奋德威以安裔夏,其内治外攘之道,仰绍前烈而有光。陛下缵承大统,丕阐洪猷,而于内治外攘之要,盖已知之审而行之至矣。今又以策臣等而必以尤加意为言,臣愚又有以知陛下留心于此,此即大禹不息满假,文王望道未见之盛心也。

陛下之策臣者,臣既已略陈之,而于终篇窃有献焉。夫人主一心,与天地同其量,与日月同其明。天地惟不息,故覆载而无外;日月惟不息,故照临而不已。臣愿陛下体天地日月之不息,宏覆载照临之大德,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则宗社民生之福,必由此而愈盛;冠带春秋之伦,必由此而咸服;三光六气必由此而顺行;五岳四渎必由此而奠位;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必由此而蕃庶;麟凤龟龙、膏露醴泉、与凡体徵嘉瑞者,必由此而毕至。将见四方万国莫不遵道遵路,来享来王,以为尧舜之圣复见于今日,禹汤文武不得专美于前古,陛下亿万年 之洪福,与天地相为悠久矣。臣学不足以知古,才不足以通今,刍荛之言,上渎天聪,伏惟陛下俯垂睿览,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臣谨对。

评析

这篇对策的妙处在于以虚对实。

明英宗策问中所提的问题,无论是“内治之政”的“爵赏刑罚”,还是“外攘之功”的“选将练兵”,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一些更加具体

的问题，都应是实实在在的治国之策。在回答这些具体实在的问题时，照一般常理，应详尽筹画，据实以对，拿出个能够操作、具体可感的一二三来。但是作者却悖于常情，别出心裁地用玄而又玄的“心”学来应对之。他处处以少对多，以不变对万变，任对方是什么刁钻古怪的问题，都能用“心”学来回答。“爵赏刑罚”之举要本诸“心”，这种“心”是如尧舜禹汤文武诸圣明君主之心的“赏善罚恶”之心。“选将练兵”之举也要本诸“心”，这种“心”是唐虞三代的“选将练卒”之“心”。至于“足食”、“息马”之策也要本诸“心”，这种“心”当然也是唐虞三代的“足食息马”之“心”。总之，在作者看来，“心”是“万化之原”、“万事之本”，君主只要“本诸心以安内，则内治之政修；本诸心以攘外，则外攘之功举”。如此，“斯世”就会“跻于雍熙泰和之域”。

“心”的作用和能量可以说是相当大的，但是这种“心”却只是一种意会与思维之物，是玄虚、抽象的。用这种虚的东西来应对那些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当然从常情上看是有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有些答非所问。但实际上却很能看出彭时的巧妙用心。一是如此既可以面面俱到，又可以节约笔墨，缩短篇幅，使文章显得简炼精要。二是，既能诸问俱答，一一应对，又能避无政治经验之所短，扬有治学体会之所长。三是既不去直接冒犯“龙颜”，又能间接地微含讽谏，对英宗“心术不正”的行为有所规劝。

彭时可谓用心良苦了！

（苗菁）

天顺元年(1457)丁丑科

状元:黎淳

黎淳(1423～1492)字太朴,号朴庵,湖南华容县人。少年苦学,胸怀大志。天顺元年(1457)举进士第一,例授翰林修撰,预修《大明一统志》。后又参预修撰《英宗实录》、《资治通鉴纲目》。历官左庶子、礼部右侍郎、南京工部尚书。居家俭朴,好恤亲友。为官耿介,尤好直言。有《龙峰集》。卒谥"文禧"。

策问

制曰:朕惟帝王治天下,必以求贤安民为首务,盖古今之所同也。然古之士进以礼,退以义,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今何其立功之志弱,而利禄之心胜;奔竞之风未息,而廉介之节少著,其失何

由？古之民有恒产，有恒心，家给人足，比屋可封。今何其务本者少，而逐末者多，偷薄之浸长，而礼让之俗未兴，其弊安在？朕自复位以来，图惟治理，夙夜靡宁，求贤必欲得真才，安民必欲获实效。将使士正其习，民淳其风，庶几唐虞三代之盛，必有其道。子大夫其援经据史，酌古准今，明以条陈，毋曲所学，毋卑所志，务求切至之论。朕将择而行焉。

对策

臣对 臣闻帝王之治天下，在乎求贤安民而已。求贤安民，在乎智仁兼尽而已。盖求贤者，智之事；安民者，仁之事。非智不足以求贤，非仁不足以安民。智以求贤则迪知忱恂，而真才无不得；仁以安民则博施济众，而实效无不臻。真才既得，士习由是而正；实效既臻，民风由是而淳。尧舜所以帝天下而陶民熙皞者，此也；禹汤文武所以王天下，而措世隆平者，亦此也。故《书》曰："在知人，在安民。"又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其是之谓欤？

钦惟皇帝陛下禀聪明睿智之资，全刚健中正之德，曩者嗣大历服已历十有五年。日御经筵，讲求治理。声色货利无所通殖，宫室苑囿无所增广，惠泽覃被于八荒，声教洋溢于四海者久矣。兹乃应天顺人，复登宝位。诞膺新命，光复旧物。言动不违乎祖训，举措允合乎天心。所谓多难兴邦，而殷忧启圣者也。是以伦纪粲乎其肇修，风俗蔼乎其丕变。而功业文章，巍然焕然，已驯致乎唐虞三代之隆矣。然犹体道谦冲，不自满足，特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首以求贤安民为务，期在士正其习，民淳其风，且拳拳欲求切至之论。

臣愚有以知陛下此心，即舜之好问好察、禹之闻善则拜、文王望道如未见之心也。其所以复大一统文明之治，绵千万载太平之业，端在此矣。顾臣愚陋，无所知识。然明命下临，敢不精白一心，以对扬于万一乎。

臣惟天生斯民不能自治，而必作之君。君抚斯民不能独理，而必资乎臣。故人君之为治，不必务乎至高难知，惟在求贤而已。不必务乎至远难行，惟在安民而已。昔者唐虞三代之求贤也，若时若采之登庸，三德六德之咸事。肱股耳目，皆有所托；贤德忠良，举无所蔽。或三宅三俊之克即，或义德容德之继用。其得贤之盛如此，岂无自而然哉。盖由智之极其明耳。若尧之畴咨明扬本于钦明，舜之翕受敷施本于浚哲，禹则明明于万邦，汤则经德而秉哲，文武则聪明齐圣，克知灼见，谓非智之极其明乎！夫惟智之极其明，如鉴之空，而妍丑自辨；如衡之平，而轻重自分。贤否不得以混淆矣。然上之人既明于知人，而贤者乃得行其志。是故其进也以礼，不枉道以干禄，不炫玉而求售，盖主乎辞逊，而不轻于进也。其退也以义，或见几而必作，或不合而即去，盖主乎断制，而不难于退也。所以士之用于当世者，必为上为德，而使君为尧舜之君。为下为民，而使民为尧舜之民。又岂不行其道，而尸位素食哉！所谓求贤而得真才者以此。至若唐虞三代之安民也，黎民有于变之休，万国有咸宁之效。平治水土而烝民乃粒，辑宁邦家而兆民允殖。有夏为之修和，四海为之永清，其安民之功如此，又岂无自而然哉。盖由仁之极其爱耳，若尧之协和万邦，本于其仁如天。舜四方风动，本于其德好生。禹则德惟善政，汤则克宽克仁，文武则怀保小民，宠绥四方。谓非仁之极其爱，万物一体，而惠泽为之溥施，天下一家，而教化为之大行，远近咸归其极矣。然上之人既笃于爱民，而下民乃得遂其生。是故民有恒产，必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而游手游食者无有也。民有恒心，必孝、弟、忠、信之是修，

放辟邪侈之不作，而败礼、乱常者无有也。所以民之生于其时者，家给人足，而欢然于仰事俯育之余；比屋可封，而蔚然于礼乐教化之内。又岂衣食是忧而五品之不逊哉。所谓安民而获实效者以此。夫二帝、三王智以求贤，仁以安民，而得其真才实效，于是之极盛矣。自时厥后，若汉唐宋之英君，虽或知以求贤安民为务，而于智仁不能兼尽，是以真才未必得，实效未必臻。回视唐虞三代之治迢遥其不可及也。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命以创鸿业，太宗文皇帝顺人心而靖邦家，其求贤安民之道，远绍帝王而有光。仁宗昭皇帝敷大惠以宁四海，宣宗章皇帝明俊德以绥万方，其求贤安民之道，近述祖宗而无间。夫何承平日久，趋向渐乖，士习或流于贪纵，民风或至于浇漓。朝廷虽急于求贤，然为士者立功之志弱，而利禄之心胜，奔竞之风未息，而廉介之节少著。岂所谓求贤者徒徇虚名，而未得真才之故欤？使得真才而用之，尚何有是失哉！朝廷虽急于安民，然斯民务本者少，而逐末者多，偷薄之习浸长，而礼让之俗未兴。岂所谓安民者徒事虚文，而未臻实效之故欤？使臻实效而验之，尚奚有是弊哉！仰惟陛下复位以来，图惟治理，夙兴夜寐，汲汲于求贤；宵衣旰食，切切于安民。然求贤必欲得真才，而安民必欲获实效。将使士正其习，民淳其风，庶几唐虞三代之盛，必有其道者。臣愚以为在陛下智仁兼尽而已。臣伏睹陛下详经制以网罗天下之贤，或由科目举，或由胄监选，或以贤良方正荐，或以杯材抱德征，此陛下求贤如渴之心也。奈何人藏其心不可测度，直者似讦，而刚者似傲；佞者似忠，而诈者似信。所谓珉中玉表而凤鸣鸷翰者也。况秉铨衡者未尽其公，司考课者或乖乎正，回邪谄媚之徒得跻于显融，而刚方廉洁 之士或困于诋毁。真才何由而得乎？陛下求贤果欲得真才，必本乎此心之智，洞察其贤否，灼见其虚实。励精选举之方，申严考课之法，登崇俊良，简任忠直。置之庙堂之上，布之藩臬

之中，言行足以表率乎群僚，政事足以抚绥乎黎庶。譬之木焉，本端而末自直。譬之水焉，源澄而流自清。将见今之士进必以礼，而不蹈希世取宠之非；退必以义，而咸知固位贪权之耻。急于行道济时，而奋立功之志。力于输忠效劳，而忘利禄之心。以恬静为尚，而奔竞之风自息；以贪墨为戒，而廉介之节自著。即《书》所谓："允迪厥德，谟明弼谐。"《诗》所谓："济济多士，秉文之德"者也。尚何士习之不正哉？

臣伏睹陛下颁明诏以轸念元元之苦，或蠲租税以宽之，或发帑藏以济之，或申节俭之制，或开减省之条。此陛下视民如伤之心也。奈何民生多欲，因物有迁。夏暑雨而阻食，冬祁寒而阻衣，孤独鳏寡颠连而无告，饥馑流移濒死而难存。宜乎礼义不兴而奸宄未止也。况司民牧者乏抚字之勤，职风化者乖明伦之教。词讼日繁，而刑清之颂不作；田野就荒，而击壤之歌未闻。实效何由而获乎？陛下安民果欲获实效，必本乎此心之仁，如疾痛之切于一体，如气脉之贯于四肢，儆戒其劳来之职，严督其劝课之责。所欲与聚，所恶勿施。置之于衽席之安，措之于富寿之域。比闾族党有义以相保，亲疏尊卑有礼以相接。譬之网焉，纲举而目自张。譬之衣焉，领挈而裘自顺。将见今之民产必有恒，不游惰而弃业。心必有恒，不妄作而陷刑。知农事不可缓也，咸耕凿以务其本；知商贩为可贱也，不市利以逐其末。乡闾有塾，则考德问业，而偷薄之习自止；里社有约，则好善恶恶，而礼让之俗自兴。即《诗》所谓："群黎百姓，遍为尔德。"《易》所谓，"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者也。尚何民风之不淳哉？夫如是、则陛下之治天下，端不异于唐虞三代之盛矣。此臣愚见断以为，智之明足以求贤，仁之爱足以安民，是以其效自有不期然而然者也。

然陛下之策臣者，臣既略陈之矣，而于终篇窃有献焉。夫求贤安民，固本于陛下之智仁，而智仁之尽，尤在乎陛下之一心。盖心

者，一身之主宰，万事之本根，所以统五官而令百体者也，所以恭天地而赞化育者也。陛下必欲常存是心，又必以敬为之主焉。静而主敬，以全其心之体；动而主敬，以达其心之用。以之求贤则智极其明，以之安民则仁极其爱，然而是敬奚翅为智为仁，以尽求贤安民之道而已乎。至于视听言动，一循乎天理；好恶用舍，必合乎时中。殆见四方万国，必由此而咸和，九夷八蛮，必由此而宾服，五岳四渎，必由此而效宁，四时五行，必由此而顺序。旷世之祥于是乎并见，诸福之物于是乎骈臻。宋儒程子所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而四灵毕至者也。如是则陛下之治，卓冠百王而垂亿万年之休，与天地相为无穷者，自兹始矣。臣学识肤浅、不能援经据史，酌古准今，谨直述以对。若夫曲所学以阿世，卑所志以徇时，则臣不敢以自处也。伏惟陛下少垂睿览，天下幸甚。臣谨对。

评析

黎淳以"求贤安民"四字应对策问，颇能迎合英宗此时的心情。因为"土木堡之变"中，蒙古瓦剌部酋长也先率部俘获"御驾亲征"的英宗，并挟英宗进攻北京。此时，英宗弟郕王朱祁钰受命于危难之时，先是监国，后即皇帝位，年号景泰。他遥尊英宗为太上皇，重用于谦等大臣，败也先于京郊，使明朝统治得以安然。代宗即位，英宗便失去了价值，也先只好放回了英宗。英宗在南宫当了8年的太上皇，不甘寂寞，于景泰八年(1457)正日十六日，乘代宗病重之机复辟帝位。接着诛杀功臣于谦及大学士王文等，改元天顺。正是在这样的血风腥雨中，明王朝又一次开科取士。英宗的

策问中有“求贤必欲得真才，安民必欲获实效”之语，分明显示出，他要在复辟之后安定人心，平恤朝野，使天下之人能对他倾心拥护，以便能渡过难关，长期统治。所以黎淳独标“求贤安民”四字大作文章，是很对英宗的心路的。

怎样才能“求贤安民”呢？作者的论点是：“求贤安民，在乎智仁兼尽而已。盖求贤者，智之事。安民者，仁之事。非智不足以求贤，非仁不足以安民。”这就是说“求贤”要讲“智”，“安民”要讲“仁”。那么什么是“智”与“仁”呢？作者认为“智”即是一种“洞察其贤否，灼见其虚实”的鉴别能力；“仁”即是一种“视民如伤”的慈民爱物之心。那么怎样在“求贤”上运用“智”，在“安民”上化用“仁”呢？作者针对当时的现实，很真切地提出，运“智”当“励精选举之方，申严考课之法”，即在选拔官员时应“登崇俊良”，在任用官员时应“简任忠直”，总之严把选拔、任用两关。运“仁”当重农事，轻商贩；行乡学，订乡约；“所欲与聚，所恶勿施，”总之应以便民，重家，教化人民为务。作者的这些论点虽然多是封建社会传统思想的引申，但是也是针对明代自正统年间之后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供税不足，则鬻男卖女”，以至离乡背井，四处流亡；官场世风日下，奸邪当道，利禄之心日胜，奔竞之风日急的现实情况而言的，有十分强烈的针对性。

作者的对策还相当注意文辞的优美和感染力。如他在论述“任贤”时，指出“登崇俊良”，“简任忠直”的重要性时，很恰切地插入了一个比喻：“譬之木焉，本端而末自直。譬之水焉，源澄而流自清”。在论述“安民”时，指出“所欲与聚，所恶勿施”的重要性时，也不失时机地运用了个比喻：“譬之网焉，纲举而目自张。譬之衣焉，领挈而裘自顺”。既使得文意显豁，生动形象，又使得文辞华美，富有文采。此外，像对偶句与排比句的适当运用，文章结构的前后呼应，就又使得表达效果起伏跌宕，极富感染力。 （苗菁）

天顺四年(1460)庚辰科

状元:王一夔

王一夔(1425~1487),新建(今属江西)人。本姓谢,祖父与人结仇,避祸于外祖父王氏家中,因冒姓王。一夔自幼发愤苦读,于英宗 天顺四年(1460)三月参加殿试,一举夺魁,钦点状元。援例授翰林院修撰。进官左谕德。后历任数官,直至工部尚书,死于任上。

策问

制曰:朕惟治天下亦多术矣,举而行之,必有其要。《传》谓: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然则其要固不出此四者,而行之亦有先后缓急之序欤?唐虞三代所以措天下于雍熙泰和之盛者,率用此道,可历指其实而详言之欤?后之有天下者莫若汉、唐、宋,其间英君谊辟,亦有用此道者。然而治效不能比隆于唐虞三

代，其故何欤？朕嗣承祖宗鸿业，孜孜图治，夙夜不遑，于礼、乐、刑、政，亦既备举而并行之矣。而治效犹未极于盛，何欤？兹欲究礼、乐之原，求刑、政之本，行之以序，而达之不悖，用臻唐虞三代之盛，其道何由？子大夫潜心经史有年矣，其详著于篇，朕将采而用焉。

对策

臣对 臣闻帝王之治，本于道。帝王之道，本于诚。盖诚为道之实，而道即礼、乐、刑、政之理也。礼乐而非诚，无以立其体；刑政而非诚，无以达其用。惟其诚也，由是而制礼作乐，则礼备而乐和；由是而明刑修政，则刑清而政举。故善为治者，未有不本于道；善行道者，未有不本于诚。二帝之所以帝天下而世跻雍熙者，此诚也；三王之所以王天下而偕臻康乂者，亦此诚也。下逮汉唐宋之英君谊辟，所以不能比隆于二帝三王，而治不古若者，庸非此心之诚有或间欤？大哉，诚乎！其为万物之本原、万事之枢纽，人君为治之大本乎？

钦惟皇帝陛下聪明先物，睿智有临，法二帝三王之要道，绍祖宗列圣之宏规。曩者嗣大历服，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凡耳目之娱，珍异之献，悉诚心罢去，与民休息。是以十五年间，朝廷清明，民物熙皞，四时调玉烛之和，万汇赞祯祥之应。属者顺天应人，复登宝位，乾坤为之再造，人纪为之肇修，礼乐明备，刑政修举。普天之下，莫不讴歌乎凰仪兽舞之治；率土之滨，莫不甄陶于鸢飞鱼跃之天。治效之盛，振古而无以加矣，是皆本于皇上至诚行道之所臻也。兹犹不自满假，乃涣纶音，下明诏，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首

之以礼乐刑政施为缓急之序，继之以唐虞三代汉唐宋治化隆替之由，终之以所以用礼乐刑政而克臻帝王治效之道。至哉，问也！顾臣愚陋，曷足以上揆渊衷。虽然，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陛下既诚心发策以下问矣，臣敢不悉心披诚以上对乎？

窃惟帝王治天下之术，非一端也，然所行之要，不越乎礼乐刑政而已。盖礼有三千三百之仪，所以节民之心、使 其所行无过不及焉。乐有五音不律之作，所以和民之声、使 其所言无所乖戾焉。故曰安生治民，莫大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是礼乐所以教民，而为出治之本。陛下所谓先与急者，在是也。若夫政者，法制禁令也，所以一民之行，而率其倦怠焉。刑者，墨劓剕宫大辟也，所以防民之奸，而惩其恣肆焉。故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是刑政所以弼教，而为辅治之具。陛下所谓后与缓者，在是也。虽然，礼、乐、刑、政固有先后缓急之序，要之亦不可以偏废也。使有礼乐而无刑政，则徒善不足以为治。使有刑政而无礼乐，则徒法不能以自行。故《传》谓：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诚哉！是言也。稽之于古唐虞之时，以言其礼，则五礼修而三礼明；以言其乐，则六律和而八音谐，礼乐于是乎大备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而六府三事之允。治明于五刑，刑期无刑，而五服三就之克允，刑政于是乎大彰焉。是以当时万邦协和，而黎民有于变之休；庶绩咸熙，而四夷有来王之效。岂非唐虞能用礼乐刑政，而臻雍熙泰和之盛乎？然推其所由，则又本于尧之允恭克让、舜之温恭允塞之所致也。夏商之世，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乐正崇四术以教士习，立典则以贻子孙，而有关石和钧之设焉。制官刑以儆有位，而有三风十愆之训焉。成周之世，宗伯掌五礼以亲万民，司乐掌六乐以谐万民，司马掌邦政以九法正邦国，司寇掌邦刑以三典诘四方，情文备而制度详 。是以当时养教四讫，而兆民允殖，丕冒海隅，而万姓悦服。岂非三代能用礼乐刑政，而致雍熙恭和之盛乎？然原其所自，

则亦本于禹之允迪厥德，汤之咸有一德，文武之纯亦不已，丕则敏德之所致也。夫唐虞三代以诚心行道而致治效之盛如此。后之有天下者，莫如汉唐宋君。高祖之豁达大度，文帝之恭俭玄默，武帝之雄才大略，宣帝之综核名实，以至光武之沉议先物，明帝之下身遵道，章帝之左右艺文，此汉之英君谊辟也。观其用绵蕞所习之仪，奏昭德五行之舞，制屯田而定租税，作九章而除肉刑，其用礼乐刑政也如此。然或不事诗书，或谦让未遑，或内多宠欲，或择术不审，又有吏事深刻，察察为明，优柔不断者。求之当时，虽有海内富庶，几致刑措之风；百姓宽息，人赖其庆之美。方之唐虞三代雍熙之化，不啻武夫之于美玉矣。此无他，由其徒用礼、乐、刑、政而行之，不能本乎诚故也。若夫太宗之英迈绝伦，玄宗之励精图治，宪宗之刚明果断，此唐之英君谊辟也。观其采古制而定章服，分二部以习音乐，立府兵、租庸调之法，除断趾而增覆奏，其用礼乐刑政也如此。然而一则假仁喜功，一则惑于女色，一则不终其业。考之当时，虽有斗米三钱、绝域来庭之盛；民皆乐业、威令几振之美。揆之唐虞三代恭和之治，不啻鱼目之厕美珠矣。此无他，由其徒用礼、乐、刑、政而行之，不能本乎诚故也。迨夫有宋之兴，太祖之仁义，太宗之沉谋，有以开创于前。真宗之英悟，仁宗之仁恕，有以守成于后。真所谓英君谊辟矣。观其定朝仪而详服制，正音律而录名数，严科禁以弭奢僭，采敕条以为卷编，固皆用礼乐刑政以图至治矣。然或好微行，或伤恩义，或假符瑞而封禅，或以邪正而互用，虽曰治效有过于汉唐，而亦不能比隆唐虞三代也。详其所以，又岂非设诚于内者有或替欤？夫汉唐宋诸君，不能诚心行道，而治效不古若者如此。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区夏，太宗文皇帝肃清邦家，而隆古之风以振。仁宗昭皇帝继其统，宣宗章皇帝纂其功，而隆古之治益彰。所以然者，固不外乎礼、乐、刑、政之用。原其所以用礼、乐、

刑、政，又岂不本于列圣至诚之心也哉。陛下应天人之笃心，嗣祖宗之洪业，复位以来，孜孜图治，夙兴夜寐，不遑宁处。虑民性之未中也，则用礼以节之；虑民声之未和也，则用乐以和之。而礼也乐也，固并举而无遗矣。虑民行之不一也，则修政以一之；虑民奸之未息也，则明刑以防之。政也刑也，亦并行而不偏矣。是以治效之盛，旷古莫及。而圣心犹有治效未极于盛之虑，臣有以知陛下真大有为之君，真不世出之主，真可以四三王，六五帝，而视汉唐宋诸君，风斯下矣。陛下欲究礼乐之原，臣则以为礼乐之原，固不外乎一诚。陛下欲求刑政之本，亦不外乎一诚。盖真实无妄，纯粹不杂者，诚也。一有所杂，则伪而不诚矣。悠久不息，始终无间者，诚也。一有所间，则息而不诚矣。陛下运此心以兴礼乐，则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而礼不失于昵，乐不流于淫矣。陛下运此心之诚以用刑政，则一政之出，人皆信之如蓍龟；一刑之施，人皆畏之如铁钺。而政不失于乖，刑不流于惨矣。礼、乐、刑、政虽备举而并行，然礼乐在所当先，刑政在所当后。析而言之，又必先礼而后乐，先政而后刑，此四者施行之次序也。行之既有其序，则礼乐昭宣，刑政修举，极天蟠地，周流四达，凡天下之民，莫不是遵是守，而无违悖者矣。然所以行而达之之要，实在于陛下一念之诚焉。陛下能于礼、乐、刑、政之用，一本于诚，则治化之盛，又何患乎不与唐虞三代同驱而并驾哉！将见今之黎民，与唐虞之黎民，同一于变时雍矣。今之百姓，与三代之百姓，同一遍为尔德矣。何则？世有古今，而道无古今。人有先后，而心无先后，惟在陛下至诚以感化之耳！所谓惟天下至诚为能化是也。

然陛下之策臣者既如此，而篇终又启之曰：子大夫潜心经史有年矣，其详著于篇，朕将采而用焉。臣受陛下生成之恩，沐陛下教养之德。平昔之所涵养者，忠君报国之心；师友之所讲明者，致君泽民之事。虽援经据史之对，有未及详而责难，陈善之志实所抱

负，既领春官之荐，叨奉大廷之对，正愚臣叩阊阖呈琅玕之日，谨拜手稽首而献言曰：诚之为道，其大矣乎！具于太极之浑沦，而极于天地之变化；始终夫妇之隐微，而著于鸢鱼之飞跃。亘古亘今，莫非此诚之所为。彻上彻下，莫非此诚之所寓。故修身而不以诚，则欲得以间理。用人而不以诚，则邪得以间正。况礼乐刑政，为治天下之大经大法，而行之不本于诚，可乎？《中庸》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即诚也，诚之为道，信乎其大矣。臣愿陛下存此心之诚，不贰以二，不参以三，不以始终而有殊，不以先后而有间。大廷如是，深宫亦 如是。大政大事如是，微言细行亦如是。存养于端庄静一之中，省察于应事接物之际。出一言也，无非实理之所发；行一事也，无非实理之所著。由是而法帝王，必能合时措 之宜，而不泥于古矣；由是而法祖宗，必能尽崇述之美，而有光于前矣。殆见德之所及，广大如天，极覆载之间，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信乎唐尧虞舜，复见于今日；禹汤文武，不得擅美于前世矣。臣之愚见，始以诚为陛下勉，终以诚为陛下献。良以同民心出治道，而极其盛者，实由于此。伏惟万几之暇，少垂睿览，则国家幸甚，生民幸甚。臣干冒天威，不胜恐惧战栗之至。臣谨对。

评析

李腾芳在《山居杂著》中曾说："作文须先立意，苏东坡云：'儋州虽数百家之聚，而州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不可徒使 ，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认为写作要先有命意，才好选材。立意犹如购物之钱，

是统摄百物的根本。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中一般都是较重立意的，尤其是在应对的文章中，要想达到见解精深、逻辑严密的艺术效果，一个好的、集中的立意是必不可少的。

王一夔的这篇应对文章很好地注意到了立意的问题。他面对殿试策问中提出的诸问题高屋建瓴地用一个“诚”统率之。然后以此为立论的根本，从容不迫地回答了策问中所提出的问题。

首先，策问中问道：唐虞三代使天下达到“雍熙泰和之盛”，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王一夔回答说：这完全是“唐虞三代以诚心行道”的结果。其次，策问中又问道：汉唐宋“其间英君谊辟，亦有用此道者。然而治效不能比隆于唐虞三代”，这又是为什么呢？王一夔又回答说：这是因为汉唐宋诸君“不能诚心行道”的缘故所致。在得出这两个结论的论述过程中，王一夔运用了大量的事实和史料，正说反说，前后对比，立中有破，破中有立。这种既归纳事实，又反复论辩的手段使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得到加强。

最后，对策问中关于如何治理当代的问题，王一夔合二归一，也用“诚”进行了回答。他说：“礼乐之原”、“刑政之本”都不外是一个“诚”字。那么什么是“诚”呢？开端没有解说，中间没有解说。到了这里，针对着现实的情况，他进行了阐释，他认为：“盖真实无妄、纯粹不杂者，诚也。……悠久不息，始终无间者，诚也。”也就是说，“诚”有两个含义，一是“真”与“纯”；二是始终如一、坚持到底。这实质上是对英宗的委婉劝谏，在王一夔看来，一个皇帝只要既能真心待民，又能善始善终，那他就是个好皇帝。如此，则“治化之盛，又何患乎不与唐虞三代同驱并驾哉！”同样是讲“诚”的问题，王一夔在这时为了避免直接涉及当代的一些敏感问题，主要是运用了演绎法，步步推理，导出结论。这样写虽有些枯燥，但是却较为周详，显得富有逻辑性。

在应对策问的问题时，王一夔以不变应万变，以“诚”字统万

端，所以游刃有余，从容不迫，颇能迎合圣意。

（苗菁）

成化二年(1466)丙戌科

状元:罗伦

罗伦(1431~1478)字彝正,号应魁,人称一峰先生。永丰(今江西广丰)人。出身农家,谦让温和,发愤读书,于成化二年(1466)参加殿试,高中榜首,钦点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因上疏言事,得罪当朝,外放为福建市舶司副提举。因商辂上谏,罗伦才官复原职,改任南京。后因病归乡,死时年仅48岁。赠右谕德,谥文毅。有《一峰集》传世。

策问

制曰:朕惟古昔帝王之为治也,其道亦多端矣。然而有纲焉,有目焉,必有大纲正而万目举可也。若唐虞之治,大纲固无不正矣,不知万目亦尽举欤?三代之隆,其法寖备,宜乎大纲正而万目举也。可历指其实而言欤?说者谓汉大纲正,唐万目举,宋大纲亦

正万目未尽举。不知未正者何纲？未举者何目？与已正已举之纲目，可得而悉言欤？我祖宗之为治也，大纲无不正，万目无不举，固无异于古昔帝王之治矣。亦可得而详言欤？朕嗣承大统，夙夜拳拳，惟欲正大纲而举万目，使人伦正于上，风俗厚于下。百姓富庶，而无失所之忧。四夷宾服，而无梗化之患。薄海内外，熙然泰和，可以增光祖宗，可以匹休帝王。果何行而可，必有其要。诸士子学以待用，其于古今治道，讲之熟矣。请明著于篇，毋泛毋略，朕将亲览焉。

对策

臣对 臣闻居天下之大位，必致天下之大治；致天下之大治，必正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本，必务天下之学。尧舜禹汤文武之位，天下之大位也；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天下之大治也；尧舜禹汤文武之心，天下之大本也；尧舜禹汤文武之学，天下之大学也。有其学然后能正其心，有其心然后能致其治，有其治然后能保其位。治也者，帝王保位之良图；心也者，帝王出治之大本；学也者，帝王正心之要道也。古先圣王知其然，是以尧学于君畴，舜学于务成昭，禹学于西王国，汤学于成伯子，文王学于时子思，武王学于郭叔。其所以精一此学，维持此心者，无不至也。故德泽加于当时，声名垂于后世，功高天下，明并日月，而不可及也。自汉而唐而宋，其间英君谊辟，非不欲致治如唐虞三代。志士仁人，非不欲致君如二帝三王。然寥寥千载，未有一二庶几乎此者。或君有可学之资，有欲学之志，而不遇其臣。如汉高之于萧、曹，太宗之于房、杜，神宗之于安石，是非其君之罪也。或臣有匡国之才，有格君之学，而

不遇其君。如贾、董之于汉，陆贽之于唐，二程夫子之于宋，是非其臣之罪也。此君臣相遇，自古为难，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愤叹，而不能自已也。此汉之所以止于汉，唐之所以止于唐，宋之所以止于宋，而不能唐虞三代者也。臣每观前史，见君有向道慕学之心，而臣不能成之，则悲其臣。臣有匡国致君之学，而君不能用之，则悲其君。陛下继祖宗列圣之位，即尧舜禹汤文武之位也。天纵聪明之资，即尧舜禹汤文武之资也。治已至矣，犹以为未至。德已盛矣，犹以为未盛。乃于万几之暇，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首询唐虞三代下逮汉唐宋诸君，拳拳欲正大纲，举万目，以明人伦，以厚风俗，以富庶百姓，以宾服夷狄，以增光祖宗，以匹休帝王。臣有以知陛下此心，即尧舜禹汤文武之心也。陛下之有此心，非特臣之幸也，天下之幸也。臣敢不以尧舜禹汤文武之学，为陛下勉哉！昔范祖禹上《帝学》八卷，以为自古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推原其故，由人主未学也。朱熹将入对，或曰："正心诚意之说，上所厌闻。"曰："某平生所学者在此，若有所回护，是欺君也。"陛下有志于唐虞三代之治，而无汉唐宋诸君之失，固无不学之心，亦非厌闻正心诚意之说者，臣敢不以平生所学者告陛下，而自陷于欺君之罪哉！使愚臣于此，犬马之诚未尽，刍荛之见或隐，上负朝廷，下负所学。臣恐后之悲今者亦无异于今之悲昔也。臣请因圣问而毕言之，陛下试垂听焉。

臣闻道之大原出于天，是道也，极于至大而无外，入于至小而无内。语其大也，则为父子，为君臣，为夫妇，为朋友，为长幼之伦。若网之有纲，所以根抵乎人心，纪纲乎世道，乃天地之常经，所谓为治之大纲也。语其小也，则为礼乐，为刑政，为制度，为之具，所以扶持乎三纲，经纬乎国体，乃古今之通谊，所谓为治之万目也。是道之纲，非吾心主宰之，则无自而正。是道之目，非吾心维持之，则无自而举。此心也者，所以主宰乎吾身，而为正大纲举万目之根本

也。心虽主宰是纲，非 学则有所惑，纲何从而正？心虽维持此目，非学则有所蔽，目何从而举？此学也者，又所以正其心，而为正大纲举万目之要务也。大纲不正，固不可以言治；万目不举，亦非尽善之道也。故古者帝王之治，其道虽多端，然必大纲既正，而万目兼举。若尧之肇唐，舜之起虞，禹之创夏，汤之建商，文武之造周，皆不能外乎此也。在尧之时，亲睦九族，以广爱敬之恩；釐降二女，以正闺门之礼；馆甥二室，以厚朋友之伦。尧之大纲无不正也。在舜之时，底豫瞽叟，而父子之位定；克谐傲象，而兄弟之化成；刑于二女，而闺门之仪肃。舜之大纲无不正也。钦若昊天，历象授时，命羲仲以秩东作，命羲叔以秩南讹，命和仲以平西成；命和叔以在朔易，命鲧以治洪水，命四岳以明扬侧陋。允厘百工，庶绩咸熙，万目之举于尧何如也？察璿玑以齐七政，举祀礼而观诸侯，命四岳以明四目、达四聪，命十二牧以修内治、服远人，命禹以宅百揆，命契以敷五教，命皋陶以明五刑，命伯益后夔以作礼乐，命龙以作纳言。四方风动，庶政惟和，万目之举于舜何如也？唐虞之大纲无不正，万目无不举如此，岂徒然哉。本于尧舜之心，惟务大学，以正其大本也。不贪淫欲，不嗜玩好，而允执其中，尧之学也。罔游于逸，罔淫于乐，而允迪厥德，舜之学也。使唐虞之君，不事乎此，则学有未正，而大本未立矣。纲何自而正，目何自而举乎？其在禹也，典章之率由，彝伦之攸叙。其在汤也，旧服之既缵，人纪之肇修。其在文武也，麟趾以厚公族，棠棣以燕兄弟，鹿鸣以燕群臣，樛木思齐以严阃教，故其子孙，成敬承继禹之道。或布德陟禹之迹，或率乃祖攸行。或监先王成宪，或笃故正父，或对扬光命，或率德以盖前人之愆，或脱簪以辅中兴之盛。此三代之所以正大纲也。其养也，夏以贡，商以助，周以彻焉。其教民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焉。其制刑也，夏有禹刑，殷有汤刑，周有祥刑焉。其建官也，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人六典，阜成兆民焉。其作乐也，禹作大夏，汤作

大濩，武作大武焉。其正朔也，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焉。其习尚也，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焉。万目之举于三代何如也？三代之大纲无不正，万目无不举如此，岂徒然哉！本于禹汤文武之心，惟务大学，以正其大本也。祗台德先，不自满假，懋昭大德，不殖货利，禹汤之学也。不盘游政，缉熙敬止，不作无益，克慎明德，文武之学也。使禹汤文武不事乎此，则学有未至，而大本不立矣，纲何自而正，目何自而举乎？此尧舜禹汤文武惟务天下之大学，以正天下之大本，所以能致天下之大治。

三代而下，汉唐宋诸君虽有天下之位，而不能务天下之大学，所以天下之大治卒不能致也。汉就高祖言之，如发义帝之丧，戮丁公之叛，庶乎明君臣之义。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庶乎全父子之恩。立白马之盟，定同姓之封，庶乎广昆弟之爱。故继世之君，子不敢叛其父，弟不敢戕其兄，嫂不敢驾其夫，臣不敢专其君。岂不由高祖之作则乎，此其大纲可谓正矣。然其养民也，阡陌之坏未久，而井田之制不复。郡县之废未久，而封建之制不复。其教民也，焚坑之祸未久，而学校之制不复。五礼六乐之废未久，而礼乐之制不复。此其万目未尽举也。然兄弟之不容，昉于戛羹之锡封。夫人之同席，作于戚姬之见宠。大将之见杀，兆于韩彭之菹醢。先儒谓汉之大纲正，以臣观之，汉之大纲亦未尽正如唐虞三代也。汉非惟万目未尽举，而大纲亦未甚正者，以其或不事诗书，或溺于黄老，或杂于刑名，或荒于神仙，而圣学也杂。圣学之既杂，而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纲之未尽正，万目之未尽举哉！唐就太宗言之，胁父臣虏，逼夺神器，父子之亲何在？推刃同气，喋血禁门，兄弟之义何在？纳巢刺妃，媚武才人，闺门之礼何在？故继世之君，子叛其父，嫂驾其夫，弟戕其兄，臣专其君，岂不由太宗之作俑乎？此其大纲可谓不正矣！然设府卫兵之法，彷佛古人寓兵于农之意。设租庸调之法，彷佛古人用一缓二之意。设殿最以考绩，彷佛古人黜陟之

意。设覆奏以审刑，彷佛古人钦恤之意。此其万目可谓举矣。然法令之行，比之先王未纯也。田畴之制，比之先王未备也。学校之教，比之先王未盛也。礼乐之具，比之先王未修也。先儒谓唐万目举，以臣观之，唐之万目亦未尽举如唐虞三代也。唐非惟大纲未尽正，而万目亦未尽举者，以其或蔽于异端，或荒于游畋，或锢于女色，或甘于小人，而圣学也怠。圣学之既怠，则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纲之不能正，万目之未尽举哉！宋就太祖言之，其厚兄弟也，金匮之书，千古不磨。神器之重，一朝脱屣。其厚勋旧也，杯酒解柄，终全勋名，雪夜再幸，不改殊恩。其待臣下也，鞭扑不行于殿陛，骂辱不及于公卿。其严阃范也，内言不出于外，私恩不害于公。故继世之君，持盈守成，家庭之间，虽不能匹休乎麟趾之盛也，而操戈之事则未闻。闺门之内，虽不能齐美乎关雎之化也，而聚麀之耻则未有。此其大纲亦云正矣。然制度颇因五代之旧，不能复先王之制。劝课农桑，美则美矣，视三代养民之制何如？修广学校，盛则盛矣，视三代教民之制何如？礼乐分诸儒之喙，视三代制礼乐之遗意何如？兵财由朝廷之制，视三代制兵财之遗法何如？以至赋吏之戒不严，败军之法不立，设官之制太冗，任子之恩太滥，此其万目之未尽举也。先儒谓宋大纲正，万目未尽举，以臣观之，黄袍加身、未免来人之公议。烛影避席，未免起人之疑心。德昭之死，未免不厌夫众心。郭后之废，未免有疵于盛德。则宋之万目固未尽举矣，而其大纲亦岂甚正乎？宋之诸君见于行事如此，虽曰夜分观书，未免徒侈乎虚名；虽曰炎暑谈经，未免不关于实践。圣学既有不实，则大本不立矣。其大纲之未甚正，万目之未甚举，又何怪其然。故汉唐宋所以不能致唐虞三代之治，皆由大学之不讲，大本之不立故也。

我太祖高皇帝龙飞淮甸，混一区宇，心尧舜禹汤文武之心，而大本以立；学尧舜禹汤文武之学，而大学以明。故以其大纲之正言之，观其祭毕便殿，泣下不止，遣祭皇陵，哀感不胜，则我太祖之圣

孝，亦虞舜之大孝，武周之达孝也。观其剖符锡壤，建封诸王，上制国家，下安生民，则我太祖之亲睦，亦虞舜之敦睦九族，周武之时膺展亲也。观其申明五常之说，则与唐虞之敦典庸礼，商周之建中建极同一揆也。观其君臣同游之言，则与唐虞之都俞吁咈，商周之左右笃棐同一意也。大纲之正，有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以其万目之举言之，则法井给民之言，户知丁业之戒，与古人重农之意相出入也。学校教民之政，乡饮励俗之礼，与古人立教之意相表里也。内设六卿以总制天下，外设布政司以为四方之耳目，则其治官之意，庶几古人之六卿，九牧相唱和也。兵部帅府，相维于内，而将帅无偏重之势，布按都司，相制于外，而藩镇无专恣之患，则其制兵之意，庶几古人之司马司徒相统属也。命牛谅以制礼，则斟酌先王之典，以还中国之旧；命陶凯以制乐，则务宣和平之意，而屏亵慢之习。万目之举，有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列圣相承，心太祖之心，学太祖之学。圣德日新，而无不正之纲。圣化日广，而无不举之目。然法久则弊自生，世久则俗自降。故人伦有不明，风俗有不厚，而我祖宗之纲目渐以乖张。百姓有不富庶，夷狄有不宾服，而我祖宗之纲目，渐以沦斁。

陛下嗣承大统，于兹三年，夙夜拳拳，惟此之虑。陛下此心，即尧之兢兢、舜之业业、禹之孜孜、汤之栗栗、文之翼翼、武之无贰之心也。然自即位以来，躬行大孝以先天下，已有意于明人伦，而人伦至今有未明。斥去邪佞，禁制奢侈，已有意于厚风俗，而风俗至今有未厚。躬耕藉田，蠲免租税，已有意于富庶百姓，而百姓至今有未富庶。简练将帅，严饬边备，已有意于宾服夷狄，而夷狄至今有未宾服。陛下有尧舜禹汤文武之心，而不能致尧舜汤文武之治者，意者陛下于尧舜文武之学有未至乎？何其心之拳拳，而效之邈邈也。臣请为陛下熟言之。以陛下望道之切，求治之笃，必愤发于中，忧形于色，而拳拳之诚，盖有所不能止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

行于上，而行于朝廷者也。未有不行于朝廷，而行于天下者也。

以人伦言之，今公卿大臣，虽轩墀之内，有霄壤之隔。是非不及于面谕，则腹心无所托，而下情不得以上达。可否惟出于内批，则耳目有所蔽，而上心不得以下究。何有乎君臣相亲之义也？陛下诚能体手足腹心之义，略崇高贵重之势，召见不时，咨访非一，使愿输忠悃者得以献其诚，伪为蔽欺者无以施其诈，则君臣之化行于下，而无有不厚者矣。闾阎小子，忍心害理，生则私妻厚子，别籍异财，曾夷狄之不如；死则食稻衣锦，火葬水瘗，曾禽兽之不若。何有乎父子相爱之恩也？陛下诚能望陵兴哀慕之悲，致养勤定省之诚，公卿守终制之典，士夫严匿丧之禁，则父子之化行于下，而无有不亲者矣。隔形体而分胡越，弟或戕其兄；同门户而设藩离，幼多贼其长。何有乎兄弟之恩也？陛下诚能厚同气之恩，广友于之爱，严犯上之律，敦敬长之风，则兄弟之化行于下，而无有不爱者矣。妾媵无数，庶人僭公侯之分；婚姻论财，中华行夷虏之风。何有乎夫妇之道也？陛下诚能则关睢之化，正闺闱之礼，申明婚姻之式，定著妾媵之数，则夫妇之化行于下，而无有不正者矣。所贪者利禄，谁同心而相求？所附者权势，谁同道而相益？落水下石者纷如，贻书谏诤者寂若，何有乎朋友之道也？陛下诚能近君子之朋，远小人之党，黜排陷之奸，奖协恭之正，则朋友之化行于下，而无有不善者矣。人伦之明于上，非务学不能知。臣愿陛下拳拳圣学以正大本，急求所以明人伦之道，则人伦庶乎可明，无异于唐虞三代也。

以风俗言之，朱扉一开，燕雀骈集，谀佞诡随者，名之曰变通；缄默自便者，目之曰忠厚；直言正色者，非之曰骄激；操心持节者，刺之曰干名。此士夫之风丧也。陛下诚能塞奔競之门，杜谄谀之口，奖名节之士，张正直之气，则士夫之风振矣。庶人帝服，倡优后饰。雕梁画栋，惟恐其不华；珍馐绮食，惟恐其不丰；锦绣金玉，惟恐其不多；侏色俪音，惟恐其不足。此奢侈之风盛也。陛下诚能躬

节俭之实，抑浮靡之费，重僭逾之罪，定上下之等，则奢侈之风降矣。典学校之教者，尸虚位而无实行；由科贡之途者，饰虚名而乏实才。此学校之风衰也。陛下诚能重师儒之任，使无实行者不得以滥叨。严科贡之选，使无实才者不得以幸进。则学校之风兴矣。珠宫梵宇，照耀云汉。秃首黄冠，充塞道路。此道佛之风盛也。陛下诚能鉴梁武、宋宗之失，斥祸福、报应之论，惟崇乎正道，不惑于邪说，则道佛之风熄矣。苞苴一入，贱可使贵。贿赂一通，滞可使达。黩货载归，闾里称庆。琴鹤相随，妻子怨谤。此贪黩之风炽也。陛下诚能综核名实，督行劝惩。廉介者必彰而不隐，贪墨者必诛而不赦，则贪黩之风止矣。风俗之厚于上，非务学不能知。臣愿陛下拳拳圣学，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厚风俗之道，则风俗庶乎可厚，无异于唐虞三代也。

以言夫百姓之失所，则征求极其锱铢，而尾闾于异端之奉；苛敛至于毫发，而漏卮于宠幸之费。此吾民之困于赋敛者可恤也。征舸贡舰，动连千夫；工匠兴抬，延及数户。此吾民之困于征役者可恤也。田连阡陌，利累羊羔；家鸡犬豕，惟其所啖。此吾民之困于豪家巨室者可恤也。囊帛赢金，饫鳞醉醲；市虎门妖，恣其所欲。此吾民之困于贪官、黠吏者可恤也。劫掠践蹂，鸡犬一空；胁持抑逼，肝脑涂地。此吾民之困于兵戈、盗贼者可恤也。父食其子，夫鬻其妻，壮者散于四方，老弱转于沟壑。此吾民之困于饥馑、流离者可恤也。百姓之失所，固可恤矣。然恤之有道焉，大要在于重守令，急务在于节财赋。守令者，民之父母。守令不重，则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豪猾由此而横，盗贼由此而起。财赋者，民之命脉。财赋不节，则以一而科百，因十而敛千，赋敛由此而苛，征役由此而滥。欲重守令，在于慎选科贡，疏理监胄，严励风纪，精立选法。欲节财赋，在于简阅军士，沙汰冗官，杜抑私爱，斥绝异端。科贡既慎，则专图侥幸者不得以幸进。监胄既理，则苟延岁月者不得

以幸选。风纪既严，则贪淫无状者不得以幸存。选法既精，则政绩不闻者不得以幸迁，而守令自重矣。军士既阅，则老弱无能者不得以幸食。冗食既汰，则备员充位者不得以幸禄。私爱既杜，则贵戚近习之属不得以幸赐。异端既斥，是佛老怪诞之徒不得以幸干。而财赋自节矣，何患百姓之不富庶哉！百姓之富庶，非务学不能知。臣愿陛下拳拳圣学，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富庶百姓之道。则百姓庶乎可富庶，无异于唐虞三代也。

以言夫夷狄之梗化，则虏骄于北，羌黠于西，变诈之不测，侵掠之无常。驱之则不足于兵，守之则不足于食，此西北之夷寇可虑也。阻山川以为固，结流民以为援，神出鬼没，蜂屯蚁聚，此荆襄之夷寇可虑也。丹崖千仞，青壁万重，攻之则虑险，守之则废财，此两广之夷寇可虑也。围聚山岩，浮游乡邑，我进则彼去，我退则彼来，此川蜀之夷寇可虑也。夷狄之梗化，固可虑矣。然服之有其道焉，大要在于修内治，布恩信。急务在于选将帅，足兵食。内治不修，则根本不固。恩信不布，则人心不服。将帅不选，则敌人不畏，士卒不附。兵食不足，则士气不振，众心不守。欲修内治，在于戒逸乐，足民用，任君子，退小人。欲布恩信，在于宥胁从，绥降款。欲得将帅，在于收人望，专委任，戒欺罔。欲足兵食，在于广屯田，增土兵。逸乐既戒，则主心日正。民用既足，是邦本日固。君子既任，则君策日陈。小人既退，则奸弊日消。胁从既宥，则叛乱日怀。降款既绥，则归附日众。人望既收，则将材日至。委任既专，则将士日奋。欺罔既戒，则赏罚日明。屯田既广，则储蓄日富。土兵既增，则兵力日振。何患夷狄之不宾服哉。夷狄之宾服，非务学不能知。臣愿陛下拳拳圣学，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宾服夷狄之道。则夷狄庶乎可宾服，无异于唐虞三代也。

嗟乎！陛下拳拳于唐虞三代之治，而臣拳拳勉陛下以唐虞三代之学者，诚以纲之未正，臣不忧也；万目之未举，臣不忧也；人伦

之未明，臣不忧也；风俗之未厚，臣不忧也；百姓之未富厚，臣不忧也；夷狄之未宾服，臣不忧也，臣之所忧者，陛下大本虽已至矣，或不能如尧舜禹汤文武之光明；陛下大学虽已讲矣，或不能如尧舜禹汤文武之精一！陛下由臣之言，持拳拳图治之心，致拳拳为学之力，如尧舜，如禹汤，如文武，则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妖艳之色，淫哇之声，不足以荡此心；便辟之言，侧媚之态，不足以尽此心；沈湎荒淫，盘游之事，不足以荒此心；华丽珍怪奇异之物，不足以侈此心；神仙佛老异端之说，不足以惑此心；土木刑名征伐之类，不足以蛊此心。而大本立矣。大本既立，由是大纲可正，万目可举。人伦由是而可明，风俗由是而可厚，百姓由是而可富庶，夷狄由是而可宾服，薄海内外由是而可熙和，宗庙社稷由是而可保安，神器由是而可康宁，圣寿由是而可永延，列圣由是而可增光，帝王由是而可匹休。而汉唐宋诸君不足以望陛下之下风矣。若大本不立，则虽疲精惫神，以正夫大纲，以举夫万目，以遂数者之效，而快陛下之心，亦将徒为文具。而天下之事，无可为者矣。此臣所以拳拳欲陛下从事于学也。然臣之所谓学者，非稽同合异以为博也，非钩深致远以为奇也，非绣章绘句以为美也。臣之所谓学者，即大学之道也。是学也，即尧舜禹汤文武之学也。其目有八，而各有其要。平天下之要，在于治国。治国之要，在于齐家。齐家之要，在于修身。修身之要，在于正心。正心之要，在于诚意。诚意之要，在于致知格物。宋儒演绎其义，以进告其君曰：齐家之要有四，曰：重匹配，严内治，定国本，教戚属。修身之要有二，曰：谨言行，正威仪。诚意正心之要有二，曰：崇敬畏，戒逸欲。致知格物之要有四，曰：明道术，辨人才，审治体，察人情。是书也，乃千圣之心法，万古之成规，致治之良图，保邦之大道。陛下必拳拳于此，昼而诵之，夜而思之，亲近儒臣，问质疑义。毋徒事虚文，毋徒应故事，毋徒闻于耳而不识之于心，毋徒德于人而不践之于己，毋徒勤之于始而或怠之于

终，毋徒讲之于百辟云集之时，而即弃之于宫闱深严之地，毋以朝夕而有间，毋以寒暑而有辍。或摘其要语而列之于屏障，或参以祖训而铭之于座右。考之于经，证之于史。如某事也，古人以之而治，以之而安，以之而盛，以之而寿，即惕然以省之曰：吾今日之所行，有合于此者乎？如某事也，古人以之而乱，以之而危，以之而衰，以之而夭，即惕然以省之曰：吾今日之所为，有类于此者乎？念念在此，念念之外无他念也。事事在此，事事之外无他事也。如此然后可谓之拳拳矣，如此然后所存必正心，所出必正言，所行必正道，所亲必正人。如此然后身无不修，家无不齐，国无不治，天下无不平也！

嗟夫，人主之心，示尝不好治而恶乱也，好安而恶危也，好盛而恶衰也，好寿而恶夭也。然治常少，乱常多；安常少，危常多；盛常少，衰常多；寿常少，夭常多。往往违其所好，而蹈其所恶！夫岂其本心哉！以其不能拳拳于学，而陷于不知故也。如人之疗病，未尝不爱其生，而卒至于死。亦岂其本心哉！以方书不熟，而用药不精故也。方今天下大势，如人受重病，非不枵然且大形犹人也。然内自腹心五脏，外达四肢百骸，无一毫一发不受病。有识者以为寒心，而庸医委之曰安。病者不悟其非，和之曰吾无病也。昔扁鹊见齐桓侯曰："君有疾，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如是者三，扁鹊望见齐桓侯而走。后五日桓侯疾作，召扁鹊，鹊已逃去。臣愿陛下以本心为元气，以贤良为明医，以古圣贤经史祖宗宝训之言为古方、为药石，惧病之将深而豫治之，信任明医，熟察古方，深究脉理，精择药石，节嗜欲，慎防护，日调其元气，急寻其病根之所在而划除之。则元气日固于内，邪气不攻于外，而百病自消，天年自固。何忧不如尧舜，不如禹汤，不如文武者乎？及今犹可为也，失今不为，臣恐扁鹊望之而走矣，虽噬脐无及也。唐虞三代与我祖宗列圣之大纲无不正，万目无不举，元气本固，客邪难入，病无自而生也。汉

唐宋诸君,或大纲正而万目不举,或万目举而大纲不正,元气未固,客邪易奸,随病而施药者也。自唐虞而三代,自三代而汉唐宋,用是道则治,不用是道则乱;用是道则安,不用是道则危;用是道则盛,不用是道则衰;用是道则寿,不用是道则夭;用是道则延长,不用是道则短促。然则是道也,乃世道治乱之所系也,社稷安危之所关也,风俗盛衰之所由也,人主寿夭之所本也,国祚短长之所在也。陛下可不大警于心乎?《易》曰:“正其心,万事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董仲舒告武帝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臣愿陛下加意于臣之言,毋如武帝不加意于仲舒之言也。苏轼对神宗曰:“天下无事,则公卿之言轻如鸿毛;天下有事,则匹夫之言重如丘山。”今天下不可谓无事矣,臣愿陛下不视臣言如鸿毛,而视臣言如丘山,则天下幸甚,生民幸甚。臣俯拾刍荛,上尘天听,不胜战栗之至。谨对。

评析

罗伦的这篇文章的特色是相当多的。

一是篇幅较长。一般明代的殿试对策文章大都在2000～4000字之间。而罗伦的这篇对策文章却有万余言。这在当时是较为罕见的。试想,一日之中,上有高官甚至皇帝威坐监考,下有吏员巡回检查,气氛自然紧张;一纸之宽有限,必须用工笔一笔一划地写满蝇头正楷,且不能有涂抹删改的地方,而且格式还须完全正确,要求当然严格;一人一桌,身边无资料,周围无商量,全凭平日苦学之积累,功夫要非一日。洋洋洒洒,文不加点;滔滔汩汩,不能自已。这种驾驭大篇巨制的功夫确实令今人折服。

二是颇有气势。作者以居大位必致大治，致大治必正大本，正大本必务大学为全篇之总摄，然后一以贯之，"溯黄虞迄昭代，上下数千载"，顺承而下，次第言之，"凿凿如日中天，总大纲，悉万目，进退数百王，历历如指诸掌。"气蕴充沛，如水之决堤，轰然而下，排山倒海，略无阻隔，条理舒畅，如书生剧谈，抵掌挥麈，指点江山，考评得失，意气飞扬。文章之承接，转合处，浑然无迹，不觉有斧凿雕饰之象；文章之铺排、夸饰处，水到渠成，不见其人工精炼之痕。奇偶相间、排比叠用，使文章节奏起伏、张弛适度；譬喻巧设、设彩纷呈，使文章绚丽多姿、形象感人。如此极有气势与文采的对策文章在明代状元卷中确实罕见。

三是极有胆识。策问中只是称："欲正大纲而举万目，使人伦正于上，风俗厚于下。百姓富庶，而无失所之忧。四夷宾服，而无梗化之患。薄海内外，熙然泰和，可以增光祖宗，可以匹休帝王"，却对时弊只字不谈。但是罗伦却极有勇气，在文中列举了大量的现象，对现实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当今天下有四大弊端，即"人伦不明"，"风俗不厚"、"百姓至今有未富庶"，"夷狄至今有未宾服。"而在这四大弊端中，作者所谈到的种种情况也都是十分真实和深刻的。最后作者把产生这四大弊端的原因直接归于帝王身上，认为这是其"不能拳拳于学，而陷于不知故也"。文中用大量的篇幅来直接批评现实，这在明代状元卷中是不多的；而且这种批评又是十分大胆、丝毫不留情面的，这在明代状元卷中也是少见的；而且这种批评又是极其深刻、富有洞察力和卓见的，这在明代状元卷中更是少有的。像这样的文章才应算是真正的时务对策。

总之，这是明代状元卷中曲指可数的佳作，诚如李西涯所评"梅溪、文山而后，不多得矣。"

（苗菁）

成化五年(1469)乙丑科

状元:张升

张升(1444~1518)字启昭,号柏岩,南城(今属江西)人。成化五年(1469)殿试,被钦点为第一甲第一名。例授翰林院修撰,迁太子东宫谕德,升太子庶子,因弹劾权臣刘吉被贬为南京工部员外郎。刘吉遭疏远后,张升官复原职。此后,历官礼部左右侍郎、礼部尚书。晚年又忤宦官刘瑾,以病辞去,卒于家。

策问

制曰:朕绍承大宝,图底丕平,虽宵旰勤励,然绩效罕著。略举其端,诹尔多士,择材于文以理民,拔功于武以驭兵也。今铨衡涂

壅，卫所员溢，奚以疏通之？昔人所谓名利相均，虚实相济，可推广而施欤？岁无常稔者天之道，土有常怀者人之情也。今歉则籴贵，贫则民徙，奚以绥辑之？前代所行常平有法，均田有制，可稽仿而为欤？夫兼资文武以周一世之用，裁成天地以遂万姓之安，固济时切务也。若乃致治大道，必有至言。古之臣献言于君，或得圣道之经而流于迂，或得圣道之权而流于诈，或辩矣而术不密，或智矣而文不及。今尔多士陈四者之务，必宜于时，矫四臣之偏，必合于道，朕将览而资治焉。

对策

臣对 臣闻治本于道，道本于诚。非道不足以善治，非诚不足以立道。盖道为治之本，诚又道之本也。有其道，然后能致其治。有其诚，然后能尽其道。是诚也者，万善之原，万事之本。推之无不准，动之无不化。以之择材于文，则真材无不得，拔功于武，则武将无不善。以之因天时以利民，而民生无不遂。因地利以厚民，而民居无不安。文武于焉而兼资，而用无不周。天地于焉而财成，而功无不著。人君为治之道，岂越乎此哉！故曾子传《大学》有曰："意诚而后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子思作《中庸》亦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即诚也。大哉诚乎！其治道之本乎？

钦惟皇帝陛下圣神文武，刚健中正，上承天命，下得人心。即位以来，五年于兹，民物阜安，风俗醇美，四夷咸宾，万方乐业，凡所以致治保邦持盈守成之道，至矣尽矣。然犹体道谦冲，游心高远，锐于图治，切于求言，万几之暇，特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询以兼

资文武之要，财成天地之道。顾臣一介庸儒，识见谫陋，曷足以上揆渊衷，仰裨治道。然窃思之，臣荷朝廷作养之恩，沐陛下化导之德，有爱君忧国之心，无由以自献。有忠君报国之志，无路以自达。今幸见录于有司，得立玉陛方寸地，正叫阊阖呈琅玕之日也。敢不俯竭愚衷，以对扬于万一乎？

臣闻民者，所以固邦本。而理民之任则在乎择材于文。兵者，所以卫民生。而驭兵之寄则在乎拔功于武。故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而致庶绩之其凝。武夫洸洸，经营四方，而致王心之载宁。文臣、武将自古为重，诚不可不审也。我国家崇儒重道，取士之制虽非一途，要之首科贡而次荐举，未尝不重文臣之选。崇德报功，选将之道亦非一端，要之先才能而后荫叙，未尝不重武将之职。铨衡之途奚至于壅，卫所之员奚至于滥乎？仰惟陛下有迪知忱恂之明，有庶政惟和之效。然犹图底丕平，以文臣武将为兵民之所赖，故欲有以疏通之。此尤见圣智之高明也，臣请得为陛下言之。盖自迩年以来，文臣则或因开贡之条而混升国学，或缘纳粟之例而滥登仕籍。况夫拘于资格之先后，牵于历任之久近，以有限之职，待杂进之流。铨衡之途由之壅矣。武将则勋旧是属，而秉节钺者或韬略之蔑闻；弊习相承，而统师旅者或勤能之罕著。况夫功多出于贿求，赏每加于幸得，未经锋镝之劳，已登录用之典。卫所之员由之滥矣。铨衡之途既壅，何敢望其展素蕴以理民；卫所之员既滥，何敢望其奋武勇以驭兵哉？此不能无劳于圣虑也。为今之计，莫若严考察黜陟之法。治行卓异者，则增秩以奖异之。年力衰迈者，则以礼而退遣之。杜塞奔竞侥幸之门，摈斥庸陋贪污之辈，则用人之道，必如唐臣陆贽所谓名利相均，而不至于壅矣。重爵赏劝惩之典，功勋既著者，则计其劳以加赏；材略有闻者，则随其能以授任。不以其无功而施泛滥之恩，不以其有罪而行姑息之政，则选将之要，必如唐臣陆贽所谓虚实相济，而不至于滥矣。盖诱人之方惟名

与利，名近虚而于教为重，利近实而于德为轻。锡货财赋，秩廪所以彰其实；差品列殊，章服所以饰其虚。虚实交相养，故人不渎赏；轻重互相制，故国不废权。疏通之术，岂越于此乎。然求其本，则在于陛下此心之诚而已。诚心以行之，而必期其功，则司理民之责者，皆有守有为之人；当驭兵之寄者，咸有严有翼之士。尚何虑其有不疏通者哉！

雨露适时则年丰，旱涝相仍则年歉。此岁无常稔者，乃天之道。久居其地则难弃，久享其利则重迁。此土有常怀者，乃人之情。然尧虽有洪水滔天，而黎民之于变者自若，由其有以备天道之无常。汤虽有大旱积久，而商邑之用协者自如，由其有以遂人情之常怀。天时、地利在人裁制，不可不知也。我国家救荒有法，储蓄有备，而所以因天时者得其道矣。田有等，则赋无过取，而所以因地利者得其道矣。粜之价奚至于贵，民之居奚至于徙乎？仰惟陛下有怀保小民之心，有万邦咸宁之效，然犹深求至治，以天时地利为生民之所资，故欲有以财成之。此尤见圣心之刚健也。臣请得为陛下陈之。盖自迩年以来，年一歉则谷粟缺乏，无以给民食，囊橐空虚，无以遂民生，而啼饥号寒者深可矜也。民一贫则弃久依之桑梓，即新刈之蓬藋，而流离播越者深可悯也。米之价既踊，则民食且不足，尚何望其出赋税以充国用。民之居既徙，则自救且不赡，尚何望其效勤诚以固邦本哉！兹不能无廑于圣虑也。为今之计，莫若选监临之官，行便宜之政。知岁无常稔而有可常之道，必思患预防，敛散以时，若前代常平之法，斯可行也。择守令之贤，行子惠之政，知民有常怀，而遂其有常之情。必量地分田，因民制产，若前代均田之制，庶可为也。盖常平之法兆于齐魏，而成于耿寿昌。均田之制行于后魏，而出于李安世。丰则增价籴之以利农，凶则减价粜之以利民，是之谓常平。男子四十亩，妇女二十亩，户绝者以为公田。刺史十五顷，县令以上六顷，其田则更代相付，是之

谓均田。斟酌其宜，使合于人情，庶丰歉之相济。损益其制，使宜于土俗，庶贫富之适均。绥缉之道，岂要于此乎？然究其本，则在于陛 下是心之诚而已。诚心以为之，而必期其效，则天下莫不席于饱食暖衣之域，民生莫不囿于安居乐业之中。尚何虑其有失所者哉！夫内资文治，外资武功，文臣武将之并用，威势德化之并行，乃久安长治之计也。上因天时，下因地利，安老怀少，皆有所资，养生丧死，举无所憾，实参赞燮理之功也。

若乃致治大道，必有至言，古之臣献言于君，虽有可采而不能无弊。若董仲舒道明三代、学贯天人、议论渊源、理义酝藉，其言得圣道之经也。晁错上言兵事，思应周密，尊君抑臣，辞气激烈，其论得圣道之权也。仲舒虽得圣道之经，然阴阳灾异之言，未免流于迂而不切。晁错虽得圣道之权，然刑名术数之论，未免流于诈而不正。故宋儒苏洵因论贾谊而言二子，盖得其当矣。贾谊以年少之资，而被孝文之召，观其治安一策，有忠爱之至诚，劝兴礼乐知教化之先务，其辞辩矣。张良以豪杰之才，而辅高帝之兴，运筹决策，而定天下之大乱，因事纳忠，而关天下之大计，其智周矣。贾谊之论虽辩，然草具仪礼，三表五饵，而其术则不密焉。张良之计虽智，然术本权谋，学宗黄老，而其文则不及焉。故宋儒苏轼因论陆贽而及二臣，盖近乎是矣。文德也，武功也，救荒也，安民也，此四者之务固所当讲。仲舒也，晁错也，贾谊也，张良也，此四臣之偏亦所当知。大抵文武之选，不必拘也，在乎可以行于今；安养之道不必泥也，在乎有以利于民。使得人以司文武选，而能随势以变通。得人以主安养之道，而能度时以举行，则品节适中而宜于时矣。仲舒、贾谊之失，由乎学术未精；晁错，张良之失，由乎学术之不正。使其溯义理之渊源，而不安于小成；务圣贤之正学，而不亲于他岐，则损过就中而合于道矣。然宜于时，合于道，皆其用之见于外焉尔。苟不本诸诚，则内之体不立，施之必有所不当，行之必至于易倦。故

臣终始以诚为陛下献者，良以诚之为道，真实无妄，纯粹无伪，彻上彻下，皆实理之所为，一有所杂则妄矣。悠久不息，周流不已，亘古亘今，皆实心之所为，一有所间则息矣。臣伏望陛下存此诚于雷声渊默之时，体此诚于酬酢应变之际。凡一念之动则曰：吾之念虑得无有所杂乎？明以察之，使无一念之或妄。一事之行则曰：吾之施为得无有所间乎？刚以制之，使无一事之不实。则治道之本立矣。然而一心之微，攻之者众。或以声色，或以货利，或以游田，或以逸豫。数者一或不审，则欲动于中，而此诚变矣。臣愿陛下远声色而不迩，厌货利而不殖，谨游田而不恣，戒逸豫而不肆。勿贰以二，勿参以三，然后本源澄澈，终始惟一，而此诚岂有间断哉！或于沉湎，或于奢侈，或于异端，或于谄谀，数者一或不察，则心逐于外，而此诚泯矣。臣愿陛下禁沉缅而弗行，斥异端而弗尚，拒谄谀而弗亲。不东以西，不南以北，然后方寸明白，久暂有常，而此诚岂有止息哉！由是可以措民物于熙皓，绵宗社于隆长。重华之德，丕承之功，岂独专美于舜武哉！

陛下之策臣者，臣既已概陈之，而要其归在乎一诚矣。然于终篇复有所献焉者，盖爱君之心不能自已也。夫诚固为治道之本，而所以行是诚者，又在乎陛下之明与刚。明则有以识其诚之正，刚则有以决其诚之几。明非烦苛伺察之谓，乃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之谓也。刚非强亢暴戾之谓，乃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之谓也。陛下诚廓日月之明，无微不察，无幽不烛，如《书》所谓宪天聪明，奋乾刚之断，见义必为，闻善即行，如《书》所谓惟克果断。夫如是则表里此诚，终始此诚，如《中庸》所谓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治天下之道，无余蕴矣。臣之此言迂疏浅陋，固若无可采者，然实出于拳拳一念之忠也。伏望陛下俯垂睿览，岂惟愚臣幸甚，实天下幸甚，万世幸甚。臣谨对。

评析

张升的这篇对策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表达委婉。在写这篇文章时，张升可能有着较多的顾忌，所以当殿试策问中专就现实当中的一些弊病，如“铨衡涂壅”、“卫所员溢”、“歉则余责”、“贫则民徙”等，向举子们发问，让他们献计献策时，张升虽然都诚心诚意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和见解，显示出他是有一定识见的，但是他却在每次表示意见时都在这之前加上一个“帽子”。如在回答如何解决“铨衡涂壅”、“卫所员溢”问题时，他先说：“我国家崇德重道，取士之制虽非一途，要之首科贡而次荐举，未尝不重文臣之选。崇德报功，选将之道亦非一端，要之先才能而后荫叙，未尝不重武将之职。铨衡之途奚至于壅，卫所之员奚至于溢乎?”明明策问中已用白地指出了现实政治当中存在着这两个弊端，他却不敢就此而展开议论，而是先百般回护，根本不承认有这两种现象，然后再以退为进，缓缓曲曲地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表白出来。在回答如何解决“歉则余责”、“贫则民徙”问题时，张升也是采用了这种先否定而后正面阐述的方法。这样的表达方法，从好的方面说，当然使文章显得徐迂婉转、柔和顺美；从不好的方面来说，也会使文章谀百讽一，达不到应有的劝谏效果。

二是文风平实。作者在写这篇文章时，体现了一种老老实实的作风。策问中问几个问题，他就回答几个问题，既不溢出夸饰，又不遗漏减少。对于每个具体问题，他也尽其所知，竭其所能，给予较典要精当的回答。而策问中发问的顺序是怎样排列的，他回答时也是如此排列，决不跳跃，也不错秩。同时文辞也较为“本

色”，既没有设色绚丽的词藻，也没有精思巧构的比喻；既没有连珠而列的典实，也没有较多的奇偶相凑的对句。处处平正无奇，时时老成厚道，这就是文章给我们留下的较为深刻的印象。

张升对策中的这些特点也是一般对策文章中普遍具有的特点。

（苗菁）

成化八年(1472)壬辰科

状元:吴宽

吴宽(1435～1504)字原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幼时好学上进,孝事父母,宽以待人,深为乡里称赞。明成化八年(1472)参加殿试,钦点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升东宫右渝德,左庶子,参修《宪宗实录》,书成,进官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后历官吏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卒于官。

策问

制曰:自古帝王继体守文,克弘先业,致盛治者多矣。而史臣独以成康、文景并称,何欤?其致治本末可指言欤?朕光绍祖宗丕图,政令之行,悉遵成宪 ,期臻至治,比隆前古。然夙夜祗勤,于兹

八载，而治效犹未彰著，何欤？岂世有古今，故效有深浅欤？今天下田野辟矣，而贡赋供于上者，每至匮乏。学校兴矣，而风俗成于下者，益至浮靡。兵屯以制外者谨矣，未能使夷狄畏却而不敢侵。刑法以肃内者严矣，未能使奸顽惩艾而不敢犯。凡若此者，其弊安在？如谓政在用人，则方今百司庶府，文武具足，而科目之选拔，军功之序迁者，又济济其众。何官有余而政不举欤？无乃承平日久，习安逸而事因循者多欤？兹欲严以督之，则人情有不堪，宽以待之，则治理之难成。何处而得其中欤？夫治必上下给足，风俗淳美，外夷服而中国安，底于雍熙泰和之盛，斯朕志也。何施何为而可以臻此？殆必有要道焉。子大夫讲习经史之学久矣，其参酌古今，明著于篇，朕将采而用之。

对策

臣对 臣闻古之君天下者，莫不有治法，亦莫不有治人。盖天下之事，非法不能以自举；天下之法，非人不能以自行。故法所以举其事，而人所以行其法者也。然人亦岂能自用哉？又在人君之一心耳。昔傅说之告高宗曰：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而必继之以惟厥攸居。此可见人君之图治，其心当先安于所止也。心既安于所止，故以是心而求天下之贤，则无一人之不用。以是人而付天下之法，则无一事之不举。而所谓足贡赋、厚风俗、攘夷狄、革奸顽之四者，皆不足以劳吾心矣。

钦惟皇帝陛下抚盈成之运，当鼎盛之年，有聪明睿知之资，有孝友温恭之德，有宽仁博爱之度，有神武不杀之威。临御以来，八

年于兹,图治之心,惟日不足。故不以臣之不肖,拔之草茅之中,置之廷陛之下,拳拳焉下询乎治天下之要道。臣虽至愚,能不感激而思效其愚直之一二乎?盖陛下每三年一策士于廷者,非欲为虚文也,盖将用其言也。臣之幼而学于家者,非欲为空言也,盖将用于世也。臣常怀用世之心,适陛下开用言之路,是机也不可失也。然而陛下之策臣者,其大要欲于治法治人加之意耳。而臣以为尤所当先治者,心也。心既治,而后天下之事可从而理。臣故先以心之说为献,然后于圣策之所及者,次第而条陈之焉。

盖闻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言治化非一朝一夕所能成也。臣观三代之时治之盛者,莫盛于周。而周之治,亦莫盛于成康之世。盖有文武创业于前,而成康善于守成耳。自周而下治之盛者,莫盛于汉。而汉之治,亦莫盛于文景之世。盖有高祖创业前,而文景善于守成耳。四君之所以善于守成者,岂有他术哉。必至其持守而施为者,有本末也。《周书》之称成王曰:祗勤于德,而训迪厥官,作周恭先,而自时中乂。至于康王之敬忌天威,张皇六师,此其实也。汉史之称文帝曰:身衣弋绨而示朴为先,除田租税而厚于利民。以至景帝加以恭俭,与民休息,亦不失文帝之家法者也。成康、文景之致治本末,所可知者如此。而其所以并称于后世者,有不在此欤?夫成康、文景之为君虽不可作,而其治法,犹有可得而行者。苟能行之,所谓道洽政治,泽润生民,移风易俗,黎民醇厚之效,当复见于后世。岂以世有古今,而效有浅深之殊哉!仰惟陛下传二帝三王之道,绍一祖四宗之统,政令之行,悉遵成宪,视成康、文景之治固优为之矣。而复以为治效犹未彰著者,此陛下不自满足之心也。臣虽至愚,敢不钦承而将顺之乎?

伏读圣策有曰:"今天下田野辟矣,而贡赋供于上者,每至匮乏。"臣有以见陛下欲举治法,足食以充国用也。夫欲足食以充国

用，莫若省浮费。《大学》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今之世生之为之者，果得为众且疾乎？食之用之者，果得为寡且舒乎？借使众且疾矣，然民赋有常数，而国用无常数。以有常数之贡赋，而供无常数之用度，此田野虽辟，而贡赋所以不得不至匮乏也。臣故曰：省浮费者以此。圣策有曰："学校兴矣，而风俗成于下者益至浮靡。"臣有以见陛下欲修举治法，化民以厚风俗也。夫欲化民以厚风俗，莫若求实行。盖古者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宾兴之制，以德行居先，文艺居后者，欲使人重本而轻末也。今之取士，惟较其文艺，而不考其德行，士安得不惟末是趋乎？况所谓文艺，又非古之所谓文艺者乎？此学校虽兴，而风俗所以不得不至浮靡也。臣故曰：求实行者以此。有曰："兵屯以制外者谨矣，未能使夷狄畏却而不敢侵。"圣策及此，臣又见陛下欲举治法，攘夷狄，而非穷兵黩武之所为也。夫夷狄之性，轻而寡信，贪而无亲。王者以禽兽畜之，来则有备，去则不追。诗曰：王命南仲，城彼朔方。又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是也。是故求速效者，急于战斗而未必残其类。怀永图者，加以岁月而卒能收其功。窃以为今日之计，亦惟先于宁而已。其必练士卒，积刍粮，严斥堠，谨烽燧，而据要害之地，以为持久之计可也。然欲为持久之计，必用持久之兵。盖古者兵出于农，故戍其地则用其地之民。今之边兵安于水土，习于金革，犹夫地之民也。诚用之以守，庶免调发之扰，而得制御之道。至于守之既固，而彼犹为吾患也，于是因地乘势，以议攻之之策。则边境既实，兵威自壮，以战则克，以攻则取，而夷狄岂有不畏却者哉！有曰："刑法以肃内者严矣，未能使奸顽惩艾而不敢犯。"圣策及此，臣又见陛下欲举治法，革奸顽，而非刻法深文之所为也。盖刑所以为小人而设，小人而不加之以刑，则纵恶长乱，无所不至，

是刑法诚不可不严也。然听狱之际，一或不尽其心，则刑有不得其当者。是故刑得其当，虽岁罪一人，而天下有咸服之心；刑失其当，虽日罪千人，而人心无可服之理。今律之所载者，轻重舒惨，至精至备，可谓无遗憾矣。但有一定之法，无一定之情。其情之所在，则惟典狱者参错讯鞫以求之耳。昔郑子产铸刑书，晋叔向讥之曰：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旨哉斯言！实万世典狱者之所当知也。然参以人固足以得其情，徇乎人亦不足以当其罪。成王之告君陈曰：殷民在辟。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惟厥中。穆王之告诸侯曰：尔尚敬逆天命，奉我一人，虽畏勿畏，虽休勿休。其知狱之不可徇乎人者也。夫典狱者，下既得乎人之情，上不徇乎君之意，则刑之所加皆得其当，而奸顽岂有不惩艾者哉！以是而知浮费不省，则贡赋不足。实行不求，则风俗不厚。不用边兵以守其地，则夷狄未可以攘。不任有司以求其情，则奸顽未可以革。此臣所以妄论四者之弊，在于此也。抑四者虽各为一事，其实有相通之道焉。何也，贡赋不至匮乏，则国用既足，而兵屯可以仰给矣。风俗不至浮靡，则民心既正，而刑法可以舍置矣。刑法舍置，则中国安矣。中国安，则夷狄无衅可乘，不待攘之而自然畏却矣。有天下者之治法，信无先于斯四者。

虽然，法之立也本无弊，法之用也始有弊。法不自用，待人而后用。人有正邪，才有长短，而法不能不为之异焉。此其过之不在于法，而在于人也审矣。然则今日治天下之要道，孰谓不在于用得其人乎？然而圣策又曰："如谓政在用人，则方今百司庶府，文武具足，而科目之选拔，军功之叙迁者，又济济其众，何官有余而政不举欤？无乃承平日久，习安逸而事因循者多欤？兹欲严以督之，则人情有不堪。宽以待之，则治理有难成。何处而得其中欤？夫治必上下给足，风俗淳美，外夷服而中国安，底于雍熙泰和之盛，斯朕志也。何施何为而可以臻此治？必有要道焉"。陛下之言至此，图

治之心可谓益切矣。臣愚以为要道莫先于用人，人才皆可用，特在人君用之何如耳。用得其人，官虽不足，而政无不举。用非其人，官虽有余，而政不能举。非惟不能举，而且有害于政焉。如欲省浮费也，使奉承者非其人，则一意陛下之足国用，而更为厚敛之计矣。欲求实行也，使奉承者非其人，则一意陛下之厚风俗，而更为诡行之举矣。主兵而非其人，则兵无纪律，而赏功罚罪，惟其私意之轻重。所谓用边兵以守其地者，未必得其力也。典狱而非其人，则狱多冤抑，而刑故宥过，惟其私意之出入，所谓任有司以求其情者，未必得其实也。诚欲用得其人，又在乎陛下之一心焉。盖心安于所止则诚，诚则明，明则于天下之人，自能知其何者为正，何者为邪，于焉用其正，而黜其邪。于一人为短，于焉取其长而弃其短。不啻若辩白黑。若数一二，无一能之才，自能知其何者为长，何者逃于洞察之下者。取其人于科目，则皆俊乂多才。取其人于军功，则皆知勇之士。而凡列职于百司庶府者，其文真足经邦，而文教无不修；其武真足以戡乱，而武功无不成。盖莫不奋迅踊跃以趋其事，固无有乐因循而事安逸者矣。若然，亦何必严以督之哉！即欲严以督之，则为大舜之德威，非若唐德宗之苛察也。亦何必宽以待之哉！即欲宽以待之，则为成汤之克宽，非若汉元帝之优游也。当此之时，臣见陛下全大有为之资，居大有为之位，操大有为之具，乘大有为之势。有所不施，施之而无不当。有所不为，为之而无不成。盖纵横上下，无不如吾意之所欲者，岂特足贡赋、厚风俗、攘夷狄、革奸顽之四者而已哉！如是则真可以垂拱南面，而臻雍熙泰和之盛治矣。

然则欲事之举也，在乎法。有治法而天下无不举之事。欲法之行也，在乎人。有治人而天下无不行之法。欲大之用也，在乎心，有治心而天下无不用之人。心之功用至于如此，臣请得为陛下复一言之。夫人之心特方寸耳，所以灵于万物者在是。所以参为

三才者在是，所以具众理而应万物者在是。人皆有是心，而能治其心者寡。人皆治是心，而能安于所止者尤寡。始如是而终不如是，非安也。表如是而里不如是，非安也。安之云者，心与义理为一，而未始相违者也。夫欲心与义理为一，此岂可以袭取之哉！要必无时无处而不用其力也。陛下居禁密之地，尝诚思之曰：吾心得无少放乎？得无异于坐朝之时乎？有放焉则求之，是能治其心也。处细微之事，亦尝思之曰：吾心得无少放乎？得无异于临政之际乎？有放焉则求之，是能治其心也。无一时而不用其力，久则无一处而不安所止。由是以此心而事天，以此心而治民，以此心而法祖宗，无乎不善者，又岂特善于用人之一事而已哉！臣故恳恳焉以是说为献者，此探本之论也，此责难之义也，此区区爱君之忠也。虽然，世之持是说以告陛下者亦多矣，臣不能舍是而为新奇可喜之论者，以治道之大原止乎此也。惟陛下不以其言之可厌，而少加睿览，天下之幸，孰大于此。臣干冒天威，无任战栗殒越之至。臣谨对。

评析

这篇文章中，吴宽针对时弊提出的对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策问中认为，当时的明朝社会问题较多，最主要的是：一，“天下田野辟矣，而贡赋供于上者，每至匮乏，”也就是说，普天之下的土地都得到了开辟，但是供于朝廷的贡赋却常常感到不够用。二，“学校兴矣，而风俗成于下者，益至浮靡，”也就是说，学校已兴于天下，但是民间的风俗却越来越浮靡不正。三，“兵屯以制外者谨矣，未能使夷狄畏却而不敢侵”，也就是说，屯田戍守的军制对服

外敌是很谨备的，但却没有使异族因为害怕而不敢入侵。四，“刑法以肃内者严矣，未能使奸顽惩艾而不敢犯”，也就是说，刑法用来整肃国家，制定的是很严厉的，但却没有使奸顽之徒因为怕受惩罚而不致犯法。对于这几个问题，吴宽都用精炼的语言进行了深刻的回答与阐释。

他说，针对贡赋匮乏的问题，最好采用“省浮费”的办法，即节省一切不必要的花费。针对风俗浮靡的问题，最好采用“求实行”的办法，即讲究实际，以德行作为录取士人的首要标准。针对如何制服夷狄的问题，最好实行“用边兵”的办法，即重用边地的戍守兵士，加紧操练、积极准备，以图久远。针对如何整肃奸顽的问题，最好实行“求其情”的办法，即官员应尽心尽责，因刑而施，量罪得当。这些办法都是切合实际、易于操作的。从吴宽的对策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勤于思考，并有一定政治才能的人。

此外，吴宽对策问中其他问题的应答也是较为得体的。

总之，这是一篇较有特色的应对文章。

（苗菁）

成化十一年(1475)乙未科

状元:谢迁

谢迁(1449～1531)字于乔,号木斋,余姚(今属浙江)人。成化十一年(1475)参加殿试,钦点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迁左庶子、少詹事兼侍讲学士。不久诏令入阁,参预机务。与李东阳、徐溥、刘健等同心协力,匡失救弊,史称"弘治之治"。弘治十一年(1498)加官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武宗时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削职赶出京城。武宗病死,世宗即位,谢迁官复原职,重新入阁,时已79岁。不久辞官,卒于家。

策问

制曰:朕惟人君,奉天子民,治道所当先者,养与教也。养民莫重于制田里,广树畜。教民莫大于崇学校、明礼义。今兹二者,行之既久,而实未效臻于极,何欤?岂任用未尽得人,而督劝作兴之

道，有未至欤？唐虞三代，田分井牧之授，学谨庠序之训，当时民有恒产，士有恒心，所以养之教之者备矣。其良法美意，皆后世所当讲者，可历举而言欤？若汉唐宋愿治之君，未尝不留意于斯，而治效之成，卒不逮古，岂分田制产，兴学崇儒之意，视帝王为有间欤？朕承祖宗大统，抚临亿兆，于兹有年，夙夜竞惕，弗遑宁处，期于家给人足，教行刑措，礼乐兴而风俗美，跻斯世于雍熙泰和之盛，果何道以致之欤？子诸生积学待用，必有至当之说，明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对策

臣对 臣闻为治之道，固贵乎有仁民之政，尤贵乎有仁民之心。盖仁心存于中，而后仁政达于外。使有其心而无其政，是谓徒善。徒善不足以为政。有其政而无其心，是谓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先儒程子曰：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又曰：必有闻睢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之谓也。仁政本之仁心，则内外兼举本末不遗，而为治之道得矣，尚何虑教养未备，任用非人，而治效未臻其极耶？唐虞三代所以治隆俗美者，此心此政也。汉唐宋所以治不古若者，岂非徒有其政而无其心欤？

钦惟皇帝陛下，以圣神文武之资，绍祖宗列圣之统，恭己守成，虚心图治，虽深居九重之中，而念周四表之外。虑民生之或未厚，必欲皆安于饱食暖衣之天。虑民德之或未淳，必欲皆归于渐仁摩义之域。是以临御之初，他务未遑，首耕藉田以示重农而务本，继幸太学以示尊道而崇儒。丕绪恢张，仁闻四达，所谓宠绥四方而克相上帝者，亦已至矣。兹犹以实效未臻其极，而虑任用未尽得人，

乃进臣等于廷，俯赐清问，讲求至理，必欲追复唐虞三代之盛，此不自满假，稽于有众之盛心也。夫内不自满而外稽于众，则何所为而不至其极哉！陛下真大有为之君，可以为尧舜，可以为禹汤文武，可以唐虞三代斯世也。斯世斯民，何其幸欤！臣虽庸陋，敢不效一得之愚，以对扬明命之万一乎？

窃惟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君所以治之，师所以教之。《书》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又曰：克绥厥猷惟后。信乎！人君奉天子民，其为治之道，莫大乎养与教也。教养未尽，不足以言治，故孔子之告冉有，必曰富之教之。孟子之论王道，教养之外亦无余说。诚以仁政不外乎此耳。然养莫重于制田里而广树畜，田里不均，树畜不广，欲民生之遂，得乎？教莫先于崇学校而明礼义，学校不修，礼义不明，欲民性之复，得乎？夫是二者，固必由任用得其人，而后实效臻其极。然循其本而论之，惟在人君之心耳。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人君苟无是心，而徒区区于法制品节之末，则所施非其政，所任非其人，虽欲言治皆苟而已。臣请征诸古为陛下陈之。唐虞之时水土未平，烝民未粒，圣人有忧之。使弃为后稷而播时百谷，百谷熟而民人育矣。饱暖无教近于禽兽，圣人又忧之。于是使契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敷而百姓亲矣。三代之时其养民也，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教民也，夏之学曰校，殷之学曰序，周之学曰庠。自其制度之极备者而言之，田野之授，井牧异其制。学校之设，大小异其教。如衍沃之地百亩为夫，而九夫为一井。隰皋之地九夫为牧，而二牧当一井。井牧之制所以养民者，其备如此。八岁入小学，而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十五入大学，而教以勇理、正心之术，修己治人之道学校之制，所以教民者，其备如此。当是时也，出而使长，入而使治，皆刚简直宽之德，俊造秀乂之

士，是以民有恒产而无啼饥号寒者矣，士有恒性而无放僻邪侈者矣。然则其政立于上，而效成于下，又孰谓不本于得人，又孰谓不本于君心之仁乎？质之经、订之传而观之，则尧之兢兢，舜之业业，固一忧民之心也。禹之孜孜，汤之栗栗，亦一忧民之心也。至于文王之纯一不已，武王之永言配命，又何尝一念不在于民乎？此其良法美意，固卓乎不可尚已。古道既远，圣王不作，阡陌之端开，而井田之制废，养民已无政矣。坑焚之祸作，而诗书之习泯，教民已无政矣，又安有所谓仁民之心乎？后世愿治之君，若汉之文帝、唐之太宗、宋之太祖，亦尝留意于教养。或躬耕藉田而减租以劝农，或口分世业而节费以裕民，或遣官度田而课民以种植。养民之政有矣，然不过法制之虚文。或尊师重傅而临雍拜老，或大召名儒而增广生员，或增葺国学之祠宇而亲制孔颜之赞词。教民之政有矣，然不过太平之粉饰。究其存心，果有发尧舜禹汤文武之切于忧民者乎？上既无尧舜禹汤文武之君，则奉承宣布者，亦未必皆稷契伊周之臣。是以治效之著，虽或至于海内富庶，路不拾遗，户口繁益，求如古之耕田凿井，出作入息，而不知帝力何有则未也。虽或至于黎民醇厚、死囚来归、道学可称，求如古之仁人君子比屋可封，而但知顺帝之则则未也。此汉唐宋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欤？

仰惟我朝列圣相承，心尧舜禹汤文武之心，行尧舜禹汤文武之政，必求复唐虞三代之治。是以百纪修明，庶务振举，而于教养二事，尤致重焉。田虽无井牧之异制，然兼并有禁，荒芜有罚，既有守令以司之矣，又兼命藩臣以董之，养民何以加焉？学虽无庠序之异制，然廪饩有常，废坠有戒，既有师儒以职之矣，又专命宪臣以莅之，教民何以加焉？良法美意，昭昭乎日月之照临；深仁厚泽，荡荡乎天地之涵育。此我朝之治，所以度越前古也。陛下远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教养之政重加之意，盖无一念不在是也。伏读圣制有曰：朕承祖宗大统，抚临亿兆，于兹有年，夙夜兢惕，弗遑宁

处，期于家给人足，教行刑措，礼乐兴而风俗美，跻斯世于雍熙泰和之盛，果何道以致之欤？即此一念，臣已知陛下仁民无穷之心，盖不以目前之治而自已也。陛下抚盈成之运，当鼎盛之年，有可为之时，有可为之势，又有能为之资，诚欲复隆古之治，不过始终此心焉耳。始终此心，则始终此治。《易》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是知为治之道，固未可见小而欲速也。且天下之大，兆民之广，必人人皆遂饱暖之愿，而后可以为养之至，使有一民不遂其生，犹未也。必人人皆归礼义之化，而后可以为教之至，使有一民不协于中，犹未也。方今天下之民，安于田里而生生自庸者，固多矣。然而水旱相仍，则展转沟壑而无告者，不惟见于穷檐蔀屋之下，而通都大郡亦有之。如此而谓之生养遂，未可也。司民牧者，方且急于催科，而视农桑为末务，漫不知所以抚字赈救之方，此犹未免勤圣心之虑也。陛下养民之仁，诚能久而不替，田里未均，必思所以均之；树畜未广，必思所以广之。禁游手游食之蠹，惩横敛苛征之虐。慎选循良恺悌之人，以充守令之职，纵未必尽得如稷之贤，独不可得出入阡陌劝课农桑如召信臣者乎？既得其人，又假以岁月而考其功，因其功而进退之，则人孰不思所以自勉，而尽养民之职哉！如此而家不给人不足，无是理也。天下之民，习于行艺而熙熙相安者，固已多矣。然而饥馑荐臻，则犬鼠偷窃而无藉者，不惟见于遐陬僻壤之所，而名乡广市亦有之。如此而谓之教化洽，未可也。司风教者方且溺于宴安，而视教化为繁文，恬不知所以振励转移之术，此犹未免贻宸衷之忧也。陛下教民之仁，诚能久而不怠，学校必修，不使有倾颓之患，礼义必明，不使有坏乱之习。禁惑世诬民之言，革骄盈侈赞之俗。慎择端方谨厚之士以充师儒之任，纵未必尽得如契之贤，独不可得学兼体用、封植人才如胡安定者乎？既得其人，又重厥责任而考其绩，因其绩而黜陟之，则人孰不思所以自效，而尽教民之责哉！如此而教不行刑不措，无是理也。治既至家

给人足，教行刑措，则礼乐以兴，风俗以厚，四夷于是而咸宾，万邦于是而宁谧。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集，而雍熙泰和之隆复见于今日矣，唐虞三代岂得专美于前哉！

夫治效之所以隆，固皆本乎陛下之一心。然易逸难制者，莫人心若也。况人君之心攻之者众，若货利、若声色、若游畋、方技土木之类，皆足以蛊惑摇荡之者也。苟非识见之明而持守之坚者，未必不为所移。此心少移，则人欲日炽，天理日消，而无所不至矣。是故动一侈心，则取民不以制，而养民之政以废。动一躁心，则接下不以礼，而教民之政以坏。陛下天资高迈，志意坚定，谅必能持守此心而慎终如始矣。然以成汤之圣，每致警于盘铭之辞。武王之圣，恒究心于丹书之戒。学问之功，其可以少缓乎？先儒范氏有言：人君之心惟在所养。陛下欲致帝王之治，乌可不求帝王养心之术？国朝经筵之设，最为近古。左经右史，朝讲暮读，闻于耳接于目，而优游浸渍于心，则所以防非窒欲而长善者，莫要于此。臣愿陛下日御经筵，进讲不辍，毋视之为虚文，毋应之以故事。俾贤士大夫常侍列于前后左右，从容燕间渲绎陈说。所闻者必善言，所见者必善行。于以涵养此心，以不失其本然之天，充广此心，以不亏其固有之量。则养民教民之政，亦将始终无间，而治效愈久愈盛矣。天下治忽之几，端在乎此。

臣学术疏浅，荷朝廷教养有年，其于古昔圣贤格心之学，亦尝闻其大概矣。故敢陈此，以上酬陛下求言之盛心也。伏愿留神省览，则天下幸甚。臣干冒天威，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

评析

殿试对策的撰写一般已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固定格式。从明代的殿试试卷中可以看出，对策一般都是先归纳统率全篇的一个中心论点，然后紧扣这个中心论点依次回答策问中的问题。由此也就形成了文章顺次组合、建构的结构体系。老实的举子为了保险起见，也就形成了策问提几个问题，他就回答几个问题的习惯；在回答时，也是唯策问的顺序是循，不敢有所变化。但是谢迁的这篇卷子在结构顺序上却能有所逾越，略有变化。

策问共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与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现实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历史的问题。提问的顺序是先今，中古，后今。一般举子在结构自己的文章时，也往往是依这种顺序顺次而下的。但谢迁却不想依这种传统模式结构自己的文章，他精心设计，采用了一种先古而后今，从远古逐次论述到现实的议论方式。这种方式既能给人们以历史的纵深感，又能最后将议论的落脚点落在现实上，给人以极强的现实性。同时能够自出机杼，根据自己的体会和理解来独立结构文体，也显出谢迁是个较有主见性和独创性的人。

（苗菁）

成化二十三年(1487)丁未科

状元:费宏

费宏(1468~1535)字子充,号鹅湖,铅山(今江西铅山东南)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殿试一甲一名,例授修撰。武宗立,预修《孝宗实录》。正德五年(1510)进礼部尚书。次年,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相务,进户部尚书。武宗佞臣钱宁与宁王朱宸濠欲与交欢,费宏拒之,遂遭诬陷,乞休归。及世宗即位,加少保,入辅政,力劝世宗革除武宗弊政。"大礼"之议起,杨廷和去位,遂为首辅。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未几,张璁、桂萼以"大礼"之议得帝心,费宏被劾,于嘉靖六年(1527)致仕归。十四年(1535),复官如故。不久,卒于官。有《费文宪公集》、《宸章集录》等。

策问

制曰：自昔帝王创造丕图，必有贻谋，以为长治久安之计。夏商周之迹见于经，汉唐宋之事具于史。朕欲闻其纪纲、统体、制度得失之详，迨其嗣世之君，欲保盈成以跻至治，一惟旧典是遵是用。其或久也，不能无偏而不举之处，则亦兴其滞，补其弊，期使斯民得被先王之泽，如夏启商宗周宣王是已。而汉唐宋之君亦有能庶几者乎？朕欲究其奋励有为，功业可称之实。夫事不稽古，固无以证今，然徒泛论古之人，而不求今时之急务，亦非纳言之善也。昔朕太祖高皇帝奄一寰宇，建制垂宪，万世修崇。太宗文皇帝定鼎两京，洪谟远略，光前裕后。列圣相承，益隆继述，斯民乐育于熙皓之治，已百二十年矣。然治极而弛，理势自然。祖宗良法美意，岂能悉祗承而无弊乎？肆朕拳拳以法祖为念，欲俾内外百司，群工庶职，感思奋庸熙载，恪守夫典训而慎行之，毋滋偏失不举名存实爽之议，用期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中国尊而四夷服，风雨时而嘉祥至，谅必有道矣。尔诸生皆学古通今、有志于用世者，其各直述以对，毋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对策

臣对 臣闻帝王之御天下也，有致治之道，有保治之道。致治之道存乎法，保治之道存乎勤。非法无以维天下之势，非勤

无以守天下之法。故创造丕图者，必立法以贻孙谋；嗣守鸿图者，必忧勤以绳祖武。曰纪纲、曰统体、曰制度，皆法之具也，而兴滞补弊则勤之实耳。创之者以法，则国势尊严而有以成长治之业。守之者以勤，则法度修举而有以跻至治之休。帝王御天下之道，夫岂有外于此乎？夏商周之治所以卓冠千古，以其创之者其法善，而守之者其志勤也。汉唐宋之治不古若，庸非创之者其法有未善，守之者其勤有未至欤？

恭惟皇帝陛下，年当鼎盛，运抚盈成。昧爽临朝，惟祖宗之法是遵；甲夜视事，惟祖宗之法是监。临御以来，于兹二纪，贤才皆已举用，四海皆已无虞，保治之道盖已默得于圣心之妙矣。犹不自足，乃于万几之暇，廷集多士，咨诹治道。首举三代汉唐宋之创业者而欲闻其纪纲、统体、制度得失之详；中举三代汉唐宋之守成者而欲究夫奋励有为，功业可称之实；末复以祖宗列圣之所以创守为言，而虑夫成法之弊，拳拳以法祖为念，期于吏称民安，中国尊而四夷服，风雨时而嘉祥至。臣伏而读之，有以见陛下知创业之惟艰，念守成之不易，而欲保熙皓之治于无穷也。臣请稽之经，订之史，按之当今之务，为陛下陈 之，陛下幸垂听焉。

臣闻天下重器也，创之至艰，守之至艰。创之而不知所以创之之道，则无以垂治于百土。守之而不知所以守之之道，则无以保治于万世。创之之道无他焉，臣前所谓法是已。守之之道无他焉，臣前所谓勤是已。盖法者维持天下之具，故帝王创业必建立纪纲，经画统体，条陈制度，以尽天下之法，以贻子孙之谋，以为长治久安之计。自家而国，自国而天下，彼此相维，内外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者，纪纲之谓也。或尚宽大，或尚严明，以此而始，以此而终，不朝文而暮质以自溃乱者，统体之谓也。治教、礼乐、田赋、兵刑之类，所以经纬天地，黼黻民物者，制度之谓也。然先王之法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守成者欲保盈成以跻至治，又

必勤励不息，兴其滞以补其弊，然后天下之法可以施诸罔极，先王之泽可以被及斯民，而世为有道之国矣。

臣请以创之法言之，禹之造夏，有典则以贻子孙，观其文命四敷，声教四讫，则有以立乎纪纲。政尚忠朴，治先勤俭，则有以定乎统体。至于建官二百，内辟三千，设六师以讨罪，辨三壤以成赋，天秩有礼，大夏有乐，教民以序，正朔以寅，其制度又无不备。禹之立法贻谋，其善如此，夏之治安于此乎致矣。汤之造商，昭大德以裕后昆，观其肇修人纪而九有有截，则纪纲以立。代虐以宽而兆民允怀，则统体以定。至于建二相以总百官，制官刑以儆有位，公田籍而不税，大辂质而得中，国老养于右学，庶老养于左学，其制度亦无不备。汤之立法贻谋其善如此，商之治安于此乎致矣。若夫周之文武启佑后人，咸正罔缺，风化基于关雎，内庭属于冢宰，枢机周密，有以为四方之纲，明德而不敢忽，慎罚而不敢滥，仁爱中厚，有以为一代之体。其建官也，六卿分职，其制刑也，三典诘奸。田赋有乡遂都鄙之殊，军赋有乡遂丘甸之异。语礼乐则五礼以节民性，六乐以和民声。语教化则三物以兴贤能，四术以造俊秀。制度之备又何如也？周之治安何莫而不本于立法贻谋之善乎？下逮汉唐宋，创业之君非不欲致治如三代也，但其法有未善耳。汉之高帝大封同姓，委任大臣，以规模为纪纲。约法顺民，扫除烦苛，以宽仁为统体。命萧何次律令，命叔孙通制礼仪，章程定于张苍，军法申于韩信，所以贻谋者又有制度矣。然大纲虽正而终不能无杂伯之非。大体虽宽，而卒不能除参夷之令。庶事草创而井田不复，学校不兴，礼文多阙，而正朔不改，官名不定，则其法不能以皆善也。唐之太宗除乱致治，四夷宾服，庶乎知立国之纪纲。屈己从谏，仁心爱人，庶乎知为政之统体。以职事任官，以尊本任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礼制于房玄龄，乐作于祖孝孙，六学有领，五刑有覆，所以贻谋者又有制度矣。然内多惭德，有夷狄之风，渐不克终，来诤

臣之疏。法度之行，礼乐之具，拟之先王未备；田畴之制，庠序之教，拟之先王未详。则其法不能以皆善也。至若宋之太祖以忠孝廉耻为纪纲，而五事之美，千古所无。以偃兵息民为统体，而五季之弊一朝顿解。两府台谏，官之总察有方。三衙四厢，兵之简阅有道。幸学有训，均田有令，而教养之法可观。温叟制礼，和岘制乐，而礼乐之文可取。又有制度以贻谋矣。然宗室则无选举、教训之实，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官司之课试不严，学校之作成无要。兵士每杂于疲老，农民常苦于征繇。其法又岂能尽善哉。由是观之，则圣策所谓纪纲、统体、制度得失之详，可得而知矣。

臣请以守之之勤言之。夏当有扈违命之时，三正怠弃，五行威侮，禹之法不能无偏而不起之处也。启则敬承继禹之道，而奋励有为，兴滞补弊，召六卿以行天讨，申赏罚以肃人心，卒使民被先王之泽，而讴歌有归，有夏盈成之治以勤而保矣。商自盘庚既没之后，赏刑僭滥，荆楚叛背，汤之法不能无偏而不起之处也。高宗则监于先王成宪而奋励有为，兴滞补弊，求良弼以代王言，裒荆旅以昭殷武，卒使民被先王之泽而小大无怨，有商盈成之治以勤而保矣。至若周自厉王之烈，小雅尽废，而四夷交侵。上帝板荡，而下民卒瘅。文武之法不能无偏而不起之处矣。宣王由是奋励有为，兴衰拨乱，车攻复古，明文武之功业，六月出师复文武之境土。卒使王化大行，流离还定，周之盈成何莫而不保于兴滞补弊之勤乎？下逮汉唐宋守成之君，非不欲保治如三代也，但其勤有未至耳。汉之宣帝、光武庶几法祖之君也。或承武昭虚耗之弊，而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伸威北狄，功光祖宗。或鉴西京不兢之祸，而明慎政体，总揽权纲，身致太平，恢复前烈，其兴滞补弊之功业有可称者。惜夫神爵之后颇尚荒唐，建武之中竟行封禅，则其勤有未至焉。唐之玄宗、宪宗庶几法祖之君也。或革前朝权戚之弊，而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或征德宗姑息之祸，而纪律必张，元和之初威令复振。

其兴滞补弊之功业有可称者。惜夫天宝之末嗜欲滋生，平蔡之后侈心遽动，则其勤有未至焉。至若宋仁宗承宫闱传政之后，裁抑侥幸，锐意太平。神宗当累朝委靡之余，勤俭有为，励精求治。亦可谓善法祖宗，而兴滞补弊之功业有足称者。惜夫一则仁柔有余，刚断不足，一则听言太广而进人太锐，其勤又岂能至哉。由是观之，则圣策所谓奋励有为，功业可称之实，可得而知矣。大抵三代之法尽善尽美，故其子孙有所据依而为治也易。至于政弊，然后变其小节，而其大体卒不可易。汉唐宋之法不过因陋就简，以苟一时之近功，其善者常寡，而不善者常多。其善者常小，而其不善者常大。立之未几，而弊已随之。后世之君区区攸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虽欲言治，皆苟而已。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区宇，建制垂宪，而法之贻于后者至精而至备。太宗文皇帝定鼎两京，讦谟定命，而法之光于前者愈盛而愈彰。请举其大者言之。宫闱雍肃而无出阃之言，左右忠勤而谨戴盆之戒。任府部为股肱，而事权不紊。倚台谏为耳目，而国论有归。宗子分封，以广维城之助。三司并置，以革藩镇之专。申明典常，而有以正天下之大谊。诛逐胡虏，而有以严天下之大防。则纪纲之善无异乎三代矣。治本人情，而广孝悌之化。仁同一视，而无南北之殊。施猛政以济宽，用重典以平乱。惠鲜鳏寡，贪墨之加者必惩。怀保小民，豪强之凌暴者不贷。则统体之善无异乎三代矣。至若审官立铨选考课之方，育才设学校科目之典。财以足国，而赋税漕运有其经。兵以卫民，而番上分屯有其备。礼仪有式，宴享有章，而和敬之风以著。令教于先，律齐于后，而钦恤之意攸存。则制度之善又无异乎三代矣。祖宗之所以创业者其法既善，自是而后，若仁宗昭皇帝之励志图治，推诚任人。宣宗章皇帝之偃武修文，五伦攸叙。英宗睿皇帝之乾刚独断，克复旧物。莫不以勤而继守之。传至陛下，又能绍列圣之忧勤，守祖宗之成法，斯民乐育于

熙皓之治者盖已百二十年，虽三代治安之长久不是过矣。

圣策乃谓治极而弛，理势自然。祖宗之良法美意，岂能悉祗承而无弊？臣知此固圣人忧勤不已之心。臣敢不俯陈狂直以副圣心之万一乎？臣惟法之立也，本无不宜；法之行也，始有其弊。因其弊而救之，则存乎其人。古人有言曰：救弊者莫如修德。又曰：救弊者莫如责实。臣愚窃谓今日救时之急务，亦惟修德责实，益致其勤而已。盖德者，法之本也。德之修万一有不慎，则其之流之弊，必至于纵欲以败度。譬之人伤其气而寒暑易侵，木伤其根而风雨易折。法虽具也，亦徒法而已矣。实者，名之主也。实之责万一有不核，则其流之弊，必至于欺谩以成风。譬之抟土为舟不足以利涉，画地为饼不足以克饥。名虽美也，亦虚名而已矣。故以舜之重华协帝，而伯益犹以罔失法度为言。以舜之庶绩咸熙，而皋陶犹以屡省乃成为戒。正以无虞之世，其修德责实之功不可少怠耳。今陛下防非窒欲，恪守旧章，任贤使能，大明黜陟，所以修其德而责其实者，固不可以有加矣。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无已而望陛下，此臣所以拳拳以勤为献也。况我祖宗之法莫不以勤而创之。臣尝观祖宗之谕近臣有曰：朕念创业之艰难，日不暇食，夜不安枕。又曰：人君理万几，怠心一生则庶务壅滞，其患不可胜言。又曰：天下之大，庶务之殷，岂所须臾怠惰，一怠惰则百度弛矣。凡皆勤之准的也。陛下既知拳拳以法祖为念，又可不法祖宗之勤乎？臣请以勤之说为陛下别白而重言之。夫君者，天也。天惟聪明刚健，动而不息，是以其光为日月，其文为星辰，其威为雷霆，其泽为雨露，而万物之生于动者，各得其职。天之行也，一息有不继则运动无常，而不能以宰万物矣。人君之御天下，以其能宪天，聪明体天，刚健而拳拳焉勤励不息也。一或怠焉，则德有不修，实有不责，先王之法委靡废放，日趋于弊而已，又安能保天下之治哉。臣愿陛下所其无逸，罔或不勤，宪天之聪明以为聪明，体天之刚健以为刚健。一念之

萌，必谨而察之曰：此于吾法得无有所害乎？一令之出，必反而思之曰：此于吾法得无有此紊乎？无所害也无所紊也，然后从之，不然不敢从也。如是则人欲净尽，天理昭融，圣德益修，而所以救弊者有其本矣。由是条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几。表天下之人，其可用者有几。鸡鸣而起曰：吾今日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为某事，其事果济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事果济也，人果才也，然后已之，不然不敢已也。如是则为之而成，革之而服，名实相须，而所以救弊者有其要矣。陛下于是二者果能拳拳焉，不违于心，则勤之实以尽。内外百司，群工庶职，孰敢不体陛下法祖之心，奋励熙载，恪守典训而慎行之乎？以是守祖宗之纲纪，必能开众正之门，杜群枉之路。威福得以专，而无侵挠之患；政事得以修，而无阿私之失。以是守祖宗之统体，必能存仁厚之风，行宽大之政，垂旒黈纩而黜其聪察，藏疾纳污而务于包涵。以是守祖宗之制度，必能惜名器，公用舍以精吏治。必能重师儒、慎科责以正士风。理财也，必能罢无名之征，停不急之务。理兵也，必能稽私役之卒，征贿求之将。礼乐则必能革奢僭之习，放淫哇之声。刑政则必能除惨刻之科，重威福之罚。将见滞无不兴，弊无不补，今日之急务无不治，良法美意可以祗承而无偏失不举，名存实爽之议。由是而吏称其职，由是而民安其业，由是中国尊而四夷服，由是风雨时而嘉祥至。凡陛下所期无不如志，可以保盈成于万世之久，可以跻至治于三代之上矣。区区汉唐宋之功业乌足言哉！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于其终复策之曰：诸生学古通今，有志于用世者，其各直述以对，无有所隐，且宠之以朕将亲览之一言。臣荷陛下生成之德，沐陛下教养之恩，学虽不足以通经，而志于用世也久矣。今幸一登文石之陛，陟赤墀之途，承问而对，臣之职也。直言无隐，臣之忠也。况陛下导臣而使之言哉！臣复有一言以为陛下献者，惟欲陛下终始以勤而已。昔周公之于成王有

无逸之戒，宋璟之于玄宗亦有无逸之图。二臣之言初非有异，二君之治乃有不同。盖成王听周公之言而无间，故卒至凫鹥之休。玄宗用宋璟之言而不终，故卒成天宝之祸。是则人君之治，莫不兴于勤而废于逸，人君之勤鲜克善其始而慎其终。此前代彰灼著明之效，有国者不可以不慎也。伏愿陛下以成王为法，以玄宗为戒，以臣之言为不欺，慎终如始，不敢逸豫，则祖宗之法有不难守，天下之治有不难保矣。惟陛下留神省览，果如圣谕，则臣之幸也，宗社之福也，天下万世无疆之休也。臣干冒天威，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

评析

费宏的应对文章有这个几个特点：

一是应对精当。这年的殿试，御策以纪纲、统体、制度等往政时务发问，费宏答以欲长御天下，其要在以“法”为“致治之道”，以“勤”为“保治之道”。纪纲、统体、制度都是“法”的具体措施与体现，它一般是由创业者创订的，把它们贻留给子孙后代，用来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历史上诸王朝的法令是有“善”与“不善”之分的，夏商周之朝因为所创之法“善”，所以能够“卓冠千古”，汉唐宋之朝因为所创之法有“不善”处，所以就使得政治有“不古若”的地方。“兴滞”、“补弊”都是“勤”的具体体现，“勤”应是后继者所应时时恪守的。只有兢兢业业，竭尽职守，不敢有所逾越，才能继承祖宗遗业，以达“至治”之境。夏商之所以能绵远久长、数度中兴，皆是因为后继者如启、高宗、宣王等，皆能奋励有为，兴衰救弊所致。汉唐宋之所以国势日衰、不能长久，皆是因为后继者如汉之

宣帝、光武，唐之玄宗、宪宗，宋之仁宗、神宗等，或不能或克始克终，或奢心嗜欲之心滋生，或“仁柔有余，刚断不足”，或“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所致。当今之世，虽然祖宗所创法令制度都很完善，但是后继者却似不能以“勤”执行之。费宏的这番议论，以历史为一面镜子，总结现实之利弊，确实论证周详，议论精当。

二是婉切动人。应对文章属于上行文，故用语应是谦恭和顺的，在文中应尽量避免过于激烈的言辞和过于刚劲的句式。费宏深谙此道，在文中采用了相当婉转的表述方式，一是多好用“臣请以……”、“臣闻之……”这样的句式，小心谨微，恐有冒犯；二是多引古人之言，从不妄下结论，总是以公言常理为依据；三是虚设心理活动之语，在文中出现了好几处“一念之萌，必谨而察之曰”这样的句式，处处为对方的心理着想。如此，文章就显得较为徐缓，让人易于接受。同时，又好用一些比喻，举例也大都表述生动，这样又使文章具有了迅速打动人心的强烈效果。

“文以载道”是古人的普遍共识，载什么样的“道”和如何载“道”，这就有了千差万别的写作内容和方法。费宏的文章由于他的精心构撰，也就形成了我们上面说的两大特色。

（苗菁）

弘治九年(1496)丙辰科

状元:朱希周

朱希周(1473～1557)字懋忠,号玉峰。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弘治九年(1496)参加殿试,一举夺魁。援例授为翰林院修撰,历官侍讲、经筵讲官、侍读学士、南京吏部右侍郎,后调京任礼部右侍郎。因"大礼"之议获罪,出任南京吏部尚书。不久辞去官职,回家养病。晚年隐居阳山近30年,淡然自守,粪土功名,唯以读书为务。享年84岁。

策问

制曰:朕惟君人者,必有功德以被天下,阙其一不可以言治。顾于斯二者何先?夫非学则无以成德,非政则无以著功。论者或

谓帝王之学不在文义,或谓天子之俭德乃其末节,或谓人主不亲细事,或谓圣王不勤远略,是宜有大于此矣。然则,其所当务者何居?二帝、三王之德,所学者何事?二帝、三王之政,所见者何功?汉唐宋代有令君,而功德鲜备。躬行德化者经制或不定,民安吏称者德教或不纯,或四夷服从而大纲不正,或仁厚立国而武略不兢,是学与政容有可议者,其得失何如?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神功圣德,冠绝古今,列圣相承,继志述事,各臻其盛,所以致此者何由?朕嗣承大统,图底治平,兹欲守宋臣所进之五规,去唐相所陈之九弊,行汉儒所对之三策,以上追古帝王,庶无愧于我祖宗功德之大,其所为根柢者何在?子诸生学道抱艺而来,皆志于世用,宜有以佐朕者,试悉陈之,朕将体而行之。

对策

臣对 臣闻帝王之为治,有体有用,功与德之谓也。德以学成,而为治之体;功以政著,而为治之用。二者可相有而不可相无者也。盖帝王未尝有无功之德,亦未尝有无德之功。德而无功,有体而无用者也;功而无德,有用而无体者也。体不立,用不备,皆不可以言天下之治。然于此又有说焉。德之浅深由乎学之精粗,功之大小系乎政之纯驳。帝王之德,天下之大德也。帝王之功,天下之大功也。然则帝王之学与政,亦独非天下之大而可以小视乎哉?故有志于功德者,必以学政为务。而从事于学与政者,亦必有所当务。苟不知务其大而专事其小,则其学也支离偏曲,而不足以成大德;其政也琐屑细碎,而不足以著大功。尚何天下之治之足云乎哉?由是论之,则二帝三王之所以功德兼隆,汉唐宋之所以

功德鲜备，及我圣祖、神宗之所以上追帝王而下轧汉唐宋者，概可得而知矣。

钦惟皇帝陛下有生知安行之资，有持盈守成之道，深仁厚泽浃洽于人心，盛烈丰功覆冒于天下，而犹体道谦冲，惟日不足，乃于万几之暇特进臣等于廷，俯赐清问，讲求至理，必欲追唐虞三代之盛治，绍祖宗列圣之洪猷，而合汉唐宋于不为甚之盛心也。臣荷国家作育之恩，预有司荐拔之列，敢不勉竭愚衷以对扬休命之万一乎？

臣惟天降下民而作之君，人君以一身为天下民作之主，其势亦尊矣，其责亦重矣。其所以治天下者，岂苟然哉！盖必有帅天下之德以立治之体，必有安天下之功以达治之用。有其功无其德则教化不成，风俗不厚，虽使勘定祸乱，臣服四夷，国本无自而正也。有其德无其功则纪纲不立，威令不行，虽使仁心洋溢，仁闻宣昭，国势无自而振 也。二者或缺一可耶，欲言治皆苟而已。然究其缓急之序，度其重轻之宜，德成而功著者有矣，德不成而欲其功之著不可得也；体立而用行者有矣，体不立而欲其用之行不可得也。故善为治者，必由体以达用；善言治者，必先德而后功。至于推本而言，则德不能以徒成。其成也在乎学，学则在讲习讨论之事，克治之功，所以培养乎其德者也。功不能以苟著，其著也在乎政。政则有纲纪文章之事，法度品式之施，所以充积乎其功者也。顾帝王之学与韦布之士不同，帝王之政与有司之职亦异。

试以古人之言论之。好文，盛事也，而程颐则谓：帝王之学不在文义。盖经世大法备载方册，务得其要，措之事业，斯其为大者耳，寻章摘句何足尚耶？崇俭，美德也，而柳公权则谓：天子之俭乃其末节，盖亲贤人、远不肖、纳谏、严明赏罚，斯其为大者耳，片长寸善何足多耶？躬亲庶政者，人皆以为勤，而杜黄裳乃有人主不亲细事之说。盖其大者，慎选贤才以分其任而已。若庶务之烦，钱谷责内史，狱论责廷尉，何必事事而亲之哉！威灵及远者，人皆以为武，

而胡寅乃有圣王不勤远略之议。盖其大者，专务治内以固其本而已。若戎狄之性则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何必人人而服之哉！夫知其大者之所当务，则其小者有不足务矣。试以古人之事论之。功德兼隆者，莫若二帝三王。其见于《书》，则尧之钦明文思，舜之温恭允塞，禹之彝伦攸叙，汤之人纪肇修，文武之纯亦不已，建其有极，德莫有大焉者矣。原其所以为学，则虽不必学知利行，而执中之传，精一之训，善言之乐闻，明命之顾諟，以至敬止之诗，丹书之戒，一皆身心性命之理，而非学之小者也。凡若此者，何莫非德之所自耶？尧之敬天勤民，舜之设官分职，禹之修和府事，汤之子惠困穷，文武之咸和万民，大赉四海，政莫有大焉者矣。要其所以为功，则虽不必家赐人益而黎民之于变，四方之风动，万世之永赖，兆民之允怀，以至万邦之作孚，万姓之悦服，一皆弥纶参赞之业，而非功之小者也。凡若此者，何莫而非政之所致耶？

三代而下称盛治者，以汉唐宋为首，其间创业之英君，守成之令主，代不乏人。然而有德者或缺于功，有功者或缺于德。汉之文帝化民以躬，率下以德，庶乎德之纯矣。而礼乐未兴，正朔未置，迹其所为多失之因循，而不能革嬴秦之陋。宣帝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庶乎功之美矣。而专事刑名，杂用王霸。考其所存，一出于苛察，而卒以基元、成之乱。单于稽颡，绝域奉贡，唐太宗之四夷服从，功可嘉也。惜乎人伦之间内多惭德，陷父不义而父子之道乖，推刃同气而兄弟之恩薄，大纲已不正矣。事周后如母，爱少帝如子，宋太祖仁厚立国，德可尚也。惜乎兵权既收，缓急无备，其始虽足以戢奸雄之变，其后渐无以御外敌之骄，武略已微不兢矣。是知文帝、太祖德优于功；宣帝、太宗功优于德。求其功德兼隆者未之闻焉。所以然者，盖以言乎学，不过从事虚文，而无修身之大要。故功虽小著而不足以成其德，用虽行而体则缺矣。以言乎政，不过补塞罅漏，而无经世之远图，故德虽小成而不足以著其功，体虽立

而用则缺矣。其不能企及唐虞三代之治，安足怪哉！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恭天成命，肇造洪业，用夏变夷。复纲常于沦斁之后。除残去暴，拯生灵于涂炭之余。太宗文皇帝定制两京，光前裕后。振兵威于四裔而圣武之广布，昭明理学于万方而王化之覃被。其德之大也，无异于二帝、三王之德。其功之大也，实倍于二帝、三王之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仁宗昭皇帝励志图治，推诚任人。宣宗章皇帝惇典绥猷，立法垂训。英宗睿皇帝刚明独断，奋发有为。宪宗纯皇帝圣孝昭彰，至仁不□□□□祖宗之志而奉承之无间，皆善述祖宗之事而遵守之无遗。所以致此者，固非言语之所形容，要亦不出乎学与政而已。善其为学，一帝王之大道而非章句文义之间。其为政，一帝王之大法而非制度文为之末。臣请举圣学之一二言之。跋《尚书》、《洪范》于座右，书《大学衍义》于庑间，表彰六经以发圣贤之蕴奥，采摭群言以明性理之渊彻，此祖宗之学也，列圣继之。数御经筵，躬亲著述，备人极于五伦之书，详君道于文华之训，何莫而非学之大者哉！臣请举圣政之一二言之。礼正百官，乐成九奏，用人有道而谗说为之不行，驭戎有法而强虏为之远遁。此祖宗之政也，列圣继之。或询民隐而急农事，或减税敛而轻刑罚，或创课种备荒之制，或加宣圣乐舞之仪，何莫而非政之大者哉！功德之大，继述之隆，有由然也。

今陛下当累世熙洽之时，慕隆古文明之治，方有□于近代之君而不为，顾有服于近代之臣而不弃，岂不以言近指远，登高自卑，□举其必可行之端，以示其大有为之志乎？昔宋司马光之于仁宗尝进五规：一曰保业，二曰惜 时，三曰远谋，四曰谨敬，五曰务实。诚不可以不守也。唐陆贽之于德宗尝陈九弊：谓好胜人，耻闻过，骋辨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刚愎，六者君之弊。谄谀、顾望，畏愞，三者臣之弊。诚不可以不去也。汉董仲舒之于武帝尝对三策：其一则欲正君心以正四方，立教化以防万民。其二则欲置明师以养士，

责大臣以求贤。其三则欲定法制以革奢靡，持一统以息邪说。诚不可以不行也。此三言者，皆该学校之两端，合体用于一。致天下之治，实不外是。苟徒慕其言而不究其根柢之所在，则守之者无法，去之者无术，行之者无具，亦何以远追帝王，近法祖宗而大其功德于天下耶！是故祖宗之德大矣，而其所由成者在乎学。今日欲期于祖宗之德者，可不自学始乎？祖宗之功大矣，而其所由著者在乎政。今日欲期于祖宗之功者，可不自政始乎？陛下之所以为学，亦惟即三臣之言而推之。戒谨不睹，恐惧不闻，儆畏于独知之地，不以暗昧而或欺。省察于方动之几，不以细微而或忽。则五规之所自守者，在是矣。善与人同，改过不吝，不知有余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为在己，失为在人。则九弊之所自去者，在是矣。善与人同，改过不吝，不知有余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为在己，失为在人。则九弊之所自去者，在是矣。体天心以为心，法天道以立道，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究治乱兴衰之源，谨动静云为之际。则三策之所自行者，在是矣。如是而德不大者未之有也。陛下之所以为政，亦惟举三臣之言而措之。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务勤劳，戒骄惰，畏天命而悲人穷，拔本塞源以防祸患之萌，循名责实以立政治之本，则得乎五规遗意矣。远邪佞之人，适端直之士，温辞色以尽下情，赏谏争以开言路，言之善者采之而不弃，言之未善者容之而不责，则得乎九弊之深戒矣。大纲正而万目张，一法行而百度举，因革损益各适其宜，先后缓急各循其序，不牵滞于后世驳杂之政，不迁改于流俗因循之论，则得乎三策之大要矣。如是而功不大者未之有也。夫学之与政固不可以偏废，然不先之以学，则无以□圣贤之成法□事理之当然。凡天下之事不知何者为是，何者为非，而是非或至于混淆。凡天下之人不知何者为正，何者为邪，而邪正或至于错杂。亦何以为政于天下哉？此古之善为政者，所以不徒恃乎政，而必有学以为之本也。若夫为学之事，臣前已论之

矣。而所以为其事者，亦有道焉。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诚心而已。盖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理者在是，所以应万事者在是。故诚心不求则外有讲学之名，而内无自得之实，虽曰从事于学，而亦安能有所发明耶？臣愿陛下坚持此心不为外诱之所移，善养此心不为物欲之所慕。主之以敬，守之以勤，亡者摽之而使存，出者约之而使入，勿贰以二，勿参以三，勿一暴而十寒，勿朝作而暮辍，则志气清明，义理昭著，会之于心而默识心通，体之于身而躬行实践，为学之功尽善全美而无罅隙之可议矣。学既至则政无不备，体既立则用无不行。由是功德之大，远可以追帝王，近可以配祖宗。而凡近代之君，小康之治，有不足言矣。

臣道不足以明体，言不足以适用。然今日之所陈者，一皆圣贤之明训，儒先之格言，而非敢以私见臆说进也。惟陛下采纳而施行之，则天下幸甚，万世幸甚。臣干冒天威，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

评析

据《明史·朱希周传》载，朱希周之所以能中状元，乃是因为明孝宗喜欢他的姓名而致，是否真的如此，今天当然是难以说清了。不过，从这篇殿试文章来看，朱希周并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的一些见解和主张，并善于适当发表意见的士子。

他对“功”与“德”的阐释和演绎，是较为成功的。他认为在治理国家中，帝王之“功”与帝王之“德”是“用”与“体”的关系。“功”是“为治之用”，要靠政事来显示；“德”是“为治之体”，而靠学习来促成。二者是相互依存，不能偏废的。如果“有德而无功”，那就是“有体而无用者”；如果“有功而无德”，那就是“有用而无体者”。所

以，一个帝王，如果“体不立，用不备”，都不能说是已达到了“天下之治”。作者反复地论证“功”与“德”的关系，实质上是想规劝皇帝既要有所作为，又要体恤民情；既要重视事功，又要讲求纲常伦理；既要立功于外，又要修身于内。如此，才能不负君王之位。

他对帝王的讽谏也是较为得体的。他认为帝王为学要“戒谨不睹，恐惧不闻。儆畏于独知之地，不以暗昧而或期。省察于方动之几，不以细微而或忽……”，都是十分精警的。他认为帝王为政要“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务勤劳、戒骄情、畏天命而悲人穷，拔本塞源而以防祸患之萌，循名责实以立政治之本……”，也是十分深刻的。所以，朱希周的议论既不过于激烈，又能于平和中触及到一些深刻的东西，这应是此篇文章的一个特色。

（苗菁）

弘治十二年(1499)乙未科

状元:伦文叙

伦文叙(1466～1513)字伯畴,号迂岗,南海(今广东广州)人。弘治十二年(1499)会试、殿试皆为第一,连中两元,夺得了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历官经筵讲官、翰林院侍读学士。正德七年(1512)秋,奉命主试应天府,归途中染上风寒,回京师大病不起,不久即去世,年仅 47 岁。后其三子皆中进士,天下盛传,当时人称"四元"。

策问

制曰:朕惟自古圣帝明王之致治,其法非止一端。而孔子答颜渊问,为邦但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为言。说者谓之四代礼乐。然则帝王致治之法,礼乐二者足以尽之乎?宋

欧阳氏有言,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当时道学大儒,称为古今不易之至论。今以其言考之,上下数千余年致治之迹具在,可举而论之乎?夫三代而上无容议矣,汉高帝尝命叔孙通定礼乐,召鲁两生不至,谓礼乐积德百年而后兴。厥后三国分裂,其臣有诸葛亮者,而世儒乃或以礼乐有兴,或以庶几礼乐许之。盖通与亮之为人,固不能无优劣,要之于礼乐能兴与否,亦尚有可议者乎?我国家自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创业,圣圣相承,百有余年。礼乐之制作,以时以人,宜无不备矣。然而治效之隆,未尽复古。岂世道之升降不能无异邪?抑合一之实犹有所未至邪?朕祗承丕绪,夙夜拳拳,欲弘礼乐之化,益隆先烈,而未悉其道。子诸生其援据经史,参酌古今,具陈之。朕将亲览焉。

对策

臣对 臣闻若天下者,有致治之大法,有出治之大本。礼乐者,致治之大法也。天德者,出治之大本也。大本具而后大法可立,大法行而后大本以彰,本末相资,内外一道,不可以差殊劝也。然大法行于天下,非智术所能为。大本存乎一心,非掩袭所能得。必其性诸天者,浑然完具,初无一毫之亏欠,则其施诸治者,粲然明备,可以四达而不悖矣。苟法有未备,固无所恃以为治,而本之不纯,抑又何以立大法哉!《传》曰:有天德,便可语王道。其以是欤。

钦惟皇帝陛下,禀神圣之资,际盈成之运,存心养性,以培植天下之根本者,无一日之不谨。化民成俗,以恢弘天下之治道者,无

一事之不周矣。但善之可为，古人自以为不足，世虽极治，圣人犹以为未然，是以侧席求贤，临轩策士，询臣等以礼乐之治。上稽唐虞三代之盛美，下逮汉唐宋之得失，暨祖宗创业垂统之善，今日保邦致治之规，诚有天下之远图，安天下之至虑也。顾臣学术肤浅，何足以语此，然有问而对者，臣之职。有怀必吐者，臣之愿。敢不罄一日之敷言，以答千载之奇遇哉！

臣惟天地之道至大也，阴阳之理至妙也，而造化蕴育，固未尝不著见乎两间。观其物各付物，而不可以强同，则天地所示者，一自然之序而为礼也。絪缊化醇，而不容以独异，则天地所示者，乃自然之和而为乐也。惟古之圣帝明王，与天地合德，与阴阳同运，履中正而大本以立，乐和平而大本以端，于是以一身之中和，为天下之中和。以一人之礼乐，为天下之礼乐。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立天下之纪纲；一制度，异好尚，明等威，正称号，以至定天下之名分；用天时，因地利，揭天常，立人纪，以广天下之政化。以至亲疏小大为之体，朝会交际为之期，宫室器用为之饰，吉凶哀乐为之节，以备天下之典。则使天下之事，莫不各得其序，而人乐以持循，夫是之谓礼。天下之物莫不各适其和，而人兴于鼓舞，夫是之谓乐。礼乐备，而天下之治毕矣。故孔子答颜渊为邦之问，不过以夏时、殷辂、周冕、韶舞为言。尹焞因谓之四代礼乐，则凡古今致治之法，皆不出于礼乐二者。而礼乐之外，安复有所谓治法者哉！降及后世，求治无本，如摭其文，以用于郊庙朝廷之间，不推其意，以及于闾阎里巷之下。宋儒欧阳修谓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为虚名，大儒朱熹因谓万世不易之至伦，良有以也。

臣请得而论之，尧舜禹汤文武之圣，精一执中，皆极夫渊微之妙。建中建极，皆纯乎义理之天。惟其为德之纯，故政事之所修明，明化之所旁达，虽未尝明言礼乐于天下，而其变通之宜，衣裳之垂，玑衡之察，玉帛之修，与夫钦昊天而授人时，画井田而备封建，

昭典礼而严命讨，祀神祇而奠山川者，率皆礼乐之用也。虽未尝显礼乐于四方，而其文命之敷，人纪之修，咸和之用，由旧之政，与夫关石和钧。其于王府正朔服色，易于革命，九一世禄，行于治岐。五教三事，重于武成者，率皆礼乐之行也。

盖不出乎经世宰物之典，而得鼓动作兴之机。不外乎民生日用之常，而寓渐摩诱掖之道。所治莫非教，所教莫非治。政治礼乐，初无二途。是以二千年间，经制大备，政教大同，礼乐之化，自国家以布濩乎天下，自朝廷以流及于万国。咸有以沦人肌肤，浃人骨髓，致人人有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者，合唐虞夏商周，而同一彻焉。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者，以其治之有本故也。

若汉唐宋之君，具宽大之德者，不如尧舜之至仁；抱英雄之略者，类非汤武之大勇。惟其德之不纯，故虽制礼作乐之命，后先相闻，蕞仪审音之奏，影响不绝。然徐考其所务以为治者，则九章之法，十五之税，南北之军，以为开基之伟制。习射殿前，更定律令，减省吏员，以为贞观之政要。收藩镇之权，严兵样之选，定覆奏之狱，亦视为立国之规。朝夕从事，以为治民之政，至其制作所成，谋议所定，则杂就之仪，掌于太常。大风之歌，奏于原庙。事文具，则著贞观之仪；耀武功，则崇七德之舞。刘温叟所定，犹杂先朝之迹。和岘所奏，未谐声气之元。另其名目，以为礼乐之教，是皆求治于抑勒操切之余，而不知其陷于俗吏之非。立教于声容器数之末，而不知其流于文史之伪。所治非所教，所教非所治，政治礼乐，岐为二致。

是以千有余年，经制荒忽，政刑苛紊，置先王之粗迹，以为有司之藏。采古法之遗略，以备斯须之用。妖声艳辞，无补于时政之缺失。虚饰美观，莫拯夫世变之下移。虽其享国，亦仿佛乎帝王之历年。而其风俗，则不逮帝王之季世者，合汉唐宋而一同睽焉。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者，以其治之无本故也。

汉高祖因群臣肆拔剑击柱之失，叔孙通行共起朝仪之请，乃曰可试为之，又曰度吾所能者为之。则其所求者固已非三代之典，而其所委者又复无九官之臣，此积德百年之语。所以来两生之却，而绵蕞野外之习，姑以徼小就之功，则其君臣之所自许，与其志愿之所自足者，从可知矣。是其时虽若可乘也，而无可为之人，礼乐之所以不能兴也。诸葛亮感先主三顾之勤，而为两汉中兴之佐。立纲陈纪，而不为近图。广德率义，而不为小惠。庶政欲其精练，万事理其根本，则其施为之规，已得礼乐之遗意矣。使天祚汉，假之以年，将见开诚布公之治，虽未敢必其匹休前古，而光明俊伟之业，将有以决其度越后世矣。王通谓其礼乐有兴，程颢谓其庶几礼乐，岂无见乎。是其人虽若可为也，而无可乘之时，礼乐之所以不复兴也！

我国家自太祖高皇帝，以圣人之德，御圣人之位。用夏变夷，为民立极，酌古准今，以建一王之法。因时创制，以定万世之规。暨于列圣，率遵成业，以为永图。肆我皇上，益隆继述，以期光大华夷一统，百有余年，固非蜀汉之偏安，重明继照，世德作求，下陋汉高之不学，是宜礼乐之道，掀天揭地，超出乎百代之表。礼乐之化，风行海流，大被乎九围之内。然《凫鹥》既醉之什，尚未歌于审音之瞽。而鸣条破块之变，容或纪于上事之臣。堂陛深严，而吁咈之风未著。教化流行，而禁网之密未舒。萑苻之扰，间见于潢池，纨绮之习，下成于闾巷。治效之隆，未尽复古，诚有如圣谕所云也。将谓世道有升降之异耶。向使汉唐宋之君，有尧舜汤武之德，而其臣有皋夔伊周之贤，则王道著七制之书，未必为后世之僭经，而唐史赞文王之辞，亦遂为不刊之实录也。

今以君明臣良之时，当重熙累洽之盛，所以时平世道者，特在陛下决取舍之机。而所以维持世道者，亦在大臣竭赞成之力耳。复古之治，臣切望焉。若谓合一之实有未至耶，则我祖宗为治之

道，即礼乐之道，陛下保治之法，即礼乐之法，固无所谓出于二矣。但其道至大，非一人之所优为。其法至广，非一日之所能尽。朴略于风气未开之时，不能不藻饰于人文渐著之世；草创于文武更始之初，不能不大备于成康继体之后。今求夫为治之实，其亦有不能尽合于一者乎？

伏愿陛下，上体天心，懋隆峻德，涵养情性，致极中和，以端出治之本。详审枢机，修明体要，以成致治之法。使天下之政，皆出乎天理之公，而后世人欲之私，有所不用。天下之务，皆由乎道义之正，而后世法禁之术，有所不行。殆见著于闺门，兴于朝廷，被于乡遂比邻，达于诸侯四海。自祭祀军旅，至于饮食起居，未始一日不在礼乐之中，亦无一人不被礼乐之化。所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乐无声，而天下和。近可以匹休于祖宗，远可以比隆于前古。而汉唐宋之治，不足言矣。

虽然出治之本，固在于德，而修德之本，则岂外于学哉，尤愿陛下，于退朝之暇，清燕之余，注意于圣经贤传之蕴，留神于古训时务之宜。端本澄源，以肃此心之敬。防微慎独，以闲外至之邪。御经筵，不徒事讲说之勤，必求夫明善诚身之实。开言路，不徒侈献纳之广，必尽夫省躬克己之诚。治乱兴衰之源，在所周知，民情物态之变，亦垂听览，则圣学聿新，治效随著，礼乐之用，达于天下而无间矣。尚何合一之实有未至，而复古之治有不成哉！

由是观之，帝王所以建致治之绩，于数千载之上者，此道也。祖宗所以隆致治之业，于百年之间者，此道也。然则陛下之所以光前振后，而绵亿万载隆长之绪，亦岂出于此道之外哉！臣学不足以稽古，而窃尝怀复古之思；智不足以知今，而未敢忘当世之务。故酌治道之中，为探本之论，以上尘圣览，惟陛下采择而施行之，匪惟愚臣之幸，诚宗社无疆之休也。干冒宸严，不胜恐惧战栗之至。臣谨对。

评析

梁刘勰《文心雕龙·议对》中说:"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清王兆芳《文体通释》中说:"对策者,应对君所问事之册书,非谓谋策也。颜师古曰:'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主于视策详说,殚洽见闻。"所以,对策乃是应对君王的一种文体,君威可惧,本已让人百倍小心;而又用在选拔人才的特殊场合,一策能定终身,关系到自己的未来前途,更应处处考虑。因之,在回答问题时,一般以能柔顺而承上意,周详而中条款者为最保险。伦文叙的文章就具有这两个特点。

就柔顺而能承上意来说。策问是以礼乐为题向考生发问的,礼乐是科举考试中常要涉及到的题目,但是集中发问却是较少见的。时当弘治之朝,孝宗朱祐樘是位较能励精图治、有所作为之君主,他重用贤能,革除弊政,减少供奉,停省工役,赈济水旱灾害,时称朝序清宁。他心目中当然对礼乐之治有所倾心,所以伦文叙不能别有选择,只能于"礼乐之治"上大作文章。他和明代几乎所有的考生一样,扬三代之君,抑汉唐宋之主,不过这种扬抑是以能否实行"礼乐之治"为出发点的。他认为,三代之治乃大行礼乐之治,故"政事之所修明,明化之所旁达"是后世难以企及的;汉唐宋诸朝治事有亏乃"治出于二","治非所教","教非所治","礼乐为虚名"的缘故,所以"虽其享国,亦仿佛乎帝王之历年。而其风俗,则不逮帝王之季世者。"并且事例屡举,引言纷呈,反复阐释,反复论证,对策问中的观点竭力阐发、维护。这当然是能切中上意的。

就周详而中条款而言。伦文叙于文中首先立出一篇之中心论

点，曰："大法"、"大本"。具体地说：礼乐是致治的大法；天德是出治的大本。然后再就策问中的提问一个个进行具体的阐释、发扬。先说礼义之含义，申叙的重要作用。又言尧舜三代用礼乐而大化天下，汉唐宋三朝不能纯用礼乐而难追古人。这已是条条俱照发问而来。随即又用一小段就叔孙通与诸葛亮之优劣发表议论，认为汉初时是"时可乘"，但"无可为之人"，即叔孙通并不可用，所以"礼乐不兴"；认为蜀汉时是"人可为"，即诸葛亮可以有所作为，但"时不可乘"，所以"礼乐不能复兴"。两两对比，言简意赅。接着，又用较长的篇幅对时政发表了意见，宛转从容。最后以修德、好学作为全文收束，既照应开篇，又勉励帝王。言语谆谆，动人心弦。总之，运笔周密，行文详备，有问而能尽言，无问决不溢出，是本文的一大特点之一。

（苗菁）

弘治十五年(1502)壬戌科

状元:康海

康海(1475～1540)字德涵,号对山,又号浒西山人,一号沜东渔父,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人。弘治十五年(1502)壬戌科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因与李梦阳等相唱和,始负盛名,为弘治间文坛十才子之一,又为复古派前七子之一。正德年间,宦官刘瑾擅权,欲与交欢,被拒。后李梦阳获罪,康亲谒刘瑾,使梦阳得释。及刘瑾败,被斥为同党而落职。后与王九思等聚于鄠(今陕西户县)、杜(今陕西西安近郊)间,制乐造曲,浪迹江湖。有《对山集》、《沜东乐府》传世。

策问

制曰：朕膺天命，承祖宗列圣之统，以临天下，于兹十有五年。夙夜兢兢，思弘化理，非法诸古而不可。然尝考之前代继统之君，守成称贤，莫盛于夏之启，商之中宗高宗、周之成康之数君者。治绩之美，具在方策，果何道以致之？近世儒者之论，谓圣王以求任辅相为先。又谓君之王者以辨君子与小人。数君之致治也，其亦有待于是邪？且辅相之贤否，君子小人之情状，未易知也。兹欲简贤为辅，用君子，不惑于小人，将安所据邪？天下之务固非一端，以今日之所急者言之，若礼乐，若教化，若选才，课绩征赋之法，兵刑之令，皆斟酌于古。然行之既久，不能无弊焉。祛其弊而救之，欲化行政举，如祖宗创制之初，比隆前代，何施何为而得其道邪？子诸生积学明经，通于古今之宜，其具实以对。毋隐言，毋泛论，朕将采而行之。

对策

臣对 臣闻天下有不可易之道，而常获于人主有不敢易之心。盖天下之事，未有舍道而能集者。而道固不可易也。心之所向，道之弘否所关，一有所易，则所以修乎身者，必不能实用其力。而道之在我，知之不明，守之不固，甫迁于此，或转于彼。虽欲勤励以求治，而弛张予夺，一无所拟。窥伺媒孽之辈，共起而乘之，

虽有贤人君子立于其朝，漫不相信，甚者或斥谴罢去，不为之所。天下之治，将焉所赖而成乎？惟有以真知道之不可易，其心常忧勤惕励，而不敢以一毫苟且轻率之意杂之于中。择之必精，执之必固，使用人取善各有定则，贤否莫吾乱，而君子小人不相尤。既得其人而任之以事，则政无不举，而法无不善。天下之治，宜无有不成者矣。古之人君，未有不达于是，而能致其治者也。亦未有徒达于是，其心终有易焉，而能以无弊者也。

洪惟皇帝陛下以至圣之德，抚盈成之运，十五年来，民安物阜，虽尧禹汤文武之业，亦不过此。而策士之诏，乃犹拳拳焉以化之不洽为念。陛下岂诚有未达于是，而犹待于问哉？臣有以仰窥圣心之于道，固有不自易焉者也。臣尝谓古今豪杰之士，不得所遇，如子思、孟轲之流，亦且徒尔。而臣之庸昧，乃际遇若此，臣敢有所讳而不言哉！

臣惟天下之深患，在于久安极治，而机括所不见者，莫为之虞。陛下夙夜兢兢，思弘化理，此固宜也。然用于己不若资于人，求诸今莫若法乎古。古之君之心纯乎道，未尝敢以为易，故其用人行政，有非后世之所能及。如启当禅授之后，继禹之业，守之以敬，而伯益之用，终始无间，故道之得于禹者，无废坠不举者矣。中宗、高宗，一切信任陟扈傅说之属，而又本以严恭寅畏，恭默思道之心，成商之治，夫岂无所据邪？殷之顽民，杂于管、蔡、武庚之手，武王之泽未洽也。使非悔悟于周公，笃信于君奭，借有成康继序不忘之思，旌别淑慝之意，而礼乐之化，岂能如诗书所道哉！程颐曰：圣王以求任辅相为先。欧阳修曰：君之圣者，以辨君子与小人。盖政以人而举，人既存，则政自无偏弊不举之患，而治之在天下者可成也。陛下欲求数君致治之绩，独可舍此而他务邪？亦惟有不敢易之心而已。天下之政，孰有出于人主之心者。况用人之际，又其本原所自之地哉！

圣制所谓简贤为辅，用君子，不惑于小人，诚灼见其必然，而忧勤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盖大君为天地之宗子，必有大臣以为宗子之家相。相之职，所以辅养君德，而赞成政化，天子不可以日无者，岂惟夏商周为然。皋夔稷契之流，虽尧舜之世，亦 不可无也。若其贤与否，则必辨之于先，而后可任之于后。苟辨之不明，用之不当，则天下之祸，反有不可言者矣。何者，以匹夫之贱，而上与天子共事，其所为操纵予夺者，无一不为天下之所禀爱。使心术或不正，而学识或不醇，则其所坏，非如有司之一节一端而已。故必先有不敢易之心，然后修之身者，无往不实。修之身者既实，则出乎我者，无乎不正，而人之邪正，自无所匿。于是择其贤者而用之，则辅相得矣。臣于今日，岂以不得为忧哉！特恐所以待之者不至尔。臣在草野间，闻朝廷用大臣，必极耸动，以为谘谋亲信，将必有出于恒品之外，今上于京师，乃或有未然者。臣愿陛下为之礼下，务得其心，而使尽其职，凡远猷大略，不为群议所诎，一政一令、必与之深言极论而后布。则小人虽欲肆其无所忌惮之私，以惑吾听，而其情已先觉矣。盖小人之情不过趋利避害，去其所恶而求其所喜者而已。然亦必掩之而不甚露 ，故利之来或逊且谢之，害之至或以为所分且蹈之。夫辞之不力，则得之不固，受之不力，则去之不决，及利害至于必不可已，则亟去与取之恐后也。方其有所勉而为之也，其卒不可掩者，已跃然于甘言悦色之间，即此试之，小人之情可复遁乎？既得其情则宜亟去之，去之不亟则或为他巧所中，而犹未免于有惑，随有即觉，随觉即去，如是而已。如是则君子小人不相尤，君子小人不相尤，则动无所妨，而天下之务，自无凝滞不举之患矣。

臣请以圣制所及数者言之，礼乐不可以一日无，此万古不易之论。然其兴也，虽专重其实，而亦未尝遂弃其文。臣窃见近之所为礼者，疏简纵逸，虽所谓仪文之末，亦未之有。所为乐者，残缺废

坏，虽所谓声容之细亦不备。盖不得其本，而安于苟且将就之习，固如是也。苟学校之教，有以振作而兴起之，则人心自无不止之欲，而其情自无不和之发。凡见之宗庙朝廷乡党之际，自有以去其疏简纵逸之习，而补其残缺废坏之弊，将不俟于进退升降，而节钟鼓羽籥而和矣。礼乐有不兴者乎？至夫教化之所在，其机系于人主之心，而其应属之天下之广，萃英俊之士，使之郡游于学，读书穷理，且或莫为之变。而欲驱天下之愚民，使悉归于礼让和乐之域，固已难矣。莫若先以恭俭忠厚，躬行于上，不为声色、土木、货利、玩好之所移易，而后徐以示于天下。天下方以前日之侈纵相安，而一旦之所闻见乃如此，其心亦必悚然以思，泠然以省。苟大家巨族，顿悟而倡改之，则人之乐从者众矣。选课之法，则臣于此有所深惜。祖宗之于士，养之以道义，而信之以赏罚。其用也，不为之拘，而其课之也，幽明殿最，各为之等。故人皆勉于其官，而优于其事。比者稍有兵、荒，而纳粟贾官之人，已满吏部之簿矣。虽有才德滞于所用之期，用未及而颠毛已号种种。能以壮节自励者，曾几人哉！又况黜陟之施，一惟流品是视，苟不本于科甲之选，高官重秩，未肯轻予，则彼无所慕于中者，又安有所忌于外哉！臣愿严其侥幸觊觎之禁，使冗懦不识之徒，一一谢去。选惟其才而不尽拘流品，视之以官而课之以实，如苏洵所谓：其人廉吏也，有其事以知其廉。其人能吏也，有其事以知其能。然后因其职否以加赏罚，天下之人，望以其才见者，亦将知所变矣。征赋之病大抵冗耗过多，而司会莫为之省。非司会之不省，势不得也。自京师言之，食之仰于江南，岁数百万。而权势所畜，无籍之辈，不为国家分寸之益者，乃至百千，借其空名以耗实费。至有水旱饥馑之变，则又加倍以取于江南之民。臣闻土日掘则陷继之，江南之民贫甚，则江北可晏然以不顾乎？况今边境之扰，未甚妥贴。前日榆林大同之役，马死食匮，所费不知几千万。而无用之兵，又坐食于是。山陕之民，丁运

之法，无不备举，老幼妇子，流离移析。外患未除，而内地已困，宁不为可惧邪？臣欲去冗耗无用之费，而革权门招集之弊，息江南之民，以固根本。边境之扰但以付之良将，不用统制之属，带挟侥幸之徒，以耗军食。而又复屯田之实，省丁运之苦，用固无不足者也。兵则无于生养安息之间，为之深计，使不受役于私门，而得给其俯仰。奋迅激烈之气，又必常振励之，使之无所沮丧。今有一级之劳，而大家右族，诃谴夺去，不敢仰视，将何所养以自奋乎？况夫新旧逃流之兵，方以官法逼之复伍。釜鬵之用，俱无可充，又其居无亲戚往来之接，其心之欲去已甚矣。卫所之官，又以严刑深计，钩取其有。彼方有欲去之心，而此又逐之使去，逐矣而不去，岂人情哉？欲兵之强，而二者特不之详，臣所以深虑也。用刑之际，洞照物情，而不为所诳，明者皆足为之。而法之轻重，则有一定之制。既得其情，必为之继，使贵贱无异施，豪右寡弱无异决，则令之所出，即无不从，天下之奸，当必随禁而革。盖天下皆天子之民，则刑期于必戮，赏期于必得，不待命而后知者也。豪右之徒，有所倚仗，得以自脱。而寡弱之人，骈首就死。人之情孰不畏死，而不求所以自脱哉！此尤陛下之所宜置念者也。夫数者之务酌之于古，而行之于今，宜有不可易者，而其弊犹若此。

圣制所谓祛其弊而救之，欲化行政举，如祖宗创业之初，比隆前代者，岂有他哉？亦取诸人而已。孔子曰：为政在人。启以下数君不过中才之主，一得其人且足以为治。而况陛下神圣天纵，出于寻常万万者哉！然臣于此窃有说焉，盖政虽举于有人，而身则所以取人之本。故孔子又曰：取人以身。欲得人而不先修乎身，是其心之所存，轻忽率易，不能不累于爱憎之私。而用所不当用，舍所不当舍者有矣。愿陛下急于修身，以端取人之则。然所以修身者，又非勉强矫拂之所能致，必自君臣、父子、夫妇、昆弟之间，以至于动静、语默、一事、一为之际，常加儆畏，内省于中。果当于理，而不悖

乎？果非其当然之则，而狃于外诱乎？使天理纯明，私欲净尽，则身无有不修，而道无有不尽。酬酢斟酌，自不谬于天下之是非。苟用乎人，其用必当。苟发于政，其发必精。治功之隆，必能追配祖宗，卓越古昔，而有诗书之所不及载者矣！彼汉唐宋区区小补之治，又恶足论哉！然臣又闻治不患于始之不得，而难于终之有继。伏惟陛下常存不敢易之心，以守此不可易之道，则国家天下之幸，非独臣之幸也。臣无任拳拳忠爱之至。臣谨对。

评析

据说，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的殿试举行后，第二天，“读卷大臣”内阁首辅刘健等人评阅试卷时，评阅到一份卷子，不禁为之叫好，认为不仅是此科殿试试卷的第一份，甚至自有殿试以来，也难见这么好的卷子，遂置为第一。然后，殿试卷中的前十名全都进呈给孝宗裁决。孝宗见到第一份卷子，也不禁叫好，道：“我大明一百五十年来，无这种文体，此卷可以变今追古！”于是朱笔一挥，在卷首写下了“第一甲第一名”6 个大字。这份君臣共赏的卷子原来是西安武功人康海的。

这份卷子究竟好在哪里呢？今天看来，有两点给人的印象较突出。

一是敢于指陈时弊。策问中所问的诸问题虽也关涉时政，但大都是泛泛之言，并没有特指。一般的举子在应对时，自可以以空泛言谈，引经据典，高谈阔论，对于现时的弊端和社会问题可以完全避开。这样，既显得渊博，又可以不对时政有所冒犯，这是较“高明”的作法。但康海却没有这样作，他从策问所问的“礼乐、教化、

选才……”诸问题中加以发挥，直接谈论种种敏感的社会问题，至有“前日榆林大同之役，马死食匮，所费不知几千万。而无用之兵，又坐食于是。山陕之民，丁运之法，无不备举，老幼妇子，流离移析。外患未除，而内地已困”等尖锐激烈的语言，他的这种处理方式是相当大胆的，显示出他关心现实，并敢做敢为的本色。

二是论点明确、结构完整。康海在文章的开篇就开宗明义地揭出自己的论点，即帝王为政应“不易道”、“不易心”，然后围绕着这两个论点来展开论述，夏之启，商之中宗、高宗，周之成、康等继业君主的治绩是恪守“不易道”、“不易心”原则所致，今天如欲有所作为也应遵守“不易道”、“不易心”原则。接着又阐发策问中提出的“礼乐、教化、选才……”诸问题，从他的论述中，似乎没有较多的关涉这两个中心论点，但是，在他最后的收束中又分而能合地把结论又归于这两个中心论点。总的看来，作者以“不易道”、“不易心”这两个中心论点来笼罩全篇，如此，就使得文章结构既清晰又完备。

总之，康海的文章是一篇较成功的应对文章。

（苗菁）

弘治十八年(1505)乙丑科

状元:顾鼎臣

顾鼎臣(1473～1540)初名同,字九和,号未斋,昆山(今属江苏)人。弘治十八年状元,授为修撰,累迁礼部右侍郎。世宗好神仙术,内殿设斋醮,他进《步虚词》七章,得优诏褒答。不久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加少保、太子太傅,进武英殿大学士。卒赠太保,谥文康。昆山旧时无城,他力主造城,后倭冠来犯,昆山无恙。有《文康公全集》。

策问

制曰:朕惟自古帝王之致治,其端固多,而其大不过曰道、曰法而已。是二端者,名义之攸在其有别乎?行之之序亦有相须而不可偏废者乎?夫帝之圣莫过于尧舜,王之圣莫过于禹汤文武。致

治之盛，万世如见其为道为法之迹，具载诸经，可考而证之乎？自是而降若汉、若唐、若宋，贤明之君所以创业于前而守成于后，是道是法亦未尝有外焉，何治效之终不能古若乎？我圣祖高皇帝定天下之初，建极垂宪。列圣相承，益隆继述，为道为法，盖与古帝王之圣，先后一揆矣。朕自莅祚以来，夙夜兢兢，图光先烈，于兹有年。然而治效未臻其极，岂于是道有未行，是法有未守乎？抑虽行之守之，而尚未尽若古乎？子诸生明经积学，究心当世之务，必有定见。其直述以对，毋泛骋浮辞而不切实用。朕将采而行之。

对策

臣对 臣闻帝王有治天下之大体，有治天下之大用。体者何？道是也。用者何？法是也。道根于心，法之所由立也。法施于政，道之所由行也。法而非道，则所以主张之者无其本。道而非法，则所以经纶之者无其具。皆非所以治天下也。然有是道，则其法可立。未有善立，是法而不本于道者也。有是法则其道可行，未有能行其道而不知守乎法者也。道行而无弊，法立而能守，则推之无不准，动之无不化，外无不攘，内无不安，远无不至，迩无不服。端拱于九重之上，而操纵翕张，所向如意。运用于四海之间，而浑融贯彻所在归极。尚何治之不古若哉！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我皇祖之所以创造，列圣之所以继述，皆不外此。彼汉唐宋者，道非其道，法非其法，又何怪乎治效之不能比隆于唐虞三代也哉！

钦惟皇帝陛下，天启圣神，日新德学，大化神明，洽于远迩，至治馨香，彻于上下。所谓学于古训而有获，监于成宪而无愆者，盖

卓卓乎足以光前而裕后矣。兹者开贤科，擢多士，御大廷，降明诏，犹谓治效未臻其极，而拳拳以行道守法为问。臣虽至陋，宁不鼓舞感动，思罄愚衷以对扬休命乎？

窃惟天生万物不能自理，而命之圣人，故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夫以一人之身加于兆民之上，而付之以君师治教之责，亦大且难矣。求尽是责以无负乎天之所命，舍道与法二者，其奚以哉？是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之道也。道者，治之体也。建立纪纲，分正百职，顺天揆事，创制立度，以尽天下之务，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尝考朱熹之训曰：道犹路也，法犹度也。董仲舒亦曰：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谓之路，则可见其为人之所共由。谓之度，则可见其为人之所当守。是二者，理与事有精粗之异，而本与末亦若二致焉。岂可以无别乎？圣策所谓名义之攸在者，盖如此然。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程颢曰：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胡宏又曰：道德者法制之隐，法制者道德之显，有道德以结民，而无法制者为无用，无用者亡。有法制以絷民，而无道德者为无体，无体者灭。是其本末虽有先后之殊，而显微则无彼此之间也，岂可以偏废乎？圣策所谓序之相须者，盖如此。

古者圣人迭兴，皆天所命。帝莫过于尧舜，王莫过于禹汤文武。其道与法垂之古今，如日中天而昭示无极，如水行也而泽润不穷，功化之美又孰有加于是乎？圣策首询乎此，臣有以知陛下嘉尧舜禹汤文武之治，而能自得师矣。臣请稽诸经传而陈其大，可乎？尧之明峻德以至于和万邦，舜之徽五典以至于叙百揆，禹之敷命率常，汤之绥猷修纪，文武之迪彝伦建皇极，至若精一执中之授受，典礼损益之因革，此帝王之道也。是道也，大公而至正，尽善而尽美，不狃于功利之好，不牵于诈力之私，小自于一身而冒于六合之大，近自于日用而放乎四海之远，造端于愚夫妇所能，而极于天地化育

之所不能，尽实行之，万世而无弊者也。尧之历象授时，垂衣制器。舜之封山浚川，颁瑞考绩。禹之慎财赋诒典则。汤之懋功赏制官刑。文武之奠丽陈教，列爵分土，至置封建井田之制，学校征伐之典，此帝王之法也。是法也，详为之虑曲为之防，本诸身，征诸庶民，法乎天时，因乎地利，合于人情，宜于土俗，当百世守之而勿失者也。道以立其体，而法以善其用，致治之盛万世如见，有由然矣。

自是以降，若汉唐宋贤明之君创业于前，守成于后。其道与法固皆出于帝王。然徒窃夫秕糠之似而无其实，得夫糟粕之浅而失其真，虽有事功不过小补，其孰能与于古哉？圣策继及乎此，臣有以知陛下陋汉唐宋于下风，而有所不为矣。臣请摭诸史册而陈其概，可乎？汉高祖之豁达大度，孝文之清净玄默，唐太宗之聪明英武，玄宗之好贤乐善，宋艺祖之严重孝友，仁宗之温恭节俭，于道似有得矣。然而杂霸术、尚黄老，大纲不正，闺门惭德，仁厚有余，刚明不足，非帝王之所谓道也。汉之著律令，定税赋，唐之租庸调，府卫兵，宋之序资格，严科禁，其法似亦善矣。然而不事诗书，礼文多阙，矜骋大之心，极奢侈之欲，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非帝王之所谓法也。盖斯道既微，法亦随变，治效之成，终不古若，何足疑乎？

恭惟我太祖高皇帝诞膺天命，扫除胡元，立帝王自立之中国，传帝王相传之正统，建极垂宪，诒谋万世。臣沐浴膏泽，尝窃窥一二，敢拜手稽首，为陛下陈之。敬天勤民，防非窒欲，身之修也；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家之齐也；君臣同游之盛，朝野画一之政，国之治也；武功以戡祸乱，文德以兴太平，天下之平也。我祖宗之道，非即帝王之道乎？六卿分治，庶僚承服，百职举矣；台谏以纠正于内，宪司以廉察于外，纪纲肃矣；车旗服物之有章，宫室器用之有等，制度一矣；学校选举之有修，兵刑财赋之有制，庶事康矣。我祖宗之法，非即帝王之法乎？自是以来，圣子神孙，善继善述，不愆不

忘，治化之成，盖远过于汉唐宋矣。

而圣策复以治效未臻其极，夙夜兢兢，图光先烈为言者，此陛下圣不自圣，务欲福跻皇极，化协泰和，超千古而特出，跨百王而独盛也。臣愚何足以知之。臣窃以为欲师帝王，先师祖宗。能行祖宗之道，则帝王之道在是矣。能守祖宗之法，则帝王之法在是矣。陛下大孝格天，至仁育物，谦恭逮下，明智烛微。日御经筵讲求治理，数召大臣咨询时政，所以行祖宗之道而守祖宗之法，盖无可訾议者。但近岁以来，灵异迭见，水旱相仍，而时雍风动之休未洽。黎民阻饥，赤子弄兵，而鼓腹击壤之谣未闻。夷虏跳梁，而军政未可谓修。府库告竭，而蓄积未可谓富。内外臣工率多因循苟且，取办簿书，廉靖之节日隳，华丽之风日长，而文武未可谓尽得其人。则圣策所谓行道守法未尽若古者，臣不敢谓其不然也。臣愚以为陛下之德 如是，学如是，虚怀望治之诚如是。以陛下而虑此宜无足为者，但恐不加之意耳。夫道虽不一，其要在于修身。身有不修而妄意于躐等之为，谓之能行道，不可也。法虽至繁，其要在于纪纲。纪纲有不振而疲神于不急之务，谓之能守法，不可也。然修身不外于威仪言动，而纪纲不外于举措刑赏。陛下诚能左之右之，周旋乎规矩准绳之中，一言一动从容乎仁义礼乐之蕴，则道成于上，而身修矣。身既修则家可齐，国可治，而天下可平，尚何祖宗之道有不行乎？举直措枉必协乎天下之公论，赏善刑恶不徇乎亵近之私情，法行自近，纪纲振矣。纪纲既振，则百职可举，制度可一，天下之事可兴，尚何祖宗之法有不守乎？如是则俊良登崇而谗邪远，出入有度而财用足。武备修而蛮夷慑服，刑罚威而奸宄销亡。灾异息，灵瑞臻，而百姓安堵，民物顺达，治效之隆岂不足并美于唐虞三代也哉！

虽然，此就陛下所以策臣者而言之尔，犹未要其极而举其全也。臣请究极本原探索精微，以为终篇献焉。盖心之主宰一身，无

事不体。而天之主宰万物，亦无往不在。天者理之所从以出者，天之心与吾心之天一也。是以帝王之道虽要于修身，而欲修其身必先于正心。帝王之法虽要于纪纲，而欲振纪纲惟在于顺天。不正其心，不顺乎天，则虽宵旰忧勤思以行道守法，亦苟焉而已尔。何谓正心，致知以明此心，诚意以实此心。声色货利之欲，此心之鸩毒，则远之。车马宫室之乐，此心之斧斤，则禁之。谄谀邪佞足以移此心，则斥之。便嬖近幸足以挠此心，则绝之。凡吾威仪言动之发莫非自然，必使吾心泰而百体从令也，吾心大而万物咸备也，是之谓正心。何谓顺天，无贰无虞曰上帝临女也。有严有翼曰鬼神在旁也。匹夫匹妇勿谓可下，曰此天民也。一命一秩勿谓可忽，曰此天职也。创制立度恐其悖天，揆事成务恐其违天，凡吾举措刑赏之施，不敢自专，曰天命有德也，天讨有罪也。是之谓顺天。能顺天则天与吾心为一，而吾心自无不正。能正心则吾心与天无间，而于天自无不顺。以是行祖宗之道，则道焉无弊，而足以主张乎法。以是守祖宗之法，则法焉弗失，而足以经纶乎道。体无不立，用无不行，所谓光先烈而臻治者，惟陛下所欲而致之无难矣。如是则君治教之责以尽，上天宠绥之命以凝，而磐石之宗，苞桑之业，岂不可以永保于亿万年而无虞也哉！

臣窃伏海滨，荷生成作养之德有年矣。平居所学因不出乎道法之间，每念异日幸望清光，奉大对，期有所论列敷启，以尽责难之恭，而今也实其时也。顾臣草茅迂疏，不知忌讳，敢直述所见闻者如此，伏愿陛下留神澄省。果切于万分有一之用，俯赐采行，不胜幸甚。臣干冒天威，无任陨越之至。臣谨对。

评析

明代中期以后，皇帝大多昏庸奢侈，导致政治日益腐败。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六日，年满18岁的皇太子朱祐樘接替父亲登上了权力的宝座，以第二年为弘治元年(1488)，此即孝宗。这是一个较有朝气的人，年轻却很有章法，一意求好，急躁、轻信、易变的毛病在他身上并不多见，所以在他登基之后的18年间，朝中面目一新，举国上下，充满生机，后世称他为“中兴之主”，把他掌权的这段时间，称为“弘治之治”。弘治十八年(1505)是明孝宗执掌权力的最后一年，他于这年的四月就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

这一年三月的殿试中，一个正值壮年的举子却从这人人称道的“弘治之治”的瑞祥气象中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他在一片颂扬声中在对策中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但近岁以来，灵异迭见，水旱相仍，而时雍风动之休未洽。黎民阻饥，赤子弄兵，而鼓腹击壤之谣未闻。夷虏跳梁，而军政未可谓修。府库告竭，而蓄积未可谓富。内外臣工率多因循苟且，取办簿书，廉靖之节日堕，华丽之风日长，而文武未可谓尽得其人。”联系到前一年，大学士李东阳祭曲阜孔庙还京后，将所见所闻毫无所隐，大胆奏告的事实，我们可以知道，整个弘治朝基本上还是朝风较为正直的，大家还是敢于说话的。从顾鼎臣后来的所作所为中，我们也可以知道，他是个作为较少的人，但这时却能敢于有所直言，这一方面说明究其本质，他也曾是个正直而敏锐的人，可惜以后不良的社会政治环境将他的优良的品性给渐渐磨平了。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知道，当时虽仍有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但政治的风气却是相对有所好转，是有些清朗明

洁的特点的。

（苗菁）

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

状元:杨慎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父杨廷和为当朝名相。杨慎自幼即聪慧过人,以才思敏捷、出口成章而闻名,尤以诗文最为擅长。正德六年辛未科殿试第一,例授翰林修撰,随后充任经筵展书官,参与纂修《武宗实录》。嘉靖三年以"大礼"之议触犯世宗,下狱,谪永昌卫(今云南保山),终老其地,年72岁。杨慎少时即以诗文知名,后受业于李东阳门下。诗文甚多,此外还有词、曲等杂著一百余种。后人辑其诗文为《升庵集》,有散曲集《陶情乐府》。

策问

制曰：创业以武，守成以文，昔人有是说也。然兵农一致，文武同方，其用果有异乎？文武之分始于何时？兵民之判起于何代？尝质诸古矣，《书》称尧曰乃武乃文，于舜称文明，禹称文命而不及武，于汤称圣武而不及文，周之谟烈各专其一。且三代迭尚而不言武，周列四民而兵不与焉，何也？汉唐宋之英君令主，或创业而兼乎文，或守成而兼乎武，或有未备亦足以善治。论者又谓天下安，注意相。又谓天下虽安，忘战则危。是治兵之道，果与治民者同邪，异邪？我太祖高皇帝以圣神文武统一天下，建官分籍，各有定制。列圣相承，率循是道，百五十年治定功成，实由于此。然承平既允，玩惕乘之。学校之法具存，而士或失业；蠲货之诏屡下，而人多告饥。流徙之余化为寇贼，以遗朕宵旰之忧。今赋税馈运民力竭矣，而军食尚未给；调发战御兵之力亦劳矣，而民患尚未除。或者官非其人乎？而选举之制，黜陟之典，赏罚之令，亦未始不加之意也。兹欲尽修攘之实，谨恬嬉之戒，文治举而武功成，天下兵民相卫相养于无事之天，以保我国家久安长治之业。宜何如而可？子大夫志于世用，方策试之日，不暇以微辞隐义为问。姑举其切于时者，其为朕陈之。

对策

臣对 臣闻帝王之御天下也，有出治之全德，有保治之全功。文武并用，出治之全德也。兵农相资，保治之全功也。于并用而见其同方，则天下之政出于一，而德为全德。如日月之在天，凡所以照临者，胥天之德也。于相资而见其一致，则天下之治出于一，而功为全功。如手足之在人，凡所以持行者，皆人之功也。由是联属天下以成其身，纲维其道，以适于治，体统相承而无偏坠不举之患，本末具备而无罅隙可议之疵，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万世而无弊。帝王为治之要，孰有加于此哉？臣自少读帝王之书，讲帝王之道，窃有志于当世之事。然学焉而不敢言，言焉而不达，今幸近咫尺之威，立方寸之地。制策所及者，皆是道与是事也。臣敢不罄一得之愚，以为万分之助乎！

伏睹圣问，首曰：创业以武，守成以文。而又曰：文武同方，兵农一致，果有异乎？臣惟三代而上，同一道也，勘乱则曰武，守成则曰文。同一民也，无事则为农，有事则为兵。初未始异也。在《易》明两作离，文明之象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释之者曰：刚明及远，威振而刑不滥，斯不亦可见文武之同方乎？地中有水，师。师旅之象也。而释之者曰：伏至险于大顺，藏不测于至静，盖寓兵于农之意。斯不亦可见兵农之一致乎？是故一张一弛，号为善道，刚克柔克，协于皇极。周公冢宰，实兼东征。毕公为公，亦总司马。武夫堪腹心之寄，吉甫有文武之称。以天保治内而未尝无武，以采薇治外而未尝无文。文武固未分也。自秦不师古，专以武勇立国，语诗书者有刑，斩首级者进爵。民勇于战，皆忘生好利之人。士贱

以拘，废干戈羽籥之习。至汉袭秦制，立丞相将军，而将相之职异。唐宋以来，置中书、元帅、枢密，而军国之权偏。此文武之分出于三代之后也。成周之制，以田赋出兵。一井之田，出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一封之田，出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畿方千匹，畿封方井，出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自五人为伍，积而为两为卒。自五卒为旅，积而为帅、为军。天子之六卿六军，诸侯之大国二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而降杀有等焉。一方有事，则命将出师，迨功成献俘，将归于朝即守职之吏。兵散于野，即缘亩之农。兵农固未判也。至管仲相齐，欲速图霸业，乃坏周兵于内政，分国中以四乡，使国中之民为兵，鄙野之民为农。兵不服耒耜之勤，民不识干戈之具。以至勾吴之群，秦昭之锐士，成周之制，变易尽矣。此兵农之判于三代之衰也。载质之诗书所称，古之帝王，未有不兼文武之德，均兵农之功者。称帝尧者曰：乃武乃文。四表之被，即所谓文。丹水之战，则所谓武也。舜之诛四凶，禹之格有苗，固可以武功名，而亦文明、文命之余事也。布昭圣武，见于伊训。然圣谟嘉言，谓非文武之全欤。文谟武烈，称于君陈，然整旅伐崇，下车访道，二者正未始偏废也。三代迭尚，曰忠，曰质，曰文，而不及武者，盖言忠、质、文则武固在其中。必以武言，则是秦之所尚，而非三代之治矣。周列四民曰士、农、工、商，而兵不与者，即臣前所陈寓兵于农之说。专以兵言，是为后世之制，而非成周之旧矣。

汉唐宋之君，如光武之投戈讲艺，太宗之身兼将相，庶几创业而兼乎文。其未备者，如汉高之不事诗书，而规模宏远，盖其宽仁大度，暗合乎道，况能善陆贾文武并用之言乎？孝武之封狼居胥，宪宗之平淮西、西蜀，庶几守成而兼乎武。其未备者，如仁宗之时，西夏猖獗而致四十二年之太平，盖其深仁厚泽培植国本，况能用韩范儒者之将乎？陆贾之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则在承平时，不可不修文德。故曰：人君以论相为职。又曰：将特大有司耳，非比也。

司马法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则在承平时，不可不饰武备，故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又曰：圣人贵未然之防。是知兵以卫民，民以给兵，治兵乃所以镇兵，讲武即所以偃武。治兵之与治民，亦异而同也。汉之军制以南北分，南军主环卫王宫，北军主巡绰京城。有骑士，有材官，与夫南北之车骑，东南之楼船，临淄之弩手，荆楚之剑客，皆仰给于县官，而不缩于齐民。识者惜其去古未远，而不能复。此汉之治民与治兵异也。唐府兵之立，其制最善。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所以弭祸乱之原。二十为兵，六十而免，而民无久役之劳。三时耕稼，一时讲武，而兵无常聚之患。器甲出于民，衣粮出于民，而国无养兵之费。治民与治兵同。而论者许其为近古，良有以也。宋之制有三衙、四厢，诸总管钤辖诸将。然终宋世国威不振者，殆兵权失之轻，而兵民分之过也。由是言之，文武者，其名也。兵农者，其实也。三代而上，兵出于农，而文武不得不合。三代而下，兵判于农，而文武不得不分。夫苟知文武之所以同，则所以治民与兵者，不容以异矣。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独禀全智，首出庶民，扫开辟所未有之污，复帝王所自立之地。武功之盛无以加矣。整人伦于用夏变夷之余，兴文教于拨乱反正之始。文德之盛，又何如哉！当时之建官也，科目则有文举武举，官联有文班武班，部属则有文选武选。当时之定籍也，常产则有屯田民田，户籍则有军籍民籍，官署则有州县卫所。然乾纲独断无威柄下移之失，犬牙相制无尾大不振之患。有事则共与机密之谋，无事则各掌兵民之寄。在京有司马以提督军营，在外有宪臣以总制边务，臬司有兵备之权，县吏专巡捕之职。名若分而实则相属，职若判而任则相维，保治之法盖与三代而同符也。至若太宗表章经史，而外清朔漠之尘。宣宗崇重儒臣，而出平汉邸之变。列圣相继，益懋益敦，百五十年来固皆以文致治而庙算不遗，神武不杀，伟列宏功照耀简册，寿国脉于箕翼，安国势于磐

石，斯世斯民，盖有由之而不知者。恭惟皇帝陛下，保富有之业，思日新之图，阅历熟而见理明，涵养深而持志定。垂衣拱手而天下向风，动颜变色而海内震恐，疆场之虞扑之于方炽，萧墙之梗消之于未形，君子洗心以承休德，小人延颈以望太平，而皇心谦冲，谓承平既久，玩愒随之。臣伏读至此，有以知陛下出治之全德，保治之全功，可因此一念而举矣。

臣窃以为陛下求治之心甚至，而奉行者，或有所未至焉。夫学校者，风俗之首也。程颢谓：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使主学校者皆得其人，教之之法，悉如阳城之在国，胡瑗之在湖学，一道德以明礼义，尊经术以定习尚，不荒于嬉而毁于随，则淳厚之风可臻，而士之失业者，非所忧矣。民者国本所系，邵雍谓：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所以宽之者在朝廷，而近民者莫切于守令。使为守令者习得其人，养之之法，悉如黄霸之在颍川，张咏之在益州，遵奉诏条宣布德意，不以简丝先保障，不以抚字后催科，则因革之俗可期，而民之告饥者，非所忧矣。流徒之余，聚为盗贼，亦由教之无法，养之无素故也。以人情言之，盗贼亦人耳。人莫不爱其筋力肌肤也，莫不爱其父母妻子也，莫不爱其田庐赀产也。在上者，不以无益之工役苦其筋力，不以不中之刑罚残其肌肤，不以流离病其父母妻子，不以诛求损其田庐赀产，则彼岂不自爱以蹈必死之地哉？今潢池弄兵绿林称号者，在在有之。赋税之过，春支秋粮。馈运之弊，十室九空。农事在所当重也。迩者出内帑银二十万两，以济西蜀之军储，爱民可谓深矣。臣愚以为，本土之蓄积宜自足用。昔人有言：兵务精，不务多。今为将者，兵每务多，而财馈每患其寡。兵既多，则财馈不得不多，财馈既多，则民力不容以不屈。是民以养兵，而亦不可反为兵困也。调发之伍，动以千百，战御之功，十无二三，兵政尤所当急也。迩者发京营兵三千骑以平山东之反侧，御患可谓切矣。臣愚以为，本土之壮士，宜自可用。昔汉击匈奴，用六郡

良家子，盖其熟知险易，力卫桑梓，比方他方，所谓发一可当百。况京兵一出，既有行迹，居饷之劳，亦有居重驭轻之戒，固可权其宜于一时，而非可继于旬月。是兵以卫民，而亦不可过为也。

圣问又谓，或者官非 其人。臣愚以为一代之才，自足以周一代之用，特患用之不得其道耳。用之诚得其道，则贪可使也，诈可使也，况蕴德行而志功名者乎？选举之制公矣，宁无腐儒而当事局，历济而投散者乎？黜陟之典当矣，宁无冗食备员之辈，隐贤遗才之叹乎？赏罚之令明矣，宁无滥竽而受赏，戴盆而免罚者乎？诚使官各尽其人，才各尽其用，人人有忘私之公，事事有爱国之诚。彻桑土于未阴之时，徙积薪于未火之日。一郡有警则傍郡切震邻之忧，一时有警则先时思噬脐之悔，敌至不惧，敌去不侮，不因人成事而老吾之师，不旷日持久而匮吾之财，内修外攘之实，必尽于条教之外，文恬武嬉之弊，必作起于玩习之余。则文德之敷，云行雨施；武节之建，雷厉风行。远可以复帝王之善治，上可以光祖宗之谟烈，国家亿万年之历，可以配天地于无穷矣。臣愿陛下益崇此德，益保此功，存无怠无荒之心，为可久可大之道。惟万几之暇少加意焉，则凡所以策臣者，可次第而举矣，何暇于多言为哉！臣干冒天威，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

评析

殿试时策问所提的诸项问题有时也是颇为动脑筋的。在考试中，既要能见出考生的才学，又要能显示考生的治能，比较常见的出题方式就是出两道大范围的题目，前一道是古的，后一道是今的。古的那道重在典章、制度，以看考生对历史上治政之道的熟悉

情况，今的那道重在时政筹画和措施，以考考生对当今现实的认识和为政的谋略与能力。正德六年的策问就是按这样的思路来出题的。

这道策问就古而问了个“文武”、“兵农”的异同问题，就今而问了个“以保我国家久安长治”的问题。二者虽有一定关联，但也有很大的差异。杨慎在回答时根据提出的实际情况，分门别类，各有重点，很是得体。

对于“文武”、“兵农”的问题，他重点是考辨源流，阐述史实，由三皇五帝到唐宋诸君，一一点评。有赞许之言，亦有批评之语；有详尽的分析，亦有简炼的概括。议必有据，言必有证。从容不迫，运笔自如。虽有时略加润饰，但却从不浮辞夸比，决不让人有言之无物之嫌。这样的写法略能显示出他作为一代大学者的风度和气质。

对于“以保我国家久安长治”的问题，他既不回护，又不避短，敢于大胆指陈时弊，至有“今潢池弄兵，绿林称号者，在在有之。赋税之过，春支秋粮。馈运之弊，十室九空”的激烈沉痛之语，显露出一个铁骨铮臣的本色。同时，他还尽心筹画、精心谋计，对当时的弊端，都能胸有成竹，抓住根本，一一提出较为切于时用的方针策略，又显示出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大政治家特色。

杨慎作为明代的一个大学问家和一个忠贞之士，历史对他是不公正的。但是他的才学和识见是不会湮灭的，这篇对策文章也从一个侧面显出其个人的一些特色。

（苗菁）

正德十二年(1517)丁丑科

状元:舒芬

舒芬(1484～1527)字国裳,江西进贤县人。幼好读书,12岁作《驯雁赋》,为人称誉。正德十二年殿试状元,授翰林院为修撰。负才使气,敢于直言。因参与劝阻明武宗南巡事,被罚跪午门五天,杖打30。旋即责授福建市舶司副提举使。武宗死后,舒芬复职还京,不久又卷入"大礼"之争,被夺俸杖责。遇母丧,辞官归家,不久病死,年仅44岁。舒芬于学术上颇有造诣,专研《周礼》,并作《太极绎义》等著作,为当世学者所称道。

策问

制曰:朕惟羲农以下之事见于经,秦汉以来之事见于史。见于

经者皆圣贤为治之迹，见于史者亦当时君臣相与随时而成治者也。然儒先君子之论，则曰帝王以道治天下，后世只以法把持之而已。信斯言也，岂帝王之治一以道而不以法，后世之治一以法而不以道欤？自今观之，如画野分州，设官分职，明礼乐，兴学校，正律历，秩祭祀，均田赋，通泉货，公选举，严考课，立兵制，慎刑罚，则帝王之治天下固未尝不以法也。天性明达，宽仁长者，躬修玄默，以德化民，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事从宽厚，文以礼乐，畏义好贤，力于为善，聪明果决，得于天性，宽仁多恕，心无邪曲，恭俭仁恕，忠厚恻怛，则后世贤君之治天下，亦未尝不各有其道也。然则儒先之论，殆亦有不足尽信者欤？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创业垂统，治定功成。圣子神孙，万代如见其治道之高明，治法之弘远，直可以等帝王而上之矣。然而帝庙祀立于京师，自昔忠良多与配享，虽以胜国之世祖而亦获秩祀焉。岂非以后世之英君谊辟，其政治亦犹有可取者欤？朕膺天眷命，嗣守鸿业，临政顾治，盖十有三年于兹矣。然远师帝王之道，而望道犹有所未见。近守祖宗之法，而行法犹有所未逮。其故安在？子大夫积学待问久矣，其为朕据经史，兼本末，详著于篇。朕将采而用之，以资于治焉。

对策

臣对 臣闻天下无法外之治，帝王无道外之法。盖道者，出治之本，法之体也。法者，为治之具，道之用也。使道有未纯，则所以立法者，义必不精，利必不尽，虽能行于一时，而不可垂于万世。法有未善，则所以为治者，化必不洽，泽必不周，虽或致夫小康，而终不足以望雍熙泰和之盛。故论治而谓不以法，非知治者

也。论法而谓不以道，非知法者也。古之帝王全于躬行心得者，既有以建天下之极，见于典章制度者，又有以尽天下之情。故功业之盛，上下与天地同流，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秦汉以来，非不有法也，类皆小补罅漏，而不知先王立法之原。亦非不有道也，乃其天资偶合，而不闻先王大道之要，尚何望其治效如古昔之隆也哉！然则治之不能外法，法之不能外道，盖有确乎其不可易者矣。

恭惟皇帝陛下笃于求道，审于行法，勤于致治，践祚以来，尝三亲策多士矣。始之以法天法祖，盖笃于求道之心也。继之以文武兵农，盖审于行法之心也。又继之以大学衍义之问，盖勤于致治之心也。兹于万几之暇，复进臣等于廷，兼是三者之心，俯赐策问，拳拳焉若有所不足，而欲益臻其极者。臣虽愚陋，敢不对扬休命于万一乎？

臣闻羲农治之极也，尧舜道之至也，三代法之备也。言法极则法之善可知，言法备则道之纯可知。故孔子系易，始于伏羲，则十三卦之制器利用，以法而存乎道也。序书断自唐虞，则二典之所载时雍风动，以治而形乎法也。删诗而备于文武，则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是又以道而显设之于法也。子思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熹释之曰：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岂尧舜不足于法，而文武犹病于道邪？盖举道则法以著，举法则道以存。故朱熹又曰：皆兼内外该本末而言也。由是言之，道与法非判然二物也明矣。圣制以为儒先君子之论则曰：帝王以道治天下，后世只以法把持之而已。信斯言也，岂帝王之治，一以道而不以法，后世之治一以法而不以道欤？圣虑深远，臣愚，何足以知之。然窃惟帝王之与后世，其为道不同，而其为法亦异。帝王道足以创法，法足以善治，故专谓之道，盖道即法之所从出也。后世之于道，或偏而未全，或驳而未纯，则其所恃以为治者，独法而已，故专谓之法，盖法始有不本于道者矣。

请因圣制所及，以凡经史所载道与法者，敬详陈之。圣人理天下，使物各得其所为极至，故其尽制曲防莫非美意存焉。今举其大者，若黄帝之画野分州，舜肇十有二州，禹弼成五服咸则三壤，商人肇域四海以建诸侯，周人以九州之地建三等之国。而分田以定赋者，或五十而贡，或七十而助，或百亩而彻，皆以什一为中正，则封建井田之法，于是乎立矣。伏羲以龙纪官，神农以火纪官。黄帝有夫天地四方之官。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其数。周官三百六十，统于六卿。而敷奏明试，三考黜陟，与夫六计八职八柄之政，亦行乎其间，则建官考课之法于是乎详矣。亲疏贵贱之有体，郊社禘尝之有仪，咸英韶濩之有制，璇玑玉衡之有具，塾庠序学秀选俊造之有等，则礼乐律历学校选举之法，无一之不备也。九赋以为敛，九式以为节，五刑以为计，八州以为纠，弧矢以示威，伍两卒旅军师以蓄众，则货财兵戎刑罚之法，无一之或缺也。所以然者，羲农、黄帝皆以神圣之德继天而王。尧、舜、禹、汤、文、武数圣人者，或克明峻德，或温恭允塞，或肇修人纪，或缉熙敬止，或重民五教，道无不纯而法于是焉出。不然，亦安能心代天意，身代天事，妙化导之机，而极制作之善若是哉！故曰：帝王以道治天下，而臣谓道即法之所从出者，于是可见矣。

后世贤君，若汉高之天性明达，宽仁长者，以创汉家之业。文帝之躬修玄默，以德化民而致后元之治。光武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成中兴之功。章帝之事从宽厚，文以礼乐，济永平之政。唐太宗之畏义好忠，力于为善，速致太平。宪宗之聪明果决，得于天性，卒平祸乱。宋艺祖之宽仁多恕，心无邪曲，而有以易五季干戈之乱。仁宗之恭俭仁恕、忠厚恻怛，而有以开元祐炎兴之运。诚如圣制所谓，亦未尝不各有其道也。但此之谓道，不过天资之近似耳。就而论之，则恶闻诗书，崇尚黄老，溺图谶以蹈封禅之非，乏刚断以启戚门之衅，以至天伦惭德，异术荒心，任智谋以成功，听谗幸以废

后，帝王纯粹之道果如是乎？道既未纯，则法之所立，宜乎其不能尽善也。故汉初三章之约，律令之次，章程之定，与夫侯国之封，所谓磐石之宗、犬牙相制者，规模亦宏远矣。然不革秦习，不任周政，所以治杂于霸，其后祸难屡起，亦非法之所能防也。唐以六典建官，以租庸调取民，增置学舍生员以养士，与夫以府卫治兵，所谓居重驭轻，五大不在边者，节目亦详尽矣。然大纲不正，昏风相袭，所以治杂于夷，其后变故最多，法亦屡坏而不可支也。宋人重儒术，爱民力，以文知州，以朝官知县，以京朝官监临财赋，与夫通判县尉之置，要皆以收方镇之权，所谓混一天下，亦长虑而却顾矣。然武备颇衰，成功亦小，国势日以积弱，莫能善其后也。故曰：后世以法把持天下，而臣谓法之不本于道者，夫岂不然耶？以是观之，则道有纯否而法随之，法有善否而治因之，孰谓为治可以无法，而立法可以不本于道哉！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用夏变夷，一代经制之备，真足以匹休帝王，而开圣子神孙万世之太平矣。观夫京畿诸道之建置，宗藩列爵之世封，内则罢丞相而设府部，外则罢行省而设三司，有大明官制以定其员，有诸司职掌以定其守，命官议礼，则吉凶军宾嘉之礼，有其等矣。而又有礼仪定式诸书，以示其品节制度焉。命官作乐，则郊社宗庙朝廷之乐，有其章矣。而又有太常神乐诸署，以习其器数声容焉。设国子监，以教天下之英才。外设府州县学，以育民间之俊秀。经义之制定，而士无诡异之谈，科贡之制行，而士有汇征之望。以言乎律历，则造历有官，而闰余岁差之有算，司天有台，而休征灾异之并占，且谓至元辛巳之历渐违天度，遂以洪武甲子之岁肇起历元。律历之正何如哉？以言乎秩祀，则大而郊庙仪物典于太常，小而厉享品节详于祠部，正岳镇海渎之神号，革前世不经之淫名。帝王陵墓，三岁一降香祀之，先代贤臣，惟以当时官爵称之。祀典之正何如哉？谓田赋不均非所以遂民生也，国

初丈量田亩以抑兼并，清理田粮以防奸伪，且视土地之肥墝以为税科之轻重，是虽非井田也，不几于什一之中正乎？谓泉货不通非所以资国用也，国初因桑穰之饶而钞法甚严，置宝源之局而钱法再变，茶马盐课之利则以助军需，商税鱼课之办则以助国费，是虽非帑余也。不几于九府之圜法乎？礼部以科举之式选士，必严贡举非人之律，吏部以铨选之法选官，复有推升保举之例。其选举之公，仿佛乎虞周明扬宾兴之盛也。给由虽有常期，而所以为黜陟者，复稽其旌异之典，纪录之册焉。考核虽有通例，而所以校才能者，复稽其历任之久暂，地方之繁简焉。其考课之严颉颃乎虞周三考六计之详也。以兵制言之，既有亲军诸卫以宫禁，复有隶府诸卫以卫京城。既有都司留守司以卫一方，复有各卫守御所以卫郡邑，且府卫之所职掌，虽各有司存，而军政之枢机实由于兵部。盖统重驭轻之中，寓防微杜渐之意。此我圣祖亲历戎行，灼知古今利病，而为是良法。昔人谓其军政有统，真知言哉！以刑罚言之，大明律之纲有六，而其目止于四百六十。大明令之纲亦有六，而其目止于百四十有五焉。是虽因唐制而定五刑，其间别比类异，简而易遵，明而易晓。盖我圣祖断自宸衷，务在直言其事，庶几使人易知而难犯。昔人谓其有象刑钦恤之仁，真知言哉！夫一代经制之备如此，岂偶然而致之哉，盖有本于其间矣。臣尝庄诵圣祖之言，有曰：朕求帝王之治，莫盛于尧舜，然观其授受，在允执厥中。又曰：人君一心治道之本存于中者。无尧舜之心，而欲施于政者有尧舜之治，不可得也。大哉王言，非真有得于帝王之道，能如是乎？宜其创制立法尽善尽美于以致雍熙泰和之盛，直等帝王而上之矣。

圣制又谓：帝王庙祀立于京师，自昔忠良多与配享，虽以胜国之世祖而亦或秩祀焉。岂非以后世英君谊辟，其政治亦有可取者欤？盖自洪武六年定历代帝王之祀，自伏羲以至元世祖，凡十有六君，皆以其开基创业，大有功德于民耳。若周文王虽基周命，终守

事商之节。唐高祖虽君天下，皆赖太宗之功，故不祀焉。伊尹之告其君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圣祖秩祀帝王之意，不在兹乎？二十一年定名臣从祀，自风后以至赤老温，凡三十有七臣，皆以其始终全节，与有功德于民耳。谓宋赵普虽曾有微劳，然实深负于艺祖。元安童虽信有勋德，然难并列于先臣，故不祀焉。盘庚之告其臣曰：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圣祖秩祀名臣之意，不在兹乎？故程颐之论治独归于帝王，而常不足于后世者，天下之公言也。圣祖之秩祀并隆于帝王，而亦不遗于胡元者，王者之弘度也。且以前世功德，固有当崇。而后人监戒，亦有攸视。圣意亦何深远哉！

圣制之终有曰：远师帝王之道、而望道犹有所未见，近守祖宗之法，而行法犹有所未逮，其故安在？且欲臣等详著于篇，将采而用之以资于治。臣虽愚陋，敢无一言以对，而徒进谀词曰：道则至矣尽矣，治则已臻皇极，法则无可议者矣。独不有以来曲学之诮，而上负圣明待士求言之意哉？臣窃观今日之天下，州野如旧，而民生之憔悴日甚。官职如旧，而事功之废弛日甚。礼乐如旧，而奢僭渐形，和气未洽也。学校如旧，而道术渐乖，士习未端也。律历正矣，而能以灾异当畏为陛下陈之者谁欤？祀典正矣，而能以异端当戒为陛下避之者谁欤？田赋之均如旧也，而额外之征求无已。泉货之通如旧也，而关市之税课日增。选举之法具存，而贤才之疏远者未伸。考课之法具存，而庸劣之在位者未去。兵制虽不改乎旧也，然强壮役于私门，恩赏夺于有力，其能弭怨谤之丛积乎？刑罚虽不改乎旧也，然怙终之罪不加，罗织之风未已，安能止物议之沸腾乎？夫以天下之事，每每如此，则是圣祖之法虽善，而今之所存者盖文具耳。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意者，陛下之望道诚有所未见欤？臣愿终其所欲言以副陛下之欲闻，而无复有所隐也。窃惟帝王之道大矣，臣愚不能究极，今陛下以程颐之言为问，臣亦敬

以程颐之言为献。其言曰：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此即臣所谓无法外之治是也。又曰：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即臣所谓无道外之法也。陛下诚能重人伦之始，审王教之端，如文王之雍雍在宫，无教亦保，则关雎之化其庶几矣。图国祚之绵洪，计宗祧之嗣托，如文王之振振公子，以永姬箓，则麟趾之化其庶几矣。关雎麟趾化成，则至于兄弟，御于家邦，而道无不纯。有以匹休帝王，而增光祖宗帝王之盛治，又何难哉！是则陛下之所宜加意者，诚不在于多方也。伏愿少垂天听，克广德心，不以臣所陈之言为谬，而听之惟聪。不以臣所言之事为易，而行之惟力。矜持敬畏，不少间断。清燕之优游无异于大廷之临莅，便嬖之使令不忘乎儒绅之奏对。则道可纯，法可善，治可久。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草野之人不识避讳，冒干天威，无任陨越之至。臣谨对。

评析

舒芬的对策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条理清楚。策问中共提出了三大问题。一是帝王治天下中的“道”与“法”；二是关于祭祀先朝君臣的问题；三是关于当今政治的问题。舒芬以策问中提出问题的顺序来结构全文，先开门见山地谈到自己的中心论点，认为：“天下无法外之治，帝王无道外之法”，以此为总纲来约束自己的思路，形成全文的主线。随后。陈述事实，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以三皇五帝为正面事例，以汉唐宋的君主为反面事例，反复申说，以一个反诘句式又进一步强调了自己的论点：“孰谓为治可以无法，而立法可以不本于道哉！”至此，圆满地回答了策问中的第一个问题。

接着，他以盛赞太祖朱元璋的种种治世之道为一个过渡，既照应了策问中的“太祖高皇帝……治道之高明，治法之弘远，直可以等帝王而上矣”的观点，又顺理成章地引出下文。

随即，他又引述圣制所问，以大量的事实和精当的引证来说明祭祀先朝历代帝王和名臣的重要性，谓：“前世功德，固有当崇 。而后人监戒，亦有攸视。”同样，他又顺承而下，继续就圣制所问，一一给予周详严密的答复。最后，以诚惶诚恐之态，谦和卑恭之度表达了自己对皇帝的愿望，于是水到渠成的结束了全文。总之，这篇对策答无遗漏，而成条理；说有依据，而能明晰。这是本文的第一个特点。

二是主次分明。策问中提出了三个问题，就难易程度而言，当时人们恐怕认为第一个略难，因为这是究历代之治，总结经验教训的，论者须既有才学，又有识见，才能灵活驾驭，纵横驰骋，否则，捉襟见肘、鼠目寸光，终是小家子气。故舒芬以较大篇幅来系统地论证这个问题，或论证，或举证，或陈述，或考辨，或结论，或推理，以能见自己的史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等多种功力。而论当今的二、三问题，一是不好正面回答，恐有忌讳，二是有所限制，不能展示才学。所以，他就以较小的笔力来处理之，只是以陈述事实，颂扬功德，昭示愿望为主，而不敢大幅度地展开。如此，文章就笔落有轻重，主次能分明，这是本文的第二个特点。

三是应对恭谨。该文洋洋数千字，少有嚣张激烈之语、慷慨悲壮之辞，多有温恭谦良之语，委婉舒缓之文。文中赞语多，讽语少；正面颂扬多，反面指责少；祈请祝愿语多，责问批驳语少；设问句式多，感叹句式少。如此，也就形成了该文恭谨顺从、温润徐和的风格。读此文，仿佛看到了一个战战兢兢的臣子正面对着威严的君主，用他那谦恭的言辞，在小心谨慎地回答着君主的提问。其内心总是怕有所冒犯，惟愿能开龙颜，故处处用心，时时留意，只想怎样

答得好，答得适度，答得圆满，答得得体，故行文用笔也就自成风格。 (苗菁)

正德十六年(1521)辛巳科

状元:杨维聪

杨维聪,生卒年不详,字达甫,号方城,顺天固安(今属河北)人。幼随父读书,正德十六年殿试状元,授翰林修撰,迁太子中允。嘉靖六年出为山西按察司副使。此后历任河南学政、山东布政司左使等地方官,恪勤政事,时号能臣。后调京都任光禄寺卿、太仆寺卿。嘉靖十九年致仕,卒于家。

策问

制曰:朕惟自古人君临御天下,必慎厥初,而为其臣者亦未尝不以慎初之说告之。盖国家之治忽,君子、小人之进退,世道之否泰,其机皆系于此,诚不可以不慎也。然观之诗书所载,则亦不能无疑焉。舜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首察玑衡以齐七政,而类禋望遍

之并举，观天交神，庶政固在所先矣。异时月正元日格于文祖，询四岳，辟四门，明目达聪，惟恐或后，且进十二牧而历咨之。岂听言用人又在所急欤？太甲元祀，祗见厥祖，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王。是天下之政，无大于法祖宗矣。高宗恭默思道，傅说告之，尤拳拳逊志时敏之务，典学亦岂容缓欤？成王即政，周公作无逸，举三宗以劝之，惟以畏天爱民为主。访落一诗，乃又以尽下情守家法为说。立政一书，又以三宅三俊为不可忽，终之无误庶狱为重。意固各有在欤？抑又有可疑者，禹受命于神宗不旋踵，会群后誓师征苗，康王率循大卞，大臣进戒，首以张皇六师为言，他务未遑。顾以兵事先之，何欤？若乃禹祗承于帝，有精一执中之传。汤黜夏命，有克绥厥猷之任。武王胜殷，访《洪范》于箕子。践阼，授《丹书》于尚父。且退，而几席觞豆刀剑户牖莫不有铭，则又万世道学渊源所自，未可以寻常政事目之也。然则人君慎初之道，果孰有外于是欤？汉唐宋以来，其君臣之间盖无足与于斯者。然一代之治功，论议亦不可泯。观夫求端于天之策，治审所尚之疏，尚德缓刑之书，荡涤烦苛之奏，与夫先天要说之十事，奉天罪己之一诏，元祐修德为治之十要，淳熙谨始自新之十目，皆于初政深致意焉。其与十渐之虑，五始之义，三卿序进授策之戒，指归所在，其果无大相远欤？夫人事有本末，物理有终始，王道之施设固有先后。端本所以治末，谨始所以图终，施之宜先则不可以少后，皆治体所关甚大，不可以苟焉者。何众说不能以皆一欤？朕奉天明命嗣承祖宗大统，临御以来，厘革弊政，委任旧臣，凡夫敬天法祖，修德勤政，求贤纳谏，讲学穷理，节财受民诸事，惟日孜孜，次第举行。取无逸中嘉靖殷邦之语，建号纪元。方将体元居正，以求俪美诗书所称帝王熙明之治。特进尔多士于廷，咨以慎初之道。尔多士尚酌古准今，稽经订史，明本末之要，审先后之序，悉意敷陈，用辅朕维新之治。

对策

臣对 闻帝王之御天下也，有治法，有心法。酌其因革，制其缓急，足以周天下之务，立天下之纲，是谓治法。□于躬行，原于心得，使其出之而有本，运之而不穷，是谓心法。治法不善，则施为注措之间，乖谬舛错必无以成治。苟治法善矣，心法或未端焉，则科条虽具，品式虽详，亦弥文粉饰，而未必征之实事，勉强一时，而不能持于悠久，虽欲言治，皆苟而已。故心法存于内以为之本，治法施于外以为之用。本端而末治，体立而用行，斯为治不易之常道也。况人君临御之初，天命眷顾方新，人心向望方切，治忽否泰之机胥此系焉。所以慎其初而图其终者，可不加之意邪？是故得心法而举治法，三代以上之所以善治也。心法不纯而治法亦有所未备，三代以下之所治不古若也。然则今日慎初之道，奚有外于是二法哉！

钦惟皇帝陛下睿哲天挺，仁孝夙成，昔潜藩邸之时，已系元元之望，一旦龙飞虎变，御极当天，宵旰孜孜，厉精图治，任耆旧之臣，厘积习之弊，天下之人莫不延颈举踵，观政听风，思见德化之成。臣以草茅，首蒙赐对，虽至愚陋，不足仰承休德，而喜庆之深，敢不掇拾旧闻，对扬清问之万一。臣惟人君之治天下有机焉，识治势者乘其机以为之，则力不劳而功可成。所谓机者，初是也，盖临御之初，好恶未著，虽有邪佞之臣，卒然不敢售其奸，唯左右观望，一有隙焉，即投以所好。人君唯好之徇也，于是溺其所可乐，忘其所可惧，而后彼得以肆。天下之事，将遂愦焉以至于不可为。诚自其初谨之，不堕于小人之计，小人亦洗心涤虑，唯正之趋矣。是故识其

机者慎其初，不慎其初，不识其机也。识其机，则国家由之而治，君子由之而进，世道由之而泰。不识其机则治者忽，进者退，泰者否矣。其关系岂小小哉！太甲初嗣位，伊尹告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成王初营洛，召公告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自古人君临御天下，率以慎初为事，臣之贤者亦未尝不以慎初之说告之也。

臣请稽经订史，因圣制所及者条陈之。舜初摄位，在睿玑玉衡以齐七政，而观天之道尽，类上帝，禋六宗，望山川，遍群神，而交神之礼举。及其即位，询四岳，避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务进贤以决壅蔽之患，且进十二牧，而历以五事咨之，务用人以赖辅理之益。伊尹作伊训，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训太甲，盖逆知其欲败度纵礼，颠覆汤之典刑，故以法祖为说。高宗以交修命傅说，说告之曰：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则以君德既修，然后大臣可举其职也。周公作《无逸》以训成王，举殷中宗高宗祖甲畏天爱民之事，欲其知小人之依，以为祈天永命之本。成王朝庙听政，思先人顾托之重，乃作《访落》一诗，延群臣以尽下情，率昭考以守家法。《立政》一书，周公戒成王以任用贤才之道，始以宅俊为不可忽，而终之以无误庶狱为重，使王尤知刑狱之可畏，必专有司牧夫之任，而不以己误之也。若夫禹受命神宗，不旋踵会群后，誓师征苗。康王率循大卞，召公进戒，首以张皇六师为言，似若忽内而重外者。然圣人之治，固不因外以废内，亦不因内以遗外。有苗弗率，民弃不保，禹承舜命，安得不征之。然班师振旅，诞敷文德，卒格于干羽两阶之化。周至康王三叶矣，承平既久，玩愒随之，老臣爱君得不以张皇六师为戒。且张皇云者，亦有国之常政。军伍藏于井甸，陈法讲于蒐狝，巡边四征，寓于巡狩。会同儆军，实阅器械严纪律而已。非若后世守文者以兵为讳，喜功者则又穷兵黩武之为也。夫三代以上之君，临御之初，莫不急所先务，其治法可谓举矣。至其心法之所

存,则尤致意焉。是故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禹之祗承于帝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汤之自任于己也。武王之始克商也,访《洪范》于箕子。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其始践阼也,又访《丹书》于太公,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退而几席觞豆刀剑户牖莫不有铭。夫武王之皇极敬义,即成汤之绥猷。成汤之绥猷,即禹之中。心法之相传,精神之相契,有以开万世道学之渊源。立政非此无以为立之之本,宰事非此无以为宰之之要。慎初之道,莫有先于此者,可以寻常政事目之哉!自是而后,若汉若唐若宋,不足与于斯矣。安马上之习者,不事诗书;修玄默之德者,崇尚黄老。投戈讲艺,息马论道矣。溺心图谶之说,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矣。专为章句之习,以至锐情经术而闺门惭德,延礼文儒而声色荒心。曰心无邪曲,顾任智谋以成功。曰重道崇儒,至指道学以为党。心法之传,寥寥乎未有得也。故其为治法也。或驳焉而不纯,或行焉而有所不尽。然当时群臣之所论议,深有可取者。董仲舒对策于武帝之初,曰:王者求端于天。欲人君任德不任刑。匡衡上疏于元帝之初,曰:治天下者审所尚。欲朝廷崇礼而敦让。宣帝刑名绳下,路温舒以尚德缓刑劝之。章帝承永平后,陈宠以荡涤烦苛劝之。汉之臣臻意于新政者如此,惜乎其君无能以行之也。玄宗开元之初,姚崇以十事要说:曰政先仁恕,曰不幸边功,曰法行自近,曰宦竖不与政,曰罢赋外之征,曰戚属不任台省,曰大臣接之以礼,曰群臣得犯忌讳,曰绝营造,曰推监戒。德宗奉天之难,陆贽劝下罪己之诏,曰: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痛心腼面,罪实在予。使狂将悍卒闻之,无不感激挥涕。唐之臣致意于新政者如此,惜乎其君行之而不尽也。吕公著当哲宗之初,尝上十事

于朝，则畏天也，爱民也，修身也，讲学也，任贤也，纳谏也，薄敛也，省刑也，去奢也，无逸也。朱熹当光宗之初，拟上十目于朝，则讲学以正心，修身以齐家，远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义理以绝神奸，择师傅以辅皇储，精选任以明体统，振纲纪以厉风俗，节财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宋之臣致意于新政者如此，惜乎元祐行之而不终，淳熙拟之而未上。故当时之治，卒莫能底于善也。由诸臣之建白观之，虽言人人殊，其视十渐五始三卿序进授策之戒，指归所在，亦无大相远者。盖魏征十渐之虑，以太宗初寡欲而今市骏马，初护民而今用人力，初役己而今纵欲，初亲贤而今近奸，初贱异物而今进难得，初求士而今任好恶，初绝田猎而今事驰骋，初达群情而今多间隔，初求治而今恃势，初抚宁而今劳弊，所以虑不克终也。五始之义则春秋之法，必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者，以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国之始。荀况所谓三卿序进授策，则天子即位，上卿进除患为福之戒，而授一策。中卿进虑事虑患之戒，而授二策。下卿进敬戒无怠之戒，而授三策。所以欲人君慎于始也，盖与诸臣之所建谨始图终者一矣。夷考上下数千年间君臣图治之说，既有所谓心法，又有所谓治法。而其为治法之说，又或天或祖或君或民，或内或外或彼或此，棼然其不能齐，何也？天下之理固有大分，而于其中又各自有界限，必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故以心法对治法言之，心法人事之本也，物理之始也。又于治法之中，以事之大且急者，对事之小且缓者言之，大且急者人事之本也，物理之始也。君人者欲端本以治末，谨始以图终，其施设之序，心法固所当先。而治法之大且急者，亦奚容以或后。圣君贤臣唯有见于此，执中绥猷，洪范丹书与夫典学之说，修身讲学之说，正心齐家之说，直指乎心法之源。而其他政事之说，亦就法治之中，因其时之所宜，据其势之所至，顺其理之所在，指其大且急者言

之也，又奚必其词之同哉？

臣窃伏观陛下践阼之初，责成辅臣，奖纳台谏。凡弊政之所当革者，革之无不尽，凡旧章之所当遵者，遵之无不笃。其于敬天法祖，修德勤政，求贤纳谏，讲学穷理，节财爱民诸事，固次第举行之矣。励精之实，发于即位之一诏。中兴之志，著于嘉靖之纪元。凡在覆载之间，稍有血气之属，莫不以殷宗周宣为望。乃犹不自满假，于圣制之终曰：方将体元居正，以求俪美诗书所称帝王熙明之治，欲臣等悉意敷陈，以辅维新之化。即此观之，臣有以知陛下必为殷宗周宣无疑矣。臣之所以为献者，亦惟愿不失此机而已。何则？数年以来法度废弛，天下之事已极于弊。陛下一起而新之，百官承德者日奋，人心望治者方切。此祈天永命之时，可以有为之会也。乘此机以为之，矢去川决，殆无难者，在陛下加之意而已。近世人君，孰无愿治之心，然或卒不逮焉。岂皆力之不足，亦其初之不慎也。陛下欲求慎初之道，则心法治法乌可不加意哉！是故精察一守以执中，肇修人纪以绥猷，逊志时敏以典学，建皇极以叙九畴，戒怠欲之胜敬义，正心以修身，修身以齐家，则心法得之矣。克谨天戒以畏天，监于成宪以法祖，亲贤远奸以致治，早朝晏罢以勤政，明明扬陋以求贤，虚怀受言以纳谏，节财以致国用，爱民以固邦本，慎刑宪以恤人命，诘戎兵以防边患，则治法得之矣。有心法以为治法之本，有治法以为心法之用，本末不差，先后有序，而谓美不俪于诗书，治不隆于熙洽，岂理也哉！慎初之道，如是而已。虽然，非初之难，而终之难也。陛下以慎初为问，臣既陈之矣。至于图终之说，臣敢复为陛下言之。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之行也，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未有一时之息，健故也。唯其健也，故四时万物皆得顺其序，遂其生，使君子自强之健于天。少不似焉，则几成而复坏，未久而已息，何以成其治哉！然所谓健者非血气之谓，又以心为之本。陛下诚求之心，日御经筵，讲求至理，以

学养此心，整齐严肃，主一无边以敬存此心。延见公辅，亲近儒臣，随侍便殿，时备顾问，以君子维持此心。则圣心淇然，义理为之主而物欲不能夺其健，即乾矣。又何不终之足患哉？伏惟陛下深留圣意，以无失今日之机，以无负今日之望，以无忝今日改元之意，则生民幸甚，宗社幸甚。臣干冒天威，无任战栗殒越之至。臣谨对。

评析

这篇对策在以下几个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是应对尽量“合情合理”。策问中犹如边珠炮似的提出了长长的一系列疑问，大意是谓：帝王当以“慎初”为务，但考究历史，为什么三皇五帝之圣君在其行事之初尚有种种有背常理之处？而汉唐宋之一般帝王在其统治之时也还有不少情理之内的善举，原因何在呢？作者谨于应对，他尽量从纷繁的历史中找出策问中所举事实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对于三皇五帝，他竭力拥护，对于其背于常理处总是千方百计地给予合理的解释，甚至有时刻意回护也在所不惜。对于汉唐宋诸君，他褒中带贬，对于其合于情理的措施和议论，他总是一分为二，先扬后贬，“鸡蛋里头挑骨头”似的总也能找出些大毛病、大错误，甚至有时有违事实也毫不顾惜。总之，作者费了不少的心机，动用了大量的笔墨，应对的尽量能合于当时传统理学“崇尚三代、卑视汉唐”的“情理”。

二是行文尽量“简洁”。策问问了一长串的问题，如果老老实实地应对，那么文章的篇幅就会拉得很长，故作者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将文章分为说古与论今两大部分，说古部分以精当的语言，富有气势的句式就所问一一进行了答复。文笔顺畅，一气贯注，毫

无牵强之处。论今部分的语言又转概括，句式又转委婉，就策问中的问题略加生发，但又迅速收束。总之，好说的就多说，不好说的就少说，能详答的便详答，不能详答的便概括，这就使行文张弛自如，繁简得度。

（苗菁）

嘉靖八年(1529)己丑科

状元:罗洪先

罗洪先(1504～1564)字达夫,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幼读王守仁《传习录》,极推崇王氏"心学",故拜同村"心学"学者李中为师。嘉靖八年中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次年因父母年老多病,辞官回乡,嘉靖十八年拜春坊左赞善。时世宗崇信神道,不理朝政,罗洪先联合唐顺之、赵时春上疏,欲请皇太子朱载垕临朝代世宗处理大事,触怒世宗,被黜官为民。后权臣严嵩因同乡之谊,邀他出仕,被罗洪先拒绝。自此,潜心学问,天文、地理、礼乐、典章、河渠、边塞、战阵、功守,阴阳、算数无不精究。尤于王守仁"心学"多有所得,并能对其流弊有所修正。死后追赠光禄少卿,谥"文恭"。著有《念庵集》。

策问

制曰:朕惟治天下之道不可概举,其大者在乎知人安民二者而已。夫知人则哲,必能官而任之;安民则惠,必使匹夫匹妇各得其所。虽然尧舜尚于此犹难,夫岂后世所能及也?朕本藩服,仰承天命,入奉大统,朝夕战兢,不遑宁处。何自即位以来,灾变频仍,旱潦相继,岁复一岁,无处无之,生民流亡,朕甚恐惧。此非朕官非其人以虐民欤?或贤与不肖进退倒置欤?或劝惩之典失其宜欤?抑为我选任者失公平之道欤?夫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非民不聊生而天垂深戒者如此何欤?至于内有盗贼之扰,外有疆场之患,此亦以为民之害者。民为邦本,而使饥寒困苦流离死亡至于如此,邦欲安得乎?朕虽存保邦安民之念,求其所以实无一得,朕欲俾灾沴潜消,民生安堵,盗贼息,边方靖,财充而食足,不知如之何可以臻此?特进尔多士于廷,尔多士明于王道有日矣,且目睹时艰,岂无真识的见以匡我者?当悉心吐露,推衍所以于篇,朕当勉为亲览焉,勿谄勿惮,勿泛勿略,庶副朕意。

对策

臣对 臣闻帝王之致治也,有覆天下之仁而以不费为施,有周天下之智而以不劳为用。施不费而后顺时鼓舞之权行,用不劳而后宪天聪明之实尽。尽聪明者存乎诚,诚无疑矣。妙鼓舞

者存乎变，变无方矣。无方而显作用于旁行，仁之发也，以天下之才尽天下之故，得天下之故神天下之化，夫何费之有！无疑而别贤否于不遗，智之运也，以天下之公为一人之度，廓一人之度达天下之情，夫何劳之有！是故诚以基智，智以广仁，仁以尽化，化以格天，天顺而时，化和而理，仁广而通，智睿而辨。非夫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者，其孰能与于此！故仁而不得其要，必纷错而弥文；智而不本于诚，必穿凿而任术。弥文之弊，泛而寡效；任术之弊，察而不弘。天下之事废者多矣，是故帝王存之为湛一之本，举之为易简之善，明而先觉，惠而久大，盖其所执者要而所尚者审故也。是以天地可位，万物可育，气化太和，灾沴不作。其上下一贯之理，显微无间之机乎！是故仁智合德之谓圣，志气交感之谓通，天人同归之谓治。是说之不明也亦久矣。古人之言曰：上有好言之君，则下必有尽言之臣。又曰：益志广德，莫善于问，乘事演道，莫善于对。臣愚恭遇陛下精明纳言，得其时矣，观时势之故，究恢济之本，极理要之说，广德业之规，臣非其人也，而窃有志焉，敢不敬述所闻以对。

惟天生民不能无欲，欲之不制，乱之成也，苟非至德，大道不行。故夫德合天者谓之皇，德合地者谓之帝，兼乎三才，足以叙伦尽制者，谓之天子。故亶聪明为元后，而佑下民也作之君师。子夏问孔子以民之父母，孔子曰：四方有败，必先知之，一人而定四方者君也。是故天者立君之命也，君者立民之命也。裁成之道，辅相之宜，所自成也；典礼之衷，命讨之权，必有归也。安民非君之责乎？势一而后定于义，职分而后详于仁，是故惟王建国，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立民极也。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以奉天道也。此则共济之义，大公之制也。官人非君之助乎？然地远则德未易遍，情异则化未易齐，求万姓之咸休至难也。听言则易于匿情，尽实则乖于广容，求九德之咸事至难也。然臣尝求之矣，四凶之恶未著也，

尧不逆探其奸，元凯之善未著也，尧不责备其用。是道也，其知人之要乎？黎民敏德，在臣工之克艰，帝力不知，由百僚之师师。是道也，其安民之要乎？然而当时病其难者，思日孜孜之心，后世之弗逮，忘其有事者也。念不念之间而治忽因之，其亦可畏也哉！

仰惟陛下即位以来，务学求理，敬慎夙夜，不遑宁处，求直言以广听纳，除冗役以划蠹害，谨爵爵以简任使，严章法以辨优劣，其于用人可谓谨矣。免杂租以重邦本，发余帑以苏时艰，减贡献以节浮费，明冤狱以行钦恤，其于抚民可谓至矣。是宜海内兴富足之歌，天下乐有年之颂，朝著崇相让之风，郡邑尚承德之美，而休征毕集，嘉气聿畅矣。夫何近年灾故迭见？旱魃肆虐，千里相继，淫潦损苗，逾时不止，白虹示警，坤仪载震，星变上现，霾气四昏。夫天人之应自古不诬，气数之说匪经之训，故曰：圣王在上，日月不薄蚀，星辰不悖，雷发不震，雨雹不为菑，一气之流行故也。今也仰窥晷度，俯考玑衡，岂惟圣明虑之，至愚如臣亦宜疑之矣，然尝延询博访，近察远闻，而知斯民之困也。仓箱无卒岁之储，田里无口分之业，耕获未已而称贷复行，亦有收不以时，如苏轼之虑者矣。播种已施而券契辄易，亦有欲亟其死，如陆贽之忧者矣。或病于赋税之增，或困于徭役之扰，至于灾异之地，犹失抚字之方。栗烈不免于悬鹑，原野谁矜夫蒙袂，是以流离载道，转相嗷嗷，攘劫为生，益见糜败，边尘稍动，僵仆满目。夫天心之仁，靡不欲其相养以生，而民之司牧，乃忍视其转死而不救，知人之道可不重省乎哉！陛下之睿思既有以洞烛其弊矣，臣也复何所言。

伏惟圣问有曰：官非其人以虐民，臣不敢谓无是也。盖古之仕也，禄不计其厚薄，职不计其大小，惟以尽分为贤，不以年数为限。今也上无责成之心，下有苟安之幸，善政未必行，能声未必著，累日积资自可叙迁，是安得不以利为利也。陛下有以处之乎？圣问有曰：贤与不肖进退倒置，臣不敢谓无是也。盖古之仕也，进以实德

不以空言，故静言如兜，不得长奸，有能如鲧，犹谓方命。今也听其辞说，无以证其素行，取其才艺，不复稽其道术，是安得不以不肖为贤也。陛下有以辨之乎？以劝惩言之，古之课绩也，日有日成，月有月要，岁有岁会，故不紊也。今给由之制，亦有视为文具而以情毁誉者乎？是赏罚无可考矣。以选任言之，古之进贤也，官长自举其僚属，荐辟不避乎亲故，皆以情也。今铨衡之法，亦有故遗所知而远绝嫌谤者乎？是公平有所碍矣。四患不除，则庶理不得；庶理不得，则群贤不登；群贤不登，则处置失宜，而百姓无赖。是故潢池多弄兵之警，沿边无固守之防。以此立国，则国运不泰；以此制民，则民纪弗宁。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言乎感应之道，察乎机缄之萌，是安得不来宵旰之忧而切多士之问也。然臣以为知致弊之由，则必有救弊之方；病化源之郁，则必有更化之道。毋亦于知人者而加之意乎？臣亦不敢为近世苟且之见，习熟之说，以负陛下之诚意，请揆其本而论之。

夫天聪明，圣时宪，古之训也。然天之聪明不可度也，有德则降祥，有恶则降殃，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因其宜而未尝有为也，各尽其才而未尝有心也。山泽之广大，污疾之藏纳，而未尝靡容也，观于天道，可以知人君之度矣。舜为大智，隐恶而扬善，谦之受益，能虑以下人者也。圣贵改过，不保其往，诚于取善，无不可师，在协于克一而已。是故虚心以应之，下己以待之。水澄则妍蚩见也，衡平则轻重自伦也。必以形迹观人，则不可以尽人；必以法制绳人，则不可以服人。而况人心至神，无感不通，上之好恶靡不审，上之情伪靡不知。示之以诚，犹恐其渝；示之以疑，弊将安极？己未信而欲人之信己，不可得也；人弗信而欲其惟志之从，亦不可得也。今以虞度之私，而视圣人间察用中之心为何如哉？虽然，此其本也，概举其端，则教育不可不端也，选举不可不慎也，考课不可不精也。而三者之中，教育又其大端也。欲端教育，在于正道术之

习，重师儒之贤。欲正其习，则祖训所谓一以记诵为能，卒无实用者可戒也。欲举其师，则祖训所谓必求端人正士，以为模范者可行也。敦 本而尚质，先德而后艺，如是而教有不成乎！欲慎选举，在于谨资格之弊，崇德行之科。谨资格也，则当鉴裴光庭混淆之失，崇德行也，则当用程颐荐达之议，而又止奔竞之风，重廉耻之节，如是而选有不当乎！欲精考课，在久贤能之任，明赏罚之权。久任则杜恕所谓辟亲民长吏转为郡守，有绩则进爵加秩者，可法也；明权则傅嘏所谓君志定，国体崇，而后责其成者可取也。如是而课有不精乎！然而数者之要，非秉聪明之德不能行，宪天之说，无亦所当致省者乎？既能知人，则安民者举而措之耳。然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法不变则道不融，制不新则化不显。兼以时久则穷，事烦则弛，俗玩则弊，势积则屯，守其故必滞而不通，反其源斯顺而可达。是故作其倦怠，不可无劝相之道；一其趋向，不可无防范之规。刚克柔克，因人而施者也；尚质尚忠，与世相成者也。此可以观时矣。时未至而求之太骤，则易至于用智；时已至而行之无渐，亦不谓之适宜。故观其会通，顺其酬酢。以为当官之法，固可尽其才能；以为责效之期，尤当易于底绩。今习于惰逸，昧于物情，执一定之迹，应无穷之变，岂所以振皇纲而宣德意者乎？虽然此其本也，概举其端，则东南有可耕之人而无其地，西北有可耕之地而无其法。旷土隙田之未治，晁错之所忧也；凿源灌渠之有法，召信臣之所行也。臣又闻因旱得雨，而皇祖犹悯其伤苗，乃免田租。今则善政置诸废阁多矣，无亦以实意行之乎？西陕告饥请粟，而皇祖倍其赉予，且令速发。今则虽有急请，稽延岁时久矣，无亦以便宜处之乎？田无定分，贫富不均，略为检制可也。赋有巧算，虚实莫究，加以清量可也。禁侈靡之风而民自足，黄霸之惠政也；豫储蓄之举而岁不饥，朱熹之良规也。然而数者之要，非达变易之宜，不能行顺时之说，无亦所当致省者乎？顺时而不悖，则贤才无掣肘之虞；任人而不

疑，则闾阎有切实之效。遂饱暖安逸之欲，而无饥寒，盗贼何从生乎？盖不但龚遂之治渤海也。得抚绥攻战之宜，而无败衄，外侮何由至乎？盖不但如充国之在湟中也。生之有道，用之有节，积之有备，取之有制，财用足而衣食富，又不必刘晏之取予而后为善计也。又何患于天心之不格，灾患之不潜消哉！

然圣问于终篇尤有明于王道真实的见之说，以启愚臣之尽言，而且戒谄畏之弊，臣有以知陛下求治理之切，广谋猷之陈，上嘉下乐之情至矣，臣复何所顾忌而不终其义哉！盖闻祖训有曰：一民未安，犹为未仁；一念未诚，犹难格天。又曰：人情遇祥则有骄心，遇灾则有惧心，惧则戒心常存，或皆蒙休矣。呜呼，其殆天人之交，始终之义，安危倚伏之机乎！今陛下遇灾而惧，因变而警，归过于己，加念于民，是心岂有二哉！此皋陶所谓兢业万几者也，寅恭和衷者也，是知人安民之大原也，万古虚灵不昧之天德也。今之灾变即潜消也，此心之敬戒无时可止息也。孔子曰：为政在人，即知人之可以安民也，取人以身，即知人之本于宪天也。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也者，即今日敬戒之真心也。是心也，天得之以情，地得之以宁，圣人得之能使天下和平。是故无有内外，无有远近，浑然与物同体者也，准则变化，皆由此出。清明在躬，可以一贯，谁则无之？难乎其纯耳。圣人之学，以纯其心者也，加以意必，即非此心，加以固我，即非此心，其得其失，不假外求，匪思匪为，乃所自得。是故静而养之而未始有物，实渊深也；动而慎之而未始不定，实溥博也。故一念之觉即为诚，一念之放即为伪，达于此为大智，决于此为大勇，而饰外之累不足惑之矣。顺之而运用也，乃为周流之妙，失之而袭取也，乃为执方之行，而似是之非不足动之矣。以此修己，中有主而不杂于二三；以此亲贤，任必专而不疑于可否；以此为裁事宰物之柄，则拟议而不穷；以此为事天治民之本，则精明而不懈。学不知心，难言穷理，不能穷理，何以泛应！此一贯之旨也，千圣之

传也，百世之经也，愚臣终身学之而未能者也。程子言：告君之贵诚也，犹钟之音系所感而应也，张子之言曰：试言乃事君第一义，岂可有欺！臣之微诚何足为献，然亦不敢妄举以陷于自欺，刍荛之虑有补万一，亦大圣之所不弃也。惟陛下审择而力行之，不胜幸甚。臣谨对。

评析

嘉靖八年的殿试，皇帝制策问以"知人"、"安民"之道，这实际上是有所针对而发的提问。因为从明世宗朱厚熜即位以来，如他在策问中所言："灾变频仍，旱潦相继，岁复一岁，无处无之"，嘉靖元年七月，南京暴风雨，江水涌溢，拔树坏屋，漂没船只；凤阳、扬州、庐州、淮安等府，同时大风雨雹，河水泛涨，毁坏房屋，人畜死者无算。二年，两畿、山东、河南、湖广、江西及嘉兴、大同、成都均旱，赤地千里；南畿又遭大水，江淮都溢，淮、扬、邳、徐等府，房屋田地大都被淹。五年，徐、沛河溢，坏丰县城。六年，黄河连年北溢，沛县以北运河阻塞，遂自兰阳北之赵皮寨引水南流，东经宁陵、夏邑至宿州符离桥，出宿迁小河口。同时，各地民变不断，自嘉靖元年到八年，先后有广西周克亮矿徒起义、山东王堂矿徒起义、文莱蔡猛三起义、大同兵变、广东瑶民起义、山西陈乡起义，等等。世宗登基的初年在政治上曾作了一些适当的改革，先后实行了减轻租银、整顿赋役以及抑制宦官、裁撤锦衣卫校尉等等措施。更重要的是勘查了皇庄和勋戚庄田，把一部分土地退还农民。但是嘉靖皇帝却不能善始善终，他阅览疏奏的时间逐渐减少了，遇事不愿多动脑筋，也懒得与阁臣议事。接下来他开始出入教坊诸司，迷醉于乐

工、舞女精湛的技艺表演。再后来事情就有些严重了，即位之初纳谏如流的情景很少再现，锦衣卫、监局里的冗员开始增加，封爵世宗之风又有所抬头……正如嘉靖二年南京礼部尚书秦全上疏所言，嘉靖皇帝有八不如初：诏令不能如初，任贤不能如初，慎名器不能如初，谨国法不能如初，恤民瘼不能如初，崇 正道不能如初，啬精神不能如初。嘉靖皇帝在一天天地腐化堕落下去。由此，就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吏治腐败，政治昏暗，点滴的改革又都成为了泡影，社会的危机又一天天加剧。嘉靖皇帝虽仍然嬉戏、奢侈，但却不能不有所警觉，他坦白地向临策会试的举子们提出了如何"知人"、"安民"的问题。

罗洪先在回答策问时，以"知人之本在于诚，安民之本在于仁"为立论根本，尤其推崇纯心，认为是"知人安民之大原"，这也是有其原因的。朱明王朝在立国之初极力提倡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作为封建统治思想。朱元璋说："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他做皇帝，就是"行先圣之道"(《明太祖实录》卷 26)。朱棣曾令撰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儒家书籍，广为传播。在明朝统治者的倡导下，嘉靖以前，程朱理学在官僚士人当中十分流行，成为统治阶级钳制人民思想的工具。但明中叶后，政治腐败，世风日下，民变纷起，统治者所崇奉的程朱理学已不能束缚人民的思想，于是王守仁的"心学"兴盛起来，以补救理学的无能。王守仁在治学方面继承南宋陆九渊的"心即理也"的学说，也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他反对程朱理学所承认的心外之理，这种心外之理在当时已被 看作封建道德的准则。他认为理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也不是圣人所能制定的，而是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所以他说"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非物理矣"(黄宗羲《明儒学案》引《传习录》)。王守仁把这种存在于每人心中的理叫作"良知"，而主张人人"致良知"，于是程朱理学用以维护封建程序的道

德准则，又被王守仁移植到每个人的心中，使它在人心中生了根。在明代中叶阶级斗争更为尖锐的情况下，王守仁把三纲五常这些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心所固有的东西，不是统治者强加于人的，那么人人就自然应该遵守这些封建道德，因此它更能直截了当地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它一出笼，就得到许多士大夫的赏识。

罗洪先在15岁时便曾拜读过王守仁的代表作《传习录》，极为推崇王氏"心学"。他潜心研究王守仁的"心学"，成为王氏"心学"的重要传人。他赞同王守仁的"致良知"的说教，要求人们用自心去体悟他认为原本就存在于自心中的伦理说教。所以，他应对中的主张，实是他所倡导的"心即理"、"致良知"等"心学"理论的演绎。

问以政治实务，答以玄妙心学，这是这篇时务对策的一大特色。

（苗菁）

嘉靖十一年(1532)壬辰科

状元:林大钦

林大钦(1511～1546)字敬夫,号东莆。海阳(今广东潮州)人。嘉靖八年,18岁的林大钦中秀才。他年少英俊,一鸣惊人,名声传遍乡梓。十一年,年仅21岁的林大钦一路过关斩将,以一篇洋洋数千言的殿试策得到嘉靖帝的赞许,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三年后因病辞官归家,嘉靖二十五年卒。后人辑有《林东莆先生全集》。

策问

制曰:朕惟人君奉天命以统亿兆而为之主,必先之以咸有乐生,俾遂其安欲,然後庶几尽父母斯民之任为无愧焉。夫民之所安者所欲者,必首之以衣与食。使无衣无食,未免有冻馁死亡流离困

苦之害。夫匪耕则何以取食？弗蚕则何以资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忧者也。今也耕者无几而食者众，蚕者甚稀而衣者多，又加以水旱虫蝗之为灾，游惰冗杂之为害，边有烟尘，内有盗贼，无怪乎民受其殃而日甚一日也。固本朕不类寡昧所致，上不能参调化机，下不能作兴治理，实忧而且愧焉。然时有今昔，权有通变，不知何道可以致雨旸时，若灾害不生，百姓足食足衣，力乎农而务乎织，顺乎道而归乎化？子诸士明于理，识夫时，蕴抱于内，而有以资我者亦既久矣。当直陈所见所知，备述于篇。朕将览焉，勿惮勿隐。

对策

臣对 臣知识愚昧，学术疏浅，不足以奉大问。窃惟陛下当亨泰之交，抚盈成之运，天下皆已大治，四海皆已无虞。而乃拳拳于百姓之未得所为忧，是岂非文王视民如伤之心耶？甚大美也！然臣之所惧者，陛下负聪明神智之资，秉刚睿明圣之德，兴天下之事无足以难其为者，而微臣所计议复不能有所补益于万一。陛下岂能以其言为未可尽弃而有所取之耶？陛下临朝策士凡有几矣。异时莫不光扬其名声，宠绥其禄秩。然未闻天下之人有曰：天子某日降某策问某事，因某策济某功者。是岂策士之言皆无可适于用者，抑亦其言或有可适于用而未暇采之耶？是臣之所惧也。臣方欲为根极政要之说，明切时务之论，而不敢饰为迂阔空虚无用之文以罔陛下。陛下若以其言为可信而不悉去之，试以臣之策付之有司，责其可行，则臣终始之愿毕焉。如或言不适用，则臣有瞽愚欺天之罪，俯伏以待罪谴，诚所甘心而不辞也。

臣伏读圣策，有以见陛下拳拳以民生冻馁流离为忧，以足民足

食为急，此诚至诚恻怛以惠元元之念。天下之所愿少须臾无死，以待德化之成者。然臣谓陛下诚怀爱民之心，而未得足衣食之道。诚见百姓冻馁流离之形，而未知百姓冻馁流离之实也。夫陛下苟诚见夫百姓冻馁流离之实，则心思所以富足衣食之道。未有人主忍见夫民之冻馁流离，而不思所以救援之者。未有人主救援夫民之冻馁流离，而天下卒坐于冻馁流离而不可救者也。今夫匹夫之心可行于一家，千乘之心可行于一国，何者？以一家一国固吾属也。曾谓万乘属天下者，有救援天下真实恳切之诚，而顾不效于天下者哉！是臣所未信也。臣观陛下临朝凡十九余年于此矣，异时劝农蠲租之诏一下，天下莫不延颈以望更生然。而惠民之言不绝夫口，而利民之实惠至今犹未见者，臣是以妄论陛下未见斯民冻馁流离之实，未得足民衣食之道也。臣闻之，仁以政行，政以诚举。王者富民，非能家衣而户食也，心政具焉而已矣。夫有其心而无其政，则天下将以我为徒善。有其政而无其心，则天下将以我为徒法。徒法者化滞，徒善者恩塞。心法兼备，此先王所以富足人之大略也。臣观史策，见三代以後之能富其民者，于汉得一人焉，曰文帝。当秦乱干戈之後，当时之民盖日不暇给矣。文帝视当时之坐于困塞者盖甚于涂炭也。育之以春风，沐之以甘雨，煦煦然与天下为相休息之政，而涂炭者在衽席矣。故後世称富民者，以文帝配成康，亦诚有以致之也。然而文帝固非纯王者，窃王者之似焉，犹足以尊称于後世，而况夫诚于王者而顾有坐视天下于冻馁流离者哉！臣窃谓今日陛下忧民之心不为不切，爱民之政不为不行，然臣所以敢谓陛下于斯民之冻馁流离而未见其实，于足民之衣食而未得其道者，窃恐陛下有爱人之仁心，而未能如王者之诚怛恳至。有爱人之仁政，而未能如王者之详悉光明。臣是以敢妄论陛下而云云也。然臣所望仁政于陛下者，非欲尽变天下之俗也，非欲复井天下之田也。亦曰宜时顺情而为之制，而不失先王之意耳。臣请因圣策所

及而条对之。

陛下策臣曰:夫民非耕则何以取食?弗蚕则何以资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忧者也。今耕者无几而食者众,蚕者稀而衣者多,又加之水旱虫蝗之为灾,游惰冗杂之为病,边有烟尘,内有盗贼,何怪乎民受其殃日复甚一日也。此见陛下痛念生民之病,深揆困乏之本,而极思所以拯救之也。臣谓民之所以耕蚕稀而日甚其殃者,游惰起之也,冗杂病之也。若夫水旱虫蝗之灾,则虽数之所不能无,然君人之忧不在焉。何者?恃吾耕蚕之具素修而无所耗,则虽有水旱虫蝗而无所害。臣闻有道之国,天不能灾,地不能厄,夷狄盗贼不能困。以恒职修而本业固,仓廪实而备御先也。臣闻立国有三计:有万世不易之计,有终岁应办之计,有因时苟且之计。万世不易之计者,《大学》所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者也。故《王制》,三年耕则有一年之积。例之则九年当有三年之豫。其终岁所入盖足以自给,而三年之蓄恒可以豫。待不虞如此者,所谓天不能灾,地不能厄,夷狄盗贼不能困。臣前所谓王者之政,陛下今日所方切求而欲励行之者。所谓终岁应办之计者,盖生财之道未甚周,节财之道未甚广,一岁之入仅足以充一岁之用。其平居无事犹未见其甚敝,偶有凶荒盗贼之变,则未免厚敛重取,以至于困败而不能自振。若此者,盖素备不修,因时权设,汉唐宋以下治天下之大率,而非我陛下之所以奉天理而深厚国脉者。其所谓因时苟且之计者,盖平时之用以敛散于民者颇无其度,而取民惟畏其不多,用财惟畏其不广。方其无事,百姓已不能自给,迨其有变,则不可复为之计矣。此则制国无纪,溃乱不时,盖昏乱衰世之政焉。臣前所谓起于游惰,病于冗杂之弊,亦略有不同于是。

陛下今所方欲改辙而易海内之观者,臣谓今日游惰之弊有二,冗杂之弊有三。此天下之所以长坐于困乏,而志士至今愤惋而叹息者也。其所谓游惰之弊二者:一曰游民,二曰异端。游民众则力

本者少，异端盛则务农者稀。夫民所以乐于游惰者何也？盖起于不均不平之横征，病于豪强之兼并，小民无所利于农也，以为逐艺而食可以为苟且求生之计。且夫均天下之田，然后可以责天下之耕。今夫里闬之小民，剥于污吏豪强者深矣，散食于四方者众也。大率计今天下之民，其有田者一二，而无田者常八九也。以八九不耕之民坐食一二之粟，其势不得不困，然而散一二有田者之业，以为八九自耕之养，其势未尝不足。议者病游民之众也，或有逐商之说。然臣以为游民之商，本于不得已也。而又无所变置而徒为之逐，臣惧夫商之不安于商也。臣窃谓今日之弊源已深，更化者当端其绪而缓理之。理而无绪，势将驱力农之民而商，而又将驱力商之民而盗也。天下为盗，国不可久。其便莫若颁限田之法，严兼并之禁，而又择循良仁爱恻怛之吏以抚劳之。法以定其世业，禁以防其奸贪，吏以时其安辑，游民其时归乎！若夫异端者，盖本无超俗利世之智，而徒窃其减额逃刑之利，不工不商，不农不士，以自便其身，且其倡无父、无君之教于天下，将使流风之未可已焉。此其为害甚明，故臣不待深辨。然臣窃悼俗之方敝也，秃首黄冠，充斥道路，珠宫琼宇，照耀云汉，此风未艾，效慕者众。非所以令众庶见也，非所以端正风纪之要体也。故臣请陛下严异端之禁，斥道佛之说，敕令此辈悉归之农。其有不如令者，许有司罪治不赦。盖非惟崇力本之风，抑且施教化之道，此臣拳拳所望于陛下之至意也。其所谓冗杂之弊三者。一曰冗员，二曰冗兵，三曰冗费。冗员之弊必澄，冗兵之弊必汰，冗费之弊必省，三冗去而财裕矣。夫圣人所以制禄以养天下之吏与兵者，何也？吏有治人之明则食之也，兵有敌人之勇则食之也。是其食之者以其明且勇也。其或有不明不勇者，则非耕不得食，非蚕不得衣。何者？无事而禄，亦先王之所俭也。今天下之吏与兵何如也？臣非欲尽天下之吏与兵而不禄之也。臣徒见任州县者固有软罢不胜而坐禄者焉，隶兵籍者固有老

弱不胜而滥食者焉。且入赀之途太多,任子之官太众。简稽之责不严,练选之道有亏。臣是以欲于此辈一澄且汰焉。其所以去冗滥而宽民赐者不少也。若夫冗费之弊不能悉举,即其大而著者论之,后宫之燕赐不可不节也,异端之奉不可太过也,土木之役不可不裁也。陛下端身以率物,节己而居俭,其于三者固未可议焉。然窃见天下之大,民物之众,九州四海之贡,尺帛粒米之赋,山林川泽之税,日夜合萃以输大仓,可谓盛矣。而国计未甚足,以为必有所以耗之者矣。且夫上之赋其下者以一,而下之所以供夫上者常以十。盖道路之耗,漕挽之费,京师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内府之百金,民家之万金也。以百万民家之资,费之于一燕飨一赐予一供玩者何限?臣故曰冗费在今日,亦有未尽节者。盖臣闻之,以天下所有之财赋为天下人民之供养,未有不足者。特其有以冗而费之者,则其势将横征极取,天下不至于饥寒冻馁大败极弊而不已。臣读《史记》,见周文王方其受命之时,地方不过百里,而四方君长交至于其国,其所以燕飨劳来之典不容终无,然而当时百姓各足,饥寒不病。故民诵之诗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盖庆之也。传至于其子孙,以八百国之财赋自养一人,宜其甚裕而无忧,而民反流离困苦,至于黄鸟此邦之咏作焉。臣于此见君人节己以利人则易为功,广费以厚敛则难为力。臣是以拳拳以省冗费为陛下告也。

陛下策臣曰:固本朕不类寡昧所致,上不能参调化机,下不能作兴治理,实忧而且愧焉。此乃陛下忧勤之言,禹汤罪己之辞也。然臣谓陛下非徒为是言也,须欲励是行也。夫君人之言与士庶不同,一或不征天下玩之,后虽有美意善政人且骇疑不信。陛下往年尝有恤农之诏矣,然而天下皆以为陛下之虚言。何者?诚见其言若是焉,而未见其惠也。今陛下复策臣若是焉,臣以为亦致忧勤之实而已。欲致忧勤之实,须速行臣之言。然臣前所陈者,皆因圣策所及条对。要之,所以振弊利世之道犹有未尽于此,臣请终之。夫

山泽之利未尽垦，则天下固有无田之忧。今夫京师以东，蔡邓齐鲁之间，古称富庶强国，三代财赋多出于此。汉唐以来名臣贤守，其所以兴田利而裨国用者，沟洫封浍之迹犹存，而今悉为空虚茅苇之地，此古人所谓地利犹有遗者。而陛下所使守此土者，一切苟且应职，而无能为任此忧者，此北人所以长坐仰给于东南，小有凶荒不继，辄转沟洫而不能自给以生者，地利未尽也。臣意陛下莫若严其守令，重选有力量才干忠诚为国之士，使守其地而专一以兴田利为事。朝廷宽其禁限，听其便宜，而惟以此为田利课，则海内当有赵过者出焉。不数十年之后，则江北之田，应与江南类。可省江淮数百万之财赋，而舒北人饥寒冻馁之急。一举而利二焉，大惠也。陛下能断而行之，大勇也。或曰非不欲行也，如东南异宜何？臣请有以检之。夫今日所谓空虚荒瘠无用之地者，非向时所谓富实而所托赖以兴起之本区乎？昔以富实，今以荒虚，臣诚未喻其说，亦曰存夫人尔。魏人许下之屯，可见矣。方枣祗为屯许之画也，当时亦诚见其落落难合。洎其成也，操终赖之，省粟数万。今天下之大，又安知其无能为枣祗者乎？臣是以愿陛下以此为田利课则山泽垦。臣又闻之，山泽不征，市梁无禁，王者所以通天下，大公大同之制也。自汉桑弘羊以剥刻之术媚上，而征榷之法如详，历代因之而不革，大公之制未闻也。然臣终以此为后世衰乱苟且之政。今朝廷之取民，茶有征，酒有榷，山泽有阻，鱼盐有课，自一草一木以上之利，莫不悉笼而归之公，其取下悉矣。夫上取下悉则其势穷，夫兽穷则逐，人穷则诈。今陛下之民将诈矣。司国议者非不知其势之不可以久也，然而明知其弊而冒之者，诚曰国家利权之所在也。臣以为利不胜义，义苟未安，利之何益，况又有不利者在乎？臣闻之，王者所以总制六合而正服民心张大国体者，固在道德之厚薄，不问财赋之有无。臣观征利之说，不出丰大之国，恒出于衰乱之世。纤纤然与民争利者，匹夫之事也。万乘而下行匹夫之事，则其

国辱，非丰大之时所尚也。陛下何不旷然为人所难，思大公之法，去衰乱之政，令天下之士争言曰：惜乎！汉唐宋不能舍匹夫之利以利人，至我明天子然后能以天子之大体镇服民心焉。陛下何苦于此焉不为也。臣愿陛下息山林关市之征焉，使大圣人所作为，过于人万万也。若夫悉推富民之术，则平籴之法不可不立也，常平之仓不可不设也，奢侈之禁不可不严也。凡若此者，史册之载可考。陛下可能举而行之，成典具在，故臣不必深论之也。

由臣前陈而言之，均田也，择吏也，去冗也，省费也。由臣后所陈而言之，辟土也，薄征也，通利也，禁奢也。田均而业厚，吏良而俗阜，冗去而蠹除，费省而用裕，土辟而地广，征薄而息宽，利通而财流，奢禁而富矣，八政立而制备矣。陛下果能行臣之言，又何忧于百姓之冻馁流离，又何至于有盗贼之警，又何患夫不顺夫道而归乎化哉！通变宜时之道，其或悉备于此。然臣以为此数者，皆不足为陛下之难。所患人主一心不能清虚寡欲，以为宽民养物之要，则虽有善政美令未暇及行。盖崇高富贵之地，固易为骄奢淫逸之所，是故明主重内治也。故古之贤王遐观远虑，居尊而虑其危，处富而惧其溢，履满而防其倾。诚以定志虑而节逸欲，固寅畏而禁敝邪也。故尧日兢，舜日业，禹日孜，汤日检。臣以为数圣人固得治心之要矣。臣尝读《汉书》，见汉武帝之为君，方其临轩策士奋志六经也，虽三代之英主不能过焉。洎其中年多欲，一念不能自胜，公孙弘、桑弘羊、张骞、卜式、文成五利之辈，各乘其隙而售之，卒使更变纷然，天下坐是大患。臣是以知人主一心，不可使有所嗜好形于外，少有沉溺，为祸必大。故愿陛下静虚恬虑以为清心节欲之本，毋以深居无事而好逸豫，毋以海宇平清而事远夷，毋以物力丰实而兴土木，毋以聪明英断而尚刑名，毋以财赋富盛而事奢侈，毋羡邪说而惑神仙。澄心正极，省虑虚涵。心澄则日明，虑省则日精。精明之运，旁烛无疆，举天下功业惟吾所建者，岂止以富民生足衣食

而已哉！

臣始以治弊治法为陛下告，终以虚心寡欲为陛下勉。盖非有惊世绝俗之论以警动陛下，然直意以为陛下之所以策臣者，盖欲闻剀切时病之说，故略敢尽其私忧。过计之辞，衷情所激，诚不知其言之犹有所惮，亦不知其言之犹有所隐。惟陛下宽其狂易，谅其朴直而一赐览之，天下幸甚。臣谨对。

评析

这是一篇较为切实的对策。全篇共分六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作者指出嘉靖皇帝临策殿试贡士已有数次，虽然都能使贡士们光扬名声，宠绥禄秩，但是却没有听说过这些贡士的得名获禄是因为他们的对策较切于实用的缘故。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自己并不清楚，但是，自己愿意把自己的文章写成："根极政要之说，明切时务之论"，而不想搞成"迂阔空虚之文"。所以，作者唯愿皇帝能把自己的对策"付之有司，责其可行"，并且说，如不能产生现实效用，作者甘愿"俯伏以待罪谴。"

在第二部分中，作者大胆地指出，当今皇帝虽有爱民之心，但却无使民丰衣足食的方法，虽看到了百姓冻饿遭难以至流离失所的情景，但却不知道百姓为什么会这样的根本原因。为什么作者会有这样的认识呢？作者进一步解释道：这主要是因为当今皇帝"惠民之言不绝于口，而利民之实惠至今犹未见"的现实使他有此认识。

在第三部分中，作者针对策问中的"夫民非耕则何以取食？弗蚕则何以资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忧者也"的问题进行了回

答。作者针锋相对地说，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不是人主所应担忧的。人君所应担忧的应是政治的问题。接着作者又进一步阐释道，当今的社会有两大弊端，一是游惰之弊；二是冗杂之弊。游惰之弊有两条，一是游民，二是异端。所谓游民问题，是起于豪强士绅的兼并，官府衙役的横征暴敛，致使百姓失去土地，只得散食于四方，而出现了“逐艺而食”的群体。所谓异端，是因为有些人为了“减额逃刑之利”，“不工不商，不农不士”以致走上异途，“秃首黄冠，充斥道路，珠宫玉宇，照耀云汉”，出现了大量的不劳而食的阶层。这些都会导致“力本者少，务农者稀”的恶果。冗杂之弊又有三条，一是冗员，即徒拿俸禄而不作具体事情的官员太多；二是冗兵，即老弱病残而仍寄食军籍者太多；三是冗费，即赏赐后宫外戚、奉祀神仙佛道、大兴土木的费用太多。如此的结果就只能进一步导致“横征极取”的加剧。

在第五部分中，作者照应第二部分的论点，认为只要皇帝尽心尽责，竭力谋画，必能“致忧勤之实”。对于怎样才能致忧勤之实的问题，作者又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第六部分是全文的收束部分。作者总结到，他在第三、第四部分要表明的施政思想是：“均田也，择吏也，去冗也，省费也”；他在第五部分要表明的施政思想是：“辟土也，薄征也，通利也，禁奢也。”并进一步阐释说：“田均而业厚，吏良而俗阜，冗去而蠹除，费省而用裕，土辟而地广，征薄而息宽，利通而财流，奢禁而富矣，八政立而制备矣。”

这篇对策在明代状元殿试的文章中属于较为优秀的。首先是他敢于指陈时弊，并能提出较为切实可行的策略来，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其次是他为文力戒浮文虚辞，追求务实的文风。再次是他的对策结构严谨，逐条展开，论说周详严密。且注意前后的照应，注意逻辑关系。在极短的时间内，既能言之有物，而又能精构细

雕，撰成佳文，实属不易。

（苗菁）

嘉靖十七年(1538)戊戌科

状元:茅瓒

茅瓒,生卒年不详,字邦献,号见沧,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时聪敏过人,喜读书。考取秀才后,乡试屡试不中,但仍苦学不辍,老不稍移,嘉靖十六年乡试得中。十七年殿试第一,例授翰林院修撰。此后历官南京国子监祭酒、南京吏部右侍郎。因居官廉勤,北上供职内庭,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三十六年加太子宾客、兼学士衔。权臣严嵩当国,吏治崩坏,茅瓒萌生退意,上疏要求致仕。获允终老于家。有《见沧文集》。

策问

制曰:朕闻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

之道，曰仁与义。三才之道一而已，何又有去义为论乎？于是未免贤者自相私反，必如圣经而后可。且今人尤大非贤者，及人君才一用义，即谓严刻。乃作言曰：上任刑以为治，非三代之治也。却一不之反于己。三代之人皆人也，不待义临而自持，惟恐放侈。今之人果三代之同欤？将欲利之是贪，欲之是纵，国而罔思，民而罔恤，以至于上下礼度悉不之慎。为之君人者，可不一教一治之，是非当否？抑果当乎？朕祇承天位，惟民是保。何官人者比比皆负国虐民之图，奚为用哉？尔多士师孔子之学，必心孔子之心。将此心之平正，陈为篇列，以除弊革私之道，衍为仁育义断之方以告我。勿讳勿欺，朕览之。

对策

臣对 臣闻帝王之御临天下也，内必有敬天之心，而外必有宪天之政。夫天者，理之原也。人君代天理物，故其所行必求端于天。天之道虽广博而难终穷，神妙而不可测，而其端不过有二：曰阴与阳而已矣。阳居春夏以长育为事，有刚道焉。王者继天而为之子则用仁，而凡为慈爱，为谦屈，无非仁之统体矣。阴居秋冬以肃杀为事，有柔道焉。王者继天而为之子则用义，而凡为果断，为裁制，无非义之散殊矣。故天道运而无所积，帝德运而无所私。以此存之于中，是谓敬天纯王之心也。以此发之于事，是谓宪天纯王之政也。合心与政皆纯乎天，夫是之谓格天之治。而尧舜禹汤文武由此其选也，奚独三代之治为然乎？

钦惟皇帝陛下，禀刚健中正之资，备文武圣神之德，自即位以来，信赏必罚，威行如雷霆。发奸摘伏，明照如日月。对时茂育，容

保如天地。盖粹乎斯道之中,而建维皇之极者也。臣也窃伏草茅,遥被治化久矣。乃者叨有司之荐,得以与于大廷之对,而清问及焉。永惟圣经之言,而有取于仁义并行之道。既而有慨于庶官之庞,而欲以兼夫治教之法,且冀臣等以除弊革私之道,为仁育义断之方,而戒之以勿讳勿欺也。顾臣之愚陋,何足以仰裨休德之万一乎?虽然,有所言而不实是之谓欺,则上负陛下矣,有所言而不尽是之谓讳,则下负所学矣。上负天子,下负所学,畴昔之所自许者谓何,朝廷之作养者谓何,而可如此也?臣敢不披沥衷悃,就陛下之所问及者而条陈之,陛下试垂听焉。

臣惟天下之道,有经有权。经也者,一定而不可易者也。权也者,或相兼以适其宜,或相济以补其所不及者也。人君抚舆图之广,临兆民之众,天下之所恃以立命者也。苟一于义则威之太震,民畏之而不敢亲。一于仁则惠之太亵,民狎之而不知敬。是仁之与义,犹天之有阴阳而不容以或偏也。臣故曰:道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然德教以象天之生育,仁矣,而义者未尝不防之于中。刑戮以象天之震撼,义矣,而仁者未始不贯乎其内。是仁义之交相为用,犹阴阳之互为其根。臣故曰:道之相兼以适其宜也。然天下之势有强弱,而人君之政有德与刑。乘弱之后者利用威,而乘强之后者利用惠,此其斟酌操纵之间,犹之天道之雨以润,而日以晅,雷以动,而风以散,既成万物,而人莫窥其神。臣故曰:道之相济以补其所不及者也。是故仁义之为道也,一定而不可易者,以立天下之经。或相兼以适其宜,相济以补其所不及者,以达天下之变。稽之于圣经,验之于往古,何莫不然。彼其去义以为论专任德而不用刑者,何其失之偏乎?

臣伏读圣制之篇,而有以辨人言之为妄矣。人之言曰:人君才一用义,即谓之严刻任刑,非三代之治。臣愚以为,用义之与严刻任刑不同也。既曰用义,则不可谓之严刻任刑。曰严刻任刑,则不

得谓之用义。人君之于天下何容心哉？视其理之所宜而已矣。苟于义所当用，则虽杀人而不可谓之严，虽致人于死而不得谓之刻，盖以义之为道当如是也。至谓用义非三代之治，此尤非所谓知理者。臣不暇远引泛取，即以三代之事明之。禹之承舜也，先罚后赏以示威。汤之革夏也，申代誓众以张武。而文武之继殷也，驱除元恶，歼灭暴国以救民。故夏有禹刑，商有汤刑，周有甫刑。三代之得天下虽曰以仁，而未尝专倚于仁，有义以济其仁之所不及也。后世事不师古，遂以为三代之治，纯用德而不用刑，何失之远欤？是故不朝者赐之几杖，受赂者馈之金钱，言宽仁者莫如汉之文帝矣，然姑息成风，乾纲罔断，故不再传，而有指大如股、胫大如腰之患。刑以不杀为威，财以不蓄为富，言仁厚者亦莫如宋之仁宗矣。然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故不再传，而有流言道路，变令推恩之讥。夫二君则汉宋之良也，一于仁而不义，而其弊犹不免有如此者。若是而谓三代之专于任德，后世之专于任刑，可乎？不可乎！由是观之，三代之所以治隆俗美者，以其仁义之并用，内有敬天之心，而外有宪天之政也。后世之所以不古若者，以其仁义之或偏，而不能审时以度势。其于天也，或亵焉而不知敬，或悖焉而不知法也。

我太祖高皇帝承元人积弊之后，故其所以创制立法者，大率以严为本。及天下已定，又戒圣子神孙，不得复用国初之典。是其仁义之并行，刚柔之相济，其所以察乎天人之际，审乎消息之宜，而为万世虑者深矣。但国家承平日久，重熙累洽，民志日趋于玩愒，事体日废于因循。盖自正德以来，兹弊极矣。肆陛下入继大统，始振起而一新之。故自临驭十有七年以来，革者故，鼎者新，蛰者奋，困者苏，天下欣欣，咸睹太平于有象矣。而陛下犹有歉于官人者负国虐民，若追羡于三代之英，而未之逮者。臣愚以为，虽尧舜在上，不能无小人，此在君人者驭之得其道耳。驭之之道，臣前所谓仁义之

并用者是也。盖尝闻之，法禁之不行，自上犯之也。而小民之所以敢为非义者，庶官之贪顽者启之也。今天下之大，其在于朝廷辇毂，岂无有秉义竭忠之臣，然而违上所好，朋家作仇者未尽无也。其在于百工庶府，岂无有亮采惠畴之臣，然而胁权相灭，诬上行私者未尽无也。其在于都邑藩省，岂无有旬宣和惠之臣，然而违道干誉，尸禄养望者未尽无也。甚者削民之膏脂以肥其家，窃君之荣宠以张其势，掠众之美以示其恩，恣己之私以败其度者，未尽无也。陛下尊礼大臣，愈久益亲，体悉群臣，有隆弗替。其于股肱之良，而谟明弼谐者，固尝抚之以恩，而动之以礼矣。而于此不悛之徒，明罚敕法，惩一以警其百，是犹春阳之后，而震之以雷雨之威。天下方将感陛下之仁，而畏陛下之法，奚为而一驭臣为然也。不可行乎？虽然，处今之时势，而义之所当用者，非独夷狄跳梁，而横于西北，则薄伐之师，不可以不整也。庶民僭越，而似于王章，则奢汰之禁，不可以不严也。军旅疲弊，而阙于勇敢，则简阅之令，不可以不怒也。凡若此者，要皆以精明之治，而敦夫浑厚之体，以立君道之纪纲，以跻中兴之盛业，道莫有先于此者矣。抑臣又闻之：仁育而义，王者之政也。所以主是政者，心也。故必有纯王之心，斯有纯王之政。而宪天下之政，谓非有敬天之心不可也。臣尝庄诵陛下敬一之箴，而有以知陛下之心，直可以质诸天地而无疑也。有德弗降，是违天之所喜矣，敢不敬欤？有恶弗惩，是渝天之所怒矣，敢不敬欤？以此常存于心，兢兢业业，罔敢失坠，夫然后以达于政也。仁足以育天下，而天下莫不归于仁，义足以正天下，而天下莫不疆于义。宪天之政，由是而会其全。格天之功，至是以要其极矣。虽然，敬亦未易言也，隐征之间，真妄错杂，毫厘之差，千里之缪。苟辨察之功不悉于几微，持守之力不继于厥服，则人得以胜天，欲得以夺理，又恶知其为仁而在所当体、恶知其为义而在所当用也哉！故曰：勿叁以三，勿贰以二，行顾其言，终如其始，静虚无欲，日新不

已。然则陛下之言，固可谓能自得师者矣。除弊革私之道，仁育义断之方，岂外此而他求乎哉！

臣始以仁义并行之道为陛下告，终以主敬协一之功为陛下勉。初非有惊世可喜之论，然直意陛下以言求士，而臣之所以献言于陛下者，惟以明诸其心。上不敢负明问，下不敢负所学而已。惟陛下矜其愚，不录其罪，而留神秉纳焉，臣不胜拳拳陨越之至。臣谨对。

评析

这篇对策可分为两大部分。自文章的开篇到第四自然段是第一大部分，从第五自然段到文章的结束是第二大部分。前者是驳，后者是立。

驳是驳的人臣之言，所以毫无顾忌，畅所欲言，以三皇五帝为正面例证，以汉宋三帝为反面例证，正说反说，充分翔实。最后在驳中立论，树立起自己的论点："由是观之，三代之所以治隆俗美者，以其仁义之并用，内有敬天之心，而外有宪天之政也。后世之所以不古若者，以其仁义或偏，而不能审时以度势。其于天也，或亵焉而不知敬，或悖焉而不知法也"。总之，无论古今，治世当"仁义并用"。这种结论既是水到渠成的从论证过程中流出，又结合了当今皇帝的观点，就显得既不牵强又很得体。

立是立当今朝政，所以就略有收敛，婉转含蓄。在这部分中，又可分两小部分，所用手段是先扬后抑，先褒后讽。第五自然段是扬与褒，美誉之词充溢文中。第六自然段是抑与讽，这部分虽对朝政略有评议，但却是谦恭委婉的，像"臣愚以为"，"抑臣又闻之"这样的恭敬用语出现了好几次，而又连连用"岂无有……未尽无也"

和“不可以不……”这样的句式，就使文章既对朝政有所建议和树立，又能显示出一种摇曳多姿的风韵。

这篇对策前后两大部分风格是不一样的，大略说来，前直率后婉转，前顺畅后徐缓，这在阅读中便能体会到。

（苗菁）

嘉靖二十三年(1544)甲辰科

状元:秦鸣雷

秦鸣雷(1518～1593)字子豫,号华峰,浙江临海人。嘉靖二十三年中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后历经升迁,四十二年官礼部侍郎。勤于政事,有所举措,皆得其宜。有《倚云楼遗集》一卷,《补遗》一卷传世。

策问

制曰:朕惟文武二道并用,而不可缺与偏者也。《传》曰:张皇六师。又曰:其克诘尔戎兵。此非好于用兵邪?朕皇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始思欲偃武修文,以德化天下。至于列圣相承,懋修文德,海宇乂安,国家无事。朕以支末上承天命,入缵宝位,兹越二旬载矣。夫何连岁以来北虏寇疆,入我中国,若蹈无人

之境，残我天民，前所未有？本之以朕罔德基之立于中，是以教化莫克行于外者也。然朕又闻之曰：帝王之政守在四夷。今朕欲求长治久安之术，无出于守之一端。欲得其守之之道，当何施用以尽其长且久焉？尔多士抱经世之略，亦有日矣，宜各著于篇，朕将采而行之。毋忌毋隐。

对策

臣对 臣闻帝王保大业于无疆者，有经国之规模，有植国之根本。规模之经也存乎法，根本之植也存乎仁。是故崇文诘武，经制豫定，使夫法之行于天下者，整饬而不可紊，夫是之谓规模。修德行仁，膏泽下究，使夫仁之洽于人心者，固结而不可解，夫是之谓根本。经制定则国威立，德泽究则国脉固。由是万姓胥悦于域中，声教四讫于海外，大业之保，盖卓乎其不可拔矣。自古帝王享国长久之道，生物为心而理物之责，不能不望于君。君之茂膺天眷也，非徒肆于民上，实以君师之道存乎我，而代之理也。则凡斯民之安危利病，世道之否泰盛衰，凡可以克尽其道，而奠天下于文熙武谧之域者，自有不容于不讲矣。今夫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帝王也者，又所以法天而图治者也。是故帝王以仁育天下，非文无以昭休明之治。故凡崇奖儒彦，怀保黔黎，与夫体国经野，明物章轨，以成经纬之德者，皆文之属也。帝王以义正天下，非武无以示挞伐之威。故凡选择将帅，振励卒徒，与夫诛暴禁乱，饬法严备，以成安定之功者，皆武之属也。文以敷德，则海宇奠而顺治；武以示威，则疆圉静而外威严。此诚有国家者不容以偏废者也。使有武而无文以济之，则义胜而流于刚，其何以敦

浑厚之治体！有文而无武以济之，则仁胜而流于儒，又何以立精明之治功也哉！乃若召公之告康王曰：张皇六师。周公之告成王曰：其克诘尔戎兵。此其为言若有所偏者。而不知乱者保其治者也，危者保其安者也。是扬武者乃所以䙘文，初非好于用兵也。一或讲之无素，备之弗豫，则所以为防者必疏，而其为累也亦必不小，是诚不容以或后者也。

臣闻中国之有夷狄，犹阳之有阴，昼之有夜，君子之有小人，不能以必去焉者也。是故先王建国，列之侯封、采服之外，所以峻其防焉。号令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所以别其类焉。刑以惩叛，礼以怀来，所以服其心焉。奈之何狼子野心，非我族类。重以消长之势无常，强弱之机莫测：值其弱则稽颡而称臣，当其强则犯顺而干纪，盖自古则然矣。故有化足以成风动，而不免于有苗之征。德足以臻时乂，而不免于鬼方之伐。治足以致中兴，而不免于玁狁之孔炽。是又奚足为盛世之累哉！故曰：帝王不患有夷狄之强，而患吾无御之之具。不贵有御夷之具，而贵吾无以致夷之窥而已矣。强本以治内，严兵以固圉，来则必治，去则不追。务使各安其所，而不敢干吾治者，兹非计之良乎？

三代以降，治道则寝矣。夫嬴秦命将出师，筑塞以御强狄，縻费巨万，夷患未袪，而国衅已不可救矣，是谓虚内以事外。汉武以雄才大略之资，为穷追远讨之举，登南台于塞北，绝王庭于幕南，夷氛虽息，而民生已不胜困矣。是谓计末而忘本，其皆策之最下者也。他如唐称臣于突厥，既病贻谋之不臧。宋迫辱于辽金，复患修攘之坐失。是又几于无策矣，安得而不沦胥以致兹极乎？

天启皇明，我圣祖高皇帝以天纵之圣，奋起淮甸，迅扫腥膻，驱之北归，绝其南寇，建自古所未有之事功，复帝王所自立之中国。神谟勇略，固尝以武功定天下矣。至于即位之始，干戈甫息，乃欲偃武修文以德化天下者，其故何哉？夫亦以天下初定，扶伤持危，

与天下休息，道盖莫先于此，非固果于忘战耳也。观其思患预防，□□谆切，所以奠不拔之基，以□则后昆□□□远也。肆我成祖，六飞三驾，再昭挞伐之威。爰及列圣，养威峻防，不忘制驭之策，其所以绵国祚之永，而恪遵成宪者，又何明备也。仰惟皇上蕴神明之德，际中兴之期，武以止戈为威，兵以全国为上。疆场之患，扑之于方萌；隐微之祸，消之于未著。南夷系颈，北虏贡琛，唐虞三代之盛，何以加此。圣祖神孙，后先相望，盛德大业，笃祜无疆，国家长治久安之术，尚何以他求为哉！

虽然，帝王望治之心无穷，人臣爱君之心无已，故古称大舜之知，必曰好问好察。彼贾谊当文帝之世，犹有取于厝火积薪之喻焉。则臣虽至愚，所以仰称德意而自靖厥忠者，可终默焉而已乎？臣请得而筹之，夫王者以京师为宫室，以诸夏为庭户，以四夷为藩篱，其内外远近之分，先后缓急之序，盖不待较而知也。粤自先王寓兵于农之意既坏，而后世制驭之道，不容不分。要之厚民所以足兵，恤兵所以卫民，实相资而非相病也。然则端本自治之道，夫亦于二者而加之意乎？以今日之民言之，安其田里，施之教化。殿最书于台臣，而守牧有考，利病关于藩臬，而兴革以时。以至水旱凶灾之必闻，赈贷蠲免之屡下，是陛下所以厚民者无不尽也。以今日之兵言之，岁给之衣，月给之粮，额籍总于司马，而逃亡可稽。节钺授于制帅，而上下有统。以至团练教习之有方，赏罚鼓舞之无倦，是陛下所以恤兵者无遗策也。夫民安而本益以固，兵精而气益以振，是宜势益以昌，威益以远，文熙而武益以谧也。然而北虏之窥伺犹昨，边境之烽火绎闻，顷者入我中国，若蹈无人之境，诚有如圣谕所及者。此其故何也？臣愚以为圣心之忧民至矣，而所以宣力于下者，或非其良。圣政之养兵善矣，而所以分阃于外者，或非其选。□□□□□□□为能，而不分心于厚下，以期会簿书为急，而不加志于推恩。甚者锐意催科，虚张敛散之能，自封厚植，肆行渔

猎之计。夫守令之职，最为近民，使天下果若人焉，又安能保斯民之皆得其所乎？以纨绔而滥韬钤之寄，方略有所未闻。虐士卒以张威福之权，抚绥有所未备。甚者功图速化，驰捷报之虚声，志切自肥，仍债帅之故辙。夫三军之命，悬于一人，使将帅而咸若是焉，又安能保边兵之皆乐于用乎？夫民心不固，而示敌以守，是投之以可乘之隙，守之未见其固也。士气未张，而应敌以战，是先 之以可败之道，战之未见其利也。然则长治久安之术，抑何以他求为哉？亦惟重守令之任，而选之也必精，使郡县之布列，皆龚黄卓鲁其人焉。于是严黜陟之典，申久任之规，劳心抚字，必增秩以示荣。奉职无闻，必夺爵以示辱。塞奔竞侥幸之门，斥阘茸贪墨之吏。如是则民安，而无复失所之叹矣。重将帅之任，而简之也必慎，使阃外之分据，皆颇牧韩范其人焉。于是专委任之托，昭劝惩之典，有功必赏，宽之以岁月之余。有罪必诛，略之以文法之细。无以一人之誉而尚其贤，无以盈箧之谤而挠其志，如是则兵精而咸起报效之思矣。由是而昭武勇以示威，修战备以利用，谨关隘以辩奸，远间谍以防诈，严吾之守以俟敌之战，将见投之无衅，觇之无隙，虏知吾之有守矣。以静制动，以逸待劳，尚何夷患之足忧耶！否则玩寇轻敌其祸大，邀功生事其计危，皆非臣之所敢知也。

虽然，御夷之道，固在于治内，而治内之要，莫切于治心。故心存于正，则事无不正，而天下蒙其福；心蔽于邪，则事无不邪，而天下与其忧。陛下绍心学之传，发道统之秘，敬一有箴，四箴有注，所以预养此心者，固已能自得师矣，臣恒虑操持之甚难，察识之不易耳。夫人主深居九重，攻之者众，倘于防微杜渐之戒，省察克治之功，一未至焉，臣恐虚明静一之体，有不能复如其初矣。臣愿陛下戒之慎之，明通公溥以植其本，静虚动直以培其基，戒谨于不睹不闻之时，察识于内外宾主之辩。亲贤远佞，俾一暴弗替于十寒。慎终如始，使九仞罔亏于一篑。淫哇之声，奇巧之色，则曰：吾心之贼

也。便嬖之言,侧媚之态,则曰:吾心之蠹也。土木游田之娱,宫室侈靡之奉,则曰:吾心之所以丧失而不自觉者也。兢兢如尧,业业如舜,孜孜如禹,栗栗如汤,亦保亦临如文,不泄不忘如武,则心存而德可修,德修而道可立,道立而政可举。由是显设于朝廷,而庶事康矣;颁布于四海,而万民乐矣;洋溢于蛮陌,而四夷慕矣。天地位,万物育,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此非臣之臆说也。伯益之戒舜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汉儒董仲舒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而宋儒朱熹亦谓:其本不在威强,而在德业。其任不在边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纪纲。此端本之道,古今一致,而实臣愚之所□□今日者也。惟陛下不弃刍荛,留神省览,见之施行,则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干冒天威,战栗无地,不胜拳拳仰望之至。臣谨对。

评析

殿试策问是没有一定之规的,有的连发数问,题目分散;有的只有一问,问题集中。有的关涉时政,配合当前,针对性极强;有的远连性理,追溯上古,较为空泛。在这样的情况下,举子们当然不能只通四书五经,有时也要关心、熟谙现实政治。如此,才能临场不惧,应付自如。

秦鸣雷是对当时的政治状况有清醒认识的一个人。

在明朝,北地的最大边患是过着游牧生活的蒙古部落的不断侵扰,这些蒙古部落最强大的当属鞑靼部和瓦剌部。英宗正统时,过着半牧半猎生活的较落后的瓦剌部,势力日益强大。瓦剌部长脱欢和他的儿子也先一度统一了蒙古,不断率兵南下搔扰,遂有

"土木之役"。正统以后鞑靼又相继兴起。景泰、天顺时的孛来、毛里孩、阿罗出,弘治、正德时的达延汗,嘉靖初年的俺达汗,都经常率兵侵入明边,"散掠内地"。就嘉靖年间来说,从元年到二十三年这段时间,几乎每年都有大规模的鞑靼部落入侵,在宣、大、延、绥等地,到处抢掠物资,杀掳居民,严重破坏了北方的生产。

蒙古部落的侵扰,成为嘉靖皇帝的心头之患。

但这时的嘉靖皇帝既无力对付蒙古部落的侵扰,又内政不修。他崇信道教,祈求长寿成仙之术。先后重用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人,在宫中广建道观与醮坛,耗资巨大,劳民伤财。且又淫欲过度,欺凌宫女,至使宫女杨金英等人忍无可忍,奋起谋杀嘉靖,史称"壬寅宫变"。谋杀虽没有成功,但至此嘉靖皇帝更加不理朝政,他宣称自己是尘世外的人,郊庙不亲,朝讲尽废,专心奉玄修道,不与任何妃子和宫女见面,也不跟大臣见面,从此朝政更趋荒废。从二十一年(1542)起,他又逐渐宠赏严嵩,导致严嵩专政几达20年,政治也就越来越黑暗。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秦鸣雷强调要外讲"御夷之道",内讲"治内之要"。他认为"御夷之道"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治内",使政治清明、民用充裕、国力强盛。而"治内"的根本又在于"治心"。所谓"治心",也就是要求嘉靖皇帝克制私欲、克勤克俭、努力国事,用秦鸣雷对策中的话说,也就是要"明通公溥以植其本,静虚动直以培其基,戒谨于不睹不闻之时,察识于内外宾主之辨。亲贤远佞,俾一暴弗替于十寒。慎终如初,使九仞罔亏于一篑。淫哇之声,奇巧之色,则曰:吾心之贼也。便嬖之言,侧媚之态,则曰:吾心之蠹也。土木游田之娱,宫室侈靡之奉,则曰:吾心之所以丧失而不自觉者也。"如此,才能"心存而德可修,德修而道可立,道立而政可举。由是显设于朝廷,而庶事康矣。颁布于四海,而万民乐矣。洋溢于蛮陌而四夷慕矣。"

秦鸣雷的这番议论确实切中时弊。

（苗菁）

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科

状元:李春芳

李春芳(1510～1584)字子实,扬州兴化(今属江苏)人。嘉靖二十六年殿试一甲一名。例授翰林院修撰,因擅长于青词,被擢升为翰林学士,累迁礼部尚书。时宗室藩衍,岁禄猛增,他援引旧例,成《宗藩条例》,诸吉凶大礼及岁时给赐,皆有严格的规定。四十四年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及代徐阶为首辅,为政力求安静。后进吏部尚书,改中极殿大学士,为高拱所不悦,乃辞官。有《贻安堂集》。

策问

制曰:朕惟人君受天之命而主天下,任君师治教之责,惟聪明

睿智，足以有临。自古迄今百王相承，继天立极，经世牧人，功德为大，是故道统属之有不得而辞焉者。唐韩愈氏乃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传，至孟轲而止。孟子则以尧、舜、禹、汤、文王之为君，皋陶、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之为臣，各有闻知见知之殊。其详略同异，果何义欤？其授受之微，有可指欤？宋儒谓周敦颐、程颢兄弟、朱熹四子，为得孔孟不传之绪而直接。夫自古帝王若是班欤？其讲之统道果求著述之功，果可与行道者并欤？抑门人尊尚师说递相称谓，而忘其僭欤？汉唐宋而下，虽不能比隆唐虞三代之盛，其间英君谊辟，抚世宰物，德泽加于四海，功烈著诸天地者，不可概少，果尽不可以当大君道统之传欤？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体尧舜授受之要，而允执厥中；论人心虚灵之机，而操存弗二。我成祖文皇帝言：帝王之治一本于道。又言六经之道明，则天地圣人之心可见，至治之功可成。斯言也，真有以上继皇王道统之正，下开万世太平之基。迨我列圣克笃前业，所以开天常叙人纪者，历百八十余年于兹。朕缵绍祖宗鸿绪，登践宝阼，惟敬惟一，叙彝伦，惇典礼，祈天命，拯民穷，思弘化理，以成参赞继立之功者，宵旰孳孳，不遑宁处。兹欲远绍二帝三王大道之统，近法我祖宗列圣心学之传，舍是又何所致力而可？夫自尧、舜、禹、文之后，孔孟以来，上下千数百年间，道统之传归诸臣下，又尽出于宋儒一时之论。此朕所深疑也。子大夫学先王之道，审于名实之归，宜悉心以对。毋隐毋泛，朕将注览焉。

对策

臣对 臣闻帝王之治本于道，道立而后化以之弘；帝王之道本于心，心纯而后道以之会。心也者，统夫道者也。心有弗纯，则存诸中者，无贞纯精一之懿，其于道也为小成；道也者，弘夫治者也。道有弗粹，则发诸外者，无正大光明之业，其于治也为小康。小成不足以语天道，小康不足以语王道。斯岂帝王之所以继天立极者哉？故本之心也，浑乎天理，而有以裕内圣之基。而后敷之治也，若夫天道，而有以熙外王之业。天德王道，其极一也，然其本则系之学焉而已矣。学以纯心，心以会道，道以出治，治以格天。其在当时也，则帝王之治法以立。其在万世也，则帝王之心法以传。斯其道统之所由肇乎？循之而治，唐虞三代是也；得其似而理，汉唐宋是也。至矣，乌可以与帝王并欤？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体天弘道，因心出治，以上继皇王道统之正，下开万世太平之基。而我陛下则又神圣从于天，光明缉乎学。而治之所溥，四达不悖，薰蒸透彻，融液遍二帝三王，道统之传，远绍而无间。二祖列圣心学之邃，近述而弥光，粹乎无以尚矣。乃犹于万机之暇，进臣等于廷，俯赐清问，且曰：宵旰孳孳，不遑宁处。臣有以仰窥陛下望道矣。臣草茅疵贱，何所知识，可以仰裨圣学之万一。虽然，涵濡圣化，盖亦有年，其于我未见之心祖宗治道之盛，及我陛下心学之精，亦尝佩服，涵沐有以少窥其涯涘矣，敢不敬陈以对扬休命乎？

臣尝闻之：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判，道在圣人。是圣人者，道之宗也。又尝闻诸书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

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是元后者，人之主也。然则道在天下，安得不属之圣人，又安得不属之大君也哉？是故三代而上，位称其德，达而在上者，莫匪圣神，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请因圣问而条陈之。唐虞以往，书契未立，邈哉无以稽矣。故韩愈孟轲之所称，率自尧舜而始。愈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孔子。是立功立言虽异，以言乎道统则均也。轲谓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是见知、闻知虽殊，以言乎道统，则一也。然观孔子有志三代之英，而自伤其未逮。伊尹乐尧舜之道于畎亩，而必以吾身亲见为幸。则托之空言者，岂若见之行事哉！此二帝三王之道，所以为独盛，而道统之传，非帝王莫之能当。何也？夫所谓道者，非徒以其蕴之心也，以其本之心而宣之化也。是故以之经天，则阴阳宣节，天道其清乎？以之纬地，则山川静翕，地道其宁乎？以之总民物之纪，是百姓太和，万类咸若，民物其熙乎？道猷章而道妙流焉，实政乂而实心昭焉。体用一源者也，微帝王其孰能与于此哉？然求其要，则心焉尽之矣；究其功，则学焉尽之矣。何也？非道无以弘天下之治，非心无以会天下之道。而学也者，所以纯心以体道，凝道以出治者也。大哉，学乎！斯固帝王所不可忽者乎？是故格于上下，尧之道盛矣。然求其所以为学者，则曰钦明允恭；其所以事其心者，何如其至也。重华协帝，舜之道盛矣。然求其所以为学者，则曰浚哲温恭，其所以事其心者，何如其至也。三代有道之长，禹、汤、文、武之道亦云盛矣。然求其所以为学者，则曰勤俭，曰执中，曰缉熙执竞；其所以事其心者，何如其至也？则夫治之所成，黎民于变也，四方风动也，文命诞敷也，万邦惟怀也，燕及皇天，会朝清明也。唐

虞三代之化，巍乎其不可及者，谓不本于此哉！德至此而后谓之天德，道至此而后谓之王道。若夫皋陶、伊尹诸臣赞翊之功，固不可泯。而其宅中图大，以恢弘化理，建中建极，以丕昭道猷者，则岂诸臣所得而专之哉！故《易》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此之谓也。

三代而降，享国长久者，莫如汉唐宋。其间英君谊辟，抚世宰物，德泽加于四海，功烈著诸天地者，亦不可少，诚有如对制所云者。是故汉之除秦苛也，深德吊民之理，以至七制嗣兴，风俗淳美矣。唐之靖隋乱也，汛收底定之功，以至三宗迭出，海宇乂安矣。宋振五季之衰也，爱养民力，出生灵于涂炭之苦，而好文守成之主，又绳绳相继焉，不可谓其尽畔于道也。向使尽畔于道，则不足以总一四海，整齐万民矣。又安能历数百年而巍然民上，以握神器乎？后之尚论犹不能无憾焉者，以其学之未纯焉耳。学苟未纯，则蕴之心者，不足以语帝王精一之传；敷之治者，不足以语雍熙太和之盛。斯岂天德王道之极哉！夫惟道化衰于上，而后讲学倡于下，此宋之四子所由兴也。以周敦颐言之，学以主静为宗，以一为要，而究其极于明通公溥，不由师传默契道体者也。以程颢兄弟言之，涵养则曰用敬，进学则曰致知，而又欲以太公顺应，学天地之常，宽和严毅，殊途同归者也。以朱熹言之，以讲学为入门，以践履为实地，博极群书而会通于心，集诸儒之大成者也。此四子之学之大较也。是其学固亦远，宗乎周孔，而授之以政，是亦伊傅之俦耳。夫即为伊傅也，犹不可与帝王并，况无伊傅之业乎？何也？道在天下，惟帝王为能行。故道统在天下，惟帝王为能传，而臣之贤者能者，则效用仰成于下者也。辄欲接续帝王道统之传，不亦僭乎？故四子者，谓之有功于斯道，可也。以之直接帝王之道统，不可也。何也？不观之天乎，方万物之生也，日以暄之，雨以润之，风以鼓之，雷以动之。夫天穆然深尔，确然静尔，然颂生物之功者，必举而归之于

天，而日雨风雷，不得而有其功。何也？太和之充，盖天实司之，而日雨风雷，不可与天道并，则知臣不可与君道并矣。知臣不可与君道并，则知四子者，不可与帝王并矣。而后之推尊者若黄干，则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而直以周子继孔、孟不传之绪。二程得统于周子先师，朱子得统于二程，而撮其要旨于居敬穷理致知克己四者，而谓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于此。至于真德秀则曰：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复明。周子之道，至二程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吴澄则曰：周子始有以接孟子之传于千载之下，二程则师于周子，而传其学，后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统之传者也。夫德秀以为道至周、程、朱子而大明，则诚有之。若黄干，吴澄，遂以四子为直接皇王道统之传于千载之下，递相称述，其论蔓衍波流，直至于今，学者尊之而莫敢违，信之而莫或疑，抑孰知其失之过乎？故四子讲明著述之功，不可谓其无裨于道。而直以为远续道统之传，与帝王并论焉，是诚门人推尊之过，恐亦非四子之心也。

是故由唐虞而三代，由三代而汉唐宋，其帝王道统之传，端不可诬。若秦之于汉，六朝之于唐，五代之于宋，则皆帝王之驱除，乌足以与斯道哉！至于胡元，则又我国朝之驱除，若汉之秦，唐之六朝，宋之五代也。道统之在天下，不其沦胥以没乎？幸而皇天厌乱，我太祖高皇帝挺生淮甸，廓清海宇。我成祖文皇帝笃生于后，丕绍鸿休，其治化之隆，真有以远追唐虞三代之盛，而超轶汉唐宋之上矣。然其所以致治者，则莫非本于道。其所以体道者，则莫非本于心。其所以存心以体道，体道以出治者，则又孰非学以基之也哉！圣制所谓：太祖高皇帝体尧舜授受之要，而允执厥中，论人心虚灵之机，而操存勿二。我成祖文皇帝言帝王之治，一本于道，又言六经之道明，则天地之心可见，至治之功可成。帝王相传之要，端在是也。然臣尝求我二祖圣学之精，则《存心》一录，与夫《圣学》

《心法》，尤其至要者欤。《存心》录凡历代帝王祭祀，有感于灾祥者，备载以垂训，而于敬天之怒，无敢戏豫者，尤致意焉。《圣学》、《心法》凡有关于君臣父子之道者，详述以迪后，而于敬天法祖，用人理财者，尤申重焉。则我二祖之所以为学者，具见于二书。而精纯贞一，心即二帝三五之心；太和咸熙，治即二帝三王之治。天德王道，巍然焕然，又奚惑哉！此列圣之所以克笃前业，开天常、叙人纪，历百八十余年，而皇图巩固者，信皆有得于是也。恭惟陛下以聪明圣智之资，懋精一执中之学。心之所裕者，与天地合其德。治之所成者，与皇王匹其休。肆今大化流衍，百姓太和，德浃于中夏，威行于蛮貊，至治馨香，达于上下，而休征毕集，于古所未有也。臣何幸躬逢其盛哉！臣尝窃窥陛下之所以臻此者，信本于学。而学之精实典要，则又莫过于敬一之《一箴》，而彝伦之叙，典礼之敦，所由出也。臣请得而扬言之。其曰人有此心，万理咸备，体而行之，惟德是据，盖言道本于心也。其曰匪一弗纯，匪敬弗聚，畏天勤民，弗遑宁处，盖言学以体道也。其曰敬怠纯驳，应验顿殊，征诸天人，如鼓答桴，盖言治以征学也。其曰郊则恭诚，庙严孝趋，肃于明廷，慎于间居，友躬以实践也。其曰天亲民怀，永延厥庆，光前垂后，绵衍蕃盛，考祥以视履也。语其目则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究其旨则合之，尽其大而无余。斯其学即二帝三王之学，心即二帝三王之心。而二祖列圣之传，远以跻乎唐虞三代之盛。夫固体信而达顺，合一而不测者也。存之为天德而日新之，盛德以裕达之，为王道而富有之，大业以昌帝王之道统，谓不在兹乎？臣欲拟议其盛，而且未易以名言矣，复何所称述以为圣学之裨乎？然臣闻之，《书》曰：慎厥终，惟其始。《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我陛下之自箴也，亦曰终如其始，又曰日新不已。故学必缉熙而后底于纯，治必永贞而后底于化，陛下之学亦既纯矣，天下之化亦既洽矣。然端拱穆清之上，一日二日事

有万几，有一之弗得，其宜非纯也。此敕天之命，惟几惟康，尧舜所为兢兢也。四海九州之远，刚柔异性，轻重异宜，有一之弗得，其所非洽也。此一夫不获时予之辜，舜所为拳拳也。学之纯者不使其或间，化之洽者不使其或漓，夫然后常敬常一，而道久化成。其在兹矣，非我陛下所当致力者乎？其要则在求之心而已。太祖高皇帝尝谕解辅臣曰：防闲此身，使不妄动。自谓已能若防闲，此心使不妄动，尚难能也。成祖文皇帝尝谕解缙曰：心能静虚，事来则应，事去如明镜，止水自然纯。是天理，是二祖之学，诚不外于心而得之也。臣愿陛下毅然以道自任，上法乎二祖，反求诸一心。养之于念虑未萌之先，以存其寂然不动之体；察之于几务既兴之际，以妙其感而遂通之用。俾其湛而虚也，神而明也。与太虚同其空洞焉，日月同其照临焉，四时同其运行焉，万物同其冲和焉。则一心既正，万化以行。敬不期敬，而自尔其常敬。一不期一，而自尔其常一。天德益以立，王道益以溥矣。帝王道统之传，不其益光也哉！至于用人必当，而皋夔稷契之在列。行政必允，而礼乐刑政之覃敷。则又此心之妙用，而我陛下之余事也。何敢以渎圣听哉！

陛下倘能鉴臣之愚，而于所谓敬一者贞之，贞久而会之于心，则道统之传，亘古今而独盛矣。斯文幸甚，宗社幸甚，臣何任祈吁陨越之至。臣谨对。

评析

这篇对策能抓住立论的根本，使论点既“正确”又“鲜明”。

议论文必须具备论点、论据、论证过程这三个基本要素。其中论点是主脑和灵魂，其他的两个要素都是紧紧围绕在它的身边的，

它们受论点的支配和趋动，为论点的存在而生存。没有了论点，一切的工作和措施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高明的议论文作者在结构自己的文章时，最关心的是怎样抓住实质，树立论点，并在以后的文章展开时，无论采用何种建构方式，总是让论点寸步不离自己，这样才能使文章富有现实存在的意义。

在应对性文章中，抓论点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只有论点给抓住了，才不会使文章显得松散而毫无生气；只有论点选对了，才不会使文章偏题而失去写作的意义。论点的正确与否，是保证一个贡士的文章能否获得主考官认可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像现在各类考试的作文一样，只要论点“正确、鲜明、突出”，那么最基本的分数就可以得到了。

李春芳的这篇文章就很善抓“论点”。他认为“道统之传，非帝王莫之能当”，臣下“欲接续帝王道统之传”，是种僭越的行为。明王朝推崇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但是很强调尊卑有序、君贵臣轻。朱元璋为孟子说过“民为贵，君为轻”，“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类的话，曾撤去过孟子在孔庙中的神位，命刘昆孙等删节《孟子》一书的文句。所以，重君轻臣是朱明王朝的一贯家风，当然是不喜欢以帝王之尊来和臣下为伍的。李春芳历史上就是个依唯两可，无所事事，甘当和事佬的人物，故当然会明白策问问题背后的帝王真实心态，于是，在立论中他始终“毫不动摇”的坚持自己的论点，左一个“道统之传，非帝王莫之能当”，右一个“臣不可与君道并”，反反复复，通古明今地申说君臣有别的理由，可说是十分地“旗帜鲜明”了。这当然在朱明皇帝看来，是立论正确的了。

（苗青）

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科

状元:申时行

申时行(1535～1614)字汝默,号瑶泉,晚号休休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嘉靖四十一年状元。例授修撰。以文字受知张居正。万历六年任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政务。进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在官期间,唯图自保,排斥异己,无所建树。后因议建储事遭谴。万历十九年辞官。有《赐闲堂集》。

策问

制曰:朕惟自昔帝王,莫圣于尧舜。史称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矣。然当其时,下民犹咨,泽水为灾,有苗弗率,则犹有未尽治平

者。岂二帝固弗之恤欤？抑其臣任之于下，而上可以无为？不然，何以垂衣而治也？三代莫盛于成周。宣王中兴，《诗》称召伯平淮夷，方叔征蛮荆，吉甫伐獯狁，惟得其人以分命之，是以不劳而治。朕常嘉之，甚慕之。朕抚天下四十有一年于此矣，夙夜敬事上帝，宪法祖宗，选任文武大吏之良，思与除民之害而遂其生，兢业不遑，未尝有懈。间者水旱为灾，黎民阻饥，戎狄时警，边圉弗靖，而南贼尤甚，历时越岁，尚未底宁。岂有司莫体朕心，皆残民以逞，有以致之欤？抑选任者未得其人，或多失职欤？将疆圉之臣，未能殚力制御玩寇者欤？夫朕有爱民之心而泽未究，有遏乱之志而效未臻，固以今昔不类，未得如古任事之臣耳。兹欲使上下协虑，政事具修，兵足而寇患以除，民安而邦本以固，灾咎可弭，困穷可复，以媲美虞周之治，其何道而可？尔诸士悉心陈列，勿惮勿隐，朕将采而行焉。

对策

臣对 臣闻帝王之御极也，体君道以奉天心，而后可以建久安长治之业。肃臣纪以奉天职，而后可以成内修外攘之功。何则？人君者，天之所授，以统一万方，而临驭兆民者也。其位尊，其任重，故君道常主乎逸。人臣者，天之所命，以左右一人，而分理庶政者也。其分卑，其事赜，故臣道常主乎劳。君能奉天以端拱于上，而以其事责诸臣，则无为而化成，不言而功著。若于穆之运，玄机之宰，不假于推迁之力，而自然造物者矣。是谓能奉天心，而久安长治之业可建也。臣能奉君以奔走于下，而以其身致之君，则同心以共济，协忠以体国，若四时之佐，五行之吏，各效其宣布之能，而罔有违天者矣。是谓能奉天职，而内修外攘之功可成也。不然

则一人之身,万几攸萃,安能一一而理之?而庶官之众,各有司存,能不蹈于瘝旷之咎哉?故君必率臣以图久安长治之业,臣必辅君以树内修外攘之功,则和气溢而宇宙清宁,理道昌而民物康乂。顺治于内,而万方弘一统之规;威严于外,而四夷效咸宾之美。巩国祚于苞桑之固,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唐虞三代之治,不可复睹于今日哉!

钦惟皇帝陛下禀刚健中正之资,合阴阳动静之德,际熙洽御天之运,膺寿考作人之符。精诚格乎穹昊,而瑞应骈臻;妙道契乎玄元,而休征毕集。盖媲美唐虞而超越乎三代者。臣窃伏草茅,沾被圣泽久矣。乃者叨有司之荐,得以与对乎大廷。而圣问所及,特拳拳焉,首述唐虞成周之治,继悯水旱盗贼之灾,任事失人之咎,而终究夫足兵安民之术,弭灾救困之方,且戒臣等以勿惮勿隐也。大哉皇言,忧国忧民之心见乎词矣。敢不披沥愚衷,以对扬于万一邪?

臣闻之《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明君在上,而又有良臣以左右之,则庶事可理也。又曰: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言君能宪天,而为臣者自敬顺之,罔敢或悖也。是故君为元首,而宪天于上,则法天以为聪,而居高听卑,可以不劳而坐听天下。法天以为明,而临下有赫,可以不劳而坐照四方。是君者,法天道以无为者也。臣为股肱,而钦若于下,则代君以用其聪,而天下之利病,皆通达而无所壅;代君以用其明,而斯民之休戚,皆洞察而无所遗。是臣者,奉天职以有事者也。是故唐虞之世,万邦咸和矣,四方风动矣,文明之会昌矣。尧舜以聪明极圣之主,默运无为之治,而又有禹皋稷契伯益之臣,共佐太平之业,故下民之其咨也,洚水之为灾也,有苗之弗率也,尧舜非不之恤也。惟其忠良之佐,足以赞皇猷;弼直之邻,足以弘帝道。以恤阻饥则有率育之臣,以拯昏垫则有克勤之臣,以格负固则有赞德之臣。诸臣者,其奉君如奉天也,孜孜焉同寅协恭,罔敢怠遑也。故尧舜虽有旰食之忧,

而终得以享垂衣之治。至今称中天之盛者,必曰唐虞,此尧舜得臣之明验也。周宣之世,海内乂安矣,国势浸隆矣,文武之业复矣。宣王以聪明有道之君,嗣守无疆之业,而又有召虎、方叔、吉甫之臣,夹辅中兴之治。故淮夷之猖乱也,荆蛮之不靖也,玁狁之虔刘也,宣王非不之虑也,惟其位元宰者才兼乎文武,总元戎者勋联乎将相。有宣威江汉之臣,而淮夷率俾。有壮猷南国之臣,而荆蛮来威。有薄伐太原之臣,而玁狁于让。诸臣者,其事君亦如事天也,惴惴焉矢心协力,罔敢戏豫也。故宣王有继述之思,而终以成再造之绩。至今称中兴之盛者,必曰成周,此宣王得臣之明验也。尧舜宣王之为君,法天道以无为。而唐虞成周之臣,奉天职以有事。则所以达久安长治之业,成内修外攘之功者,岂偶然哉!

臣伏观陛下临御以来,四十有一年矣。上帝之申眷,不为不隆,而诚敬愈笃。祖宗之成业,不为不固,而仁孝愈纯。钦天有记,以表昭事之忱。祖德有诗,以发聿追之念。至于虑切民恫,任专吏职,责成于守令矣,而巡督之臣,岁不绝遣;外付托于将帅矣,而总制之命,任必加隆。无一念不在于民瘼,无一言不轸乎国虑。臣有以仰窥陛下之心,即尧舜之心,而周宣不足侔也。于今诸瑞咸集,四灵毕至,固足以彰陛下之峻德鸿勋,超卓百代矣。然淫潦为灾、则町畦有垫溺之苦;亢旱为虐,则阡陌有枯槁之忧。倭夷窃发于东南,而海波弗靖;丑虏跳梁于西北,而边尘屡惊。甚则辽蓟之势,日就孤危。而江右之贼,岁成延蔓。殊非圣世之所宜有者,正尧舜忧民之时,周宣励精之日也。

臣伏读圣制有曰:间者水旱为灾,黎民阻饥,戎狄时警,边圉弗靖,而南贼尤甚,历时越岁,尚未底宁。岂有司莫体朕心,皆残民之逞,有以致之欤?陛下之言及此,万国万民之福也。臣窃观内外诸臣,凡折圭儋爵,结绶分符者,孰非陛下之宠荣乎?凡拥旄杖钺,制阃握兵者,孰非陛下之威灵乎?谓宜夙夜匪懈,寝处不遑,布宁谧

之化于域中，扬振肃之威于阃外，不负天子而勿为圣世之瘝官也。然各私其身者，罔致恤于民依。各利其家者，莫究心于国事。内而守令藩臬，固必有旬宣惠和，忧勤抚字之臣矣。然而肥己瘠民，营私蠹国，以催科聚敛为能，以簿书期会为急者，亦多有之也。外而营屯督府，固必有敌忾鹰扬，严明果毅之臣矣。然而坐失机宜，轻损威重，隐败衄以为捷，幸安静以为福者，亦恒有之也。人臣咸若是，则何以成内修外攘之功，而佐久安长治之业哉！盖陛下爱民之心，容保如天地，而诸臣不能承宣德意，以弘康国之猷。陛下遏敌之志，果决如雷霆，而诸臣不能奉扬威命，以茂肃清之烈，是自负于尧舜成宣之主，而有愧于唐虞成周之臣多矣。

及读圣制终篇有曰：兹欲使上下协虑，政事具修，兵足而寇患以除，民安而邦本以固，灾咎可弭，困穷可复，以媲美虞周之治，其何道而可？臣愚以为，上者下之表也，政事者臣之纪也。足兵以除寇，将帅之责任也。安民以固国，守令之职业也。灾咎之有无，困穷之复否，皆由此出者也。为今日计，莫先于任人，尤莫要于择人。夫国家分职命官矣，即列郡专城，遐陬僻壤，莫不置吏，盖未尝不任人也，臣以为任之而未当也。国家举贤敛才旧矣，即铨司法曹，明黜显擢，罔有违例，盖有未尝不择人也，臣以为择之而未精也。任之未当与择之未精，而欲得人以俾圣治，是犹楩梓未充，而需栋梁之用。穮蓘弗习，而希稼穑之成。臣知其弗能也。故夫欲修内治者，在慎择乎守令而已矣。欲平外患者，在慎择乎将帅而已矣。董仲舒曰：守令者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守令而不得其人，虽日布蠲恤之令，时廑惠鲜之思，民犹不被其泽也。今也阖郡无文翁之化，而渔猎民资者接踵。邑里无鲁恭之风，而朘剥民膏者比肩。以牧羊而暴政日闻，以齿焚身而败官弗恤。郡县之民，几何不流离而攘窃也。必也精选用之法，严举劾之科。其未任也，试以经济之略，必求谙练民情，通达治体，而不拘选用之途，如唐试理人

策可也。其既任也，责以久任之功，必使吏安其官，民狎其政，而不拘迁转之格，如汉之为吏长子孙可也。其任而获效也，优以格外之赏，必为之车服，崇之阶御，以彰卓异之勋，如汉之爵至关内侯可也。如是则有民有土之寄不轻，数迁数易之弊可免，而人知淬励，以期不负乎宠渥之恩矣。宁有守令失人之患哉！

孙武曰：将者，三军之命，国之重任，不可不知也。将帅而不得其人，虽决策于九重，定计于千里，犹未可以临敌也。今也操练之律虽严，而士无投石超距之勇，衣粮之给如故。而将无搴旗陷阵之能，论战斗则缩颈而股栗，闻调遣则掩耳而口噤，边圉之寇，几何不肆行而窃发也？必也慎武举之选，严比试之条。有洞识兵机，明习边务者，材可任也，则不拘以骑射之习，如任杜预以平吴可也。有摧锋陷敌，决胜先登者，功可录也，则不绳以文法之细，如赦魏尚于云中可也。有保障一方，折冲万里者，权可假也，则不牵以中制之命，如委充国于金城可也。如是则真材不耻于武弁，良将不苦于约束，而人得展布以自效。夫捍御之能矣，安有将帅失人之患哉！有贤守令以宣德化于域中，则政治毕举，而内有顺治之休。有名将帅以扬威灵于阃外，则纪律章明，而外有威严之烈。由是民生举安，则邦本有磐石之固。由是兵威日振，则寇患无潢池之虞。和气交蒸于海宇，而灾害不兴。颂声流布于黔黎，而困穷以复。尚何不足以成久安长治之业，而绍唐虞成周之盛哉！

抑臣又闻之，朝廷者四方之极也，纯心者用人之枢也。惟陛下常存敬一之心，以端拱于上而已。敬则存其心而不放，一则纯乎理而不杂。深宫燕闲之中，而不忘乎知人安民之虑。斋居邃密之际，而日严夫敬天法祖之忱，则心正而朝廷百官皆一于正矣。文武大吏有不奉承，而守令将帅有不奋励者哉！臣不识忌讳，干冒天威，无任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评析

申时行的这篇对策很能抓住策问诸多问题的关键和实质，他慧眼独具，拈出“君”，“臣”二字大作文章，确实显示出敏锐的洞察力和概括能力。

对于“君”，他基本上是一边倒的，竭力崇扬和褒颂。无论是有些渺茫的尧舜，还是遥远的周宣王，对他们他都无一贬词。尧舜是“聪明极圣之主”，周宣王是“聪明有道之君”，即使他们统治的时代发生了种种的天灾人祸，内乱边患，都不是他们的罪过，而他们也能从容自如，得贤臣之力，尧舜以成“垂衣之治”，周宣王也得以有“再造之绩”。对于已统治天下达四十一年的嘉靖皇帝，申时行当然更不能有一微词，他称颂嘉靖皇帝是具有“尧舜之心”的君主，而“周宣王不足侔也。”对于嘉靖皇帝自中年之后的新“喜好”——谈论瑞祥，他也一味应合，竟说：“于今诸瑞咸集，四灵毕至，固足以彰陛下之峻德鸿勋，超卓百代矣”。他采取的这种立论姿态当然是会受当今皇帝的喜爱，既不会“偏题”，更不会“跑题”，用今天的话说，当然是“思想正确，论点鲜明”的了。

对于“臣”，申时行却颇能“一分为二”。他对他们既有“褒”的一面，又有“贬”的一面。对于上古至周代的大臣们，无论禹、皋、稷、契、伯益，还是召虎、方叔、吉甫，他基本上是褒的，目的是以为当代的人臣典范和榜样。对于当代的大臣们，他是亦褒亦贬，运用的方法却很不一般，他连用了好几个“固必有……亦多有”的句式，以褒发端，以赞扬大多数为主，以贬结束，以批评一小撮为次。如此的立论方式既肯定了大多数，又批评了极小数，既然显示了当今

大多数臣子的吏道精良，又透出了当今一小部分臣子的吏德黑暗。成绩是主要的，忠贞忧勤之臣是占大多数的，但也不乏缺点，也有一些肥己营私、隐败畏敌之徒。他采取的这种姿态在当时也是颇为“正确”的，既没有得罪大多数大臣，也能道出一部分现实的真实，同时也能为当今皇帝所认可，可以说“一石三鸟”，效果当然是不错的。

申时行的对策确实是很高明的，很有些玄妙可让作类似文章的人所学习。

（苗菁）

隆庆二年(1568)戊辰科

状元:罗万化

罗万化(1535～1595)字一甫,号康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隆庆二年状元,援例授翰林院修撰,与修《世宗实录》。万历二年升至侍读,主修《大明会典》。历官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他为官较为清廉,不慕荣利。晚年多次上书乞归,获准。病逝于归家途中,赠太子太保,谥“文懿”。

策问

制曰:朕惟君天下者,兴化致理,政固多端。然务本重农,治兵修备,乃其大者。《书》言:先知稼穑艰难,乃逸。又曰: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夫成王初亲大政,而周公即拳拳以此告之,其意

深矣。朕仰荷天眷,获嗣丕基,自惟寡昧,未烛于理。尝恭诵我太祖高皇帝《藉田》谕,成祖文皇帝《务本训》,乃知王业所由兴,民生之不易。及观祖训所载居安忘备之戒,又日兢兢焉。兹躬率臣民耕藉于南郊,又屡敕边吏慎固疆圉,博求制虏长策,亦欲庶几乎知艰诘戎,以觐扬我二祖之光烈。顾彝典虽举而实政未孚,督策虽勤而武备犹弛。四方浮惰者众,未尽归农也。何以使人皆力本而不失业欤?自屯盐之法坏,而商农俱困,边储告乏。今欲举之,其遗法尚可复欤?丑虏匪茹,警报岁闻,何以创之,使不敢复窥欤?议者或言宜战,或言宜守。或欲罢调兵,或欲练土卒,计将安所决欤?朕日夜图虑安攘之策,莫急于斯。而行之靡效,其故何欤?抑其机要所在未克振举,故人罕实用,功难责成欤?尔诸士习于当世之务久矣,其仰绎我皇祖垂训贻谋之意,有可以便民益国者,明以告,朕将采而行之焉。

对策

臣对 臣闻人君之治天下也,必安攘兼举而后可以成天下之至治,必明断并行而后可以收天下之实功。何也?君犹天也,凡内而中国外而四夷,皆覆冒于天,而为君所统驭者也。惟天好生,而覆帱之用并育而不害。惟君法天,而安攘之绩兼举而不遗。故务本重农以厚民之生,而于以成顺治之休。治兵备以固国之防,而于以达威严之化。是二者,诚有国之先务,而不可以偏废,不可以缓图者也。然非明以烛之于先,而断以行之于后,则虽外慕乎安内之名,而实效罔臻。虽从事于攘外之文,而成功罔奏。其何以合内外之治,而用舒夫宵旰之忧也哉?故必君以实心主之,而委

任以责成者，恒出之以英明果断之勇。臣以实心效之，而分猷以宣力者，每竭之以左右替相之诚。然后君臣道合而百度贞，上下志同而万化广。中国可安，四夷可攘。内可顺治，外可威严。而久安长治之功将致之而无难矣。

钦惟皇帝陛下以圣神之德，膺历数之归，至诚飨帝，恭己临民。天下臣庶，孰不翘首而观，拭目而望，以冀沾维新之化。而陛下方且望道未见，求治愈殷，乃特进臣等于廷，俯赐清问，拳拳乎安内攘外之策。顾臣愚陋，曷足以知当世之务。虽然，陛下此举盖将采而行之，非虚循故事已也。苏轼有言：君以名求之，臣以实应之。矧今陛下以实求之，臣敢不披沥以对扬万一耶？

臣窃闻之《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则知天之生民，所以左右而曲成之者，其责恒寄之君；而君之主民，所以生养而安全之者，其道实法乎天。此人君所以与昊天同一道也。夫惟人君有同天之道，则凡历象日月以经天之时，体国经野以相地之宜，立纲陈纪以定民之极，爱养樽节以尽物之利。皆所以兴化而致理也，皆人君所以法天之政也。然语其政之大者，则惟曰务本以重农，治兵以修备二者而已。何也？盖国以民为本，而农者民之命也，兵者又民之卫也。农有不重则衣食无所自生，而啼饥号寒之民，且将有转死于沟壑者矣。君固代天以任养民之责者也，而乃使民无以为生，可乎？兵有不治则备御无所由固，而寇贼奸宄之发，且将有骈首于锋镝者矣。君固代天以当安民之责者也，而乃使民失其所卫，可乎？是故成王初亲大政，正天心陟降之际，人心观仰之时也，而周公所以拳拳于告戒者，一则曰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一则曰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是岂无深意而漫为是言者哉？盖以知稼穑之艰难，则农事修而民食有资，人君养民之责尽于此矣。知戎兵之当诘，则武备饬而民生有卫，人君安民之责尽于此矣。夫人君而诚使民之得养也，民之获安也，尚何化之不

可兴，而理之不可致哉！故穑人成功，而永清之治于前而有光。守在四夷，而重译之朝愈远而不替。此古今之称善治者必曰成周，而诵周公之功者，亦至今不衰也。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藉田有谕曰：欲财用之不竭，国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其必由农乎？大哉王言，谆谆乎重农之意也！成祖文皇帝务本有训，首举太祖创业之难，次及往古圣贤之君，昏乱之主，以昭鉴戒。讦哉圣谟，切切乎垂裕之心也。而又作《祖训》一书，兢兢乎选将练兵之图，居安忘备之忧，则当时所以重民之命，严民之卫者，盖周至而曲尽矣。故民皆乐业，而太和之治允洽。夷皆贡琛，而来王之化益昭。内固无不顺治，而外亦无不威严。所以上追成周之盛，而启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休者，端不在于此哉！惟我皇上临御以来，躬率臣民耕藉于南郊，则一念重农之意已切至而不虚。而又屡敕边吏慎固封圉，博求制虏之长策，则一念防患之心又诚笃而匪懈。其于二祖之所以垂训，已身体而实践之矣。宜农事修而民无不遂之养，武功振而国无不安之民也。乃今彝典虽举，而实政未孚。啼饥号寒之民，不惟见于穷陬僻壤之所，而通都大郡亦或有不免焉。督责虽勤，而武备犹弛。寇贼奸宄之发，不惟见于穷边荒服之外，而弄兵赤子亦尚有未靖焉。则所以廑我皇上宵旰之忧，而不遑豫逸者，良有以哉！

臣尝反覆思之而得其故矣。试以农言之。方今四方之民游惰者多，归农者鲜，此生之所以不众，而用之所以不舒也。今皇上诚欲驱天下之民而皆力于本，其道无他，惟贵谷粟而已矣。盖谷者，民之所资以为生也。民终日不食则饥馁随之，乃今挟末技而轻去其田里者，岂民之皆不乐生哉？谷贱故耳！我国家于常赋之外，罪有折赎，盐有飞挽。初非不贵谷也，嗣以国用不轻而见小以忘大，于是有折色之兑，有解银之额，而穑人之功日渐轻矣，又何怪其逐末而忘本也。故臣愿贵五谷，贱金玉，而晓然使知百谷之重，如晁

错之所奏焉。则激劝化导之下，岂无力本之农矣乎？如是而谓民之有失业者，未之有也。

若夫屯政之修，盐法之理，又厚农通商之最大者，独不可讲而行之乎？臣以为法久而弊者，势也；遇变而通者，权也。故屯种之田乾没于豪右，而番休之卒服役于权门，屯政之废久矣。然不曰湖山斥卤之可垦辟乎？奸豪欺隐之可没入乎？游手游食之民之可驱率乎？昔韩重黎之田振武，郭子仪之耕河中，彼岂夺诸其民者与？不过假不耕之地，而收无穷之税耳。今宜早为之。制田之见存者，履亩而正界，兵之服农者，间岁而代耕，而又时申召募之令，各与以可耕之田。则经界定而侵并之奸不肆，屯聚众而树艺之功可成。昔人谓其宽民力之最大者，正谓此也。工本之钞既难于补给，而守支之商又困于折兑，盐法之坏久矣。然不曰钱钞之用有当均者乎？输纳之粟有当复者乎？私挟私贩之令有当严者乎？昔管仲之煮山海，刘晏之斡淮盐，彼岂掊诸其民者与？不过总其权于上，而布其利于下耳。今宜定为之制，重钞法以收买余盐，而使灶有所偿，轻中纳以广招商人，而俾盐无所滞。则灶得实利而法禁可施，商有余赀而正课自溢。昔人谓其飞挽之最速者，正谓此也。不然则清查愈密而屯政愈不修，法禁愈严而盐法愈不理。辟之医者，不治其本而唯治其标，亦终必死而已矣，欲农商之两利也，胡可得哉！

以兵言之，方今边疆之地，丑虏匪茹，警报岁闻，此备之所以不严，而武之所以未振也。今皇上诚欲奋天下之武，而克壮其猷，其道无他，唯重将帅而已矣。盖将者，兵之所恃以为主也。兵一日无将则丧乱从之，乃今食廪饩而轻离其卒伍者，岂兵之皆不卫主哉？将轻故耳！我国家于沿边之地，分据以参将，专制以总兵。初非不重将也，后以承平日久而重文以轻武，于是有巡抚以辖之，有总督以统之，而文法之拘日加密矣，果安责其应敌而致胜也。故臣愿重其权，专其任，而屹然使当一面之寄，如赵充国之所行焉。则委任

责成之际岂无敌忾之勇矣乎？如是而谓虏之有窃发者未之有也。若夫战守之策，调练之宜，又安边保邦之最急者，独不可议而行之乎？臣以为一劳者永逸之基也，暂费者久宁之道也。夫今之虏非昔之虏矣，飚举乌集，众寡之势既殊，而狼奔豕突，险阻之地难凭，此当事者所以苦于战守之难也。然臣窃计之，举匈奴之众，曾未足以当中国之半，而卒未有能一创惩之者，其故何欤？无乃先发之谋未定，而积弱之气有未振乎？兵法曰：宁我制人，毋人制我。此劳逸主客之几也。故昔高宗之伐鬼方也，不惮于三年之久。而孔明之保全蜀也，不辞夫六 出之频。彼岂好为是穷兵哉？诚以不创之于前，则后之凭陵者当未艾。而不制之于我，则彼之窥伺者日未息耳。今丑虏之猖炽既如此，而犹因循委靡，不思所以振作奋励之术，则何以成中兴之治，而保边境于无虞也哉！故臣即今之势以权战守之策，必也其先决战乎？盖必以战为守，庶可以折方张之虏，而奠不拔之基也。今之兵又非昔之兵矣，锐气消沮，怯懦既已成风，而劳费不赀，司农又复告匮，此当事者所以病于调练之难也。然臣窃思之，即燕赵之士，固素称多慷慨之材，而卒未有能一饬练之者，其故何欤？无乃屯盐之政不举，而给饷之期有不时乎？兵法曰：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此饱馁勇祛之势也。故昔孔明之讨汉贼，莫急于五丈之屯。而唐宗之夷大难，悉仰于江淮之赋。彼岂徒为是扰民哉？诚以未战而不足其食，则不可以得其心。将战而不得其心，则不可以用其命耳。今边兵之柔脆既如此，而犹苟且支吾，不思所以长虑却顾之道，则何以振维扬之武，而致殷邦之嘉靖也哉！故臣即今之时以究调练之宜，必也其先理财乎？盖必财以为养，庶可以作有勇之气，而底于襄之绩也已。不然则闻敌而破胆者，既不能战也，而何足与言守？枵腹以待哺者，既不能养也，而何可以加练？譬之养身者有七年之病，而不蓄三年之艾，亦终无得而已矣。欲中外之宁谧也，胡可得哉！虽然，天下之事非知之难，而

行之难。人君之道非求言之贵，而用言之贵。故知而弗行犹弗知也，求而弗用犹弗求也。

臣伏读圣制有曰：朕日夜图谋安攘之策，莫急于斯而行之靡效，其故何欤？臣以为陛下特未实行之，而臣下亦未能实奉承之耳。果曰行之而靡效。则彼成王所以致四十年之太平，我二祖所以垂二百年之善治者，果虚语也。而抑别有要机之执，以为振举之术也哉？臣以为听言贵广也，而察之尤不可以不明。察言贵明也，而行之尤不可以不断。伏观皇祖之训有曰：内外大小官员，其言当理即付所司施行，诸衙门毋得阻滞。是言也，其兼明与断而出之者矣。故臣愿陛下奋精明之气，大明作之功。谷所当贵也，则断然以贵之，而不狃于近利之私。将所当重也，则断然以重之，而不惑于一偏之见。屯田盐法以次而举，战守调练相机而行。其始也，简众贤以使之，而不贤者弗庸。其既也，分众职以任之，而不职者必黜。贤否欲明以辨，昭然如日月之行于天，而光不可掩也。赏罚欲必以信，轰然如雷霆之鼓于天，而威不可测也。然后君宰其权，臣能其事，上作其气，下效其能。守令司民牧者，诚知重农而劳心于抚字，则国无不辟之野，而野无不耕之民者，可几也。而何游民不归农之患哉？将帅司兵柄者，诚知奋武而尽力于封疆，则士无不振之气，而国无不伸之威者，可几也。而何夷狄不率服之患哉？盖惟明克允惟断有成者，既并用而不偏，故内安中国外攘四夷者，斯兼举而不遗，周成王之治固不得专美于前，而我祖宗之业之盛又将廓大而增光之矣。此非要机之所在，而所当振举者哉！

抑臣又有献焉。心也者，万化之原，而明与断所从出者也。使其心纯乎天理之公，而绝无人欲之私，明断固浑然而在。苟一以私蔽之，则明有时而昏，一以欲累之，则断有时而失。其何以主宰化机，而役使群动哉！宋儒范氏曰：君心唯在所养。故臣愿陛下存养省察以体其心，精知力行以强其心，广询博采以大其心，亲贤远佞

以纯其心。一念之萌则曰:我其忘稼穑之艰矣乎?一虑之兴则曰:我其忘戎兵之诘矣乎?然后心无不存,而可以全明断之德,可以保安攘之功。此臣之愚忠拳拳而不已也。伏惟陛下少垂察焉,则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草茅贱士,不识忌讳,干冒天威,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

评析

在明代的殿试策问中,隆庆二年戊辰科的策问试卷是不多见的一份专讲时务的试卷。策问中开卷明义,曰"君天下者,兴化致理,政固多端。然务本重农,治兵修备,乃其大者",即君主当以重农治兵为急务。随后,连提了三个问题,即如何使人民归农务本?如何行屯盐之法?如何抵御异族侵扰?这些问题都是和现实的社会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般的只知唯四书五经之书是读,唯三皇五帝之事是究,唯先哲前贤之言是听的腐儒们,这次可能会碰上个大难题了。

但罗万化却能知难而进,较好地回答了这几个问题。

首先,对第一个问题,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今皇上诚欲驱天下之民皆力于本,其道无他,唯贵谷粟而已矣。"当然,当时许多人离开了土地,所谓"游惰者多,归农者鲜",主要是土地兼并的结果,罗万化虽没有看透这个现象的本质,但他能旗帜鲜明地提出一家之言,也能看出他还是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的。并且他还在文中对他的论点略加说明和阐释,可见他还是较有自信的。所以,从这两点上来说,他的这一回答还是圆满的。

其次,对第二个问题,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对于屯田,应进行

“履亩而正界”,“间岁而代耕”的工作,也就是对于天下的土地进行清丈,对于服役士卒实行代耕。这里“履亩而正界”的措施,终于在万历六年,在全国实行,据说曾较有效地抑制住豪强地主的侵并,可见罗万化是有一定的卓见的。对于盐法。应强调“总其权于上,布其利于下”的原则,“重钞法以收买余盐,而使灶有所偿,轻中纳以广招商人,而俾盐无所滞。则灶得实利而法禁可施,商有余赀而正课自溢。”这两条措施也是较为切于时用的。

再次,对于第三个问题,他提出的对策更是详尽具体,这就是,一曰重将帅;二曰先决战;三曰先理财。如果我们较为熟知明朝的历史,就会知道罗万化的这几条建议都是较正确的。譬如,就重将帅一条而言,明朝兵制是将帅对军队无调遣权,只有临时统率权,逢战事可被皇帝委派领军出征,战事结束,归还将印,军队脱离将帅归于卫所。这样的办法虽对皇帝从军事上加强和巩固皇权有利,但是对于加强将帅的责任心和勇气却是极为不利的。故明中叶以后,边警四起,军队的战斗力却日益衰落,这不能不和将帅不被尊重有一定的关系,许多明智之士早已看出这一点,而罗万化在这里又提出这个问题,可见这是当时普遍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罗万化的对策虽然篇幅并不太长,但却句句无虚言,句句能有所指,句句能有所陈,不愧是明代殿试对策中的一篇佳文。

(苗菁)

万历二年(1574)甲戌科

状元:孙继皋

孙继皋(1550～1610)字以德,号柏潭,江苏无锡人。文章道德为乡里推重。万历二年状元,时年25岁。例授翰林修撰,历官至吏部侍郎。敢于平反冤狱。劝谏至尊。曾因此被弹劾。卒于官,追赠礼部尚书。有《宗伯集》传世。

策问

制曰:朕惟自昔哲后膺乾,良弼纳海,未有不以典学勤政为务者,乃嗣服之始,尤斤斤焉。若《伊训》、《说命》、《访落》、《无逸》诸篇,详哉其言之矣。三代以远,强学励精之主代有作者。然考德论治,犹未可匹埒于姬姒,溯自唐虞。又有可疑者,夜分讲经,岁周太平御览,只日不废讲读,学非不笃矣。而兴造洪业,顾出于马上,得

之于不事诗书者，何欤？衡石程书，卫士传餐，汗透御服，日旰忘倦，政非不勤矣。而政理之效，独称躬修玄默清静无为者，何欤？朕以冲年践祚，未烛于理，惟仰遵我皇考遗命，讲学亲贤，日勤劝览，细大之务悉咨辅臣，以求厥中。夙夜孜孜，罔敢暇逸，亦欲庶几乎诗书所称，无坠我二祖八宗之丕绪。然论者谓帝王之学与韦布不同，盖不在章句间也。不知舍章句之外又何学欤？又或谓主好要则百事详。所谓要者果安在欤？往代陈谟有裨正始，如贤良三策，神爵言变俗，永光言审尚，及治性六戒，劝学四仪，初元节俭，建初荡涤烦苛，先天元佑十事，治平三札，熙宁稽古，正学定志。论总之不越此二端矣，可得而悉数之欤？亦有可行于今者欤？尔多士习先圣之术，明当世之务，其为朕折衷众论，究其指归。典学何急？立政何先？或古今异宜，创守殊轨，悉茂明之。以副朕慎始笃初之意。毋泛毋隐。

对策

臣对 臣闻帝王之继天以立极也，端其本以为学，而后可以立天下之治原。审其要以出政，而后可以宏天下之治化。何者？人君之学非徒以资诵说也。凝神于宥密，涵养于穆清，固羲皇以来之道统，所赖以继之于无穷者也。本之弗端，则其学也，为儒生目耳之学，而何以造于天德之精。人君之政，非徒以饰文为也。任君师之责，为治教之宗，固羲皇以来之道统，所赖以衍之于不替者也。要之弗审，则其政也为后世粉饰之政，而何以臻于王道之极。惟求端于本而不徒事于口耳之粗，则愈涵泳而愈充周，时敏之余皆实学也，圣德所以同天而至治之原，于此乎端矣。惟致审于要

而不徒事乎粉饰之具，则愈敷施而愈恢廓，推行之际皆实政也。而至治之化，于此乎成矣。学以基政，政以显学。道合一而不偏学，务其本政，举其要事，不劳而可据。自古帝王不出邃密之中而道积厥躬，万世称至学。不烦措置之力，而事得其理，万世称至治者，此道行也。况出震维新，正道岸诞，登之始继，离方早正。人心望治之初，可不取其所当急者，以为典学之本。择其所当先者，以为立政之要也哉！

钦惟皇帝陛下弱齿含元，岐嶷神授，十龄出阁，温文日新。正位宸极而玄德愈光，委政耆硕而王猷益扩。嘉纳帝鉴图说而披览不倦，一舜典尧谟之式。命书四箴六箴而顾諟不忘，一汤盘武几之铭。近又渥经筵之赐，严谨吏之饬，盖学已至矣，政已宏矣，轶于唐虞三代之盛矣。乃犹不自满假，进臣等于廷，俯赐清问。首举商周之训，次及汉唐宋君之事，而终策臣等以典学立政之要，慎始笃初之规。岂意臣等习先圣之术，明当世之务，有足以稗万分之一者乎？而臣非其人也。虽然，臣愚学惭稽古，志切摅忠，敢不披沥罄竭以对。

臣闻之，君者天之子也，民之主也。为往圣继绝学者，其道也。为万世开太平者其责也。故美玉不琢则射斗之光不生，宝鉴不拭则映日之晖不发，圣人不学则光天之德不耀。甚矣哉，学之弗可已也！然不曰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嗣服之始，学其不尤要乎？家而无政，则大夫无以著浚明之勋。国而无政，则诸侯无以树亮采之绩。天下而无政，则天子无以布清宁之化。甚矣哉，政之不可忽也！然不曰慎厥初惟厥终，终以不困。不惟厥终，终以困穷。嗣服之始，政其不尤要乎？是故临朝愿学，临政愿治，凡为哲后者皆然，而始尤重也。论学以辅德，论政以辅治，凡为良弼者皆然，而始尤切也。粤稽诸商，太甲高宗善守成者也。臣考其初，则有伊尹傅说之诲矣。人纪之修，风愆之戒，非伊之所

为训王者乎？逊志之益，聪明之宪，非说之所为诏王者乎？臣言焉，君行焉，此所以终允德而靖殷邦也。故终商之世，而曰中兴之令主者，必推太甲高宗也。载稽诸周，成王亦善守成者也。臣考其初，则有周公之诲矣。绍庭上下，陟降厥家，非《访落》之诗所为作乎？稼穑艰难，政事劳瘁，非《无逸》之书所为戒乎？臣言焉，君听焉，此所以觐耿光而扬大烈也。故终周之世，而曰继述之贤君者，必推成王也。

然学勤矣，而所以典其学者有本。政勤矣，而所以立其政者有要。顾三代以后，此义不明。强学之主诚代有之，而记诵之习兴矣。光武夜分讲经而昧三公之体，太宗岁周御览而失兄弟之义，英宗不废讲读而暗祸阶之萌。顾洪业之建，乃出于不事诗书之汉高，此其故何也？天授之资固足以创大业，而惟其弃焉不学，学焉无本，此高之所以止于高也。励精之主诚代有之，而粉饰之风盛矣。始皇衡石程书，何补于秦之乱？文帝卫士传餐，何益于隋之亡？宣宗汗服而不倦，何裨于唐之衰？顾致理之效，乃出于清净无为之汉文，此其故何也？玄默之修固足以致治平，而惟其政之不更，立之无要，此文之所以止于文也。

天启休明，生我皇上，日亲讲幄，而进学之志寒暑不忘。日咨辅臣，而求治之思细大不废。盖法天行之励学，独超于章句之外。宪天道以出政，深探夫理道之原。即商周之主不能过之，即诗书所称何以加焉。我二祖八宗之丕绪，真足以振扬于不坠矣。顾臣伏读圣制有曰：论者谓帝王之学与韦布不同，盖不在章句间也。不知舍章句之外又何学欤？又或谓主好要则百事详。所谓要者，果安在欤？臣有以见欲得其要，任人之道不可不讲也。请因圣问之所及而极论之。陛下终篇策臣曰：尔多士习先圣之术，明当世之务，其为朕折衷众论，究其指归。典学何急？立政何先？或古今异宜，创守殊轨，悉茂明之，以副朕慎始笃初之意。臣愚以为人之一心操

存舍亡，其几至可畏也。况人君之心，百欲攻之，一念弗纯，欲且乘之人焉。其系于学之进退，非浅小也。必也戒惧于不睹不闻之时，慎独于莫见莫显之顷。至善为的，主善为师，不息不移，允迪可期。帝王为学之本，或者其在是欤？譬则水焉，清之终日，可见眉睫，不过一挠，莫辨方圆，诚不可以不慎也。故曰：日月久照，不改其明。星辰久旋，不改其度。圣人久于其道，不辍其功。学至此，天下之至学也，非装缀为能，品藻为工，矻矻终年者此也。人之一身，一日二日其事尚难兼也。况人君之一身，百责萃之。人而弗任，则事且因之以隳焉。其系于政之得失，非浅小也。必也精其择于任用之初，专其任于简畀之后，不信谗间，不责细事，惟和惟一，政事乃乂。帝王为政之要，或者其在是欤？譬之御焉，輗軏不具，其何以行，有其辅之，一日百里，诚不可以不审也。故曰酒非曲蘗则无与成，羹非盐梅则无与和，君非贤臣则无与治。政至此，天下之大政也，非出纳必躬，案牍必亲，廑廑守法者比也。于乎此，典学之大本也，立政之大要也。

然臣又有献焉，纯心以为学，而任人之本即存。《传》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此之谓也。任人以立政，而辅学之资有赖。经曰：朝夕纳海，以辅台德，此之谓也。顾臣不患陛下弗纯心以为学，而虑聪明之太过，或以为商周之主不足法，而求于学之外焉。不患陛下弗任人以立政，而虑英敏之太过，或以为商周之君不足法，而求于政之外焉。求于学之外，则索之愈高，而失之愈远。将有谈正道而尚曲学，如公孙宏之惑武帝矣。求于政之外，则更之愈急，而行之愈弊。将有口尧舜而心桑孔，如王安石之惑神宗矣。此臣愚之过计固然，而亦岂可以弗早戒哉！伏愿我陛下上畏天地，近法祖宗，无以学至矣而骛于高远，无以政成矣而事于纷更，无以深居而好逸游，无以物力丰盛而事土木，无以海宇升平而事远夷，无以安处深宫而狎近习。则道德高厚，功化洋溢，内恬外熙，瑞应祥集，虞

夏商周不足侔矣，况汉唐宋乎哉！臣不识忌讳，干冒天威，无任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评析

今天来看当时的科举考试，虽然有知识面较狭窄的地方，有钳制人们思想的一面，但是它对一个考生的要求也是很高的，不仅要熟读经书，还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有时，在殿试时还要较多的涉及到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具体时务，这也需要举子们留心点现实，知道些历代政治制度和措施。

在孙继皋的对策文章中，我们就可看出这些特点来。

首先，他十分熟悉经书。因为经书是立论的根本，举凡哲学、政治、伦理、经济、文化等等一切思想的基础都是源于经书。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尊崇，经书的思想是“牢笼百代”的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统治阶级的正统的思想，人们只能对它进行必要的注释和阐扬，决不能进行更改和超越。举子们自幼饱受这种思想的教育，当然是已有相当的“思想基础”，况且又是面临着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大关口，更是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孙继皋的对策中讲“商周之训”的那一段处处都是从经书中来，语言如此，思想也如此，说它是“代圣贤立言”也不为过。他评价汉唐宋诸君时，其论点的基础仍然是经书。虽然经书在今人看来已深深钳制了当时士人们的思想，但在当时，却是一般人们无论如何也意识不到的，为了掌握经书，许多举子们可说是下了大功夫的。

其次，他还相当了解中国历史。历史在中国古代的人们看来，是治世的一面镜子，在究天地之变，察治世之道时都应相当的了解

之。殿试的策问也很注意考察举子们的历史知识，譬如万历二年的殿试策问的有些提问就设计得相当巧妙，它只列出历史事实，却不将历史事实的有关朝代、人物列出，这些都需要举子们去补充。像“夜分讲经，岁周太平御览，只日不废讲读，学非不笃矣。而兴造洪业，顾出于马上，得之于不事诗书者，何欤？……”以下一段话，就像一个个的填空题，需要举子们去一一坐实，指出这是那个朝代和人物的行为和事实。如果举子们不熟知历史知识，是没有办法对付的。所以历史上曾记载说，那时的举子一味读死书，连三皇五帝为何人都不知晓，这种说法是有些夸张了。

再次，他对现实政治也有一定程度的知晓。在孙继皋的这篇对策中，直接关涉现实政治的言辞并不太多，但是他是深深知道现实的情况的，无论说古论今，都尽量暗合当前，有所针对。这种用心处是我们应当较多地去揣度的。

（苗菁）

万历八年(1580)庚辰科

状元:张懋修

张懋修(1555～1634)字惟时,号斗枢,江陵(今属湖北)人。神宗权相张居正第三子。万历八年(1580)殿试一甲一名。援例为翰林院修撰。张居正去世,随即被中官张诚等人诬劾,遭削籍抄没,子弟戍边。懋修的“状元”头衔也被革夺。著有《墨卿谈乘》14卷,并搜集编辑其父的《张文忠公全集》。

策问

皇帝制曰:朕惟治古帝王大经大法,具在《周书·洪范》。其所以宰持万化,统摄九畴,则建用皇极,备矣。而论者谓乂用三德,实为权衡。又谓皇极以体常,以立本。三德以尽变,以趋时,则正直

刚柔，固与建极殊路欤，抑亦异用而同体也？三季以还，英辟代有，若躬修玄默，庶几刑措，力行仁义，身致太平，与刑名绳下，而表用循良，柔道理物，而总揽权纲者，于三德亦有合欤？又有可疑者，政务严切，事从宽厚，异施也，胡以各适于治？优柔好儒术，威强则武宣，异尚也，胡以同归于衰？含容姑息见谓养乱，而仁柔有余刚武不足者，胡以称庆历之隆？猜忌刻薄遂致播迁，而精于听断无复仁恩者，胡以媲贞观之美？至于唐虞夏殷之盛，所谓平康之世也。乃弼教以象刑，格苗以干羽，戮后会泣罪人。敷政优优，秉钺烈烈，其治亦兼用刚柔，何欤？朕绍休鸿业，精求上理，思建皇极为天下先。尝深诏执事，黜朋比，期荡平，祛伪刬浮，敦本责实，八载于兹矣。然而教化未洽，风俗未同，吏治未尽还淳，人心未尽归厚，岂朕之不敏不明，无能端好恶以示之极欤？抑三德之用，犹有未当欤？昔人论治，以水火喻宽猛，以阴阳配刑德，以琴瑟证缓急。与夫芒刃斧斤之说，粱肉药石之譬，是可采而行欤？夫舍刚柔而求正直，不善用三德而猥云极建，朕不知其解也？故进尔多士于廷，爰咨爰度，其尚阐析经训，标揭化原，若何以明教正俗，驭吏率人，俾斯世会归皇极，用追古帝王之治？悉心敷对，称朕意焉。毋有所讳。

对策

臣对 臣闻帝王之道，天道也。故必有合天之心法，以端化理之原。亦必有宪天之治法，以妙化裁之用。何谓心法，全体天德以为敷锡庶民之本，无偏无陂大公而顺应者是已。何谓治法，奉若天道以为变通宜民之政，知柔知刚鼓舞以尽神者是已。心法立而纯粹之精，与于穆而并运，斯圣人之所以合天也。治法行而神

应之妙，与大造而同流，斯圣人之所以宪天也。合天者以立本而建极之体，主持乎三德之用。宪天者以趋时而刚柔之用，流行于正直之中。体用合一，显微无间，古之帝王所以不降阶序而化行若神，纳天下于皇极，措斯世于平康者，率由此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躬不世之资，抚綦隆之运，天下喁喁然称圣主矣。临驭以来孜孜讲学，寒暑不替，而表正之极端，事事访求，细大不遗，而平康之化普。任贤图治，敛福锡民，八柄驭臣，九德咸事，德之所及与河海而同深，威之所加与风霆而并迅。治化之隆，固已六五帝而四三王矣！乃犹不自满假，于万几之暇，进臣等于廷，俯赐清问。谓帝王之大经大法具在《洪范》，故首以皇极三德同体而异用者为言，继以古昔君人异用而同体者为证，复询臣等以明教正俗驭吏率人之策，其使斯世会归于皇极，以媲美古帝王之盛。斯虞帝清问下民，周王望道未见之心也。臣敢不披沥以对扬休命乎？

臣闻《书》曰：天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则《洪范》之书乃天道也。人君奉天以子民，则必法天以运治。臣请言天道。夫太虚无形，秉握化权，溟茫漠泯，澒蒙鸿洞，是天道之所以立体也。嘘之以阳，吸之以阴，鼓之以雷霆，晅之以日月，润之以雨露，肃之以雪霜，是天道之所以致用也。生者杀之机，翕者张之地，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风霆日月霜雪雨露，日流行于亭毒之中，而太虚之体漠然不见其迹，斯天道之所以尽神也。人君法天以治，故皇极之畴曰：无有作好，无有作恶。无党无偏，王道荡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是圣人之心法与太虚而同体也。夫使天下而尽由于荡平，则圣人固可不赏不怒，垂衣拱手而默顺于理。乃人之才性殊科而世之情伪多变，将默然而任之乎？不容以无为也。将一法而治之乎？不能以尽变也。于是以其皇极之体敷之为三德之用，抚平康以正直，驭强弱以刚柔，有正治之者焉，以刚克刚，以柔克柔是已。有反治之者焉，以刚克柔矣，柔克刚是已。其情为喜

怒，其发为好恶，其事为生杀予夺，其权为威福命讨，其具为礼乐法制爵禄铁钺，是圣人之治法，与日月风霆雨露霜雪并运者也。然其为用妙矣，或纯用乎刚而天下不见以为毒，或纯用乎柔而天下不见以为懦，或刚而行之以柔，或柔而行之以刚，或先刚而后柔，或先柔而后刚，鼓之舞之，使天下日迁善远罪，而莫测其所以然者，是圣人之所以法天而尽神也。蕴之于内则浑涵精粹，贯彻于几微而化原以正。运之于外则交发互施，错综于万变而化理以弘。其相须之妙用如此，朱熹所谓乂用三德实为权衡，陈卿所谓皇极以体常以立本，三德以尽变以趋时，盖得其旨哉！三五之隆，至德渊闳，运用之妙，六籍所不能模焉。略观其迹，弼教明刑疑于刚矣，格苗舞羽又何柔也？下车泣罪疑于柔矣，后至之诛又何刚也？秉钺烈烈疑于刚矣，敷政优优又何柔也？凄然似秋而人不以为私怨，煦然似春而人不以为私德。要之归于平康正直而已，斯舜禹成汤之所以善法天也。

自时厥后世道浸衰，天亦不畀以《洪范》九畴，世主暗于大道，好恶反侧，既无以建皇极之体，至其治理则亦就其才性之近者而成之。汉文躬修玄默，几致刑措，似矣，而强宗悍虏莫能制也。汉宣刑名绳下，表用循良，似矣，而无辜被戮不尽无也。光武总揽权纲，盖亦兼用柔道，而信谶失刑有遗议焉。唐太宗力行仁义固已身致太平，而推刃同气有余愧焉。明帝政务严切，章帝事从宽厚，唐宣精于听断无复仁恩，宋仁仁柔有余刚武不足，则又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所谓东壁而望不见西墙者也。彼所谓英君哲王也，而犹如是，况乎优柔好儒术而倒持国柄，威强刚武宣而见制外戚，含忍姑息而凌逼于方镇，猜忌刻薄而播迁于奉天，如元、哀、代、德者又乌足道哉！

我太祖高皇帝崛起淮甸，肇造区夏，体备玄德，治兼往圣。观其和抚四夷，不勤远略，则舞干不足以为文；蹙吴灭汉，拯民水火，

则秉钺不足以为武。定律令锄强梗，则象刑戮逆不足以为威。赦灾眚蠲田租，则泣罪解网不足以为德。臣尝伏读御注《洪范》，以阴骘下民属之天，以相协厥居属之君，盖仰而颂曰：斯天再锡我圣祖以《洪范》九畴也。斯世斯民归极会极二百年矣，我陛下绍休圣绪，精求上理，虚己悬衡，因物顺应，则好恶之私不作。祛伪划浮，敦本责实，则偏陂之习已消。蠲逋税，谨谳狱，奖贤能，行久任，至恩也，柔道也。振材官，饬学校，诛侠少，申禁令，至威也，刚道也。臣尝伏读圣谕曰：朕方嘉与臣民会归皇极之路，曰：用臻师师济济之风，归于荡荡平平之域。盖又仰而颂曰：斯天三锡我皇上以《洪范》九畴也。纪纲振举，黎庶乐业，四夷向风，百嘉畅遂，建极之本，三德之用，陛下盖允蹈之而平康会归之化，盖已同符烈祖，追配哲王矣。

乃圣问犹以为教化未洽，风俗未同，吏治未尽还淳，人心未尽归厚，自引以为好恶未端，三用未当，而求所以明教正俗驭吏率人之化。臣愚何足以知之？虽然，臣闻古语，君行意臣行事，故明其义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今朝廷所以明教正俗驭吏率人，布之诏令著之章程者，固已至精至备。第令有司能其事而奉其职，陛下端拱受成事耳，奚必更求他术哉？惟是意之所在，则臣敢以两言献焉。其一曰明刚柔之实，其二曰坚持久之志。斯两者，臣之所谓治天下之意也。夫圣人之所谓刚，非曰严刑峻法以立威也。法立而使民不敢犯，令一而使民知所守。赏当而信，罚行而必，兴事考成，实事求是，而偷惰浮窳者不得以病吾治，是刚之实也。圣人之所谓柔，非曰姑息委靡以市恩也。矜不能赦小过，不侮鳏寡，不虐无告，恤困穷使闾阎无愁叹之声，理冤抑使犴狴无沉滞之狱，是柔之实也。寓教大于明作，行正直于忠厚，以义为威而不以怒为威，以德为惠而不以私为惠，则圣问所谓善用三德者也。世之论治者不达于此，苟见朝廷才一用法，则以为过刚，而与严刑峻法者并讥，徒见姑息萎茶则以为用柔，而与子惠保爱者齐誉，非知变达化之士也。

故刚柔之实，臣愿陛下辨焉。夫天道运而不已，故能成悠久之化。帝道运而不已，乃能深沦洽之仁。故事美成在久，而人之情始乎勤尝卒乎怠，是以圣人治天下兢兢业业慎终如始，譬之日月递照，阴阳代谢无日不运于太虚之中，而不见其止息，故气化无壅而岁功成。世之务近小者，苟见人之不率于教，与世之不登于理，不忿顽而求备，即苦难而中止，斯治之所以小康也。故恒久之道，臣愿陛下体焉。允若兹以之明教，而何患乎教化之未洽，以之正俗，而何患乎风俗之未同。以之驭吏，而何患乎吏治之不淳，以之率民，而何患乎民心之不厚哉！若夫子产以水火喻宽猛，贾谊以芒刃斧斤拟德法，崔实以粱肉药石譬宽严，其意则一，主于用刚者也。董仲舒以阴阳配刑德，陈宠以琴瑟证缓急，其意则一，主于用柔者也。斯愤世之孤谈，非致理之通议也。夫天不能以羁阳独阴育成万物，而人主之治独可以偏用刚柔也与哉？欲娇世主之偏，而不知已自蹈于一偏，不足为陛下诵也。虽然，有本焉，三德之用原于一心，心不可以一有蔽也。蔽于爱憎则喜怒用而好恶作矣，蔽于私邪则用舍谬而偏党成矣，蔽于逸乐则志意昏而颇僻彰矣。化原不端而欲三德之用不亦难乎？臣愿陛下建皇极必求之于心，恭以作肃，从以作乂，明以作哲，聪以作谋，睿以作圣。敬止之德必务于缉熙，刚健之精必期于纯粹，则一念之慈爱即为仁，一念之裁制即为义，斯之谓合天之心法，而行之为宪天之治法，民归皇极，世底平康，而康强逢吉之庆端有在于今日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草茅不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评析

正如张懋修所总结的，万历八年的殿试策问中共提出了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谓帝王之大经大法具在《洪范》，故首以皇极三德同体而异用者为言，继以古昔君人异用而同体者为证，复询问臣等以明教正俗驭吏率人之策，期使斯世会归于皇极，以媲美古帝王之盛。”

张懋修的对策也就围绕着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来结构全文。

他在第三自然段中以引证发端，然后畅言“天道”，得出“皇极”乃体、“三德”为用的结论。最后又引朱熹等人之语和六经等书中记载，以设问句式作结，既树立了自己的论点，又回答了殿试策问中的问题。

在第四自然段，张懋修以“自时厥后世道浸衰，天亦不畀以《洪范》九畴”句作为过渡，又转而回答了第二个方面的问题。他就所问略加总结，对汉文帝以下历代诸君一一评点，先褒而后抑，指出他们都于“三德”有未合之处。然后，提笔横扫，以“彼所谓英群哲王也，而犹如是，况乎优柔好儒术而倒持国柄，威强刚武宣而见制外戚，含忍姑息而凌逼于方镇，猜忌刻薄而播迁于奉天，如元、哀、代、德者又乌足道哉”的长句将策问中的有关提问概括答出。于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又被圆满地解决了。

从第五自然段到第六自然段，张懋修又依循常例，先颂扬明代诸帝之丰功伟绩，继歌颂当朝皇帝之硕圣大德，然后委婉地给当朝皇帝提出了“治天下”的建议，“其一曰明刚柔之实，其二曰坚持久之志”。并且，作者又大施笔墨，下定义，引明言，辨概念，设比喻，

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充分论证。这样，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又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总之，张懋修是很会作文章的，他先将对方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简明的总结，化多为少，化繁为简，然后一一答复，既显得运笔自如，又显得条理清晰，这不失是作对策文章的一个良策。

（苗菁）

万历十七年(1589)乙丑科

状元:焦竑

焦竑(1541～1620)字弱侯,号澹园,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幼年聪慧好学,曾先后师从著名学者耿定向和罗汝芳。万历十七年钦点为状元,例授翰林修撰。皇长子出阁,以竑为讲官。因对时事多有议论,为执政者所恶。二十五年主顺天乡试,因事被劾,谪福宁州同知。后毅然辞官退隐田园,专意学问。他博极群书,自经史稗官,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训雅,卓然名家。有《易筌》、《禹贡解》、《逊国忠臣录》、《澹园集》、《焦氏笔乘》、《玉堂丛话》、《献征录》、《熙朝名臣实录》、《国史经籍志》等传世。

策问

制曰：朕惟自古帝王立纲陈纪，移风易俗，一禀于礼法，使尊卑有序，上下相承，然後体统正于朝廷，教化行于邦国，所以长久安宁有此具也。当周之隆，天子总六官，六官总百执事，分职率属而万国理，朕甚嘉之甚慕之，是操何术而臻此？迨其叔季，先王之遗泽固在也，何以陵夷若是？其兴衰得失之故可指而言欤？至汉文时有以弃礼义捐廉耻长太息者，神爵中有以述旧礼王制为本务者，宋嘉佑间有论审势殷之先罚者，有疏瑾习比唐之季世者。或谓西汉贵刑名而阙于礼文，宋盛声容而疏于法制。然则诸臣之言果皆应古谊合时宜者欤？我太祖高皇帝用夏变夷，敷政立教，尝谕侍臣曰：礼法则人志定，上下安。又曰：制礼立法非难，遵礼守法为难。乃集为礼制著为定式，颁律令大诰于天下。洋洋圣谟，布在方策，可得而扬厉欤？朕以冲昧，嗣守鸿业，十有七年，夙夜竞竞，惟成宪旧章是监是率。间者深诏儒臣进讲礼经，重辑会典，使诸司有所遵守，庶几绍休圣绪，以兴太平。乃世教浸衰，物情滋玩，习尚亦少敝焉。其甚者士伍辱将帅，豪右凌有司，宗庶讦亲藩，属吏傲官长。凌替若此，何以消此悖慢使就约束欤？贪黩败节，奢侈逾制，谗说殄行，虚声贸实，诡异坏心术，倾危乱国是。浇漓若此，何以救其颓靡使还雅道欤？今诏书数下，中令既严，而帘陛之间，辇毂之下，犹有壅阏不行者。无乃礼教不修，法度不饬欤？抑风会日流而不返，积习已成而难变欤？将朕暗于大道，无能率作省成而示之极也，兹欲礼达而分定，法举而令行，纲维振肃，习俗淳美，以观扬圣祖之先烈，而远追成周之隆，何施而可？尔多士其悉抒所蕴，详著于篇，称

朕意焉，毋有所讳。

对策

臣对 臣闻帝王之临驭宇内也，必有经治之实政，然後其具彰，而有以成整齐天下之化。必有宰治之实心，然後其本立，而有以妙转移天下之机。何谓实政，饬制度明宪典，使天下分定而心安，威行而志慑，日范于精明严密之规，而清和咸理者是已。何谓实心，惩玩惕谨几微，使天下不约束而严，不刑名而肃，独运于渊微宥密之妙，而鼓舞莫测者是已。实政厝于上则相维相制，能创之必能行之，能倡之必能遂之，是明示天下以轨也，而我之治具既绸缪于礼与法之著。实心孚于下则相渐相靡，身奉之又心安之，始从之又终守之，是潜喻天下以神也，而我之治本又绾结于礼与法之先。古帝王所以陶范一时，舄奕千载，端居黼扆而朝廷之上下巍然，体统之常尊。高拱堂皇，而裨海之远荡然，教化之四达者，此道行焉耳。藉令有治天下之心而其具不备，则虽有宵衣旰食之勤，而卒病于经画之无术。有治天下之具，而其本不豫，则虽欲国纪世风之振，而卒病于斡旋之无机。此治古而下化瑟罕调，主纲绝纽，而一代之隆理，不能不有待于今日也。

惟皇帝陛下挺圣哲之英姿，纂祖宗之庥烈，经筵临御，亲贤讲礼而匪事乎文，为齐阁箴铭，养性收心而豫端乎轨，则百寮奉法。四海向风，盖已收太阿于掌上，鼓大冶于域中，而成周之治行且轶而驾之矣。乃犹不自满假，进臣等而策之于廷，諏以立纲陈纪移风易俗之道，鹭前王之得失，慨当世之陵夷，且欲挽悖慢浇漓之习，而明乎率作省成之术也。臣愚何足以及此？虽然，发愤毕诚，图策安

危，臣之愿也，敢不披沥以对。

臣观人君之于国，必有所与立。上之率乎下也为纪纲，则君之所以提挈振举之谓也。下之化于上也为风俗，则世之所为渐摩成就之谓也。乃纪纲之所由立，风俗之所由孅，必有具焉。有礼则上下辨，民志定而收天下清静宁一之功。有法则寇贼息奸宄宁，而杜天下倍畔侵凌之习。有率作屡省为礼法之本，则礼严于无体。法威于不怒，而神天下潜移默化之机。此其尊卑有等，上下相承，纪法立而风化行，由此出也。尝稽成周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故以三百六十属而统之六卿，以六卿而统之天子。其和邦国者曰六礼，以吉礼祀邦国之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军礼同邦国，以宾礼亲邦国，以嘉礼 亲万民，无非肃然示天下以不可易之分也。其禁邦国者曰五刑，野刑上功纠力，军刑上命纠守，乡刑上德纠孝，官刑上能纠职，国刑上愿纠异，无非凛然示天下以不可犯之威也。然其董正治官也，必曰祇勤于德。师听五辞也，必曰敬逆天命。而又日成考日，月要考月，岁终则命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然则兴事省成之说，虽肇于有虞，而惟周为备矣。故教化厘绵，法度毖敕。当其时，免罝备干城之材，游女励贞一之操，下之化也方沛如建瓴，则在上可知也，而何风俗有弗醇。周礼可以寒省难之大夫，明德可以折问鼎之楚子。世之衰也犹惮于委裘，则盛时可知也，而何纪纲有弗饬。昔人论太和在成周，宇宙间以此具此本修也。迨及後世，即维持世道，不能备举，而况其本乎？故汉宋诸臣，因时立论有不能概同者。贾谊以弃礼义捐廉耻而太息，王吉以述旧礼明王制为本务，彼非不知法制不可疏，而顾拳拳于礼也。苏洵论审势则称殷之先罚，司马光疏谨习比唐之季世，彼非不知礼文不可阙，而顾拳拳于法也。炎汉尚刑名而礼教多乖，赵宋盛声容而威刑或弛，故诸臣各就其所不足勉之，乃矫世之孤谈，非适治之通理